

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

茫漠の曠野ノモンハン

——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

[日]松本草平 著
华野
李兆晖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

茫漠の曠野ノモンハン

——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日）松本草平，（中）华野著；李兆晖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5（2005.6重印）
ISBN 7-209-03690-3

Ⅰ.诺… Ⅱ.①松… ②华… ③李… Ⅲ.诺门罕事件（1939）－史料 Ⅳ. E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0759号

茫漠の曠野ノモンハン
著者　松本草平
译者　李兆晖

出版发行：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电话：(0531)2098027　2098028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址：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中段　邮编：276017）
版　　次：200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6月第2次印刷
规　　格：16开（730×970毫米）
21印张　2插页　300千字
定　　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联系电话：0539-2925659

本书首次多角度反映了1939年日、苏在中蒙边境诺门罕地区的一次鏖兵。此战历经半年，重创日本关东军两个主力步兵师团，几乎全歼日军当时惟一一个坦克师团，日本称此战为日军历史上首次惨败，并被迫将“北上侵苏”改为“南下犯美”，偷袭珍珠港，从而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

书中配有220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真实反映了交战双方二战初期的武器装备及战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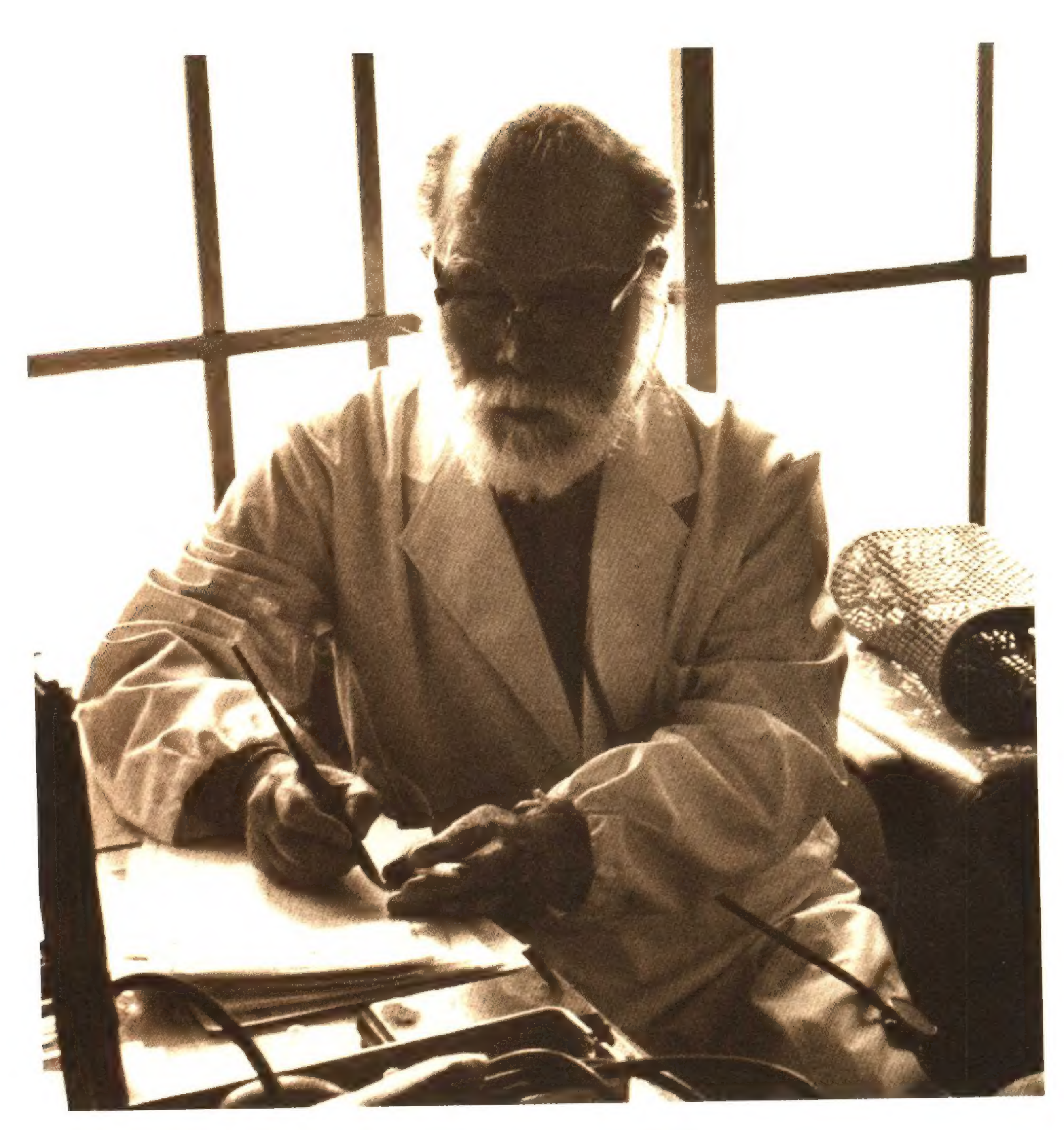
松本草平简介

1908年3月26日	出生于日本熊本县荒尾市平山
1932年3月	毕业于九州医学专科学校（现久留米大学医学部）
1934年10月9日	在大分市户次地区开设“松本医院”
1937年10月7日	应召入伍
1939年5月～10月	被卷入诺门罕战争，后在海拉尔陆军病院工作
1943年8月6日	再次应召入伍
1945年10月	返回户次地区，从事地区医疗工作
1978年6月15日	《茫茫的旷野——诺门罕》刊行
1980年9月1日	天心堂病院开院，任名誉院长（院长为其子松本文六）
1981年7月20日	去世

译者简介

李兆晖，1960年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1983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从事中医外科临床10年，后东渡日本学医。1998年10月，第一本译书在中国出版（作者：松本文六，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出版）。现在日本从事中医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丁莉　赵力
版式设计：李海峰
封面设计：秦德燕



作者　松本草平

茫漠の曠野ノモンハン

松本草平

原书封面

出版者的话

1939年5月，发生在中蒙边境的诺门罕战争，是二战初期一场对二战战局有重要影响的战争。交战双方，一方是苏联和蒙古军队，一方是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队。战争持续了5个月，以日本关东军惨败而告终，被日本陆军省称作“日本陆军成军以来首次惨败”。但由于诸多原因，有关这次战争的研究和公开出版物并不多见。

2003年10月，李兆晖先生（本书译者）将一本名叫《茫茫的旷野：诺门罕》的译稿摆在我们面前，并说此书在日本出版颇受挫折，仅由著者自费少量出版，希望能在中国得到支持，出版发行。

此后，编者认真研读了译稿，认为著者松本草平作为一名参战战地医官，较真实地记录了这次战争的惨烈及经过，亲身感受到日本关东军的残忍及底层官兵的厌战、反战情绪，并通过战后的深刻反思，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真面目。但同时，编者也认为，由于作者只是一位参战的底层官兵，对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及对战争的整个进程和意图，知道的不多，这既是松本草平先生的局限性，也是日本军部严密封锁战争真相所造成的。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编者邀请了对这场战争素有研究的华野先生，查阅了若干研究资料，增加了[相关背景]、[战史记录]、[历史点击]和图片及注释等内容，从而便于读者对这场战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此外，约请了中国军事史专家宋宜昌先生审阅了全书，宋先生还欣然应约为本书作序。为了与日文原著相区别，新增内容分别用不同字体和版式加以区分。

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人们反思历史，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2005年4月

原书前言

38年前的1939年，在戈壁大沙漠北端的诺门罕，我和许多年轻士兵咽下了悲愤的眼泪，满腔的悔恨全都撒在了“满”蒙边疆尽头的荒野上了。

许多战友的生命被白白地断送掉了，他们的死日夜不停地在鞭策着我这个随军医生，鞭策我把那段历史的真相告诉人们，敦促我把那一痛苦的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

忙忙碌碌，日复一日，不知不觉我已经是年近七十、鬓白发稀的老人了。真是岁月如流水、时光不等人啊。是时候了！我必须在有限的岁月里挤出一点时间，把这一历史事实记述下来。虽然我的文笔钝涩，但我还是想以墨代语，把我的亲身体验和心里话掏出来。

为了躲避苏军的炮火，我们不得不日夜蹲在像章鱼罐一样的战壕里，过着像原始人一样的穴居生活。遗书一封接一封地写，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明天是死是活，曾几度把自己的日记埋到战壕里，做好了去“玉碎突击”的准备。虽然我侥幸地活下来了，遗憾的是这些日记已经无处寻找了。

过去的记忆已经是朦朦胧胧了，眼见的是遮云蔽日的黄土，耳闻的是咆哮如雷的炮声，仿佛是投身于火热的地狱之中：浑身沾满鲜血的日本士兵，疯狂地扑向苏军的阵地，冲向苏军的坦克……

其实战争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写的，可写的只有那些悲愤而死的士兵，可安慰的也只有那些被送去当炮灰、并且是死无代价的亡灵。

我很想把当时准确的场所、人物、日期都写下来，可是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自己能活下来，炮火弹雨之中能保住自己一条性命已是竭尽全力了，根本就顾不上什么周围的战况，或者说是根本就漠不关心。

从1939年8月20日苏蒙军发起总攻之后，我整个就像是在梦幻里一样，脑海里留下的是那些永远难以抹去的记忆。

松本草平

1977 年10月1日

致中国读者

作者长子　松本文六

这本回忆录记述了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罕战争。诺门罕战争是一场日苏之间没有宣战的战争，所以在日本把这场战争称为“诺门罕事件”。但这却是“日本关东军仅第23师团2万兵力之中，死伤率就高达70%的一场大战争”（《昭和史》，半藤一利著，2004）。这本书是我的父亲松本草平（真名叫松本弘）六十花甲时才出版的。我原本以为军医只是在后方的野战医院里处理一下伤病员而已，看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他是作为一名兵卒被派往战火纷飞的第一线，这令我更想去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个诺门罕。

1999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本书译者李兆晖先生一起参加了一个叫“诺门罕事件60周年纪念慰问团”的旅行团，到诺门罕战争爆发地去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站在哈拉哈河西岸，望着茫茫无际的诺门罕旷野，我禁不住地问：“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地方打仗？”我虽然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但是从内心里却理解了作为一名普通兵卒被卷入这场无谋战争之中的父亲为什么那么愤怒、那么怨恨。考察完毕后，我又读了一遍本书，才真正弄明白了父亲（当时71岁）在1980年9月1日天心堂户次病院——这个病院是诺门罕参战者的纪念塔——建院典礼时说的那句话的含义。昨天还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士兵，第二天却成了尸骨，这种冤念就全部凝聚到“诺门罕参战者纪念塔”上了。父亲始终是反对战争的，在1943年再次被招入伍后，不久就被扣上一顶“赤色分子”的帽子，原因是他私下里散布日本战败论。

翻阅一下日本的近代史，尤其是昭和史，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迅猛发展工业，迈进了现代国家的行列。20世纪初期经过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傲慢起来，不顾国力而一味地追求“富国强兵”。到了1928年，一手制造了暗杀张作霖的“皇姑屯爆炸事件”；接着又挑起了“满洲事变”，侵占了中国的整个东北地区；接下来是建立伪满洲国，废弃华盛顿条约，并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为借口，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日中战争”。1938年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1939年5月，作为“东亚新秩序”的第一步，有意识地挑起了诺门罕战争。

诺门罕战争是以满洲西北部诺门罕为中心，在茫茫的呼伦贝尔高原上，日本关东军加“满洲”军和苏联远东军加蒙古军之间展开的一场大激战。于是“小小的国境纠纷就变成了大大的日苏战争了”。开战之日，父亲从两军的阵地布局、兵力火器

对比上就预感到关东军要败。果然不出所料，关东军大败，父亲所属的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然而，策划和指挥这场战争的关东军参谋服部中佐和辻政信少佐，不但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升职受奖，荣升到日本陆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任作战班长和战力班长。两个人后来又极力推行“南攻政策”，成为太平洋战争的急先锋。

假如日本当时能够正儿八经地总结一下诺门罕战争的教训，也许不会再扩大阵线、发动以后的战争了，日本也许不会再继续侵略别国了。遗憾的是历史是不存在“假如”这两个字的。

战史研究家户部良一在他的著作《失败的本质：日本军队组织论的研究》中指出：“诺门罕战争的失败，是太平洋战争败北的序曲。作战目的不明确、中央与地方不沟通、前线部队独断专行，还有一点就是过度强调和夸张精神作用。”可谓是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

遗憾的是，日本好像忘了这些，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以来每年都去参拜第二次世界大战A级战犯和一般战死士兵合祭在一起的靖国神社，引起了亚洲诸国的反感。不仅如此，还往伊拉克派遣了日本自卫队，甚至策划修改以第九条“放弃战争”为中心的日本国宪法。不得不说，这是自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再次抬头。

父亲的这本战争回忆录之所以希望中国的读者一读，就是想让中国人民知道日本军国主义当年是如何独断专行、无谋胡来；让中国人民知道日本的侵略不但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莫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创伤，同时也涂炭了无数日本人民的生命。

希望世界没有战争、和平共处，尤其是希望日中两国人民能够长期友好下去，这也是这本书为什么要在中国出版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此外这也是我对已故父亲的一个最大的安慰。日本在日中战争中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现在父亲的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让深受其害的中国读者一读日本普通人的战争体验，作为作者的长子，我甚感荣幸。

最后对此书的翻译者李兆晖先生，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金明善先生、丁莉女士、杨大卫先生，以及为本书出版而付出辛劳的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的黄涛先生、山东省国信招标有限公司的刘大伟先生等，深表谢意。

2004年12月

关于诺门罕战争（代序）

——中国军事史专家宋宜昌先生访谈录

宋宜昌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史专家，著有《辉煌帝国的军事视角——解读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长篇科幻小说《V贬值》和长篇战史小说《北极光下的幽灵》、《燃烧的岛群》、《沙漠之狐隆美尔》以及军事科普读物《火与剑的海洋》、《大洋角逐》等。以下是本书责编对宋宜昌先生的采访，代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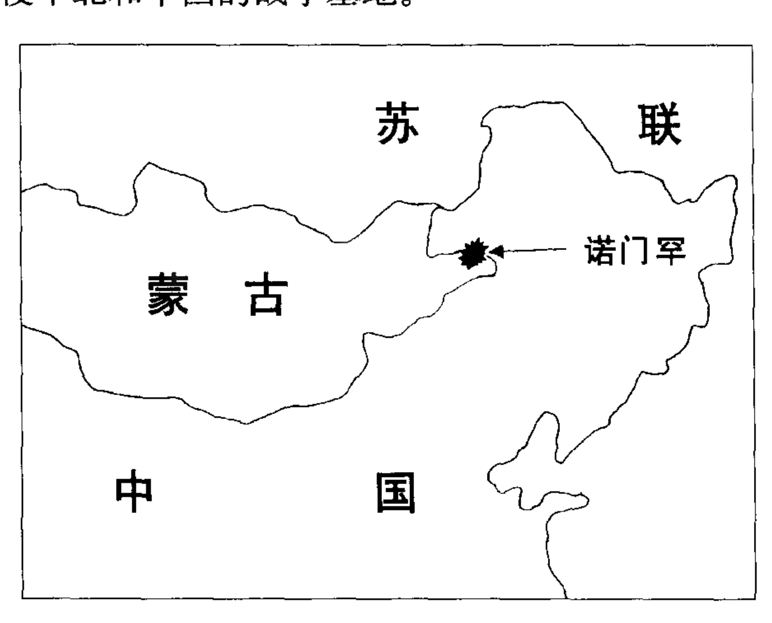
问：诺门罕战争是怎样一场战争？

宋宜昌答（以下简称答）：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当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队，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境内的诺门罕布尔德地区和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的一场激烈战争。简言之，就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一次日满对苏蒙的战争。

问：1939年正是日军主力大举进攻中国腹地，兵力捉襟见肘之时，为何又要分兵对苏蒙挑起这场战争？

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同时扶植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成立了所谓“满洲国”。日本军阀联合垄断资本企业，有步骤地掠夺我东北资源和能源，把东北变成入侵华北和中国的战争基地。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关东军除抽调部分兵力参加华北作战外，其主力未动。他们屯集储备了大量军事物资，准备



诺门罕位置示意图

实施“北进计划”，寻机向苏联开战。

日本军阀从心眼里看不起苏联红军。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沙皇陆军屡战屡败，海军全军覆没于对马海峡。在1919年至1921年的俄苏内战时期，日军一度占领了西伯利亚的部分领土。后来苏维埃政权稳固，日军才撤回。在1937年至1938年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包括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大批高级将领遭到清洗和处决，红军的指挥系统一度陷于瘫痪。关东军则趾高气扬，一心想找一个或者造一个“柳条湖”(即过去的柳条沟)事件，袭占苏联或蒙古领土，击溃苏蒙军队。其最低目标是占领伊尔库茨克以东的苏联远东领土。如果得手，则一直向西席卷，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军沿某条双方议定的界线分割苏联。

问：日本一弹丸小国，在侵略朝鲜和中国之际，还妄想与纳粹德国瓜分苏联，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胃口？

答：日军的作战指导方略，很像蟒蛇吞象的态势——一贯以小吃大。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屡屡以小吃大，多次得手。看看太平洋战争中日军铺的大摊子：与中国、英国、美国、荷兰，以及印尼、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同时开战，甚至派兵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登陆，其胃口之大，无论怎样想都不过分。

问：日本对苏作战是从诺门罕之役开始的吗？

答：不，日军发动诺门罕作战之前，是有序战或曰前哨作战的，这就是张鼓峰战斗。

关于张鼓峰作战，本书也提供了日本方面的一些情况。这场战斗也鲜为人知。大体上讲，日军第19师团(驻朝鲜)的两个步兵团，袭占了苏朝边境地区的张鼓峰和另外一个山头，遭苏联重兵重炮和航空兵反击，伤亡惨重，被迫停战。时间是1937年8月。

问：既然日军在张鼓峰试探战中碰壁，感受到了现代化合成作战的威力，为何仅时隔两年，在装备和训练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又在诺门罕挑起战火？

答：这是日军及其高级指挥机构的一贯作风。除开道义原则，日军高级指挥机构在战略战术上一贯冥顽僵化，迷信精神力量，为了“皇军”所谓的“荣誉”，不碰得头破血流、筋断骨

折是不会回头的。

问：松本草平回忆录中有多少真实性和可读性？

答：作者是当时参加诺门罕战役的一名军医。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记述了一些他亲眼所见所闻的事情和场景。而在当时，日本青年普遍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分析、批判能力很有限。所以作者当时只看到苏军武器好、地形有利，日军高级军官指挥拙劣、参谋人员能力差等等，却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整体反省和认知有所不够。考虑到作者在军队中的地位和战后日本的大环境，他能在垂暮之年勇敢地写出半个世纪前的亲身感受，写出个人对战争的忏悔，痛骂当时的指挥策划者，也就不能要求太高了。当然，由于作者身份的限制，原书对这场战争的全局性描述还远远不够。

问：前苏联关于哈拉哈河之战有何文献？

答：从中译本来讲，最具参考价值的就是三联书店1972年9月出版的朱可夫著的《回忆与思考》(上、下卷)。此书原为内部发行，改革开放后公开发行，洪科译。原书作者在文中多处引用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足见该书影响之大，而且有了日文版。

问：作为当时苏蒙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朱可夫元帅，他如何评价诺门罕战役？

答：苏联称之为哈拉哈河(旧译哈勒欣河)战役，从根本上讲，与日本人对该役的认识不同。

苏联军队也好、帝俄沙皇军队也好，都继承了当年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大兵团机动作战传统，然后用坦克装甲车辆、飞机、火炮、后勤车队、重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使这一传统完成了现代化。这种机械化战法在开阔的平坦地形上有明显的优势。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白俄罗斯、东普鲁士诸战役就是证明。

日军基本是旧时代的旧战法，主要是依靠步兵夜间袭击。这种战法无力与苏军抗衡。后来在二战末期，苏军攻入我国东北，全歼日本关东军又证明了这一点。

退一步说，即使日军当时侥幸攻占了诺门罕，但只要苏军集结更多的装甲兵、炮兵、航空兵、后勤力量，对日军深远后方从满洲里——海拉尔向东南方切入，将整个切断日军在诺门罕战区的后勤补给系统，日军只能坐以待毙。

可以这么说，日军不理解辽阔的草原，也不理解在草原上

应该使用的战争方式，更不理解机械化兵团合成作战。

问：诺门罕之战中制空权的争夺是怎样的?经典战争和经典战役中制空权非常重要，比如今天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战中，制空权弱势一方有何战法?

答：诺门罕战役初期，双方航空兵实力大体相当，苏军飞机数量略占优势，一线配置作战飞机250架(战斗机150架、轰炸机100架);日军为第2飞行集团，作战飞机150架。日军飞行员训练有素，由于已经在中国战场作战两年，经验丰富。特别是在6月27日偷袭轰炸塔木斯克机场(蒙古境内)的战斗中击毁击伤近百架苏军战机(日方资料称124架)，改变了空中力量对比。

但苏军极为重视制空权的争夺。苏军总参谋部调来最优秀的飞行员，并从内地转场到战区大批新型伊－16战机和海鸥式战机。在激烈的争夺制空权作战中，苏军很快总结经验，渐占上风。战争后期，苏联空军不仅在战场上实施近距离对地面的空中支援(轰炸、扫射、侦察、炮兵校正)，而且轰炸攻击了日军腹地的将军庙机场及后勤设施。由于损失了大量最有经验的飞行员，日军在空中已处弱势。这种制空权的易手，也影响到诺门罕战事的结局。

现代战争，无论是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制空权都极端重要。甚至可以说，美军和北约部队就是依靠制空权赢得战争的。

制空权势弱的一方并非全然无所作为。在战前，必须有反空袭的各种预案，部队必须分散，武器装备必须伪装、钻洞。战时可以大量设置假目标，诱饵，欺骗，组织好各种武器系统的对空射击。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军队由于伪装和欺骗做得好，仅损失了12辆坦克和装甲车辆，而并非北约军队宣称的炸毁了200多个装甲目标。在伊拉克战争中，伊军汲取了海湾战争的教训，做了最大限度的分散、伪装，其空袭损失不及海湾战争的1/20。另外，在现代经典战争和游击战争中，针对进攻的占有空中优势的一方，守方集中火力和智慧，大量杀伤攻方防御能力较弱的直升机也是一种成功的战法。伊拉克抵抗力量大量击毁美军直升机后，一段时间内美军直升机甚至不敢白天在战区飞行。

问：日军在诺门罕战役第二阶段的反攻中，主要手段是依

靠步兵夜间突袭，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夜袭、近战也是我军的传统优势，并在过去的战争中作为制胜法宝。在夜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夜间似乎已成为高科技一方的天下，这是否说明战争胜利的天平会倾向技术取胜?

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亚洲国家或民族的军队，在与装备、火力、技术占优势或绝对优势的美军作战时，大量使用夜袭战术。在这些战争的后期，夜袭几乎成了标准的战术。正是由于吃了夜战不利的大亏，美军花费了多年时间和大约50亿美元~70亿美元的投资，为其陆军、空军研制了配套齐全的夜视装备系统。比如最有名的机载“兰登”夜间侦察和作战吊舱。由于电子技术、芯片技术的发展，美军步兵拥有全套的夜视器材，其坦克和装甲车辆、普通车辆均有各种档次的夜视仪(包括红外线式的和微光放大式的)，这就使本来对美军不利的夜间反而成了他们的优势。夜战今天成了美军的长项。

但是，战争的规律就是攻守双方的不断变化和进化。其特点是建立广泛有效的情报网；将大部队进攻分散成数人至二三十人的小分队；进行精心策划的炮击、爆破、路边遥控炸弹、地雷袭击；灵活使用单兵火箭筒(RPG-7)、轻型反坦克导弹、各种高技术和低技术引信的炸药、中小口径迫击炮、107毫米火箭弹及简易发射装置；单兵猎杀——使用狙击手和狙击兵，配备先进的狙击步枪；混入敌人内部；利用敌人的各种弱点和决策失误；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以获得人民支持；其他高技术手段。

总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道相依，魔道相长。战争不会结束，战争手段、方式、方法、武器的发展也不会结束。天下没有完美无缺的技术，天下也没有永远的胜利者。

问：诺门罕战争中，双方都动用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反复激战，二战期间在亚洲很少有成规模的坦克群交战，这次战役是否是亚洲战区最大的一次装甲战?

答：二战期间，亚洲战场上主要是盟军(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与日军作战，日军历来重视海军和空军装备，其坦克装甲车辆非常落后，直到战败，也并无多少改进。

在诺门罕战役中，日本关东军将其精锐的坦克第1师团的2个联队投入到战斗中。其中第1坦克联队拥有八九式坦克35辆、九四式轻装甲车27辆，第4坦克联队拥有八九式坦克17辆、

九五式坦克35辆、九四式装甲车10辆。并配有步兵、炮兵、工兵、高射炮兵和汽车纵队。

但是这些日本坦克和装甲车根本不是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的对手。苏军主力为坦克第11旅(150辆坦克)、装甲第7旅(154辆装甲车)、装甲第4旅(150辆装甲车)及蒙军的几个装甲营(装有45毫米炮的装甲车)。苏军战区的这些部队由朱可夫将军指挥。朱可夫是骑兵军官出身,深谙装甲部队大规模机动作战的将道。且苏军坦克无论在功率、装甲、重量、火炮口径、火炮长度还是在射程、车速等方面，均比日军高出不止一个档次。苏军的T−28坦克和T−130喷火坦克优势尤为明显。结果日军第1坦克师团参战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几乎都被击毁。日军不仅坦克低劣，而且战术单调，坦克指挥官安冈正臣中将根本不懂以大规模机动作战为特点的诸兵种合成集团作战。所以坦克的用法单一，加上又缺乏反坦克炮、高射炮的配合，失败是必然的。

诺门罕战役是中国战区坦克使用较为集中的一次坦克作战。在二战马来亚战场、缅甸战场、太平洋岛屿战场、美军菲律宾登陆战役、中国战区的其他一些战役，也都有相当规模的坦克战发生。我个人对二战期间日军坦克和坦克战术评价不高。

问：有记载证实，日军在诺门罕战役中曾向哈拉哈河中投放了细菌武器,这是不是日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细菌战?日军在中国东三省和内地遗留了大量生化和细菌武器，贻害无穷，根据战争法日本政府应承担什么责任?民间索赔能否达到目的?

答：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化学武器(即毒气)和细菌武器(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研制并投放),据日本官方称是为了弥补兵力、兵器的不足而使用的。关于这种残忍的、违背国际公约和战争法的野蛮行径，在战争中和战后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量谴责。

日军在哈拉哈河中投放细菌武器并非首次实施细菌战。实际上日军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中、东部沿海无论作战时还是非交战时，都投放过各种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这方面已有详细资料公布。根据战争法日本政府负有多种战争罪行和战后多种赔偿责任，但日本政府对此态度暧昧，基本上对中国未进行过任何赔偿。中国的民间索赔往往经过旷日持久的法律程序，胜诉者很少。与之相比，日本政府对二战中美、英、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国家的战俘和民间伤害赔偿案则比较痛快一点。

问：诺门罕(哈拉哈河)战役在二战史上的地位和后果有多大？

答：诺门罕战役虽然时间不长，战区不大，但作战激烈，双方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日本关东军认识到：即使日军处在补给很有利的条件下——海拉尔距战区仅180公里，有较好的野战公路——也无法与苏军机械化部队正面作战。

苏军的补给线平均为650公里～700公里，依然能保障火炮、坦克、飞机、士兵有充足的弹药、油料、食品。那么，如果日本对苏开战，战线向西伯利亚延伸2000公里～3000公里，而苏联缩短2000公里～3000公里，日本军队在苏联的深远腹地，终究难逃被歼的厄运。

这一基本判断使日本关东军放弃了对苏作战的基本方略，日本军阀改“北进”为“南进”，1941年12月发动了袭击珍珠港的太平洋战争。

哈拉哈河之战的胜利，使苏联在卫国战争的紧要关头，敢于将用来对付日军的20个西伯利亚师(其中4个坦克师)向西调动，参加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击退了德军在莫斯科前线、在顿河和伏尔加河的进攻，并转入反攻。到1943年时，日军就更不敢轻易对苏联下手了。总之，该役使卫国战争时，苏联东线无战事，可以全力放手打希特勒，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另外，有一个成果也不能忽视，就是哈拉哈河之战使朱可夫将军脱颖而出，引起斯大林重视。朱可夫的新战法和新思想比苏俄内战时那些老将领的老战法显然优越得多。1939年苏芬战争后，斯大林更加信任朱可夫，在卫国战争的艰难时刻，他越过许多级指挥机构，直接安排朱可夫指挥谋划战争全局，终于取得二战全胜。

因一次战役而得一员名将，真值！

实际上苏军通过此役更得到了一大批富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

从中国抗日战争的角度看，苏军机械化部队能在诺门罕之战中基本歼灭精锐的日本关东军2个甲等步兵师团和全军惟一的一个坦克师团，毙伤俘敌5.4万人以上，对中国抗战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此战对关东军士气的打击，则远远超过消灭的人数。日后在苏军解放东北之役中，日本关东军的许多部队一

击即溃，这次惨败给其官兵留下的心理“阴影”仍然可见。

问：为什么这样重要的一场战役以前国人知之甚少？

答：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前，对抗日战争的宣传报道有两个缺少：一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报道少；二是苏军在张鼓峰、诺门罕、解放东北战役的报道偏少。改革开放后，前者充实了不少。后者涉及苏联(俄罗斯)、日本方面的资料翻译问题，所以较少。但军事史学界都知道，只是普及性不够。所以本书的出版，也弥补了这一不足。

问：原书作者反复提到了日军在诺门罕惨败主要是由于武器装备差距所致，当时苏、日两军的装备情况是怎样的?在战争中装备差的军队是否很难获胜?请你评述一下。

答：诺门罕战役两方投入的作战兵力大约都是5万～6万人，但兵力的编成、结构和使用有差别。苏军侧重机械化部队，因此，在坦克、装甲车辆、后勤运输上占优势。火炮数量双方大体相当，但苏军大口径炮数量占优，射程较日方远，弹药供应充足，每门火炮发射的弹药相当于日军的3倍～4倍。步兵武器双方差距不大。单兵素质和战斗力大体相当，互有长短。最主要的是指挥人员，尤其是高级指挥人员的差距明显。日本关东军统帅部在进行诺门罕战役策划时完全是旧式的作战和旧式的军事思想，而苏军则在残酷的内战中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如果说有差距，也就是战区指挥的优劣。朱可夫VS关东军统帅部，朱可夫胜出。

苏联军事工业在发达的重化学工业基础上造出了大批先进的武器装备，数量庞大，品种齐全。苏联当时的钢铁产量已是日本的4倍以上。另外，诺门罕战争发生时，全苏联边境上并无其他战斗。而日军主力则深深陷入中国战场。这一切就决定了日军失败是必然的！

但在战争中，劣势装备的军队不一定都打败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来就是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对手。战争史上，这种先例很多。在许多战争中，其成也在人，败也在人。

问：能否推荐一本国内出版的关于诺门罕战争的参考书？

答：较有影响的一本是《诺门罕战争》，作者厉春鹏、徐占江等，1988年1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27万字。

问：日本自卫队已经派兵进入伊拉克，这是日本政府战后首次派遣武装力量进入战区，你怎样看待目前日本军国主义复

活思潮？

答：日本主流思想界从未真正反思过二战和日本以往的侵略战争史。战后，美军驻扎日本，日本经济融入美国经济和西方经济。日本人觉得败于美国是真实的，对其他战场和战争一直持暧昧的态度。因此也谈不上什么反省，就拿日中关系说吧，中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可是日本官方对中国民间的各种战争赔偿要求一律拒绝，甚至对中国境内遗留的日军化学武器伤人案也很少赔偿，动不动就要减少或中止日本的对华政府间援助，实际上这种援助是借款，要还本付息。而对美国发动的1990～1991年海湾战争，一下子就支付了180亿美元。由此可见日本统治集团内心深处的战争观和中国观了。

今天，日本已派出自卫队进入伊拉克战区，二战的伤痕似已熨平。日本新的军事动向的确是值得关注的。

问：谢谢宋先生能在百忙之中与我们交流。

答：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希望本书也能成为一面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真实嘴脸的镜子。

2005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稀里糊涂上了前线



第一章　稀里糊涂上了前线

【相关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我东三省之后，次年便派兵占领了呼伦贝尔，并沿外蒙边界设置了边防哨所。由于历史原因，内、外蒙边境线在有些地方不甚明确。在日军挑唆下，哈拉哈河沿岸的伪满洲国的国境警察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境警备队之间纠纷不断，冲突频发。为摸清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底牌，关东军授意伪满洲国向蒙古建议召开会议磋商边境线问题，后来会议定在满洲里市召开，故亦称“满洲里会议”。关东军私下认为，这样的会议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结果，但为了了解外蒙的现状(外蒙独立10年来，由于与大多数国家都未建交，对外相当封闭，其与苏联之间关系如何?对日本提出的“日满提携”及“大东亚共荣”有何反应?能不能拉拢他亲日反苏?对日本军方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难猜的谜)还是值得的。为达到此目的，日本关东军指使伪满洲国经济部赶快往满洲里拨运大量日用百货商品，以充实各商店，给蒙方代表造成“日满提携”的“繁荣”景象。

1935年6月1日下午1时，会议如期召开，双方代表团一见面便在气势上分出了高低。蒙方代表及随员一色民族服装，落落大方，一副民族自尊自强的神态；而伪满代表则长袍马褂、西装礼帽、军装皮靴、和服木屐杂乱不一，其中居然还混有4个日本人。伪满代表谈起来也是言不由衷，顾左右而言其他。遇到重大问题，代表反而要向日本随员请示。不过伪满方谈判真正的决策者——寺田利光(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对此还是很满意，至少这次会议可以使“满洲国”正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以冲淡其傀儡的形象。会议断断续续一直拖到1936年

底，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

满洲里会议期间，日本关东军咄咄逼人的气势引起了蒙古的警觉。1936年3月21日，蒙古和苏联签订了《蒙苏互助协议书》，在法理上确认了同盟关系。随即苏联开始修建连接外贝加尔到蒙古的公路，并铺设双方的国境铁路，改善蒙古的交通条件。苏联远东空军也派出了两个飞行中队进驻蒙古东部机场，加强对蒙“满”边境的监控。由于整个蒙军只有10个骑兵师1.5万人，缺乏重武器，苏联专门帮助蒙军组建了装甲车营，配属到每个师。这些装备有45mm加农炮的BA—6装甲车，极大地改善了蒙军的火力构成，成为蒙军日后的“杀手锏”。

1936年8月，日本五相会议(即首相、陆相、海相、藏相、外相)正式制定了北攻苏联、南下南洋的《国策基准》后，日本紧接着与德国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德日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苏联《消息报》当时称：“这个协定在反布尔什维克旗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军事阴谋。”)只是由于七七事变后，中国在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牵制了侵华日军大部分兵力，日本被迫将关东军中许多训练有素的步兵联队调入关内战斗。后来海拉尔地区防卫司令官笠井中将也带着他的骑兵集团到华北平原作战，日军兵力安排上一时捉襟见肘，只好暂时将“进攻蒙古前出到苏联外贝加尔”的“北进”方案搁置起来，等待最佳时机。东京大本营没有受此影响，一直在秘密研究探讨对苏作战的详细预案，即“八号作战计划”。计划设计了从乌苏里州正面攻击(即甲案)和从外贝加尔州侧翼包抄攻击(即乙案)两个草案，关东军反复研究了这两个方案，并派出军事测绘队秘密潜入到上述两地的边境进行测图，关东军作战课高级参谋辻政信还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到诺门罕地区，对边境地区的气候、土质、道路、河流、高地以及牧民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经过对比，关东军更倾向于“八号作战计划”中的乙案，即从“满”蒙边境包抄作战，避开乌苏里正面苏军构筑的纵深达200公里



日军一支侦察部队战前正在观测诺门罕地形。

【历史点击】



日本关东军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就借口保护其继承俄国在辽东半岛的特殊权益，蛮横地向旅顺派驻了4万多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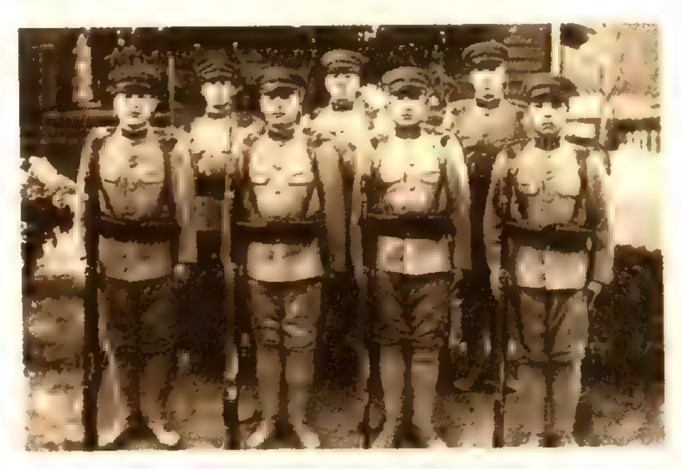
1919年4月，这支驻外派遣军正式命名为关东军，直属天皇管辖，任务是"守备"关东州（普兰店以南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这是当时日军中装备最好、训练最严、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号称"不可战胜"的"皇军之花"。其鼎盛时辖有20个师团（要知道日本在1937年之前倾其全国军力也不过只有17个常设师团及5个独立旅团）近100万兵力。二战爆发后，关东军始终是东京大本营的总预备队。

由于"根正苗壮"，大批少壮派军官都以在关东军服过役为荣，日本的许多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梅津美次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都曾是关东军的高官。可以这么说，关东军也是培养军国主义分子的温床。

关东军在东北26年暴虐的统治，掠夺性地开采了价值200多亿美元的战略资源，约180万中国劳工被虐死，东三省1/4的民众在其统治期间失去了家园。

关东军还是1928年"柳条湖"事件（炸死东北王张作霖）、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及1932年成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首犯。

1945年8月19日，关东军（其大部队主力师团已调往太平洋战场被消耗殆尽）在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下，仅仅抵抗了10天就被迫举起了白旗。至此，关东军连同其"不可战胜"的神话一起灭亡了。



关东军士兵，其手中是三八式步枪的前身——6.5mm口径的三十年式弹仓式步枪，在中国俗称"金钩步枪"。当年是日军的制式武器，该枪曾在日俄战争中大量使用。

的现代化要塞阵地网和部署的12个步兵师。还有一点关东军没有说，从海拉尔通向哈拉哈河以西的这条路线，正是当年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及欧洲的行军路线，关东军幻想自己能成为日本的"成吉思汗"。东京大本营同意了关东军的选择，决定非特别需要，不再从满洲抽调部队入关作战，并考虑从国内向满洲增兵。关东军开始急不可耐地在"满"蒙边境地区四处寻衅，企

图早日挑起事端。

这场大战的伏笔其实早在1939年初就埋下了，诺门罕地区处在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平静之中。

（一）被愚弄的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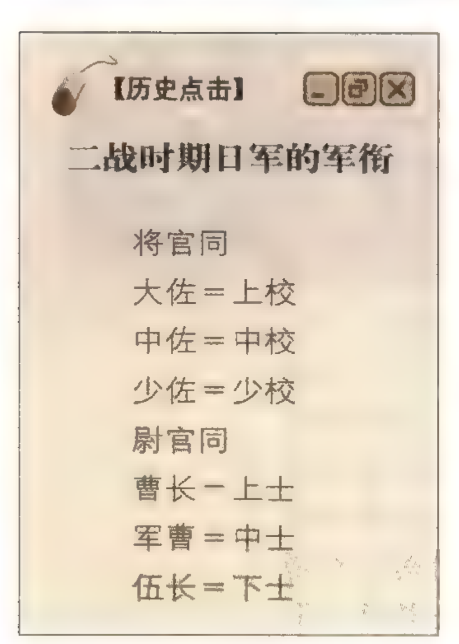
1938年5月，陆军省突然下了一纸通知：所有的医生都有义务报名充当军医预备队员。

我当时32岁，自己的医院刚刚开张不久，正处于艰难创业时期。尽管如此，在“全民总动员”的号召下，我的一颗“赤诚之心”也燃烧起来，感到这是每个医生应尽的义务，所以马上就报了名。

可是，几天以后才知道，此次的军医预备队员报名者，从大分市到别府市只有4个人，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是说人人都有报名的义务吗？国家和军事当局这不是在愚弄老实人吗？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受骗上当之感。

两个星期后，报名者被召集到第6师团驻扎地藤崎台，我先是得到了一个上等兵的肩章。经过75天的训练，又得到一个军曹的肩章。10月7日，我作为一名“见习医生”被编入第23师团的卫生队，卫生队队长是平野弘夫中佐。

卫生队人员几乎都是应召而来的，其中不少人是老兵，50岁以上的就有好几个。在出发之前健康查体时，令人吃惊的是，其中1/3的人患有各种慢性疾病，如胃溃疡、慢性胃肠炎、哮喘、支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神经痛，等等。


【历史点击】

二战时期日军的军衔

将官同

大佐＝上校

中佐＝中校

少佐＝少校

尉官同

曹长－上士

军曹＝中士

伍长＝下士

这样的卫生兵怎么能上前线呢？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怎么能去抢救伤兵呢?再把这些老弱病残送到冰天雪地的北满洲，恐怕就更是个问题了。

果然不出所料，部队一到了满洲，医务室里天天是病人一大堆。当时正值寒冬，海拉尔的气温特点是早晚非常冷，夜间的气温常常低于零下42℃。这些老病号们从日本南方突然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不用说身体更加吃不消了。

然而，到了6个月后的1939年5月，也就是诺

门罕战争爆发之前，病号竟减少了2/3。

对此我当时甚是惊讶和不解。

仔细一想，军队的生活可以说是再规律不过了。天亮起床、天黑睡觉，白天又是大量的军事训练，并且伙食定量，多了没有。这是符合自然原理、和自然界动物一样的生活规律，也是遵守天意的生活规律，所以小小不然的疾病能治好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病号们靠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合理的饮食和严谨的训练，唤起了体内的天然免疫力，因此病也就自然而然地好起来了。身体渐渐好起来的病号哪会想到战争快要到了，他们下一步面临的不仅是疾患，还有恐惧和死亡。



松本草平（中间）在熊本市藤崎台军营时的照片　摄于1938年10月。

（二）　酷寒的异国土地——满洲

1938年11月7日，第23师团卫生队接到出发命令，我们被赶上了一辆列车——一辆挂着柿黄色窗帘的、与外界隔绝起来的列车。这次出发是秘密的，不让任何士兵通知家人和亲属，所以熊本的车站上看不到一个送行的人影。究竟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大家谁都不知道。

接下来我们又上了一条军用运输船，躺在黑乎乎的舱底，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也不知道过了几天，终于到达了一个港口，好像是中国的大连港。码头上成麻袋成麻袋的大豆、石灰以及各种军用物资堆积如山，一些蓬头垢面的苦力，正在不停地搬来推去，一个个脸晒得黑亮黑亮的，只有牙齿还是白的。

刚刚上了码头，我们又被赶上了停在码头一角的一列火车。这列火车比日本的大了许多，但也是挂着窗帘，外面的世界什么也看不见。好不容易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满洲，谁都想看看满洲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家趁着当官儿的看不见的工夫，偷偷地掀起窗帘往外瞅上两眼。

真是一个漫长而无聊的“长途旅行”，火车怎么跑也看不见头儿。当然那时的火车不像现在的列车那么快，是以“D51”做牵引的，跑起来慢腾腾的。坐在车厢里无事可做，越发勾起观光之情，我真想一把拉开窗帘一饱眼福，无奈军令在上，只好



乘火车开赴前线的日本新兵，其木讷的表情和呆滞的目光倒像是一群即将被押上刑场的囚犯

耐着性子从窗缝中往外瞅。

外面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高粱世界。我第一次看到北满如此的景观，惊得目瞪口呆。说是把鼻子贴到窗户上，其实不过是夸张而已。真要是把鼻子贴到玻璃窗上的话，恐怕鼻子早就冻到玻璃上了，连靠近窗户时呼出来的气，马上就冻成雪白的冰了，满洲的冬天就是这么寒冷。

火车慢慢地驶进了被称为"北方魔都"的哈尔滨，一些士兵终于忍耐不住了，干脆拉开窗帘欣赏起哈尔滨的冬景来，不少人被当官的发现而挨上一顿训斥。这样大胆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是挤到窗口，从窗帘的缝隙里饱饱眼福。这个当时和香港、上海齐名的大都市，可惜我们只能从火车上走马观花地看上一眼，火车又接着开进了无边无际的高粱地。

火车到底要开到哪里去，我们根本就无从得知，随它的便吧。我所感到的只有茫然和无聊，至于什么时候睡的、什么时候醒的、火车现在跑到哪里了，等等，根本就没去在意。

火车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嗵"的一声把我从朦胧中惊醒。睁大眼睛一看，火车不知什么时候开进了一个银色的世界。这不是到了大兴安岭了吗?抬头看了一下四周，到处都是白皑皑的山岭。

火车不知什么时候多出来一节，可能是这个缘故吧，在一个慢坡上火车跑不动了，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咕咚咕咚地喷着黑烟，车轮在冻冰的铁轨上刺溜刺溜直打滑，可就是不往前跑。没办法，车上的士兵只好下车帮着推了，好在斜坡不太长，过了斜坡火车才好不容易缓慢地跑起来。

四周已经完全是一个冰雪世界了，厚厚的积雪中稀稀拉拉地生长着落叶松、虾夷松、白桦等天然林木，积雪下面生长着山白竹、鬼贯众等。火车奔驰在雪岭之中，使人觉得好像走进了一片雪白的圣地，心情也畅快起来。

忽然，一些士兵都挤到右侧的窗口，嘴里不时发出"嗨——

嗨——”的感叹声，我也急忙凑过去一看，禁不住也发出了“嗨——”的感叹。

低矮的铁桥下面有一条冰河，冰面上出现了二三十只野兔、野鸡、山鸟，士兵们把干面包一扔下去，它们就一齐跑过来抢食吃，两条腿的野鸡就不用说了，四条腿的野兔也是一边颠着腚蹲儿，一边跑过来抢。

多么可爱的动物呀，这才是原原本本的大自然呢，这才是野生动物的天真姿态呢，在酷寒和颠簸之下已是疲惫不堪的我，心里头一下子觉得暖和了起来。大兴安岭清澄神圣的雪岭上，大自然的动物们在自由地奔跑、飞翔、抢食吃，这简直就像亲眼见到了人间天堂一般，我的心不由得也随着清澄起来。这光景就像一幅画一样，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脑海和心底，至今也涂抹不掉。

据说下雪以后一般的动物都进入冬眠状态，可是野兔和野鸡等动物却和其他动物不一样，即便是冬天也出来觅食。不过在这么厚的积雪中要想找到一点食是很困难的，因此就在铁桥底下等火车，每当火车通过时它们就集合到冰河上，等待人们给扔点吃的东西。

看着这些招人喜爱的动物，我激动得差一点要流出眼泪来。在这个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大兴安岭，这些飞禽走兽们大概不知道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恐怖、什么叫害怕吧。我们又有什么权力去破坏这种安详呢？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又想起那温馨、清澄、神圣的世界。

（三）莫名其妙的川叉侦察

1939年年初，有消息说在“满”蒙边境的罕达盖方面，“满”蒙两军之间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这个消息使得像我这样的末端兵卒们感到不安起来。

3月底的一天，我正在海拉尔第二陆军医院工作，突然接到一个命令：“明天清晨，东搜索队[①]外出侦察，命你随队从医。”

第二天拂晓时分，一个中尉率领两个班、大约二十几个人，

---

①东搜索队：骑兵联队，所属第23师团。联队长东八百藏，军衔中佐。

分乘三辆卡车，冒着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出发了。一出了兵营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地上刮着刺骨的寒风，加上卡车顶上又没个篷子，所以坐在卡车上不一会儿，就感觉全身跟冻僵了一样。

卡车在没有道路标记、没有道路迹象的草原上颠簸了3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到达了目的地。一些士兵手拿望远镜下了车，沿着一个沙丘背侧开始往前侦察起来。大约20分钟后，他们全都撤了回来。

现在回想一下，从侦察的地点能够俯视到川叉(哈拉哈河与胡鲁斯台河的汇合点)，所以推测沙丘大概是733高地(又称巴尔夏嘎尔高地)。卡车就停在733高地的东侧。至于为什么要来侦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知道的。后来才听说，只在河边发现了几个蒙古兵模样的人。

侦察的这一段时间，我一直站在卡车上镇守待命，手和脚都冻僵了，脑袋冻得迷迷糊糊的，意识也越来越浅了。当时心想，这大概就是人冻死之前的状态吧。但是除了我之外，好像没有一个人说冻得不行了，可能是我生来就不耐寒的缘故，只好在卡车上一个劲地跺脚、活动身体，又从衣兜里掏出几块早就准备好的冰糖塞进嘴里，这才总算缓过劲儿来。

后来才知道，我们的这次侦察活动，大概全都被哈拉哈河西岸蒙古高台上的苏蒙军监视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二次诺门罕之战，我们随大部队越河登上蒙古高台时，呼伦贝尔广阔的原野就在眼前，可以整个俯视过来。也就是说，我们军事侦察的一举一动，其实苏蒙军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日军的机械化侦察部队。

“满”蒙两军之间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以后又连续发生了好几次。5月中旬，听说东搜索队在陆军航空兵的支援下，对越河过来的蒙军进行了袭击作战，一举把他们

全部驱逐出了诺门罕地区，并且打死打伤外蒙兵四五十人。消息一传来，整个兵营的空气顿时就紧张起来了，我们好像闻到了硝烟味。

到5月中旬第一次诺门罕战爆发之前，听说"满"蒙边境上又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战争死神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历史点击】



锡林陶拉盖争夺战——诺门罕战争的揭幕战

1939年5月，呼伦贝尔草原大地回春，草木逐渐茂盛起来。5月4日这一天，几个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防军士兵习惯地赶着马群，到哈拉哈河东岸放牧。(哈拉哈河东、西两岸迥然不同，西岸是沙丘绵延的不毛之地，东岸沿河地带则水草肥美，当地人称其为"莫日根草原"。)往年蒙古士兵也经常渡河放牧，东岸的"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相互之间也不那么较真。

可这次不同了，驻扎在东岸锡林陶拉盖敖包的是新换防的兴安北警备军第7团第3骑兵连，加上连长贡布扎布中尉又是司令官乌尔金中将的女婿，自然是天不怕，地不怕。一见蒙古马群过河，立即开枪阻拦，蒙军被打了个措不及防，扔下马群跑了回去。蒙军第7国境边防哨所指挥官朝格登中尉听到消息后大怒，认为这是伪满军队肆意挑衅，马上带了一个连过河反击。兴安北警备军也不肯示弱，立刻增兵，双方你来我往，最后冲突上升到团级规模。蒙古军队调动迅速，很快便形成兵力优势，在苏军装甲车中队的支援下，最终赶走了兴安北警备军，占领了锡林陶拉盖。



在这场战争中，骑兵只发挥了极少的作用。图为关东军骑兵联队出发前遛马，看起来士气萎靡不振。(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伪满军几次反击都没有见效，只好向日军求援。儿子挨了打，老子的脸上也不光彩，驻海拉尔的关东军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决定派兵帮助"满洲国"军找回面子。5月13日夜，第23师团骑兵联队长东八百藏带着几辆九五式轻型坦克(称这种只有6mm装甲、7.7吨重的小型三人战车为装甲车其实更贴切)、200名日本骑兵和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8团共700

余人组成搜索队，向诺门罕地区出发了。第三天一早，日、"满"军队便在轻型坦克掩护下向蒙军发起冲击，关东军航空兵的5架九八式轻型轰炸机也赶来支援，一口气抛下了60枚炸弹，锡林陶拉盖烟火弥漫，没有防空武器的蒙军被炸得抬不起头来，受惊的马匹四处奔跑，蒙军第24国境守备队见势不好，急忙退回了河西岸。



日军九八式轻型轰炸机示意图。1937年研制，乘员2人，装备2挺7.7mm航空机枪、可携带300公斤～350公斤炸弹，但液冷发动机不可靠。共制造864架，在侵华战争中广泛使用。1942年退入二线部队使用。

完成"扫荡"任务的日军刚得意洋洋地返回了海拉尔。第二天，蒙军又杀了回来，重新占领了锡林陶拉盖。小松原见蒙军不依不饶，感觉机会来了。既然蒙军不肯放弃东岸这块阵地，只要用武力稍加诱导，就可使战斗升级，第23师团在海拉尔枕戈以待多时，就是要寻找这种"借口"。这次或许能制造一个新的"柳条湖"事件，就此实现东京大本营梦寐以求的"北进"计划。小松原将自己的计划报告给了关东军司令部，司令部作战课的参谋们收到电报后欣喜若狂。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的战争种子，终于在"满"蒙边境破土而出，而且倾蒙古全国之兵力不过1.5万名骑兵，第23师团真是好运当头。关东军司令部立刻满足了小松原的要求，答应战事一旦扩大将给其全力支援，并派出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赴战地指导下一步作战。

当第3骑兵连的贡布扎布中尉举起三八式骑枪对着蒙古马群扣动扳机时，他恐怕万万想不到，这一枪，会引起苏蒙、日"满"十几万人4个多月的诺门罕血战。当然，关东军就更想不到他们精心策划的这场战争竟以惨败而收场，东京大本营也因此次碰壁只得将"北上"计划搁置，转而实施"南下"方案攻击英美，最终被打得头破血流，兵败太平洋，还吃了美国人两颗原子弹，至今怨恨不已。

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兹教授曾说过："亚洲腹地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或许几周后会引起南太平洋的一场风暴。"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可能微乎其微，但产生的"蝴蝶效应"却令人瞠目。

第二章

关东军吃了个『哑巴亏』





第二章 关东军吃了个“哑巴亏”

——第一次诺门罕之战

【相关背景】

1936年11月25日，日本武者小路子爵与德国全权代表里宾特洛甫在柏林签订了《德日反共协定》后，日本军界极为亢奋，有纳粹德国在欧洲牵制苏军主力，日本认为自己就可以放心地在远东地区大干一场了。其实日本1936年6月颁布的《帝国国防方针》早把苏联列为了第一敌对国(在这个方案中，日本根本没有把国力贫弱的中国放到眼里，狂妄地认为这已是囊中之物了)，并悄悄着手战争准备。侵占了东三省之后，关东军已由当时的2个师团4万人逐步扩张到9个师团20万人，并将日军刚组建的第一个坦克师安排在了东北，同时在海拉尔地区构筑由机场、炮台、坑道和兵营组成的庞大基地。(这个隐藏在深山里的要塞庞大而复杂，直到今日人们还未能全部探明其内部构造。建国后，罗瑞卿、陈锡联等中国军队高级将领曾先后视察了要塞遗址，其构造之严密和精良令两位将军感叹不已。据军方专业人士称，海拉尔军事要塞区地下工事之完备、建筑之复杂、规模之庞大、施工质量之高，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一流的军事工程，堪称是一个步兵、炮兵、工兵、防化兵、装甲兵等诸兵种合成的永久性防御与进攻相结合的要塞。目前遗址已开放了1000多米的坑道供人参观。)1938年7月，日军第23师团开始陆续进驻海拉尔，这个主要由福冈、熊本、广岛三个地方的人组成的师团以好战和擅长进攻而著名，关东军的用心此时已路人皆知，对苏作战只差一根导火索了。

1938年6月，苏联远东地区“肃反”负责人、苏军总政治部保卫局局长留希科夫大将叛逃至伪满洲国；7月，驻外蒙的苏

苏军的 TB—3 重型轰炸机。

1930 年开始研制。乘员8人，平直机翼，固定式起落架，机翼蒙皮为漆布，机身蒙皮为波纹铝板。经过改进，一共生产了818架。1938年5月苏军已建立3个特种航空兵集团军，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重型轰炸机部队。

1937 年苏联政府援助中国6架TB—3，参加了抗日战争。TB—3也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拥有的惟一一种重型轰炸机。

TB—3 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很少作为轰炸机使用，多被当作运输机。



军摩托化步兵第36师军械部部长弗仑特少校叛逃至内蒙；8月，蒙军骑兵第6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宾巴大尉叛逃至呼伦贝尔盟。这一连串的叛逃事件，不仅反映出苏蒙军队在“肃反”后的军心动荡，而且也使关东军轻松掌握了苏蒙两国大清洗的详细情况，以及苏蒙军队在蒙“满”边境的布防情报。

据留希科夫大将介绍，苏联“肃反”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苏联红军已有两万多名中、高级军官遭清洗(苏军远东方面军司令员、曾在张鼓峰战斗中大败日军第19师团的布留赫尔元帅也被处决了)。苏军五大元帅中三个思想先进、年富力强的元帅至此已全部被杀，连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创建人、总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也在肃反人员逮捕自己时开枪自杀。在西班牙任军事观察团团长的别尔津将军也被从火线上紧急召回国内加以处决。另外15个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3个、85个军长中的57个、195个师长中的110个、406个旅长中的220个都被清洗掉了，各大军区司令员只剩下一个人没有被逮捕。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也就是说苏联红军中70%以上的军长、60%以上的师长、50%以上的旅长或被捕或被杀，剩余的人也惶惶不可终日(连留希科夫这位肃反负责人都跑了，可想当时军中之恐慌)。部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指挥系统瘫痪了一半。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肃反”比起苏联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级军、政官员一口气被逮捕了1万多人，蒙古部长会议主席耿冬、蒙古人民军总司令杰米德大将、外交部副部长桑布以及蒙军全部10个骑兵师的师长都被处决。被处决的桑布当时还是蒙古与伪满洲国边境谈判团的团长，在满洲里会议上，他以态度强硬而著称，令关东军大为头痛，没想到回国不久竟让自己人给除掉了，这令日“满”惊诧不已。

英国首相张伯伦曾说过：“1937年的大清洗，使苏军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日本关东军根据上述情况得出了类似结论，认

为既然苏蒙军队中有能力和经验的军官基本被处理光了(当时苏蒙军队中师级军官不少是少校，团长多是一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中尉)，这样的军队就不足为虑，狂妄地宣称关东军一个主力师团完全可以对付2～3个苏军步兵师。关东军各部的好斗情绪被进一步挑逗起来，诺门罕战后日军心理机构的调查数据表明："几乎所有被动员参战的日本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基层军官对苏军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轻视对手。"整个日军已处在一种病态的"亢奋"中，开始跃跃欲试。

但一只病狮要强于十头毛驴。斯大林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一只眼睛盯着国内的"敌人"大刀阔斧地进行"肃反"，一只眼睛冷冷地瞅着国外的敌人不动声色，尤其是没忘记远东地区磨刀霍霍的日本。为了更好地牵制和削弱这个东洋岛国，从1937年10月起，苏联政府陆续对华提供了足够装备20个师的军事援助，先后有5万支步枪、9720挺轻重机枪、1140门火炮运抵中国，为中国军队解了燃眉之急。苏联还为弱小的中国装甲部队提供了一批T－26坦克(国民政府以这些坦克为基础后来组建了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200师，并在昆仑关痛歼日本中村旅团)。中国空军打到1937年底仅剩下4架能起飞的战斗机，真成了"空"军。应宋子文的紧急要求，一支由116架伊－16战斗机和TB－3重型轰炸机组成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及时赶赴南京助战，斯大林让中国战场上的日本侵略军亲身尝受了苏联空军和苏式武器的威力。打入东京高层的第三国际"拉姆

【历史点击】 **里查德·佐尔格（Richar Sorge）**

他的对外身份为德国新闻记者、纳粹党员、德国驻日使馆顾问，实为共产国际情报部特工人员、德国共产党员。1933年到日本，与日本上层社会交往甚密，收集了大量日本对苏战争准备方面的情报，是二战期间苏联最出色的谍报人员之一，其提供的政治、军事情报为苏联对日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1年10月不慎在日本被捕，次年2月牺牲。1964年苏联政府为表彰佐尔格的功绩，追授他"苏维埃最高国家勋章"。



扎”小组也将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送出来，使苏联政府掌握了日本的战略动向，有些日军总参谋部的重要战略计划(如《帝国国防方针》、意在侵苏的《八号作战方案》等)关东军甚至还未收到，就先摆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桌上了。里查德·佐尔格领导的“拉姆扎”小组在斯大林对日决策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了解了日军的企图后，面对关东军在苏“满”边境的不断挑衅，斯大林强忍怒气按兵不动，他心里清楚，苏联在远东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应对一场战争，即使是有限的边境战争，苏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准备。因此，除了1937年8月在张鼓峰地区给入侵日军有限打击外，对其他一系列日军边境挑衅行为，都是退让回避，甚至有些时候“打不还手”(1937年干岔子冲突中，苏军江防炮舰被日军击沉一艘，重创两艘，苏军非但没有报复，反而很快撤出了争议地区)。苏联的“忍让”政策也进一步给关东军以错觉，认为苏军怯战软弱，边境冲突越发不断。

图为二战初期苏军的一个标准步兵班。前面三人持7.62mm AVT“托卡列夫”半自动步枪（10发装弹），这种武器在1940年正式列装前曾少量配发给一线部队检验；右下角是一挺1928年装备苏军的捷格加廖夫 7.62mm轻机枪。这种装备是当时亚洲任何一个国家的陆军都无法比拟的。

1937年底，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翌年，苏陆海空三军普遍更换装备，远东地区的红军也增加到20个师，3000公里的边境线已趋稳固。斯大林认为教训一下小日本鬼子的时机已成熟，同时也可利用这个机会检验新装备锻炼部队。1938年10月，远东第57特别军开入蒙古。这支部队直属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指挥，作战对象直指几个月前进驻海拉尔的日本第23师团。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此后多次公开表示：“根据1937年签订的《苏蒙互助议定书》，任何一个国家进攻蒙古，将意味着对苏宣战。”斯大林也在苏共第18届会议上反复讲，“苏联国境不可侵犯，否则我们将给予双倍的反击”，警告蠢蠢欲动的关东军不要轻举妄动。



到1939年初，苏军1个T－26坦克旅、2个装甲旅、1个飞行旅和先期进驻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已在蒙古东部按部就班地排开阵势，连同2个蒙军骑兵师一起，张网以待。“大清洗”虽然给苏军战斗力和士气造成了严重损害，但斯大林相信苏军强大的物质基础完全可以击败日军在远东的任何挑衅。



【历史点击】

《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

1939年4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了这个《纲要》。名义上作为关东军各师团和独立守备旅团处理边境冲突的指导原则，实际上是吹响了向苏联进军的冲锋号，日军各部队长都心照不宣，认为这是关东军鼓励边境挑衅乃至大打的公开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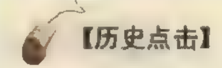
《纲要》共有8条，其核心是："各部队在执行边境侦察、巡逻任务时，为达到目的，可攻入苏联境内。在国境线不明确地区，可以按自己的判断划定最终国境线。"这种规定等于正式授权旅团长以上的军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动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从而消除了一线部队对引发大规模战争的顾虑。关东军司令部的意图很明显，日军通过不断挑衅肯定能挑起苏军还手，则可趁机扩大冲突规模，造成战争升级，最终实现东京大本营的《八号作战方案》（即对苏作战方案）。

这个野心勃勃、暗藏杀机的《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出自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代表辻政信之手，这位骄横的少佐作战参谋十分崇拜他的前任——石原莞尔（原关东军司令部作战参谋，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东三省后，因有功而被提升，一时间成为日本少壮派军官追崇的对象），他很想成为日苏战争的首席策划师。《纲要》颁布后，直接的后果就是迅速导致了诺门罕战争的爆发。

注：由于日本当时不承认外蒙独立，认为外蒙不过是苏联的傀儡，故这个《纲要》同样适用于"满"蒙边境纠纷。

日军对苏联的战略调整和兵力变化茫然不知，第23师团下发的《敌情通报》告诉所属各联队的仍是：苏联目前正着手应对欧洲的紧张局势，无暇东顾；远东苏军各级指挥员普遍缺乏在复杂环境中统帅部队的能力和经验；"大清洗"后人人自危的局面又进一步制约了军官们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因此，苏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与日军交手的实力和勇气。

1939年5月，锡林陶拉盖哨所边境冲突发生后，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感到一阵狂喜，根据关东军总部刚刚下发的《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他有权在哈拉哈河这种边境不明确地区，自行判断划定国境线，并为达此目的，可以动用武力解决。张鼓峰冲突后，敢打敢拼的第19师团顿时名扬全国，也许这次冲突会让第23师团显赫一时。小松原当即决定派山县武光


【历史点击】



国境线到底在哪儿?

1924年之前，内蒙也好，外蒙也好，全都是中国的领土，两者之间的界线在有些地段并不清晰。从历史上看，蒙古族的喀尔喀部落多住在外蒙，巴尔虎部落多住在内蒙，这两个血脉相连、语言相通的蒙古部落，为争夺放牧的水草，关系一直不太融洽。1734年，清朝的理藩院(相当于国家民族委员会)决定给他们裁决一下旗界，免得老闹矛盾。在诺门罕一带，分界线最终划在了哈拉哈河以东15公里~20公里处(沿河东岸2公里~3公里处多为水草肥美的湿地，其余为荒凉的沙丘)，史称“雍正界线”。

至于为什么不以河为界，而将河东岸一片水草茂盛的牧场给了外蒙喀尔喀部落，现已无从考据。从雍正皇帝看来，反正河两边都是中国土地，旗界划在哪儿不行?没必要那么认真。遗憾的是，190年之后喀尔喀部落从中国独立出去，那片土地不再是中国的了，这恐怕是雍正皇帝当年做梦也想不到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雍正界线”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实际国境线(当时的中国政府虽拒不承认外蒙独立，可国力有限，虽有统一之心，却无收回之力，只好在事实上默认了这条界线)。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不久，关东军突然拿出一张俄军总参谋部编绘的八万分之一远东军事地图，指出上面的国境线是划在哈拉哈河中线，以此为据挑唆伪满洲国修正国境线。(俄军当时之所以在地图上把国境定在河流中线，是依据1727年俄清《恰克图条约》"有山以山为界，有河以河为界"的原则，想当然而划上的，俄军总参谋部的绘图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点官僚主义的错误。)

伪满洲国很快便修正了地图，并堂而皇之地把边防巡逻线路向西移到了哈拉哈河。由于这一片土地人烟稀少，直到1932年，外蒙政府才发现了这一问题，双方为此争执不休，各有各的道理。为此，"满"蒙还专门召开了满洲里会议进行边境磋商。日本关东军对谈判解决纠纷嗤之以鼻，狂妄地认为"边境纠纷只有靠武力来解决"，鼓动伪满洲国军队继续越境挑衅。

战争的种子就这样被埋在了诺门罕这近500平方公里的荒原上。

的第64步兵联队和刚去过诺门罕的东百八藏骑兵联队一同开赴哈拉哈河畔，协助"兴安军"给"越境"的苏蒙军队以痛击。

师团下发的《敌情通报》山县武光早看过了，他认为对付蒙军国境守备队几个骑兵，根本无须兴师动众，有东八百藏骑兵联队配合，自己出动一个主力大队足矣。(东八百藏也是同样想法，他只带了一个中队的骑兵和一个装甲连。)山县的计划是步兵正面出击，骑兵和装甲车包抄后路，这是日俄战争时期乃木希典大将对付俄军的老路子，"敌军只要后路被袭，马上会全线崩溃"。这条经验被加以长期灌输，一直深深地烙在关东军每一名军官的思想深处，难怪西方军事家评价二战时的日军战术(尤其是步兵)，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山县武光带着两千多人的队伍，迎着落日一步步地走进了苏蒙军队编织的巨网中……第23师团卫生队的军医草平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此刻他还正处在郊游般的兴奋中。

(一) 随山县联队突袭

1. 郊游般的行军——从海拉尔到将军庙

1939年5月22日晚上，卫生队突然接到命令：明天一早随主力部队向诺门罕进军！突如其来的命令使得兵营里一下子紧张、骚动起来，大家都忙着领衣服、粮食、弹药等等，一时间



草原上的行军。从图中可以看出，日军主力仍是徒步步兵，仅配有少量骑兵和汽车，这种装备当时在亚洲虽说是一流的，但与苏军相比还差一大截。山县联队两千多人一步步地踏上了不归之路。（出自《太平洋战争·1937～1945》，每日新闻社）

忙得不可开交。

出动部队据说有三支：一支是由山县联队组成的山县支队：1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中队、1个速射炮中队、3个汽车中队，人员约1600人，兵器装备有轻机枪30挺、重机枪10挺、步兵炮2门、山炮3门、速射炮4门。另一支是东搜索队：骑兵1个中队、装甲车1个中队，人员220人，兵器装备有轻机枪13挺、重机枪12挺、13毫米机关炮5门、装甲车12辆。还有一支部队是装备极其简陋的当地满军部队，人员大约有450人(伪满兴安北警备军第8骑兵团)。

第二天一大早，卫生队尾随在山县部队的后面，甩开大步就出发了。尽管原野的坑坑洼洼里还能见到积雪，但是早晨的空气却很清沁凉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沐浴着清澄的阳光，士兵们的身心好像也受到了滋润一样，一个个轻松愉快、有说有笑地离开了海拉尔尘土飞扬的兵营。

遥望呼伦贝尔草原的东方，可以看到大兴安岭连绵起伏的峰脊，白雪皑皑的雪岭把碧蓝的天空都映白了，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美感。积雪开始溶化的山脚下耸立着白桦、落叶松等天然林木，远远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幅宁静的山水画。

草原上的行军队伍弯弯曲曲排成一列，就像一条长蛇在慢慢爬行。蛇头和蛇身就是在第23师团中号称精锐的山县部队，

最后一条小尾巴就是我们卫生队一伙了，包括医生、卫生兵、担架运输兵等一共100来人，这个卫生队的队长不是别人，正是本人——见习医官草平阁下。

运输马车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像以前在日本沿街叫卖荞麦面的一样，卫生队里甚至有人模仿小贩子吆喝起来："卖荞麦面啦！卖荞麦面啦！"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不时有士兵离队去解手，一望千里的大草原连个遮挡也没有，真可谓一览无余。"哎——看见了唉！""小子！蹲那儿干什么呢？"士兵们不时发出阵阵奚落，有人甚至扔起沙土来搞个小小的恶作剧，那光景简直就像是小学生在郊游一样。

一到了5月下旬，呼伦贝尔草原天上云雀啼鸣，地上百花争艳，无名的黄紫色野花一齐开放起来，甚是惹人喜爱。早晚





【历史点击】 "满洲国"军队

"满洲国"军队主要由国防军与兴安军组成，国防军分陆军与海军2个兵种。1939陆军为5个步兵师，兵力结构与日军步兵旅团基本相当。"满洲国"军队名义上受"满洲"国防部指挥，实际上听命于关东军司令部。在诺门罕战争中"满洲国"军队也有少量参加，在诺门罕参战的是一个特种侦察大队和梁濑汽车团（均被编入了日军步兵第23师团中），后期增加了一个混成旅团。

兴安军是关东军组建的蒙族部队，归关东军直接指挥，兴安军负责大兴安岭以东草原地区的警戒。兴安军都是骑兵部队，最大编制是骑兵师，1个骑兵师兵力约3000～4000人，军官基本都是日本人。在诺门罕战斗中，关东军动用了大量兴安军参战，总计有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6000多人参战，但遭到苏军反击后，这些兴安军士兵跑了个精光，只剩下几十个日本军官待在阵地上进退两难，气得关东军吹胡子瞪眼没办法。



图为伪满兴安军骑兵部队，后面拖拽的是一门陈旧的克式山炮。

的气温虽然还有些寒冷，但白天却是烈日炎炎烤得难受。热归热，但是空气却很干燥，不像日本那样潮湿闷热，微风一吹倒觉得挺凉爽的。也许是天气晴朗、气候怡人的原因，我率领的“大篷车”卫生队也开朗起来，一路上笑声不断。

5月24日，“蛇尾”和“蛇身”开始脱节，卫生队被落下好远，只好沿着草原上留下的车轱辘印往前走，道不像个道、路又不像个路。到了中午，我的脚上就磨起了水泡，走路的样子变了形，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肩上的背包也越来越沉，背包带勒得两个肩膀隐隐作痛。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就这个样子明天还能走得动吗？

运输卡车不时从我们身旁一越而过，气得卫生兵咬牙切齿，终于有个卫生兵忍耐不住，冲着屁股冒烟儿的卡车破口大骂起来：“混账！王八蛋！”

中午一过，挂在腰上的水壶就空了，水没了不说，水壶也成了一个“火疙瘩”，摸一把都觉得烫手。把水壶倒过来敲打敲打，把壶底剩下的几滴水往嘴里一倒，顿时能吓你一跳：就跟开水一样烫人。

大陆性气候就是这样，昼夜的温差变化太大了，这才5月份，中午的气温就已经超过35℃，可是一到夜晚气温就骤然下降，常常是还不到10℃，真可谓白天烈日炎炎，夜晚寒冷难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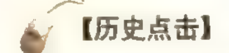
不过，比起白天来我倒是更喜欢夜晚，虽然野营露宿有些寒冷，但是冷中有趣，尤其是头枕背包、眼望星空，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5月25日，也许是太疲乏的缘故吧，露天地里的寒冷也感觉不到，一觉醒来只觉得浑身酸痛、四肢僵直，怎么爬也爬不起来。

人的身体也真是不可思议，咬着牙爬起来走上一会儿，身体也就不那么酸痛了，精神头儿慢慢也就上来了。

可是，一到中午就开始难过了，水壶空空、嗓子冒烟，汗漉漉的衣服被太阳一晒，脊背上就出现了斑斑的“地图”。士兵们个个是汗流浃背，张开大嘴一个劲儿地喘。头顶上是灼热的太阳，地上是热沙的辐射，仿佛是要把人烘烤成“人肉脯”一样。

5月26日，经过4天多的急行军，行程达200公里，好像比计划提前到达了目的地——诺门罕，太阳还没有落山，部队



【历史点击】

诺门罕



诺门罕全称是"诺门罕布尔德"，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因传康熙年间曾有一个"诺门罕"喇嘛（仅次于"活佛"的一种尊称）在此传经布道而得名，旧译为"诺门坎"。

诺门罕地区是一片半草原半沙漠的空旷荒原，除哈拉哈河东岸河畔洼地处水草肥美外，其余多为沙地，沙层厚10厘米左右，内有高约20米～40米绵延起伏的小沙丘，植被稀少。由于沙丘千篇一律且缺少自然地标，给地图判读带来很大困难，在此行走选择一个易于确定的参照物和保持方向十分困难。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诺门罕的气候条件也比较恶劣，冬天气温会降至零下40℃左右，多风雪；夏季白天气温高至35℃～40℃，夜里则急剧降至18℃以下，常有暴风雨，雨后道路泥泞，蚊蝇肆虐。诺门罕地区除有几个咸水泡子（湖）外（人畜皆无法饮用），淡水极为缺乏，惟一的淡水水源就是哈拉哈河及其支流。

就开始做野营准备了。

令士兵们意外和兴奋的是，离野营地不远的地方竟然发现了一条小河（确切地说或许应该叫小湖泊，大概是由于冰雪溶化而形成的吧），大伙也不管这水干净不干净，能喝不能喝，一头就拱了进去，像饮牛一样大喝特喝起来，直到把河水灌到嗓子眼儿才抬起头来，干枯的身体终于得到了滋润。

卫生队一下子精神起来，灌满一肚子河水以后，大家又开始嬉笑打闹起来，一些人甚至高兴地拥抱着在河里又蹦又跳。卫生队又复活了。是河水救了我们，茫茫旷野上最难寻的是水，并且这个时候的水是甘甜甘甜的，几口下去能从脑门顶一直甜到脚后跟。



诺门罕全景图

5月27日，早晨醒来，可能是离战场越近精神就越紧张的缘故，连日来行军的疲劳也都无影无踪了。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士气旺盛。明天开始就要豁出命来打仗了，为什么反倒精神起来了呢？

因为在士兵们的心目中，都抱有所谓“无敌皇军”的自负和“每战必胜”的盲目骄傲，整个军队上上下下都已经被这种教育给熏陶出来了，当然我当时也不例外，也是抱着这么一种信念。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一种恐怖感和羞辱感就会劈头袭来。

翻阅一下历史，所谓“无敌皇军”的背后要么是对手太弱小，要么就是有西方列强的援助，日本军队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好像从来就没有打过胜仗。日俄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当时没有英国的援助，日本是打不赢俄国的，但也就是在那场战争之后，日本开始藐视俄国、轻视苏联。说老实话，第一次诺门罕战争爆发之初，在当时的官兵们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把苏蒙军放在眼里。

拂晓时部队又出发了。昨天晚上吃得饱、喝得足，再加上又好好地睡了一觉，所以今天的行军格外有朝气，中午时分部队停下来休息，听说离将军庙已经不太远了，也就是说离战场越来越近了。

与行军途中所不同的是，这里设有好多临时厕所，是好几天没有正儿八经解过手的缘故呢，还是昨晚吃得太多、喝得太多的缘故呢，好多士兵都争先恐后地奔向厕所。开始还嘲笑他们“懒驴懒马屎尿多”，不久我的便意也被勾引上来了，这下也顾不上去嘲笑他人了，自己也加入了争先恐后抢厕所的队伍中去了。

休息完毕刚要出发，天空上突然出现了一架日军的飞机，在山县部队的上空盘旋了几圈，投下一个通信筒马上飞走了。接着前面传下命令：停止前进，原地待命。上千人的大部队一下子安静下来，士兵们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忽然都闭上了嘴巴，大家第一次呼吸到了不安的空气，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山县部队的军官们大概正在为那个通信筒进行磋商，到底出了什么事，士兵们是不会知道的，只有默默地等待。过了好一会儿，部队才又重新出发。

部队终于到达了将军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将军庙墙壁上的一个大窟窿，不知是被坦克炮打的，还是被野炮打的，好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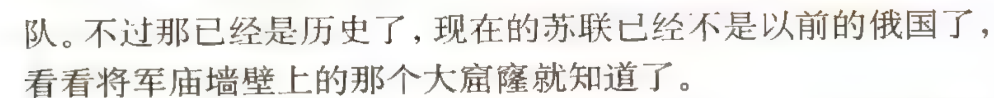
好大一个贯穿洞，一匹军马都钻得过去。

这个大窟窿使我终生难忘。当时一看到它，便浑身止不住地颤抖，马上意识到了这场战争可能是真的要豁出命来了，自己的命运也许就跟这个大窟窿一样……



将军庙。旁边墙壁上被苏军炮火击穿的大窟窿清晰可见，虽不像草平回忆的那样大得可以钻进一匹军马，但也不小。

5月27日，这一天正好是日俄战争海战纪念日。34年前的1905年5月27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以少胜多，一举击败了庞大的俄国舰



队。不过那已经是历史了，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以前的俄国了，看看将军庙墙壁上的那个大窟窿就知道了。

晚上，我又躺在沙地上欣赏起满天的星月来，可是今晚的心情却和往常不一样，充满了恐慌和不安。



2.“猪突[①]攻击”——参加步兵冲锋

5月28日清晨4点来钟，遥远的天空上出现了几个信号弹，整个山县部队顿时紧张起来，兵营里充满了杀气腾腾的气氛。军马也显得异常兴奋，鬃毛倒立，前腿高腾，咆哮不止。

卫生队也奉命在将军庙集合起来，然后分乘几辆卡车直奔前线阵地，在距离742高地北侧五六百米的地方停下来。前面已是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冲天的火焰伴随着阵阵刺耳的爆炸声，视野几乎等于零。

传令兵忽然传来命令：“抓住时机、突击前进！”

坐在卡车上就这么往烟云弹雨里冲，真可谓是胡来无谋的猪突冲锋，可是军令如山，除了冒死突击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站在卡车上抽出家传的宝刀“长船”一挥，怒号起来：“突击前进！”

卡车像发了疯一样冲进了烟云弹雨中，黑烟和飞沙使人睁不开眼，一时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什么火柱、什么爆炸声，闭着眼睛只知道猪突冲击！猪突冲击！

等再睁开眼时，黑烟和火焰已经在我们身后了，只觉得短

①猪突：原书日文，意为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

短的一瞬间，可是卡车已经突破了苏蒙军的弹雨地带，冲到了742高地的跟前。

弹雨地带共分三层：第一层是重炮、第二层是野炮、第三层是坦克炮，不难看出这是苏蒙军有计划、有组织的炮击。

刚一冲进弹雨区时，我心想这可能就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了，简直就像是下漆黑的地狱、过沸腾的火海一样。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下了一趟地狱、过了一趟火海的卫生队，伤亡却是很轻微的，我也平安地活下来了。事后一边给伤员缠绷带一边琢磨，苏军的炮火这么厉害，并且是里外分三层炮击，可就是打不到卫生队的卡车，我在烟云弹雨中也毫发未损，这是不是有什么神仙在保佑着卫生队呢?后来才明白,原来苏军集中打的是山县部队。

第一线的山县主力部队已经冲上了742高地西北侧的一个沙丘，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一辆苏军的坦克被击中燃烧起来，一个苏军坦克兵从坦克里刚一爬出来，就中弹倒了下去。

突然，一发炮弹击中了我身后的一辆卡车，死伤了好几个人，我大呼一声："担架兵!"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就落在了我的卡车旁边，心想这下可真是完蛋了，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听到爆炸声，探头一看，一个啤酒瓶大小的坦克炮弹正好落在离卡车不到一米远的地方，但是没有爆炸。大概这个炮弹飞到这儿已经是最大的射程了?再加上地面是松软的沙地,所以才没有爆炸。这家伙要是真的爆炸了的话，我们一伙没准儿就跟后面那辆卡车一样，全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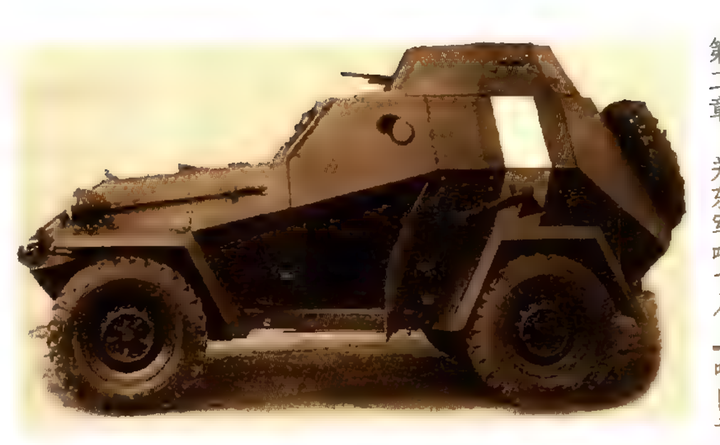


日军发起"猪突攻击"，远处是一辆九二式重型装甲车。

不管怎么说，反正在卡车上是待不住了，我急忙下令全体下车，在地面上处置伤员。刚一下车，就听有人尖叫："装甲车!装甲车冲过来啦!"我也顾不上去处置什么伤员了，扔下手中的绷带回头一看，只见前方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辆苏军的装甲车。"卧倒!打轮胎!"我一边下令一边抓起一支步枪，单腿跪地瞄准轮胎就打，除此之外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十几支三八式步枪稀稀拉拉地开了枪。

装甲车在距离卫生队15米的地

方突然熄了火，两个也不知道是苏联还是蒙古的士兵从装甲车里逃了出来，几个担架兵追了过去。这两个人不是成了俘虏就是被杀掉了，因为742高地已经处于山县部队的重围之下，所以跑是跑不掉的。



苏军的BA-64D轻型装甲侦察车。成员2人，武器为一挺7.62mm轻机枪，虽火力和装甲较差，但机动性强，适合在平原地带使用。诺门罕战争期间被苏军广泛使用。草平所见到的就是这种战车。

卫生队也能把装甲车打趴下！我们开始还有点儿得意洋洋，可后来才知道苏联的装甲车根本就没有内胎，整个是用硬质橡胶做成的，子弹打上去并不起什么作用，所以用步枪也能把苏军装甲车打趴下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好像是装甲车自身出了什么毛病才熄火的，真是老天保佑，要不然我们将是必死无疑了。

卫生队在战场上的任务是收容伤员和进行急救处置，并且要求紧跟在第一线部队的后面，所以草草地把伤员进行了急救处置、后送之后，卫生队又跟随山县主力冲向了742高地。等卫生队登上742高地时已经看不到一个蒙古兵了，他们早就撤退了，阵地上空空荡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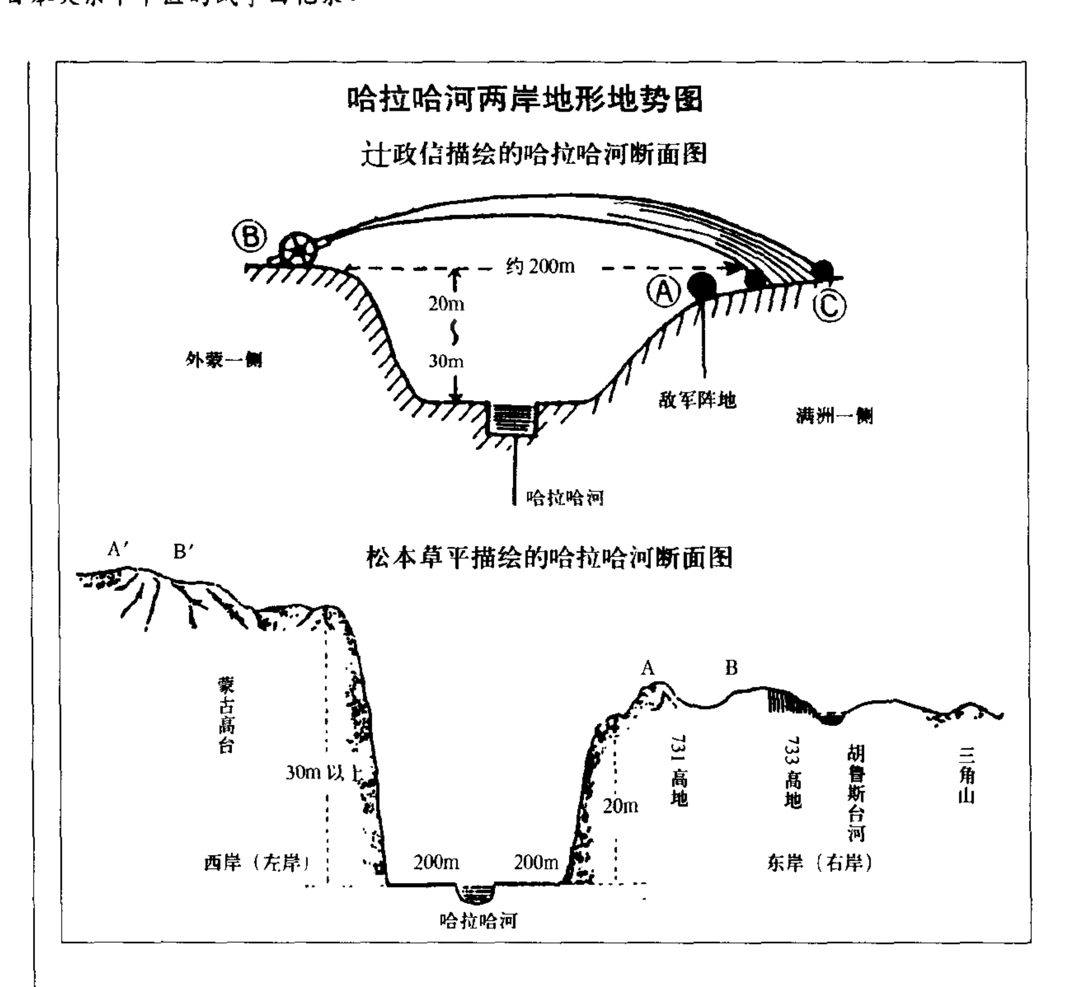
抛弃阵地全体撤退，会不会是苏蒙军故意设下的圈套呢？会不会是他们扬长避短，把善于打近战、善于拼刺刀的日军部队诱进他们的炮火圈，然后用狂风暴雨般的炮火将其消灭呢？

想到这儿，我心里不由得忐忑不安起来。

3．夺下阵地后的忧虑

为了便于理解和后述，我觉得有必要先把哈拉哈河两岸的大致地形、地势描述一下。

下图是关东军司令部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在他的“大作”《诺门罕》中描绘的哈拉哈河断面图。在这个断面图中存在着几处明显的错误。其一，哈拉哈河两岸之间的距离绝不止200米，至少应有400米。这不仅仅是我的目测，而且卫生队曾经先后两次渡过哈拉哈河，并且在河床上开设过临时抢救所，抢救和护送过伤员，有亲身体验。其二，辻政信少佐所标的左岸高度为20米～30米，而实际上是在30米以上。右岸的高度他没有明确标出，据我目测大约在20米左右，也就是说左岸的苏蒙军阵地，要比右岸的日“满”军阵地高出10米以上。



两岸的炮击战正如我担心的那样，日“满”军处于绝对劣势，吃了大苦头。日军的炮兵阵地整个暴露在苏军的视野里，而日军却看不到苏军的炮兵阵地，所以苏军的炮弹铺天盖地打过来，日军却干挨揍，搞不清楚炮弹是从哪里打来的。

看我描绘的哈拉哈河断面图，就会一目了然了。A点是完全暴露的，而从A点却看不到A′点，从B点也只能看到A′点的很小一部分，而左岸的B′点则完全看不到。但是，从B′点却能看到整个呼伦贝尔，甚至可以看到大兴安岭的山脚，所以日军的一举一动完全暴露在苏蒙军的眼皮子底下。

哈拉哈河起源于大兴安岭，河水沿着满洲和外蒙的边境缓缓而流，最终流入贝尔湖。哈拉哈河的宽度，从两岸断崖测量的话有400多米，有的地方甚至超过500米，河水的宽度为50米～60米、水深2米、流速大约1米。哈拉哈河的西岸是一面陡峭的断崖，高度为30米～40米，东岸确切地说是一片沙丘，高度在20米左右。蒙古高台上的最高点，比诺门罕地区要高出近100米，要是站在这个最高点上看的话，诺门罕大概就像一

个沙盘一样，平平整整地摆放在苏军的眼前。742高地、733高地、721高地等等，其实只不过是42米、33米、21米左右的，像馒头一样的沙丘而已。苏军可能十分了解这一点，所以当山县部队攻占了东岸的一个小高地后，苏军便不停地向高地后坡打榴霰弹，向前坡打炮弹。

蒙古高台是西岸上的一个制高点，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要塞。日军要想看到这个制高点，就必须远远退到阿布拉湖附近才行。我曾经从三角山山顶上的战壕里眺望过蒙古高台，勉强才能隐隐约约看到苏军机械化部队移动的迹象。

总而言之，在整个诺门罕地区没有我们的藏身之地，要是说有的话，那也只有像733高地这样的沙丘后面仅有的一点死角，并且必须是趴在像章鱼罐一样的战壕里才行。如果一不小心露出脑袋被苏军发现的话，炮弹马上就会呼啸而来，接着就是战壕倒塌，人被活埋。这时除了五体投地、紧紧拥抱沙丘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士兵们常说诺门罕是苏军的"炮击靶场"，大概说的就是苏军利用这个制高地形，进行准确的炮击的意思吧。

最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些当兵的了，像被从狐狸洞熏出来的狐狸一样，为了寻找一个藏身之处而不得不东躲西藏、到处滚爬，好多人就这样死于炮火之下、被活埋在战壕里，仗还没打就当了炮灰。

一提起哈拉哈河的地形、地势，我就对诺门罕战争的策划者、特别是对关东军作战课高级参谋辻政信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怒，愤怒得执笔的手都有些颤抖。冒国家兴衰之危而挑起的这场战争，事先竟搞不清地形地势，甚至也没有进行认真测量，就把部队赶到这儿打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参谋呢?就连普通一兵都知道这是军事上最基本的常识，可是他就敢对这个问题等闲视之、置之不理。

这还不算，辻政信战后仍然还是搞不清哈拉哈河两岸的地势，可以想像得出他的作战计划是如何凭空杜撰、胡编乱造。日本战败后，辻政信把这场战争以《诺门罕》为书名写了一本书，在书中对他人是恶意诽谤和攻击，对自己却是厚颜无耻地吹捧和标榜。

到第二次诺门罕之战时，甭说别的，光从蒙古高台上苏军的军用物资、机动车辆，阵地上的坦克、装甲车等的数量来看，也大体上能推算出苏军的战斗力来。然而，关东军对此也是等

现在的哈拉哈河，远处是蒙古高台



闲视之，结果导致成千上万名士兵葬身于诺门罕荒野。

关东军所知道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士兵们豁出肉体来，把身体当作肉弹，猪突！猪突！他们的作战计划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暴虎冯河！

那么，为什么在连地形地势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关东军就敢挑起这场战争呢？原因就在于关东军的“强硬派”少壮军官们一个个都太狂妄、太顽固了，说什么缺乏攻击精神就不是军人，说什么“肉弹”胜过炮弹，这完全是一幅自我显示狂的嘴脸。对他们来说，只要大日本的欲望能得到满足，死多少士兵都不会在乎，所以地形也好、装备也好，在他们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尽管地形十分不利，尽管敌我的兵力是3∶1，但是只要有日本兵的“猪突”，靠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就足以弥补这些不利条件，就一定能打败苏军。不用说，师团长小松原也是这么想的。

（二）地狱般的防卫战

1．在弹雨中苦苦支撑

占领742高地以后，我们马上就动手修工事、挖战壕，可还没等我们把战壕挖好，苏军的炮击又开始了。榴霰弹不时在头顶的上空爆炸，没有比这更令人心惊肉跳的了。

山县主力部队的斜面上，遭到苏军连续不停地猛烈炮击，浓烟滚滚、沙土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嗓子干得冒火，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高地。眼见的是硝烟沙雾，耳闻的是震耳欲聋的炮声，大地随着炮声在抖动，我们趴在章鱼罐式的战壕里双手合掌一个劲地祈祷，祈祷战壕别塌了。

"前方500米、6辆坦克冲过来了！"哨兵突然大声尖叫起来，那尖叫声就像哭嚎似的，平时就胆小的我一听到这叫喊，魂儿都吓飞了一半。那坦克的轰鸣声，我听起来就好像是阎王爷在进行死亡宣告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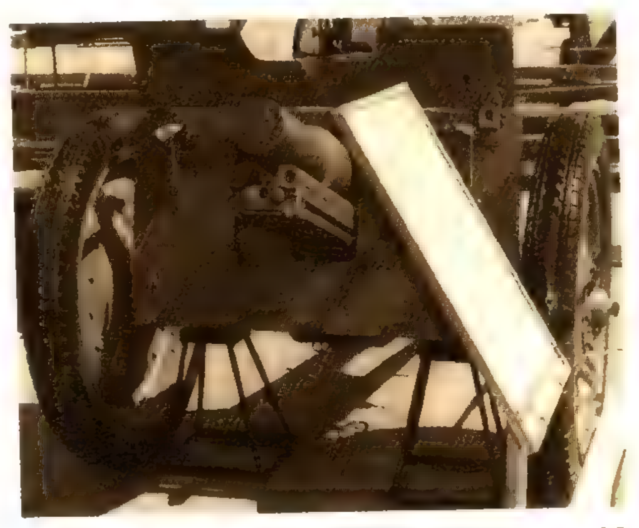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蒙古高台上的大炮一下子全都停火了，大概是怕打中自己的坦克吧。我全身颤抖着从战壕里站了起来："快，准备打坦克！"就在这危急关头，幸好山县部队的染矢中队冲上去击退了苏军的坦克群，我们才得以脱险。

坦克群一后退，接下来又是炮火的"洗礼"，卫生队连正儿八经给伤员包扎、换纱布的时间都没有，只能等炮火不太猛烈的时候做一个紧急处理。

不久传来消息说，浅田小队长率领一个加强小队在回联队途中，因迷路而误入川叉与东搜索队相遇，正在与苏蒙军苦战死斗，随时都有覆没的危险。这消息可能不会有假，因为川叉方面激烈的枪声就如同炒爆豆一样。

原来，第23师团的作战方案大致是这样的：兵分三路、前后夹击、一举歼灭。一路为右翼穿插部队，由东八百藏中佐率领搜索队从右翼先突击到川叉的渡桥附近，切断苏蒙军的退路。另一路为主攻部队，由山县武光大佐率领步兵部队从正面攻击，把越过哈拉哈河的苏蒙军围歼在河右岸。第三路为左翼包抄部队，由"满"军从左翼包抄到胡鲁斯台河南岸，切断苏蒙军的南方退路。

可是，东搜索队等穿插到了川叉才发现孤立无援，原打算包抄苏蒙军的搜索队却遭到了苏蒙军的反包围。另一方面，主攻的山县部队虽然攻下了742高地，但却遭到苏军猛烈炮火的阻击，部队无法继续攻击下去。连一门火炮都没有的"满"军骑兵部队就更不



图为苏军1927年式76.2mm团级野战炮。炮班成员5人，每个步兵团辖6门，科拉斯尼·普提洛瓦斯特工厂生产，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时，红军已经拥有了4708门这种野战炮。第一次诺门罕之战时的炮击，苏军只是牛刀小试

用说了，只能是隔岸观火、被动挨打。

一个浑身是血的东搜索队联络员，突破苏蒙军的层层包围前来求援，他嘴里一边喊着："山县联队长!山县联队长!"一边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出现在742高地上。他说搜索队伤亡惨重，死伤已经过半，并且面临着弹尽粮绝、全军覆没的危险，请求山县部队紧急增援。

听了联络员带来的悲报，山县命令副官汤屋九八郎少尉紧急给搜索队运送弹药，汤屋带领部下把弹药装上一辆卡车，冒着炮火弹雨就出发了。可是没过多大一会儿就传来悲报，说汤屋小队在途中遭到蒙古骑兵和苏军装甲车的袭击，全员战死。

接下来山县大佐又派中野敏晴少尉率领一个班，给搜索队运送弹药。可是中野班突击到搜索队身后七八百米的地点时，也被蒙古骑兵和苏军装甲车包围起来，中野下令把弹药埋到土里，然后率领全班冲入了苏蒙军的包围网，一个班无一生还。

恶报一个接一个，头头们的脸上都显露出苦涩苦恼的表情。从夹击作战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可能就意识到了这个计划是无谋的胡来蛮干。现在包抄的搜索队已经完全被苏蒙军包围起来，危在旦夕。主力的山县部队又遭到苏军炮火、坦克的阻击，趴在742高地上动弹不得。他们自身也预感到了情况不妙，全线败色浓厚。

山县联队长好像终于下定了决心，要拿出自己手里的王牌部队——染矢军旗中队前去营救东搜索队。可是，不久就传来消息说，染矢中队长在途中意识到了这一去是凶多吉少，所以没有冲进苏蒙军的包围圈，而是率领部队撤了回来。另有一说，说是山县又传急令把他们叫了回来。

对此一事，当时前线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我倒是觉得此举虽然对不住东搜索队，但是染矢、山县的决断还是明智的。为什么呢?依我看，当时苏日两军的战斗力恐怕不止3：1，而是6：1，要是再加上装备上的差距，其实际比率恐怕应在10：1左右吧。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山县部队即使是前去营救，冲进苏蒙军的包围圈，恐怕也是飞蛾投火，正中其下怀。

关于山县的作战指挥方法，战后有人批评说就像打发乞丐似的，是保全势力的自私表现。然而，山县部队也属于"穷人"，根本就拿不出什么"大钱"，不可能慷慨大方。再说了，如果派

【历史点击】

苏军的实际力量



此时苏军在诺门罕前线的兵力布置为：第11坦克旅的1个喷火坦克连（T–130喷火坦克×12辆）、1个机枪营、1个战斗工兵连，另外还有蒙古骑兵第6师、第8师的2000名骑兵，以及两个76mm山炮连，总兵力不过3000人。日军为山县联队本部及1个步兵大队（约1500人），东八百藏骑兵联队主力，75mm山炮1个中队及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7团、第8团，总计2600余人，双方兵力差距不大，并非草平所感觉的10∶1，所不同的只是苏蒙军是以逸待劳而已。



苏军的一支机械化步兵侦察部队，有趣的是，他们使用的是英国造的布伦式轻机枪，车上的另一名士兵拿着枝PTRD反坦克枪，其火力配备还是很强的。

出增援部队就能扭转局势的话还好，否则就是白白送死，浅田小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时山县部队装备薄弱，而军旗中队又是惟一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假如染矢中队真的去增援搜索队了，那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样一来山县部队就会基本失去战斗力，面对苏军如此猛烈的炮击、蜂拥而至的坦克，山县部队的命运肯定就要和搜索队一样了。

万雷轰鸣一般的苏军炮火停下来，742高地上也随着一下子寂静下来。几只昆虫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似的又唧唧地叫起来，这些昆虫们大概不知道这儿正在进行战争吧？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一个月牙，映照着仍然充满硝烟味的高地。月光下的高地上死一般寂静，只有伤员们痛苦的呻吟声在阵地上轻轻飘荡。

卫生队的战场救护也不顺利，白天眼看着有人受伤可就是不能去抢救，只有天黑苏军的炮火停下以后，才能把他们抬回来进行治疗，所以一到了晚上我们就忙得不可开交。说是治疗，其实顶多也就是包扎止血、打针镇痛，失血过多的就给他们打打强心针什么的。好多士兵虽经一再抢救，但最后还是死掉了。

卫生队在742高地的北坡、一个苏军看不到的死角上搭起了一个临时抢救所，但是白天苏军的榴弹还是像下雨一样打过

来。甭说治疗了，就连换换纱布、缠缠绷带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另一个年轻的军医福田商量，决定趁天黑，先把一部分伤势严重的重伤员送往后方。

晚上8点来钟，载满重伤员的两辆卡车由福田军医指挥，朝着将军庙方向悄悄地出发了。可是出发后不到10分钟就被蒙古高台上的苏军发现了，“送行”的炮弹接着就飞了过来，两辆卡车不得不撤回来。炮火一停，我说这次由我自己来押车指挥，可是福田军医说什么也不肯，指挥着卡车再次出发。终于突破了苏军的炮火，把第一批重伤员送到了后方，不知为什么，福田军医再也没有回来，是死是活也无从得知。这样一来卫生队的军医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5月29日，天刚蒙蒙亮，炮弹代替了早饭，又是苏军炮火的“洗礼”。我趴在战壕里一动也不敢动，双手合掌一个劲地祈祷。苏军的炮击一天之中很有规律，天一黑就停，天一亮就打。

后坡上停放的几辆卡车成了临时病房，晚上就把伤员们安置在卡车上休息。只是白天卡车上太危险，所以一大早又把伤员从卡车上放下来。伤稍重一些的放在卡车下面，轻一点的就只好让他们趴在地上了，轻重加起来一共50来人。我趴在战壕里总觉得不放心，时不时转过头来看上两眼，好在是一个死角，伤员们总算是安全。

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川叉方向突然枪炮声大作，“乌拉”、“乌拉”的叫喊声就像大海的怒涛一样隐隐传来，搜索队的恶战苦斗程度可想而知。

742高地上又是硝烟弥漫了，炮弹好像是从小松台打来的。从弹道来推测大概是122毫米榴弹炮，威力很大。但是从日军的炮兵阵地上却看不到，大概苏军就是利用这一地形上的优势，看准了日军的动向再打，炮弹一点也不浪费。



苏军1910式122mm榴弹炮。这是驻蒙苏联红军第57特别军早期装备的最大口径火炮。

卫生队因为是在高地的后坡，有山顶的遮挡，再加上全都趴在战壕里，所以伤亡相对比较小。对卫生队来说，和炮弹相比我们更担心自己的章鱼罐战壕会不会倒塌。章鱼罐战壕的一个特点就是口小肚大：口小是为了防止炮弹碎片飞进来，肚大是为了人在里面能伸腿坐下。但是这样的战壕有一个致命的缺

点，那就是容易塌方，一塌方人就会被活埋在里面。

中午时分，双手插在裹肚的腰围子里、打扮得像普通士兵一样的山县联队长从战壕里爬了出来，看样子好像是要巡视一下阵地，脸上充满了不安和苦恼的表情。是不是要采取什么新的行动了呢?我心里直打鼓。

下午2点左右，5名炮手悄悄地抬出一门速射炮，安置在742高地的山口附近。这是开战一来我第一次见到山县部队的火炮，可能这也是山县手里最后的一张王牌了吧。

正好这时，大约500米的前方出现了一辆苏军坦克，它正向这边行驶。刻不容缓、瞄准射击，只听“轰！轰！轰！”三发三中，坦克顿时冒起白烟燃烧起来。我此时正好趴在这门速射炮的身后，看得真切，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次实弹射击，紧张得心扑通扑通一个劲地跳。炮弹从侧面看的话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从后面看的话，炮弹带着烟飞出去的弧形弹道能看得一清二楚。

可是不到10分钟，一架苏军飞机就低空飞来，“不好，要投弹!”一看情况不妙我急忙跳进了战壕。然而飞机并没有投炸弹，一掠而过就飞走了，看样子好像是一架侦察机。“不对！”这下我觉得情况更加不妙，不由得大声叫喊起来：“危险!”

话音未落，五六发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打了过来，速射炮当场被炸毁，5名炮手无一逃脱，全部阵亡。侦察机又一次出现在742高地的上空，在确认了战果以后不慌不忙地飞走了。苏军的立体协同作战真是巧妙、奏效，而我们除了顿足捶胸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门速射炮被炸毁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山县部队的火炮射击。

日军的37mm步兵狙击炮。

这种1922年设计的火炮主要用于攻击机枪阵地与各种掩体，必要时也可以发射穿甲爆破弹攻击装甲车与轻型坦克。当时只装备了日军的精锐部队，1个步兵中队装备2门。

傍晚7点来钟，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月亮也从云层里爬了出来。突然，川叉方向的上空光芒四射，蒙古高台上的探照灯一齐打开了，照得整个大地如同白昼一样。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以惊讶和不安的目光眺望起来。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硝烟火光就已冲天而起，大地随着万雷齐鸣一般的爆炸而颤抖起来，爆炸的气浪携带着热风和烧焦的糊臭



味儿直扑过来。接着就是“乌拉”、“乌拉”的呐喊声。

与此同时，传来了日军那特有的“呀——”“呀——”的声嘶力竭、吐血一般的突击呐喊声，听起来简直就像鬼哭狼嚎一样令人毛骨悚然。无疑这是东八百藏的搜索队正在进行“肉弹”拼死作战。

这拼死的呐喊声撞击着我们的五脏六腑，令人不寒而栗，那火光就像血在燃烧。何等的悲惨啊，面对隆隆而来的坦克、装甲车，使出最后一点力气，用浑身是血的身躯冲撞过去……这简直就是一幅“阿鼻叫唤”的地狱图，然而这就是日本军队要求的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是关东军高官们不顾士兵死活一再强调的“肉弹”拼搏！

突然，伴随着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大爆炸声，通红通红的火焰直冲云霄，仿佛是搜索队全体将士的鬼哭大合唱，又仿佛是所有人的血液一齐喷射出来。事后才知道，是搜索队的弹药车和油罐车被击中燃烧起来。

两个小时以后火光才慢慢消失，大地又恢复了夜晚的寂静。搜索队可能是全军覆没了，因为炮声没了、枪声没了、呐喊声也没了，只有夜风卷着血腥味儿阵阵扑来……

2. 第一次遭遇蒙古兵

川叉方面平静下来以后，卫生队突然接到命令：卫生队夜间巡逻阵地。

我一听就来气了，卫生队一到了晚上就忙得不可开交，怎么能叫我们去巡逻阵地?再说巡逻阵地是战斗兵的工作，你们不去却派我们去，这算怎么回事?越想越有气，我禁不住在心里怒骂：“胆小鬼！”

可是再怎么生气、再怎么怒骂，有命令还得去执行。我只好冲着卫生队喊了一声：“谁跟我来?”松永上等兵等三个人马上就站了出来。

卫生队好像总是低人一等，来战场之前的待遇低不说，来战场之后的待遇还低，发的东西也比步兵的少。步兵总是沾光，好事都是他们的，擦屁股的事全让我们来干。他们在睡大觉的时候我们却要消毒、换纱布，甚至要给伤员擦屎擦尿，现在放着伤员不让管却把我们派出来巡逻，叫什么事?也有点儿太离谱了吧?我一边走一边琢磨，心里总觉得堵着一口闷气。

可是好好想一想，气也就消了。步兵们在战火硝烟之中已经打了两天，肉体也好精神也好，都已经是相当疲劳。并且最要命的是没有水喝，干渴得嗓子冒烟，有的士兵实在是干渴难忍，抓起汽油就喝，结果中毒而死。为了找水喝，他们曾在夜晚轮班不停地挖过井，可是一滴水也没有挖出来。在沙丘里挖井找水岂不是缘木求鱼，愚蠢透顶?结果不管怎么挖、挖多深也还是沙子，最后只留下一个个大沙坑不了了之。

淡淡的月光透过薄雾映照着大地，连灌木杂草的影子都隐约可见。我提着一支手枪和三个卫生兵一起走下斜坡，在高地的周围巡逻起来。因为这是卫生队第一次夜间巡逻，四个人心里都很紧张，紧紧握住手里的枪小心翼翼地走动着。

刚刚走了不到5分钟，突然前面低矮的草丛中有几个黑影在动，我们马上就地卧倒，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有两三个黑影在眼前一闪而过，敏捷得就像一阵风一样。我发现眼前不远处有一个坑，起身一跃就跳了进去，马上举枪瞄准。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觉得不对劲——坑里热乎乎的。“有人在这儿待过!”心头猛然一惊，双腿一软差一点跌倒在地。

几个黑影又在眼前不远的地方出现了，猫着腰正一溜烟儿往前窜去，我刚要扣扳机就听“啪”的一声枪响，一个黑影倒了下去。这一枪是久经沙场的上等兵松永打的。好像一枪击中要害，黑影倒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蒙古兵，人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手里还紧紧握着颗手榴弹!

卫生兵正要去追击另外几个黑影，我急忙拦住了他们，一是担心苏蒙军有接应埋伏，二是因为我们还有巡逻任务在身。薄雾不知什么时候消散了，一轮皎洁的明月悬挂在中天上，好一个月光的世界。周围已经看不到苏蒙军的影子了，只有荒野上的昆虫还在叫个不停。5月的夜



日军的观测哨。处于较低地势的日军只能用汽油桶垒起高台监视对方，虽绑上树枝加以伪装，但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孤零零地突兀着这么一个怪物，必然成为苏军首先打击的目标。（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风一吹，被露水打湿的肌肤还是感到有些寒冷。

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刚才的一幕又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出现了。几个蒙古兵好像早就隐蔽在这儿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当发现有人朝这个方向走过来时，他们可能以为是被发现了，所以才急忙开始往回逃的吧?要不然坑里是不会那么热乎的。

又一想，这几个蒙古兵大概都是喇嘛僧，不轻易杀生吧，否则扔上一颗手榴弹，我们这支小小的巡逻队恐怕早就被炸飞了！这么一想，又觉得那个被打死的蒙古兵太可怜了、太不幸了。

世上少见的这场巡逻闹剧结束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战壕里，刚想坐下来喘口气，不知为什么一下想起了傍晚那场激战，不由得又朝川叉方向看了一眼。就是这一眼，我突然发现在前方大约300米的地方，月光下出现了一个“幽鬼”，正东倒西歪、连滚带爬地朝这个方向奔来!“怎么回事?”我吃了一惊，急忙抓起枪，朝那个“幽鬼”奔去。

等赶到时，“幽鬼”已经被周围的士兵们搀扶起来，只见他满身满脸都是血，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来到山县联队长的面前，他忽然推开搀扶的人，立正敬礼：“本军曹奉命前往第二线后送途中，遭敌军坦克袭击，除我一人之外全员战死。为了汇报，本军曹现赶回来归队。天皇陛下万岁!”高呼一声之后，就像演电影一样扑通一下倒在地上，气绝身亡了！

要不是亲眼所见的话，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可是他真的死了，因为我给他检查了一下，心跳没了、呼吸没了、瞳孔也散大了。这个“幽鬼”看来是东搜索队的部下，并且看样子他大概还不知道搜索队已经全军覆没了，错把山县部队当成搜索队了。

5月30日，早上3点来钟，睡梦中忽然觉得喉咙里好像插进了一根竹棒一样难受，一下子憋醒了。嘴里、喉咙里、食道里、气管里都是沙子，怪不得喘不过气来呢。

一阵折腾之后，再也睡不着了，就一个人爬出战壕来透透气。战壕的四周一棵杂草都没有，沙土已经被炮弹翻了好几遍，硝烟的气味仍然在阵地上飘荡，沙土的热气直冲鼻子。不过凉风带着细细的雾珠吹过来，倒使人觉得浑身凉爽。

为了能搞到一点儿露水，我早早就到高地的山口附近，用饭盒盖开始收集，可是忙活了近一个小时才搞到一小杯露水。

东方刚刚开始发白的时候，我捧着像宝贝一样的露水急忙返回战壕里，要是被苏蒙军发现可就麻烦了。

蹲在战壕里用这点比血还贵重的露水开始刷牙，只是露水里沙子太多，刷得牙龈都有点痛起来，想吐出来却又觉得可惜，含在嘴里简直就像一块血疙瘩一样。刷完牙，我把剩下的宝贵的露水小心翼翼地捧起来，也不去管它沙子不沙子，一口气喝了。这几口水一喝，馋虫一下子逗引上来，想喝水的欲望越来越强烈，那滋味简直能使人发狂。此时此刻方能理解，为什么有的士兵要喝汽油。仅仅缺水两三天就这样使人发狂，再这样下去又会怎么样呢?

天刚一放亮，742高地还笼罩在阴冷的晨雾中时，苏军的大炮就吼叫起来，先是一两发，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万炮齐鸣。苏军向东侧的主力部队方向打榴弹炮，向西侧的卫生队方向打榴霰炮，从前后两个斜坡分开来炮击。主力部队的东坡被浓浓的硝烟覆盖着，阵地上什么也看不见。卫生队的头顶上榴霰弹不时“啪”、“啪”像雷击闪电一样，又像是放烟火一样一个个炸开，硝烟弥漫，遮天蔽日，视线几乎是零。火热的地狱再加上沙雾硝烟，令人喘不过气来，战地救护工作根本就无法进行下去。

小的时候曾经读过一本书，书名叫《日本海战记》，书中一个俄国海军将校写到：“日本海军的榴霰弹使我们大伤脑筋，因



苏军在猛烈炮击，由于补给通畅、弹药充足，苏军在炮战中始终处于上风

为榴霰弹导致我们无法进行正常的舰上作业，这也是导致俄国海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可现在是苏军的榴霰弹在我们的头上爆炸，导致卫生队无法进行正常的战地救护。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下子轮到日本尝尝苦头，“大伤脑筋”了，这是不是一种轮回报应呢？

一个多小时后，炮声戛然而止。士兵们都纷纷从章鱼罐战壕里探出脑袋来，互相小声呼唤着同伴的名字，确认一下对方是否还活着，一旦听到回音彼此就高兴好一阵子。晨风吹走了硝烟，就像一下子打开了天盖一样，阳光耀眼夺目。放眼向远方望去，硝烟伴随着晨雾正向远方慢慢飘荡，飘向大草原的尽头。雄大的呼伦贝尔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静静地沐浴着清晨的阳光。

没有搜索队的音信，什么音信都没有，越是没有就越使人害怕，也就越担心742高地会不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士兵们由于连日缺水，再加上多日的炮火煎炒，连汗水都干枯了。肉体上疲惫不堪，精神上更是焦躁不安。

9点多钟，阵地上突然骚动起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站岗的哨兵打盹的时候，被蒙古兵抓了“舌头”。虽然从阵地上还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蒙古兵是把哨兵捆绑起来作盾牌而撤退的，所以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能看着他们的身影咬牙切齿。我一下子想起昨天晚上巡逻时遭遇的那几个蒙古兵，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来抓“舌头”的。

这个时候山县部队布置在742高地上的士兵，大概只剩下不到300人，这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兵力。人手越少就越忙，白天是炮火弹雨，夜里不是站岗就是巡逻，所以根本得不到休息和睡眠。这边苏军的炮火一停，士兵们一个个就开始打盹，身心疲惫不说，再加上好几天喝不上水，与其说是在打盹，倒不如说是由于缺水而引起的轻度昏迷。

炮火一停就轮到卫生队上班了，连个打盹的工夫也没有，抓紧时间赶紧去给伤员清创、换药。使人惊讶的是，过了两三天的伤口不用说，就连纱布还渗血的伤口，都已经生了蛆，大的竟有1厘米长。事后我还惊奇地发现，蛆越多伤口长得越好，蛆多脓少，肉芽组织长得也快。

这些蛆好像是在清除坏死组织，促进肉芽组织的生长，促进伤口早日愈合一样。心想这可是一个重要发现，是一个值得

好好研究的重大课题。可是战争让这一切都成了幻想，命若悬丝的情况下哪还顾得上什么医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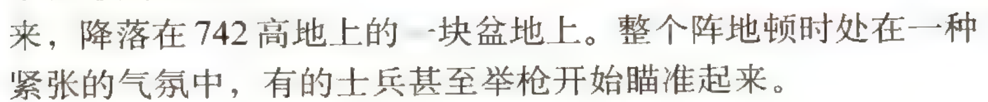
后来才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早就开始在研究这个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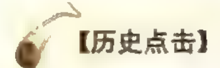
日军在诺门罕前线的侦察机。（出自《太平洋战争·1937～1945》，每日新闻社）

3.辻政信从天而降

下午2点左右，一架美式CESSNA小型侦察机突然飞来，降落在742高地上的一块盆地上。整个阵地顿时处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有的士兵甚至举枪开始瞄准起来。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从飞机上走下来的竟然是本次作战的设计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关东军司令部作战"大参谋"



【历史点击】



辻政信其人

日本少壮派"小樱会"成员，同时也是"东亚联盟"的骨干分子，"八纮一宇"、"皇道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曾经为日本军队完成了很多艰险的作战使命，在日本旧陆军军官眼中，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军人，因此他成了许多日本法西斯青年军官崇拜的偶像。

辻政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此人工于心计，在军校时总善于独出心裁表现自我。在夜间集合行军时，别人总是尽量减少辎重，而辻政信却带上全部家当，还特意在铺盖里塞上几块砖头，后被教官发现，成为"学生的榜样"。

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时，辻政信是第9师团的一名中队长，在上海郊区大场镇一役中受伤，因"重伤不下火线，并指挥连队有方"受到师团长植田谦吉的表扬和信赖。

1936年，植田谦吉升任关东军司令官时，将辻政信一并带到了关东军。辻政信此时已升为少佐，担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要职。在诺门罕战争中辻政信可谓战争的积极鼓动者和参与者，整个战争期间他始终待在诺门罕战区指挥部，甚至还随机参加了轰炸塔木斯克机场的行动。诺门罕战争失败后，调任中国派遣军继续服役。用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话来说："辻政信体力旺盛、精力充沛，言有说服力，动有实行力，是个杰出的人才。"可参加过诺门罕战争的日军下层官兵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辻政信好大喜功、盲目制定《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才诱发此次战争，使1.8万名日军葬身异国他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辻政信又策划制定了"马来奇袭作战"计划，1942年2月8日，一举攻下了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桥头堡新加坡，令8.5万名英军投降。后来，辻政信下令在新加坡屠杀了4万名华侨（新加坡中学教科书记载），并在缅甸战场粮食短缺之时，让部下生吃英国战俘的人肉（日军片仓源少将战后证实了此事）。连号称"马来之虎"的日本第25军军长山下奉文中将都对辻政信这些行为感到惊讶，认为："辻之人欲望强烈，奸诈狡猾，是个善于耍小才的人，非国家有用之大才。"



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

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时，辻政信也是主要策划者之一，日本战史认为辻政信应为此役2万多名日军的死负责。（诺门罕和瓜岛之战可谓日本陆军史上败得最惨的两仗，竟都出自于辻政信一人之手，真可谓“大手笔”。）

日本战败后，辻政信得知其被列为战犯而受通缉时，忙化名“青木宪信”，装成一名日本和尚在泰国和中国躲了三年，并以军事顾问的名义悄悄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1950年战犯解除通缉后，辻政信返回国内，竟于两年后当选为日本国会议员。

1961年，辻政信以“对东南亚进行实态调查”为由（一说是为挖掘日军在战争中隐蔽起来的黄金）去了东南亚，不久在老挝被老挝人民解放军抓获，以“间谍罪”被枪毙，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我还是老样子，忙着去给伤员换药、治疗。不大会儿工夫一些卫生兵就回来了，他们不解地问：“军医，这个参谋怎么这么凶呀?他一见到山县联队长就破口大骂起来，并且是当着我们这些士兵的面骂的呀。” 辻政信说：“全是因为你的笨拙用兵，才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全是因为你见死不救，搜索队才全军覆没的!东八百藏不是你的同学吗?你的友情都到哪里去了?今天晚上你给我去收尸，你要是不去，那么本官亲自去!”

当时山县的军衔是大佐，辻政信的军衔才是一个少佐，但是就是这个少佐竟像痛斥自己的部下一样，把个山县大佐骂了个狗血喷头，并且是在山县部队士兵的面前骂的，气得士兵们个个咬牙切齿，但是又毫无办法。

由于辻政信的无谋、胡谋、乱谋，所以士兵们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三谋参谋”，这也说明了在一线士兵们的心目中，对他是如何的不满和不信任。不管日本士兵对所谓的“皇国”如何忠诚，对“皇军”的军规又是如何顺从，但是对这样的“三谋参谋”实在是忍无可忍。

不可思议的是，辻政信“三谋”大大地发泄了一通之后，大家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身影。飞机着陆之后不久就飞走了，原先估计他是不会乘飞机走的，也就是说他人可能还在742高地上，奇怪的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时战火纷飞，自己的事都管不过来了，哪里还有心思去管他人之事呢，尤其是像辻政信“三谋”这种人。

多少年之后我才搞明白，当时的估计是错误的。东搜索队的一个幸存者，一个叫田端的人，在回忆38年前被救经过时所写如下：

“当时我的腹部被弹片贯穿，右胳膊被手榴弹炸伤，已经快不行了，可是我还是靠自己的力量向东，向自己部队的方向一点一点爬去。终于我发现了地上的车轱辘印，是敌军的也好、是友军的也好，反正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靠运气吧，于是我就躺倒在路边上。正好有一辆卡车从这儿路过，我就喊叫起来，结果我被救上车，上了车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之后才知道是被友军救了，躺在一个帐篷里。正巧搜索队的池田军医也在，他说正好过政信参谋的飞机在这儿，你就坐飞机走吧。结果我和另一个人一起被送到了后方。”

田端当时的军衔是伍长，他在拣起一个苏军投掷过来的手榴弹，准备往回投的一刹那间手榴弹爆炸受伤。

从他写的这一段来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帐篷就是山县部队的联队部，飞机就是过政信的侦察机。飞机飞回时机上的另一个人，很可能就是过政信“三谋”了。要是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过政信参谋乘坐飞机而来，把山县大佐臭骂了一通，下了一道夜间收尸的命令之后，自己竟拍拍屁股“飞”走了。

4. 【战史记录】



开往前线的日军九二式重型装甲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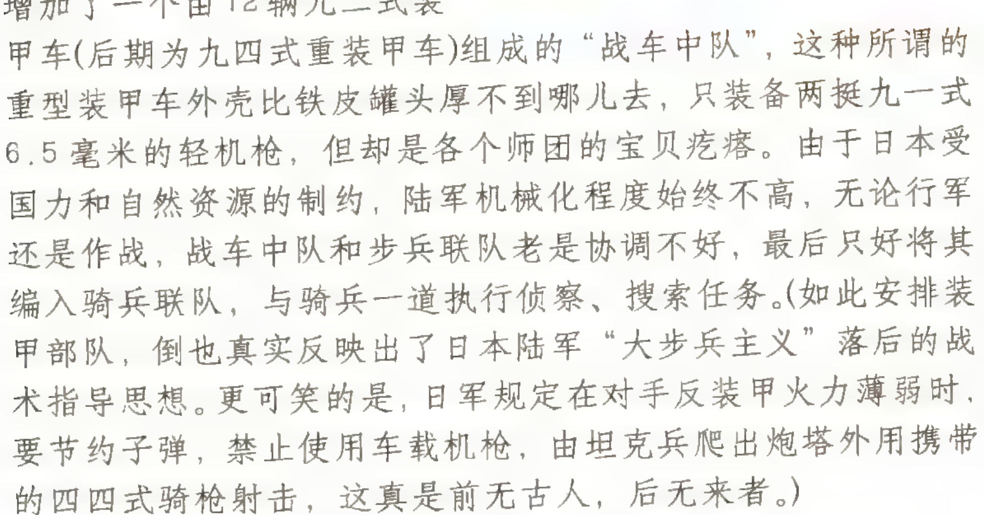
骑兵与坦克的对决

1939年5月27日午夜，第23师团骑兵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信心十足地带着快速部队走出了甘珠尔庙军营。这支担负迂回包抄任务的部队由骑兵和一个装甲车中队组成，仅仅对付一个蒙军第24国境守备队，东八百藏甚至认为派这么多兵力都有些小题大做了，山县的第64步兵联队或许根本就不用去。虽然有情报反映，在前线发现了有苏蒙军队坦克和装甲车活动的迹象，但东八百藏根本不在乎，他认为在松软的沙丘地带作战，笨头笨脑的战车会故障频生，远不



如他的骑兵灵活机动，何况他的部队还带了不少的反坦克手雷，真要是碰上了，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不过他还是听从了小松原师团长的建议，带上了师团惟一的一个重装甲车中队，这就更使东八百藏有恃无恐了。

1937年以后的日本陆军编制中，每个主力师团都新增加了一个由12辆九二式装甲车(后期为九四式重装甲车)组成的“战车中队”，这种所谓的重型装甲车外壳比铁皮罐头厚不到哪儿去，只装备两挺九一式6.5毫米的轻机枪，但却是各个师团的宝贝疙瘩。由于日本受国力和自然资源的制约，陆军机械化程度始终不高，无论行军还是作战，战车中队和步兵联队老是协调不好，最后只好将其编入骑兵联队，与骑兵一道执行侦察、搜索任务。(如此安排装甲部队，倒也真实反映出了日本陆军“大步兵主义”落后的战术指导思想。更可笑的是，日军规定在对手反装甲火力薄弱时，要节约子弹，禁止使用车载机枪，由坦克兵爬出炮塔外用携带的四四式骑枪射击，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日军九二式重型装甲车。

九二式重型装甲车乘员3人，重3.5吨，正面装甲厚度6mm，车体十分狭小，仅载机枪2挺。侵华战争初期面对反装甲火力几乎为零的中国军队，尚能符合日军平原地带快速突破、在崎岖地带机动作战的要求，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九二式的技术寿命已经到达极限，而且也失去了其战术上的存在意义。

诺门罕战争中使用的改进型九四式重型装甲车也仅是加装了一门13mm的机关炮，仍解决不了火力弱的根本问题。

由于刚从陶林锡拉盖清剿“得胜”回来，这次再去诺门罕自然是轻车熟路，骑兵联队一路上排成四列纵队，连前哨都没有派，大摇大摆地行走在荒原上，战车中队则拉开一字长龙，卷起滚滚黄尘紧跟其后。日军普遍认为，只要一交火，蒙军仍会像上次一样掉头就跑，打这样的仗太轻松了。“当时根本不像去打仗，像一群中学生到野外郊游。”一个幸存的军曹战后回忆道。

5月28日拂晓，东八百藏的快速支队异常顺利地迂回摸到了哈拉哈河畔，黑夜里穿过了长达27公里的沙丘绵延地带，竟没有迷路，日军这次的运气出奇的好。

清晨5点，身体粗壮的东八百藏气喘吁吁地爬上了一个大沙丘，眼前的景况令他兴奋不已。不远处好像是一个蒙军指挥部，掩蔽部外竖着长长的天线，周围堆着厚厚的沙袋，旁边只有零星的几个哨兵和拴着的十几匹马。(东八百藏发现的正是蒙

军骑兵第6师的司令部，也是苏蒙军队前线联合指挥所，苏蒙军队的5道防线全部排列在战场正面，两翼竟没有布设警戒阵地，甚至连巡逻队都没有派。“大清洗”后苏蒙军队刚换上来的年轻军官普遍缺乏实战经验，很快他们便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血的代价。）

老谋深算的东八百藏没有急于进攻，他用望远镜仔仔细细地又观察了许久。东边沙丘尽处隐隐可以看到一些排列整齐的坦克和装甲车；河西岸高台上好像有苏军的炮兵阵地，长长的炮管斜指向天空。这根本不像情报所说的蒙军第24国境守备队，对手肯定是早有准备的苏蒙野战部队。那些部署在蒙军纵深的苏联坦克，会给即将发起正面进攻的山县联队一个措手不及。山县一打响，自己在侧后就必须同时打响，马上会腹背受敌，遭到河西岸苏军和东岸蒙军的夹击，就手下这点兵力，肯定凶多吉少。东八百藏开始后悔没有把骑兵联队全带来，更令他恼火的是，根本没有办法将这个至关重要的情报通知给山县武光大佐，以迅速调整进攻部署。因为无线电通讯小队留在了海拉尔的营房里，出发前谁也没觉得有带上电台的必要。

东八百藏骑兵联队一路上排成四列纵队，大摇大摆地行走在荒原上。没想到，这一去就如飞蛾投火，再也回不来了。

东八百藏和山县武光都没料到，从诺门罕沙丘到哈拉哈河东岸，15公里内，苏蒙军队集中了1个骑兵师、1个T—130喷火坦克连、1个苏军机枪连和1个装甲车营，部署了5道防线，正张着网口等着日军来钻。而且苏军第11坦克旅正从温都尔汗马不停蹄地向这儿赶。



然而，战局的发展出乎双方的意料。

5点30分，东方响起了枪声，山县部队按原计划发起了进攻。东八百藏只好硬起头皮下达了“攻击前进”的命令，日军12辆装甲车居中，骑兵环绕两翼一起扑向了

蒙军指挥部。

当日军的第一排重机枪子弹打到蒙6师司令部的掩体上时，师长沙日布当时就愣住了。一线战斗刚刚打响，指挥部内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前方，谁也没想到处在后方“最安全”的司令部会遭袭击。日军装甲车上的13毫米机关炮和重机枪弹如雨泼，蒙6师警卫排在光秃秃的沙丘上毫无遮掩，虽顽强还击，但没几分钟，便伤亡殆尽，3挺马克沁重机枪刚打了几发子弹就先后被击毁了。几分钟后，日军骑兵便挥舞着马刀冲进了蒙6师阵地，师长沙日布少校一面命令政委和苏军顾问快撤，一面带领剩下的师直人员拼死阻击。日军的一颗手榴弹扔进了掩蔽部，沙日布中弹牺牲。河对岸的苏军炮兵见双方混战在一起，不敢开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骑兵挥着马刀四处砍杀。

占领了蒙6师司令部后，东八百藏兴奋得手舞足蹈，四处走来走去，这真是意外的收获，他马上派出副官将此消息上报师团长(这是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取得的少有的胜利)。稍加休整后，骑兵联队开始向浮桥挺进。

不过关东军的好运到此为止了，苏蒙军队接到指挥部被偷袭的消息后，大批部队立刻从两边包抄过来。东八百藏要是当时打完就跑，或许还能有脱身的机会，但此刻他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最早赶到的是蒙6师的装甲营，36辆BA—6装甲车一字排开，齐刷刷地压了过去，一排排45毫米加农炮炮弹打得日军骑兵人仰马翻，乱成一团。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毫无遮掩的日军冲不上去撤不下来，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有少数骑兵侥幸冲入了蒙军装甲车群内，可面对这些横冲直撞的“钢铁怪兽”也是束手无策，只好绝望地挥舞着马刀，砍得车壳装甲丁当乱响。接着赶到的是一个苏军喷火坦克连，日军装甲车中队迎了上去，各12辆，双方数量都一样，可日军的装甲车与苏军的T—130喷火坦克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九四式重装甲车上的机关炮打到苏式坦克装甲上如同隔靴搔

苏军的BA—6轮式装甲车，乘员3人。上面装的是T—26坦克的45mm炮塔，火力强大，机动性较好，但装甲相对薄弱。诺门罕战争中被日军肉弹炸毁多辆，蒙军几个装甲营装备的全是这类战车。



痒，而苏式坦克上的45毫米加农炮打日军那不到6毫米厚的车壳，就像捅层窗户纸一般轻松。双方交手没一会儿，8辆日本重装甲车便被打成了筛子，滚滚黑烟夹杂着烈焰直冲天空。苏军喷火坦克慢慢逼近了剩余的4辆日军战车，像猫戏老鼠一样将其团团围住，任其机枪打成一个点也不还击，最后喷出了一股火龙席卷车顶，上千度的高温将绿色车体烧成了灰白色，车内的东洋装甲兵顷刻便人间蒸发了。

沙丘上到处烈焰腾腾，弹片横飞，风刮起灼人的沙粒扑打在日本骑兵的脸上身上，他们一个个大汗淋漓，血污满面，像刚从地狱爬出来的小鬼。东八百藏见大势已去，只好命令手下弃马就地掘壕抵抗。实事求是地讲，当时隶属于关东军的日本兵还算是训练有素，尤其是士官和一些老兵，被长期灌输的“武士道”精神支撑着，加上长年累月的艰苦训练，单兵作战能力较强。剩下的百十个日本兵很快用钢盔在松软的沙地上挖成一个环形掩体，据此向四周射去。蒙古骑兵的攻势被压制住了，但对苏军的装甲部队没有用，三八式骑枪6.5毫米的子弹噼噼啪啪地打在坦克装甲上跟刮过去的沙粒差不多，苏军坦克和装甲车调整完队形毫不在乎地冲了上去。

在东八百藏的指挥下，日军拿出了最后一招——“肉弹攻击”。挑选出的敢死队员利用坦克的观察死角，扑向其油箱处拉响集束手榴弹，几辆苏装甲车被炸起火，其余的连忙退了回去，苏军一时还找不出什么办法对付日本兵这种玩命战术，只好保持距离远远地监视着他们，车载机枪和火炮编织成的弹雨打得日军阵地上尘土飞扬。

苏军在猛烈炮击，强大的火力使参加过诺门罕之战的日军刻骨铭心。



虽说被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但日军总算是缓过一口气，可接下来怎么办，东八百藏也不知道。东边炮声隆隆，看来山县部队正与苏蒙军主力交火，恐怕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惟一让这伙孤兵感到一丝欣慰的是，熬到下午，突然在浓烟中冒出一股援军，原来是山县联队的浅间小队。这

个小队在进攻中迷了路，远远地看到这边黑烟冲天，浅间少尉就自作主张带着80名部下趁天近黄昏硝烟弥漫之际，冲进了阵地。虽然来的全是步兵，也没有反坦克武器，但聊胜于无，东百八藏还是惊喜交加，马上安排扩大掩体，准备死守待援。



苏军的两人狙击小组。前方步兵拿的是PTRD型反坦克枪。乍一看到，人们首先会对其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枪管产生深刻印象，由于苏军当时没有足够的狙击步枪，很多时候反坦克枪被作为狙击步枪使用。该枪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在阿尔巴尼亚陆军部队中列装。

天黑了下来，在战壕里蹲了一天的日本兵还没来得及伸伸腰，便被一片强烈的亮光罩住了。苏军的几部防空探照灯车将日军阵地变成了白昼，东八百藏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炮弹便铺天盖地打了过来。苏军8门76毫米火炮开始发言，炮击持续了整整一夜，炸得一天多水米未进的日军士兵头昏脑涨，个个灰头土脸。

幸好第二天上午苏军没有再发起攻击，心灰意冷的东八百藏又有了一线希望。东边传来的炮声越来越密，远远地可以看到大漠上升起了十几根浓浓的黑色烟柱，那是山县联队在正面采取“人海战术”向蒙军阵地发起集团冲锋。蒙6师骑兵15团被日军缠住，双方正在苦斗。苏蒙两军的炮火此时已全部转向正面战场，支援骑兵15团。密集的炮火反复梳理着日军冲锋的地域，将山县联队打得无处可躲，死伤惨重。而山县带的4门四一式山炮由于射程太近根本够不着对方，只能躲在沙丘后一声不吭。山县的进攻到中午再也支撑不住了，活下来的残部退守到一个小沙丘周围，祈盼东八百藏部队的策应。

这时，东八百藏的末日已经到了。稳定了正面局势后，苏蒙军队腾出手开始收拾身后的敌人。蒙军骑兵17团在团长丹达尔中尉率领下一鼓作气冲上了日军盘踞的沙丘，如砍瓜切菜一般很快将浅间小队收拾干净了。已弹尽粮绝的东八百藏带着仅剩的十几个部下蹒跚着爬出沙坑，端着空枪，挥舞着马刀，向

冲上来的苏蒙军坦克、装甲车扑去。T—130坦克喷出的火焰立刻就地火葬了最后这一小撮武士道狂徒。日军的迂回包抄计划宣告彻底失败，第23师团骑兵联队主力至此全军覆没。事实证明，东八百藏的骑兵没能打过坦克。

（无独有偶，几个月后，纳粹德国侵略波兰时，一个波兰骑兵师被德军坦克部队追得恼羞成怒，索性埋伏好来了一次反突击。3000多名头插羽毛、手持长矛的波兰骑兵勇敢地冲进了古德里安的坦克群中……为二战历史留下了一段唐·吉诃德式的记录。）

5．最成功的行动——为骑兵联队收尸

5月30日傍晚时分，卫生队接到命令：命卫生队今晚去收容搜索队的遗体。

不错，收容尸体的确是卫生队工作的一部分，可是就连全副武装的浅田小队、中野班、汤谷弹药运输队都遭到了灭顶的悲惨结局，还有以勇猛善战而著称的染矢军旗中队也是深怕再遭灭顶之灾而临阵撤回，那么叫战斗力几乎等于零的卫生队又怎么去收尸？

要是和步兵一起行动的话还说得过去，让卫生队单独去收尸也太没有道理了。自己手里的王牌部队舍不得派出去，却把我们这群“后娘养的”打发出去，怎么想都觉得卫生队成了“陪



日军第23师团“收尸队”。

绑”的了。再加上收尸又是那个过政信“三谋”的馊主意，我心头的怒火终于按捺不住，爆发出来：“你给我到联队部去说，没有步兵的联合行动，卫生队无法完成收尸任务!要去的话，就让联队部给派人来!”我怒吼着派人到联队部去了。

联队部好歹给派来一个班，一共15个人，这一个班虽然还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是有就比没有强。再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收尸队分乘3辆卡车，从742高地的斜坡上慢慢滑下来，朝着川叉方向就出发了。今晚应该是个接近满月的月夜，幸运的是乌云遮月，大地上一片黑暗。并且好像又有什么神灵在保佑着我们一样，周围一片寂静，没有枪声也没有炮声。

卡车大约跑了几公里左右，全体人员下车开始一边搜索一边前进。晚上10点来钟，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米开外什么也看不见。为了防止被西岸的苏蒙军发现，所有的手电筒都用一块黑布包了起来。

我压低声音命令到:“一辆卡车为一个班，三个班每个班派出一个侦察兵先行50步进行侦察，然后返回来汇报。其他人三步一间隔，匍匐前进。”按理说军医是没有指挥权的，可是今晚的情况特殊，只得指挥了。

有两个班的侦察兵一会儿就回来了，可还有 一个班的侦察兵却迟迟没有返回。就在大家等得都有些沉不住气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是那个侦察兵竟绕到我们身后来了，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原来侦察兵就像捂上眼睛做游戏一样，想一直往前走，可就是走不直，转了一个大圈竟绕到别的班身后去了。这要是苏蒙军的话……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就惶惶不安起来，像有一把铁锉在锉一样。从疑心到疑鬼，一个小草丛也好，一个侦察兵的黑影也好，全都令人心惊肉跳。

这一带是一片平平坦坦的河边平原，完全没有藏身之地，卫生队又几乎是赤手空拳，所以大伙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黑暗中的行军比想像的要困难得多，并且这一带卫生队谁都没有来过，完全是一片陌生的旷野。

呼伦贝尔的拂晓来的也真是早，才刚过3点就已经接近天亮了。脚底下虽然还是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士兵之间

模模糊糊能看见对方的脸了。我们加快速度心惊胆战摸索着前进，心急如火地四下搜寻着。从时间和距离来看，收尸队已经到达了川叉地区，可是不管怎么寻找，就是找不到东搜索队的阵地在哪里，尸体又在哪里。

这里离苏蒙军的阵地只有一河之隔，天再亮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被苏蒙军发现。抬头看了看东方已经发白的天空，我越发焦躁不安起来，不行了，没有时间了，还是撤退吧。

就在收尸队准备撤退的时候，忽然听到“噗——噗——”的声音，接着发现了一处冒着紫色雾气的地方。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用柳树枝覆盖着的马壕，里面站着两匹瘦马！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总算找到搜索队的阵地了！

现在回想起来，多亏了这两匹瘦马的“通报”，我们才找到了目的地，没有这两匹军马的话，我们一伙没准儿早就撤退了。并且不可思议的是，那瘦马并没有乱蹬乱踢，也没有嘿嘿大叫，它是用“噗——噗——”的鼻音来通知我们的，军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却能理解人意，看透人心。军马和人是有感情的，并且这种人马之情在战场上往往催人泪下，令人感动。

日军步兵师团骑兵联队配备的九二式装甲车，从敞开的车门可以看出其内部之狭窄。

我高兴地抚摸起一匹军马的鼻子，军马也靠拢过来，好像久别重逢似的竟流下了眼泪。起初我还以为是看花眼了呢，可是这匹军马的确是流泪了。虽然地面上还是黑乎乎的，但是两匹军马好像什么都明白似的不吵不闹。只因两三天没吃没喝的缘故吧，军马已经骨瘦如柴，显得无精打采。这两匹军马大概是东八百藏联队长和金武副联队长的专用坐骑，所以才得到特别的保护，活了下来。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才找到的这块川叉之地，的确使人一下子就能联想起阴森、恐怖、凄惨的地狱来，朦胧的夜雾孕育着鬼气，夹带着令人作呕的尸臭味。透过夜雾，哈拉哈河西岸的断崖隐约可见，仿佛是黑暗深

渊旁耸立着的一座悬崖，又仿佛是一条巨大的鲨鱼张开了血盆大口，令人恐怖，令人寒颤。



日军辎重部队的九四式卡车。日军当年装备的卡车多为丰田制造，产量少，质量更不济，马力严重不足，易发生故障，越野能力尤差。当时的“丰田卡车”即是“烂车”的代名词。就是这样的“烂车”也不是每个师团都有，只有甲种部队才配属几个汽车大队。

阵地上到处都是挖得杂乱无章的战壕、立射壕，看样子大概搜索队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就遭到了苏军的猛烈攻击，所以战壕挖得也不像个战壕的样子，并且都已经倒塌了，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不难想像，这块土地遭到苏军炮弹多少次轰击，坦克多少次碾压。这些战壕是搜索队的士兵们亲手挖的，可遗憾的是一仗下来自己挖好的战壕，竟成了埋葬自己的坟墓。

卫生队马上开始寻找尸体，要在这样倒塌了的黑洞洞的战壕里找到一具尸体，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手电筒上蒙盖着一块黑布，所以光线暗得要命。我和3个卫生兵在坑坑洼洼的战壕里，好歹才挖出3具尸体，也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反正恐慌之中觉得过了好长好长时间。

到处是烧焦的痕迹，仿佛是一群喷火的蟒蛇在这里群斗过一样，阵地上充满了焦煳味和尸臭味。有的尸体已经被烧焦了，有的尸体四肢被烧掉了，看上去实在是惨不忍睹。面对他们如此悲惨的命运，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这叫打的什么仗啊?就因为关东军高官们为了所谓的“帝国荣誉”，几百人就白白送了命。这哪是什么战场啊，简直就是搜索队的坟墓!

把找到的尸体全部装上卡车，竟整整装了3卡车。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我不禁吓了一跳，不知什么时候雾气已经消散，天空已经放亮了!看了一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4点，不好!赶快撤退!

再往前方一看，大家顿时傻了眼，卡车右前方大约300米远的地方，几十辆苏军坦克长长的炮筒已经对准了我们!“完了，完了，这下可真完了!”我在心里惊叫起来。就在这惊恐至极、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想起了红十字标志，急忙下令让卫生兵把

印有红十字标志的急救包挂到卡车右侧护栏上，然后命令卡车“全速撤退”。多亏了红十字标志，苏军没有开炮，卫生队的卡车就在苏军炮口之下一溜烟地逃了出来，朝着742高地玩命地飞奔。到了742高地之后好长时间才缓过劲来，但心还是扑通扑通一个劲地跳。

两辆卡车平安无事地返回来了，可另外一辆却迟迟不见踪影，一股不祥之感渐渐浓厚起来。就在大家一个劲祈祷的时候，只见第三辆卡车押车的军曹像个血人一样跑了回来。一打听，原来第三辆卡车遭到苏军坦克的集中炮击和火焰喷射器的袭击，除了军曹逃出之外其他人全部阵亡。

我忽然想起，这辆卡车是步兵班的，步兵手里是没有红十字标志的。哎呀，匆忙之中竟忘了给第三辆卡车挂红十字标志了，14个士兵全死了，后悔得我是揪心挖胆一般难受。

两辆卡车上的尸体陆续卸了下来，一共40来具，全部摆放在卫生队阵地的前面。在尸体的中央，摆放着东八百藏的肩章。这40来具尸体大部分像是被火烧过，不是全身焦黑，就是手脚被烧掉了，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恶臭。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尸体尽管手和脚被烧掉了，但是身上的衣服却没有烧光，领章、肩牌也都带在身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猜测是不是苏蒙军看到日本士兵个个都充满了武士道精神，只要还剩一口气就有去抓枪的可能，所以为了预防万一，才用火焰喷射器把他们的手脚都烧掉了吧?

我正给那个受伤逃出来的军曹治疗的时候，以山县联队长为首的头头们跑了过来，个个是满脸的悲痛。就在这时，从尸体堆里摇摇晃晃地站起四五个人来，向山县等人敬礼，吓得大伙差一点魂都飞了，一时间甚至怀疑是不是在做梦，或者是紧张过度而出现了幻觉。

这几个人显然是东搜索队的幸存者，但是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又是被谁发现的，我一无所知，不禁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感到羞愧。原来我们几个人所搜索的仅仅是阵地的边缘，并没有深入到阵地里面，再加上没有充足的搜寻时间，所以收容率是较差的。

一僧侣出身的士兵开始为死者念经，一时间高地上就像一湾水一样平静下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单调的念经声。这经声像鼓槌一样敲打着士兵们的心弦，使人一阵阵地心寒。可

能大家都在想,明天会不会轮到我的头上呢?这经声飘荡在空旷无际的荒野上，仿佛是在为全体将士占卜明天一样。

突然,“吭——吭——”的鼾声打破了这严肃而寂静的祈祷仪式，那些正闭目祈祷的士兵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鼾声惊得睁开了双眼。“吭——吭——”的呼噜声越来越大，像打闷雷一样。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平时大家都觉得这嘈杂烦人的鼾声，此时此刻听起来不知为什么竟像悲哀的箫声一样催人泪下，给这庄重而严肃的念经仪式增添了一些悲伤的色彩。

原来是东搜索队死里逃生的几个人已躺在地上，张开大嘴鼾声如雷地酣睡起来，令在场士兵们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大概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不知道什么叫恐怖了，然而如此大胆的举动，实在令我们这些胆小的人哑然失色。

大概人都是这个样子，在跨越了极其困难的难关，身心高度紧张后一放松的那一瞬间，极度的疲劳感就会涌向全身，双腿发飘站立不稳。一倒下去的同时，便会张大嘴打着鼾声进入酣睡状态。也就是说，这些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重伤员身体上也好、精神上也好，困倦和疲惫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什么也顾不上了。

（三）灰溜溜撤回了海拉尔

这之后苏军的炮弹是否又打过，坦克是否又冲来过，我没有一个清楚的记忆。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迫在眉睫的命运而担心，除此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追溯一下模糊的记忆，大约是下午4点来钟吧，山县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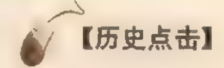


饿鬼一般的抢水战。渴疯了的日军一撤回后方便发疯般冲向了供水车，根本顾不上什么军风纪了。

接到师团部的命令：今晚天黑之后，部队撤向海拉尔。

卫生队因为要护送伤员，所以乘坐卡车在蒙蒙细雨中先行一步，幸运地逃出了虎口。染矢军旗中队担当大部队的撤退掩护任务，并且是在雨中徒步撤退。我们心里真为他们担忧，坐在卡车上一个劲地嘟囔：原谅我们先走一步啦，原谅我们先走一步啦。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苏军的炮火虽然打了一阵子，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所以伤亡比想像的要少得多，大家一直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卫生队先行一步平安到达了将军庙，车刚一停下来，士兵们就开始了另一场战争——“抢水战”。一向是军纪严格的这些军人们，此时已经顾不上什么军纪了，像一群饿鬼一样拼命冲向供水车，争先恐后地开始抢水喝。水下肚不过5分钟，越发觉得口渴起来，于是再去抢，直喝得肚子快要爆炸时才罢手。





日本满疆开拓团

草平等人在海拉尔所见到的日本人多是日本满疆开拓团的移民。1936年4月30日，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新京召开了第二次移民会议，通过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拟定由伪满政权划出移民用地1000万町，从1937年起20年内，向东北迁移日本农民100万户500万人。计划分4期进行，每期5年，第一期10万户，以后每期递增10万户。通过移民，将改变中国东北人口的民族构成和土地占有关系，预计20年后在中国东北总人口中日本移民占一成以上，并占有东北耕地的1/3。同时，日本贫苦农民有一半输出到东北，可以减轻日本国内压力。当时的广田内阁已经把这项计划列为日本七大目标之一，并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拓务省”。

其实，早在1932年10月至1936年7月，日本侵略者就已经在东北进行了5次武装移民活动，移民团达9个，共移民2811户。只是由于日本战败，这项计划才没有得逞。移民狂潮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铁证。当时日本有4000万人口，20年移民100万户，相当于移民500万人，占日本全国人口的1/8。截止到1945年，实际移民数已达10.6万户，共31.8万人，侵夺土地152.1万公顷。

上述内容可以从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年)拓务省出版的《满洲农业移民入植图》上看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份有关日本有计划向中国进行移民的资料，目前已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

灌了满满一肚子水以后，这才觉得不渴了，枯竭了的身体好像又复苏过来，再一次品味到了复活的喜悦。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救命之水的味道,尽管那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河水，可当时却觉得那是世界上少有的甘露，说不出的甘甜，一口下去直沁入心肺。

742 高地大概又恢复了平静，又回到了和平之中吧，可是这个在空旷的原野中毫不起眼的沙丘越是平静，我就越觉得悲愤，恨不能让它爆炸，让它燃烧起来才能一解心头之恨。大概这么想的不止是我一个人吧?

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付出这么大牺牲的这场诺门罕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也是第一线全体士兵一直得不到解答的疑问和不满。由军部一部分强硬派操纵指挥的这场侵略战争，对一般的下级官兵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更不用说那些已经死去的亡灵了，宛如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一般。

终于活着回来了，大家见了面就互相笑起来，只不过是一边流泪一边笑。被太阳晒成紫褐色的脸上，像脱水症晚期的病人一样失去了弹性和光泽,只有发黑的眼窝里还闪着一点光亮。乌黑乌黑的脸上只有牙齿还是白的，一笑起来真是黑白分明，如同一具阴森可怕的骸骨一样。说不出为什么高兴,也说不出为什么悲伤，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都是那么不自然，仿佛是在讥笑，又仿佛是在苦笑。

经过苦战死斗的山县部队终于撤回了海拉尔，可是海拉尔却显得那么冷漠、无情，连街道上都是冷冷清清的。给我们送汤送菜的同胞们，脸上也看不到以往那温柔的笑容了，稍带同情似的轻轻点一下头就算行礼了。大街小巷里充满了流言蜚语，仿佛海拉尔明天就要展开一场大战似的。



第三章
亚洲史上的第一次坦克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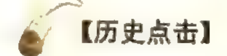
第三章 亚洲史上的第一次坦克大战
——第二次诺门罕之战

【相关背景】

1939年6月8日，山县联队的残部退至将军庙一线掘壕固守，伤兵源源不断地运回海拉尔，小松原道太郎为自己的轻率出击感到一阵后怕，他深谙极度狂热的军部绝不容忍日军出现任何失败。两年前的张鼓峰事件提醒他丧事要当成喜事办，那次冲突中日军伤亡更为惨重，但师团长尾高龟藏避而不谈，对外极力渲染第19师团的战绩，使东京大本营的虚荣心得到充分满足，不久尾高被提升为第12军军长，现在正指挥部队在华中大打。小松原决定也这么办。他一方面将摧毁蒙军骑6师司令部、击毙师长以及全歼骑15团的"捷报"上报，对损失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一方面悄悄命令井置中佐重组师团骑兵联队。(幸好东八百藏留下了一个骑兵中队在海拉尔，对外还能当一块遮羞布。)

关东军司令部也认为这一仗与苏军打成了平手，要不是第23师团动用的兵力太少，谁胜谁负很难说，于是向东京大本营汇报了"战绩"。东京参谋本部很快发来参字547号电予以祝贺，并询问下一步是否需要支援。陆军省的态度更加明朗，授意关东军完全可以自行选择适当时机，借类似问题再大打一场。想想陆军大臣是坂垣征四郎也就不难理解，坂垣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事变成功后青云直上，由关东军的一个大佐作战参谋一直升到中将陆军大臣。这次又是他的老部队关东军在诺门罕挑起事端，正沿着他早年设定的路线向苏联外贝加尔进军，焉能不积极支持?!

东京传回的消息让小松原暂时松了一口气，看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都有将战事进一步扩大、向前继续进攻的用意。根据


【历史点击】



张鼓峰事件

1938年7月9日，苏军在吉林省珲春县以南的张鼓峰构筑工事。日本关东军认为这是苏军越界的侵犯行为，遂向国内建议，用武力予以驱逐。

（苏军认为根据1886年的珲春界约，边境线在张鼓峰山顶的149高地，而日军认为边境线应在张鼓峰的东侧。）

日军大本营对于苏军进入张鼓峰非常重视。7月15日首先派出作战部参谋有末中佐到达朝鲜了解实际情况。接着又命令“朝鲜军”第19师团向该地区集结部队。7月30日晚，苏军在张鼓峰地区部署的部队约7个营，火炮36门，坦克11辆，兵力和装备都超过了日军。但日军在张鼓峰已进驻了20天，构筑好了较完备的防御工事。日军认识到苏军占有装备、人数、位置的优势，而且战斗打响以后必定还会向该地区增兵，因而决定采用“先制攻击”的方法。

31日凌晨2时15分，日军从南部进攻张鼓峰的第75联队第1大队，由大队长中野藤七少佐率领，沿着东面和北面缓坡向上发动攻击，经几次反复，伤亡很大，中野藤七及两名中队长均战死，最终急袭后占领了该地。

7月底的东北已进入雨季，加之张鼓峰地区离日本海很近，经常产生浓雾。日军进攻张鼓峰时有大雾，接着又是大雨，因能见度极差，致使苏军增援的炮兵射击完全中断。天气给日军造成一个有利条件。

8月1日，苏军开始进行反击。先后出动约130架飞机对张鼓峰高地进行猛烈轰炸及射击，接着约两个营的步兵向高地进行攻击。

8月4日、5日，苏军仍以火炮、战车掩护步兵对张鼓峰地区的日军不断攻击。炮兵以较密集的火力攻击52高地、张鼓峰、沙草峰要点。



张鼓峰战斗中，准备不足的远东苏军点到为止，只是夺回失地，没有展开大规模反击。

8月6日，苏军按计划发起对张鼓峰地区的总攻。苏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到上午11时已占领了日军的大部分阵地。猛烈的坦克炮火将日军的各前沿阵地的胸墙打成锯齿的形状。（张鼓峰事件中关东军资助了第19师团大量物资和弹药。另外关东军为策应张鼓峰地区作战和防备万一，对8个师团进行了作战准备和调遣。）

骄横诡谲的尾高龟藏中将，面对严峻的现实，再不敢跋扈逞能，而急切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边界纠纷。他向东京大本营力陈兵力骤减的险境，接着提出"目前本师团的作战能力已到了最后的极限"，第一线部队下一步仅能做最后的抵抗。因此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停战。

苏、日张鼓峰停战协定于8月10日夜间24时在莫斯科签订。按该协定日军由现占据线后撤1000米。

张鼓峰事件中，苏军在攻击精神，装备，火力密度，步、炮、坦克及陆、空战术配合方面都较好，利用火力逐步增加日军的伤亡，迫使日军求和。

造成这次日军失利的尾高龟藏，由于东京大本营一直有人支持他，所以未受到任何追究。几个月后他离开了偏僻的罗南海岸而到达华北，于11月11日出任新成立的驻济南第12军首任司令官。对张鼓峰事件，日军参谋本部及部队的指挥官们认为，这是苏联在外交上、军事上支援中国抗日，用军事活动直接牵制日军向中国内地的武汉、广东发动进攻，以图继续增强苏、中两国关系和进一步鼓舞中国的抗日信心。

东京的旨意，关东军司令部6月20日向伪满洲国境内的部队下达了集中令，准备调集13个步兵大队、112门反坦克速射炮、124辆坦克和重型装甲车、400辆汽车在第2飞行集团(军)的支援下，报复驻蒙苏军，并伺机"北进"。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认为，诺门罕地区不是苏蒙军队防御重点，兵力有限，且从这一带的地理条件判断，也不适合苏军大兵团作战，因为从苏联最近的铁路线到这儿也有750公里之远。以日军补给经验来看，补给线超过250公里就不宜作战。可植田忘了一件事，日军的后勤补给是靠畜力和大板车，苏军用



陷入泥泞的日军辎重卡车。

【历史点击】



二战时日本的单兵负荷

1941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出发时由长尾五一军医中佐实测第234步兵联队一般中队步枪手的装备重量：

三八式步枪	1挺	3.95kg
三〇式刺刀	1把	0.44kg
手榴弹	2发	1kg
口粮（甲）	4日份	3.42kg
罐头	3个	0.45kg
食盐	1日份	0.012kg
鱼干	1日份	0.15kg
梅干	1日份	0.15kg
被服、日用品		2.25kg
步枪弹药盒	1套	1.685kg
实弹	20发	1.25kg
钢盔	1顶	1.1kg
肩包	1个	0.25kg
防毒面具	1个	1kg
圆铲	1把	2.3kg
饭盒	1个	1.9kg
水壶	1个	1.25kg
军鞋	1双	0.5kg
合计		23.057kg



以上这些装备中没有包括班用帐篷，而且是有车辆的机械化部队的负荷，如果是驮马辎重部队的步兵，装备重量则达30kg（像第23师团）。另外，持十字锹的步枪手或轻机枪手负荷为31kg，而轻机枪弹药手达34kg。

出处：德田八郎士《間に合つた兵器》(光人社NF文库)

的是卡车，而且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面前从来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只有想不想打、没有敢不敢打的问题。斯大林早就憋着一口气，植田这次冒险可是一头撞在苏联红军的枪口上了。



第23师团全员出动开赴战场。在诺门罕之战中炎热和缺水是日军第23师团面对的比苏军更现实的敌人。

打诺门罕，第23师团当然是首当其冲。6月20日，小松原中将带着步、炮、工、辎、骑7个联队2万多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缺乏车辆的日军步兵师团行军完全依赖徒步，6月下旬诺门罕地区的户外温度中午已达35℃以上，在烈日的烤灼下，步兵背着30公斤重的负荷踩着细软的沙地，一步一陷地向前挪。更要命的是，第23师团军需部门没有带饮用水，因为从地图上看有的是湖泊，士兵们的水壶第一天就干了，个个渴得喉咙冒火眼睛喷血，途经的湖泊全是咸水泡子，连马都不能喝，部队只好利用晚上宿营时挖坑，轮流吸吮沙坑里的湿气。就这样走走停停，一周后终于到了前线，所有的人都几乎脱了一层皮，师团长小松原气得差点把军需部长给劈了。

驻扎在公主岭的日军第1坦克师团也接到了进军诺门罕的命令，这还是师团成立后首次大规模远距离作战，上上下下忙成了一团，直拖到6月25日才乘火车到达阿尔山。这儿离诺门罕前线还有180公里，沿途都是原始森林(大兴安岭山南山北气候迥异，山南林区多雨，山北沙丘绵延)。6月下旬，正值林区阴雨绵绵，河水泛滥，道路泥泞不堪，日军坦克部队没有配备专用拖车运送装甲车辆，坦克在泥水中行驶不久便故障频出，被履带反复碾压的土路很快变成了两条深深的泥浆沟，跟随的

油罐车、弹药车、给养车一辆辆地陷了进去，同行的日本步兵背负着65磅重的背包，还携带着一支9磅半重的步枪、60个弹夹、两颗手榴弹、一个军用饭盒和一个防毒面具。已经负重不堪的徒步士兵还不得不帮助坦克兵推拉那些陷入泥坑的车辆和马匹。部队每天都为拖车、推车而疲于奔命，更要命的是配属的工兵联队没有重型舟桥设备，遇到稍大一些的河流就得绕路，行军混乱而缓慢。(第1坦克师团长安冈正臣与步兵第23师团长小松原是日本陆军大学同班同学，看来师承果然一样，一个在干旱的荒漠中长途行军忘了带水，一个在多雨的森林里远程跋涉没有带必要的工兵装备。)安冈正臣更心痛的是那一辆辆趴窝的坦克，第1坦克师团是当时全日本仅有的一个坦克师，被东京大本营视为“军中之国宝”。别看日本那些九五式、八九式小坦克个个粗糙简陋，却是日本陆军武库中最宝贵的武器(八九式中战车日本当时每月只能生产出4辆)，除了在检阅式或敌阵前远远地炫耀一下外，平时根本舍不得用。侵华战争中曾在松沪会战时以联队规模出动了一次，被炸毁了几辆后，就再也没成建制出击，关东军这次是动用了老本。经过4天多艰苦的行军，6月29日下午，安冈坦克师团终于以每天40公里的“摩托化”行军速度抵达前线。所有的坦克都被泥浆糊住，面目全非。

阿尔山附近，安冈坦克部队在泥泞中艰难行进。一辆卡车居然需要20多个人推拽，工兵设备落后始终是制约日本机械化部队的瓶颈。

相比之下，步兵第7师团参战部队的运气就好了许多。第26联队是乘关东军汽车联队的400辆卡车赶赴诺门罕的，一路上虽有颠簸之苦但却没遭什么罪。这倒不是植田谦吉特别关照他们，因为第7师团本身就是关东军的主力机动兵团，机械化行军也在情理之中。植田动用第7师团还有他的一番考虑，这个师团一直作为东京大本营的战略预备队，牌子硬，名气大，尤其是这次上阵的第26、第28两个联队(第28联队出动了一个加强大队)，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双料王牌，被公认是整个日军中战斗力最强悍的联队(日军规定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必须在此实习合格才能授衔，皇族人员从军也多在此镀金)，1918年列强干涉俄





第七师团的部队正搭乘汽车赶赴诺门罕前线，为防止苏军空袭，从图中可以看到，大部分车辆都插满了树枝加以伪装。（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国十月革命时曾入侵过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等地。这是一支最适合对苏作战的部队，可以作为诺门罕之战中关东军的“杀手锏”。1939年7月20日，《纽约时报》的社论这样评价道：“这是一场陌生的战争，日本第7师团的士兵们在齐齐哈尔附近尘土飞扬的草原上长期接受高强度步兵训练，他们主要集中于三种日军所重视的训练：刺杀、射击和机动。他们一如既往地练习在一次冲锋中，与敌人面对面地交手，在肉搏战中杀死敌人。大多数步兵一年中有38周进行夜战训练，平均每周10小时。他们学习各种夜战方式，包括清除障碍物、隐蔽、静默、夜间定向、巡逻以及警戒。其中第28联队被视为一支最精锐的部队。他的官兵据说全来自北海道和南库页岛，那些地方被认为盛产顽强和冷静的武士。”第7师团长圆田中将对战事不像植田谦吉那么乐观，他觉得与苏军作战凶多吉少。部队出发前，他悄悄嘱咐联队长须见大佐最好把军旗留在军营里(日军规定：战斗后军旗在，编制存；军旗失，编制撤)。圆田认为第26联队是日本陆军的骄傲，应该存在下去。不带军旗出征对第26联队来说还是第一次，须见和他的部下都明白前途凶恶，还未出发，士气先泄了大半。圆田真是“料事如神”，他的第26联队上了诺门罕就如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第7师团剩下的几个联队也被陆续抽调上阵，填了苏军的坦克，最后齐齐哈尔只剩下师团部和一个留守大队，圆田几成了光杆司令。不过令他惟一欣慰的是，由于他的“先见之明”，各联队军旗犹在，第7师团还可以重组。

6月21日，嵯峨彻二中将率第2飞行集团(军)指挥部抵达海



二战期间，日军的补给基本上还是依靠畜力拽拉的大板车，行动缓慢不说，从图中可以看出，一车也拉不了多少物资。（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拉尔。此后几天，第7、第9、第12、第15飞行旅团陆续飞抵海拉尔机场，九八式笠川战斗侦察机、九七式中岛陆攻(战斗机)、九八式川崎轻型轰炸机、九七式三菱重型轰炸机乱糟糟地放满了停机坪，关东军航空兵主力已倾巢出动。

在海拉尔火车站站台和货场上，各种军用物资也堆积如山。崭新的弹药箱、饼干箱、帐篷、木料、大米袋、白糖袋、梅干袋、鱼干袋和打成方块的干草、豆饼(马料)一垛垛地码在铁轨中间，全满洲都在向这儿运送物资。从海拉尔到诺门罕约180公里，日军运输主要靠平板车，马拉一趟来回至少要8天，牛拉一趟需要10天，车上装不了多少东西，光人吃马喂就要占一半地方，看着热热闹闹、车流不断，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运到将军庙一线的物资少得可怜。轻视后勤和辎重部队建设以及落后的补给方式是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战后日本军史研究人员每提及此事都痛心疾首。

各路人马云集到了诺门罕前线，中将、少将一大堆，按日本陆军的传统，在一个战区内同等军衔的以授衔早的为主官。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提升最早，前线总指挥的职务自然也就落到他身上。一下子指挥近三个师团的兵力，手下还有坦克、重炮这么多先进的装备，令小松原兴奋不已。

曾长期作为日本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小松原非常了解苏军的战斗力和战术特点，他曾经写过一个小册子——《如何与苏军作战》，由参谋本部秘密下发。这本49页的手册中指出，苏联红军缺乏在被包围或侧翼包抄的情况下，与友邻部队进行协同的能力，苏军士兵受过正面防御的严格训练，但如果侧翼发现敌人或补给线受到威胁，就会全线产生混乱。这个手册给日军各级指挥官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只要发起侧翼包抄，苏军就会撤退。在整个诺门罕战争期间，日军一次次地按照这种僵化的战术对苏军发起进攻，结果被苏联红军打得头破血流。

【历史点击】

日军的“迂回包抄”战术

日军这种战术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1938年颁布的《作战要务令》进一步明确指出：“进攻的主要目的就是包围敌人，并将之歼灭。”强调正面进攻后，用于侧翼包围的兵力越大、越强、越出其不意，其歼灭敌人的成果就会越明显。这一观点对此后日军教范、条令的制定，对日军作战思想、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广泛重视和强调了实施侧翼迂回包围战术。这种战术逐渐成为日军的一种教义，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在太平洋岛屿作战和南洋热带丛林战中，尽管日军很多时候完全不具备运动战和包围歼灭的条件，但还是硬要实施，结果只能是加剧了日军的灭亡。一种灵活的战术被食古不化的日军如此教条地运用，真令军史学家们哭笑不得。

《如何与苏军作战》写成于1933年，小松原没有考虑到苏军的变化和进步。

按照上述思路，小松原和前线指挥部作出了第二次诺门罕之战的方案，即由安冈坦克师团、第23师团的山县步兵联队协同兴安骑兵师6个团正面发起进攻，给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队施加压力以吸引其注意力；而第23师团主力和第7师团参战部队从哈拉哈河下游抢渡过河，突入蒙古境内，进行侧翼包抄；最后两军合击结束战斗。这可以说是第一次诺门罕之战日军战术的翻版，在某种程度上，小松原这个计划还不如山县武光，山县至少知道派机动性较强的骑兵联队远途包抄；而小松原放着一个坦克师不用，偏去用步兵进行大迂回作战，显然他又忘记了步兵在沙丘地带行进的缓慢和艰难。



《日德反共协定》签订后，侵华日军犹如打了一针兴奋剂，狂躁不已。（出自《太平洋战争·19[illegible]～1945》每日新闻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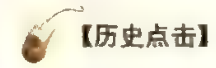


苏军在最初的战斗中，由于经验不足，伤亡很大（注意堑壕前众多伤亡的士兵）。堑壕里一名炮手正用50mm迫击炮提供火力支援。

总攻时间最终定为7月1日。

关东军司令部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小松原顿感踌躇满志，大有一番拔剑四顾、谁与争锋的感觉。不光是小松原，进攻前夜，整个关东军上下都得意洋洋，兴高采烈，武断地认为这一仗将会成为日军的胜利大进军，还特意邀请德国和意大利武官到诺门罕观战。可是关东军没想到对手此时已换成了朱可夫，在大草原上跟坦克战专家朱可夫上将玩这种小把戏无异于以卵击石。

5月下旬，在蒙"满"边境上的战斗引起了莫斯科的高度关注，斯大林认为驻海拉尔的日军反应之迅速不同以往，表明第23师团是有备而来，这很可能是关东军要大打出手的前兆。特别是德、日两国签订了《反共协定》之后，德国已先后吞并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刚刚又将立陶宛分离出波罗的海三国联盟，正虎视眈眈陈兵波兰边境；意大利则侵占了阿尔巴尼亚，并在北非蚕食阿尔及利亚；日本不会满足于只侵略中国，肯定也要有所动作。共产国际打入东京的"埃姆扎"小组近日也传回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关东军已任命小松原道太郎中将为"满"蒙前线指挥官，而这个小松原任驻苏武官多年，可谓一个





朱可夫的指挥艺术

朱可夫元帅是苏联红军中最著名的统帅，苏德战争时他被视为红军中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朱可夫元帅参与了苏德战争中所有重大战役的指挥。他是列宁格勒战役、莫斯科会战、白俄罗斯战役、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柏林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主要指挥者；是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作为总参谋长、最高副统帅，他曾是1000多万红军的总指挥。从哈拉哈河战役开始，他就以机械化作战专家著称。当时，他以两个坦克旅插入日军纵深，结果是以较小代价几乎全歼了日军两个师团。莫斯科会战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快速集群概念，并用于反攻，会战共歼敌30余万。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他以一个坦克军和一个机械化军的向心突击，合围了33万德军。库尔斯克会战中，他先以纵深防御消耗德军实力，然后将机械化兵团投入反攻，打垮了德军的最后一次攻势，全歼了德中央集团军。在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中，他的坦克集团军20天前进600公里，冲过整个波兰。柏林战役中，他的方面军在10天里就冲过上百公里的筑垒地域，歼灭数十万德军。

朱可夫指挥极其沉着，很少感情用事，也从不慌乱，即使被斯大林斥责也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改变自己的看法。

正是这种力挽狂澜的能力为朱可夫赢得了“苏德战场上的消防队员”的称号。



朱可夫是苏军历史上获得勋章最多的一个人。

“苏联通”，关东军近期准备在远东进行军事冒险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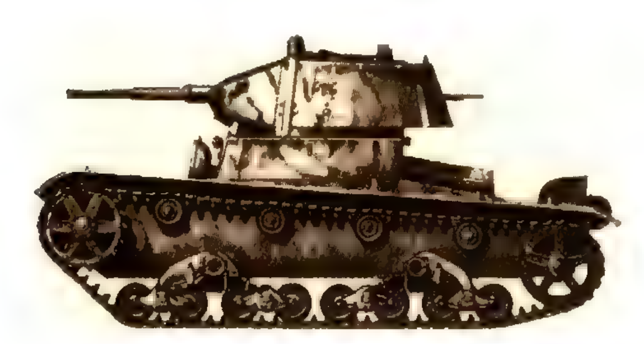
与其被动应战，不如主动出击，斯大林下了决心，在对付欧洲剧变之前，应尽快抽出手来狠狠教训一下这个东洋小国，让他彻底老实下来。不过“大清洗”后，找出一个既能让斯大林放心又有指挥才能的将领确实不容易，思来想去，斯大林的目光最后盯上了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苏联援华前军事顾问、苏军坦克战的积极倡导者——格·康·朱可夫上将。他有在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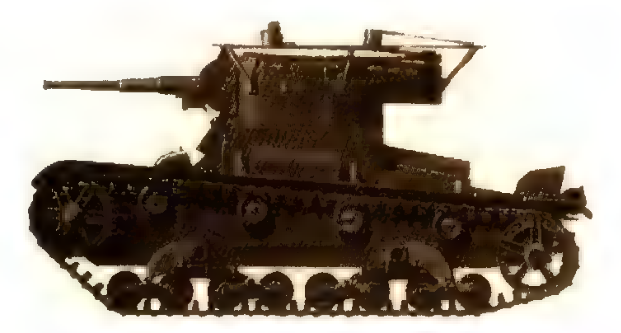
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又是布琼尼骑兵部队的老班底，忠诚可靠，这几乎是斯大林当时的最佳选择了。

1939年6月1日，朱可夫刚刚结束了明斯克地区的首长—司令部演习(这次演习的内容恰巧是装甲部队由防御作战转入进攻，简直是两个月以后哈拉哈河反攻的兵棋推演)，就接到命令速到莫斯科国防人民委员会(国防部)报到。朱可夫有些发蒙，“肃反”期间，很多将领都是接到这样一纸通知后就一去不复返了，包括朱可夫热爱的老上级雅基尔(当时任基辅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和《铁流》一书中著名的科茹赫师长的原型、智勇双全的兵团司令员科夫丘赫将军，以及他的前任骑兵军军长罗科索夫斯基将军。这些名将都先后被处决了，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通知太令人害怕了。第二天，朱可夫忐忑不安地到了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办公室，才得知远东地区局势已十分紧张，很可能要爆发一场大战，斯大林亲自点了他的将。朱可夫暗自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感到了压力，这一仗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前线传回的消息并不令人轻松，刚刚结束的一场冲突中，苏蒙军队虽有优势的火力，但未取得预想的战绩，军队在一些缺乏经验的年轻军官指挥下伤亡很大，特别是装甲部队没有发挥出优势，仗打得十分艰苦。伏罗希洛夫元帅神情凝重地告诉朱可夫，斯大林同志要求我们必须打胜，为此，远东苏军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支援。

6月5日上午，朱可夫乘飞机抵达蒙古，他吃惊地发现第57特别军指挥部设在离前线120公里外的塔木察布拉格市里，军长费克连科竟至今未到前线去过。这位中将军长对此辩解为前方找不到构筑指挥所的木料。怒气冲冲的朱可夫亲自到了哈拉哈河东岸，经过一番侦察，他认为日军近期很有可能就在这里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而以第57特别军现有的精神状态和

左图为配有45mm火炮的T-26坦克。右图为配有37mm火炮的T-26坦克。在早期的苏联坦克中，T-26是比较有名的一种。T-26轻型坦克一般被用来支援步兵。中国于抗战开始后也引进了部分T-26坦克，组成了最早的一个装甲师——第200师，以它为基干的第5军曾于昆仑关战役中重创日军第5师团。T-26轻型坦克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诺门罕战争、苏芬战争，一直被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苏联坦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它的主要缺点就是发动机防护较差，在诺门罕和苏芬战争中损失较大，不过这也成为苏联以后研制T-34坦克的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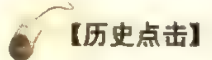


实力根本无法取胜。

莫斯科收到了朱可夫的调查报告，6月8日，费克连科被解职，朱可夫兼任第57特别军军长。面对严峻的战场形势，朱可夫命令第57军各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迅速占领哈拉哈河东岸的所有要点，日夜施工构筑永久性工事；同时要求驻蒙苏军各部队必须无条件抽调出所有机动车辆(包括火炮牵引车)紧急运送军用物资。从博尔集亚火车站到诺门罕前线汽车往返需要5天，苏军采取了歇人不歇车的办法，长长的车队日夜不停地穿行于草原之上。10天后，足以支撑第57军作战半个月以上的物资堆积在了哈拉哈河畔，朱可夫赢了第一步棋。为延缓日军进攻的时间，苏军还充分利用了其装甲部队机动性强和火力猛的优势，趁日军坦克师团未到前线之际，多次派出营、连规模的坦克分队，袭扰日军步兵集结地、兵站和补给线。6月28日，苏军第11坦克旅的一个坦克营一度逼近将军庙，险些端了第23师团司令部的老窝，70多辆T－26坦克将日军指挥阵地冲了个七零八落，直到日军调来几十门反坦克速射炮后才从容撤离。朱可夫这一招“进攻防御”果真奏效，日军十分头痛，每时每刻都要提防苏军坦克袭击，坦克成了日军前线部队的心理负担。对苏军这种快打快撤的袭扰战术，日军始终没想出有效的对策。

由于苏蒙“满”边境漫长，在3000多公里国境线上的任何一点，关东军都有可能发起攻击，朱可夫不敢抽调边境地区的苏军守卫部队。但仅靠第57军力量在诺门罕防御尚可，反攻显然是力不从心，朱可夫提请国防人民委员会增加兵力，一部分用于坚守哈拉哈河东岸的登陆场，一部分准备用于对敌纵深进行反攻。

有斯大林的支持，在伏罗希洛夫元帅的调度下，苏军精锐部队陆续从欧洲调往远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红军除海军以外，几乎所有兵种的司令员都到了前线。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练兵检验新装备，一方面也是表示对此役的重视。苏联装甲兵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带来了两个新型坦克旅、一个装甲旅(由于补给的原因，大部分坦克装甲旅都部署在了乌兰巴托和温都尔汗一线，诺门罕前线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坦克11旅和装甲第7旅)；苏联炮兵司令员沃罗诺夫大将带来了三个远程重炮团，这种射程为30公里的重炮威力巨大，日后让日军吃尽了苦头；苏联空军司令员鲍尔吉金少将不仅带来了几个新型战斗机大队，




【历史点击】

日军的师团编制

1938年以前，日本的常设师团为四四制单位，分为挽马制（适合平原作战）和驮马制（适合山地作战）两种，每个师团多达2.5万人～2.8万人（相当于同期中国军队近2个军的兵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一方面感觉兵力严重不足，同时也感觉庞大的编制使行军、作战、补给十分不便，故1938年以后，日军采用了新的师团编制，即3个步兵联队组成1个步兵师团，再配属上若干支特种兵部队；师团长多是少将，其中甲种师团拥有12个步兵大队14072人，此外还有1个炮兵联队、1个战车大队、1个骑兵联队。即使精编后，日军一个甲种师团的兵力也近2万人。诺门罕战争时期的关东军第23师团、第7师团都是甲种师团，其兵力远远超过苏军一个齐装满员的主力摩托化步兵师（苏军1938年一个摩步师的兵力编制为1.2万人）。

而且还带来了48名曾在西班牙内战中与德、意空军作过战的王牌飞行员。这些人的到来一改塔木斯克机场被炸后的颓势，苏联空军的士气很快高涨起来，逐渐夺回了制空权。

朱可夫也将指挥部移到了哈拉哈河西岸，短短两周的时间，诺门罕地区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改变：一方面是弹粮充足、枕戈以待的苏军，一方面是马困兵乏、蠢蠢欲动的日军。不过朱可夫还不想过早地与小松原交手，他的机械化兵团还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炎热干旱的沙丘地，物资补给还远远未达到他满意的程度。但小松原等不及了，他急于和朱可夫赌上一把，



正在河边待命的日军步兵师团九五式轻型坦克纵队。（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第二次诺门罕之战就在双方都有所准备但都没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匆忙打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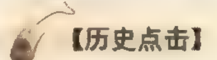
（一）第23师团倾巢出动

1．意气轩昂下的恐惧

搜索队覆没、山县部队撤退后，苏蒙军再次占领了742高地等哈拉哈河右岸的阵地。不久又有消息说，苏蒙军正在高地上修筑工事。听到这个消息后，海拉尔的兵营内马上又处于一片惊恐、不安、骚动的气氛里，因为这意味着又要打仗了。

6月2日，第一次诺门罕之战的伤亡统计数字出来了：东搜索队出动人员220人，其中战死115人、战伤24人、失踪81人，伤亡率为63%；山县步兵第64联队出动人员1058人，其中战死151人、战伤55人、生死不明92人，伤亡率为20%；“满”军出动450人，伤亡30人，伤亡率为6%。装备及兵器损失：卡车8辆、吉普车2辆、装甲车12辆、速射炮4门、轻重机枪19挺、掷弹筒6门。

亲身经历过第一次诺门罕之战后，深知苏军的物资、机动力是我们的五六倍之多，并且占尽了天时地利，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显然是不应该出兵再战的。但是一个小小的军医左右不了局势，只能在心中暗暗祷告，希望那些曾设谋炸死东北军阀张





二战时日本陆军编制情况

二战时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其兵力与当时中国军队的编制相比：

日军师团（20000人左右）＞军

旅团（8000～9000人）≈加强师

联队（4000人左右）≈两个加强团

大队（1200～1500人）≈团

中队（300人左右）≈两个连

小队（80人左右）≈两个排

分队（15人）≈一个加强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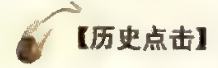


作霖、挑起“九一八”事变、狂妄自大的关东军参谋们，不要再发起更加无谋、猪突一般的战争了。

可是，当时的一般军官、士兵们已经被灌输得满脑子都是“无敌皇军”的自负讴歌，在他们的心目中敌人虽有成千上万，但都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日本皇军才是天下无敌、所战必胜的军队。一段时间里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整天担心、忧愁、恐慌，甚至晚上睡不好觉，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

一天晚上，我梦见了自己还年幼的孩子，惊得一下子睁开眼爬了起来。大概是下半夜3点来钟吧，一轮弯月挂在半天空上，月光淡淡地洒落在寂静的兵营里。盘腿坐在凉飕飕的床上，望着窗外的月亮回味一下刚才的梦，禁不住思念起家乡的妻儿老小来。

日军的九二式装甲车纵队，这种小战车当时是侵华日军的主力战车。



此次出征大概不会再活着回去了吧?恐怕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想到这儿心里就像有把刀子在搅动一样，不觉视线模糊起来。

6月20日，部队接到再次进军诺门罕的命令，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兵营里的气氛又紧张起来，各部队忙于补充弹药，领取军用物资等战前准备，人来人往一片混乱。

听说第二次诺门罕之战的作战计划由辻政信参谋亲自制定，内容为“两岸攻击作战”：一路为左岸攻击队，渡过哈拉哈河攻入外蒙古领土内的西岸(左岸)，歼灭蒙古高台上的苏军炮兵部

【历史点击】

此时苏军的真实实力

苏军此时在前线的兵力是：坦克第11旅、装甲第7旅、摩托化步兵第36师以及蒙军骑兵两个师，总兵力和关东军分析得差不多。有所改变的是坦克型号由BT-5、BT-7为主变成了以T-26为主，并有少量T-28、T-35多炮塔坦克参战；火炮也由师属122mm榴弹炮为主，改为补充了大量八九式150mm重炮。但日军兵力总数要远远超过苏蒙军队。

队，然后再突击到小松台附近从背后拦截、夹击东岸(右岸)的苏蒙军；一路为右岸攻击队，主攻哈拉哈河右岸(东岸)各个高地上的苏蒙军，来个前后夹击一举歼灭。小松原师团长任总指挥，兵力如下：

步兵　四个联队(第23师团步64、71、72联队，第7师团步26联队)

一个大队(第7师团步28联队第2大队)

骑兵　一个联队(第23师团搜索队)

坦克　两个联队(坦克第3、4联队)

炮兵　两个联队(独立野炮第1联队、野炮第13联队)

工兵　两个联队(工兵第23、24联队)

兵器与装备：

火　炮　212门(速射炮128门、山炮24门、野炮36门、九〇野炮24门)

飞　机　180架

坦　克　82辆

装甲车　36辆

汽　车　400辆

左岸攻击部队：

步72、步71、机动攻击步26联队，辅攻野炮13联队、独立野炮1联队、工兵23联队、搜索队

右岸攻击部队：

安冈支队（坦克第3、4联队，步64联队，工兵24联队，步2大队)

这个时候关东军推测的苏军兵力为：步兵4个团、坦克150辆、火炮120门、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这个数字完全是关东军的一个凭空想像，毫无实际依据，苏军的实际兵力要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1939年6月23日，第23师团全体出动，一大早离开海拉尔向甘珠尔庙出发了。不过此次不全是徒步行军，第7师团的士兵们坐上了运输卡车。上百辆卡车在空旷无际的草原上排成了长蛇，卷着沙土奔驰起来，远远看上去就像滚滚的波涛一样。整个队伍看上去意气轩昂，官兵们好像又恢复了以往的气势。

看着这进军的气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凶猛快速的闪电战，这个庞大的进军图谁看了都会受感动、都会热血沸腾起来。我

蹲在卡车上，不知不觉中也被进军的气势鼓动起来，一种必胜的信念也油然而生，心中暗想“此次一定能报第一次诺门罕之战的一箭之仇了”。

可是冷静下来想一想，苏军的战斗力是我们的数倍之多，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日军的精神力量有多么强大，获胜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这就像2大于1一样一目了然。说老实话，当时虽然说不出口来，但是内心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甚至产生了逃跑的念头。这么一热一凉的两种心情一直在烦扰、困惑着我。

随着卡车的颠簸行驶，战场也越来越近了，我感到整个身心都被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包围起来，好不容易熬到休息时间，士兵们都从拥挤得转不过身来的卡车上跳了下来，有的急急忙忙去找地方方便，有的活动一下麻木的筋骨。

我掏出自己宝贝一样的依斯特曼·柯达相机，让一个卫生兵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因为这次已经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心理准备，所以我想趁着这个机会留下人生的最后一个镜头（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卡车在没有道路的草原上一跑起来，顿时黄尘滚滚，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没有防沙眼镜根本吃不消。虽说已是6月天，但是昼夜的温差相当大，为了夜间防寒每个人又加发了一件外套。

第二天，卫生队的卡车在行进途中突然停了下来，我们全都被赶下了车，据说有命令要卫生队在此驻守待命。这儿前不着村后不靠店，方圆好几里看不到一点人烟，从地图上看位置好像是在阿布达拉湖和乌兹尔湖之间。在卫生队身后不远的地方，已经建起了一个临时野战医院。我心里直纳闷，为什么把卫生队放在这儿呢?野战医院这么近，卫生队又能起什么作用?

卫生队下车以后，马上分散开来各自挖各自的战壕。这是一片平坦的沙漠地带，所以无法明确划定战壕的位置和方向，大家都是找个适合的位置，就用小圆铁铲挖起来。

挖了一半的时候，卫生队的秦医长探过头来：“哎，也算我一个。”说着就跳了进来。一个人挖个单人战壕就行了，可是两个人就得挖个大战壕了。我说挖个圆筒状的吧，秦医长却非要挖个肚大口小章鱼罐式的。沙漠地带土质疏松，章鱼罐式的战壕很容易倒塌，我在742高地上亲眼见到过好几个士兵被活埋

的惨剧，所以坚持要挖圆筒状的。可是秦医长说什么也不肯，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从命挖“章鱼罐”了。

“章鱼罐”挖好了天也黑了，秦医长不知从哪里搞到一瓶伏特加酒，像抱着个宝贝似的跑了回来。几杯酒一下肚话就多了起来，两个人一边喝着一边就侃上了，直喝得两眼蒙蒙眬眬、脑袋昏昏沉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过去。我因心里一直担心这个“章鱼罐”会不会倒塌，夜里醒来好几次。可是秦医长却是酒后心宽，打着闷雷一样的鼾声睡得满香甜。

醒来时已是晴朗的拂晓了，太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从大兴安岭的顶端冉冉升起，东方的天空被染成茜草一样的红色，显得格外美丽壮观，整个旷野也变得神圣、庄严起来。卫生队的一些人纷纷探出脑袋来，欣赏起这雄大的黎明景观，好像已经忘记这儿是战场一样。深深地吸上几口清晨凉爽的新鲜空气，五脏六腑都觉得清爽，使人觉得仿佛一下子溶化到大自然里一样。看着这壮丽的景观，我忘掉了一切，爬出战壕踏着朝露散起了步。

刚溜达了不到10分钟，头顶上突然传来“嗡——”的巨大轰鸣声，抬头一看头顶上出现了一架乌黑的苏军轰炸机，我急忙就地卧倒。不一会儿就听“轰”的一声，野战医院的方向一股火柱夹杂着黑烟冲天而起。

这是苏军对我们二线部队的一次低空轰炸，轰炸机的飞行高度只有1000来米，一个俯冲投下一颗炸弹，又慢慢地飞走了。望着这个像乌鸦一般的黑家伙，有的士兵操起步枪瞄准就打，可是毫无效果。野战医院也好、卫生队也好，没有对空火炮，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轰炸机扔炸弹。卫生队拉“荞麦车”的马好像受惊了，撒开四蹄一溜烟地逃走了。马虽然逃走了，幸运的

SB-2是苏联第一种全金属、机身、蒙皮形成整体承载结构的快速双发轰炸机。1934年底开始批量生产。该机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战斗机要飞得快，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一种先进的轰炸机。

作为苏联红军的主要轰炸机，SB-2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中国空军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从苏联获得了392架SB轰炸机。从此，SB作为苏联空军志愿队和中国空军在战争初期的主要轰炸机，参加了几乎每一次对日军的轰炸。



是卫生队的人员没有什么伤亡。

“秦医长，你没事儿吧?”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战壕问了一句。秦医长摊开双手耸了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一张娃娃脸上依然带着笑容。秦医长总是这个样子，就连这种时候也忘不了开个玩笑，真是一个白发斑斑的好好爷。

秦医长52岁，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在大分市中心的闹市区开了一个儿科医院。大正时代[①]应征入伍，曾当过军医大尉。虽然上了年纪，可还是一张白净净的娃娃脸，从面容来看怎么都不像个军人，倒是一副文绉绉的文人模样。苦战苦斗之际也总是忘不了用诙谐的语言、滑稽的动作来安慰和鼓励伤员。

爆炸声余音未尽，又传来了哨兵绝望的叫声:“坦克冲过来啦!”大家呼啦一下全都跳进战壕里，不知是谁在大声呵斥:“不许露出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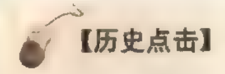
秦医长无所顾忌地大呼小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嘴里虽然这么叫着，脸上依旧是笑容满面。看着他这副怪模怪样的脸，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我按捺不住刚要探头往外看的时候，不料秦医长大怒起来:“混账!”说着一手抓住了军刀，看样子马上就要劈上一刀似的，满脸杀气，笑容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吓得我只好又老老实实蹲了下来。

虽然看不到外面，但听声音好像有四五辆坦克冲了过来，一阵坦克炮、机关枪乱射之后就撤走了。刚才是飞机轰炸，现在是坦克扫射，苏军陆空一体的作战方法运用得真是巧妙。好在卫生队没有什么伤亡，虚惊了一场。

可是，野战医院年轻的秀才S军医却没能忍耐住，他从战壕里探出头的一瞬间，脑袋被机枪子弹打穿，当场毙命。我不禁觉得这个S军医就像自己的替身一样，要不是秦医长严厉制止，恐怕被打穿脑袋的就不是S军医而是草平了吧？想到这儿脊背就阵阵发凉，越发打心眼里感谢秦医长。

野战医院被炸以后，我曾认真地考虑过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线的战斗还没有打响，苏军就先下手轰炸日军的二线呢?恐怕这正是苏军在战略战术上的巧妙之处吧。回顾一下第一次诺门罕之战，苏军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战术，那就是使日军的

①即1912年到1925年的14年间。大正之前为明治时代，之后为昭和时代。





苏联远东空军初战失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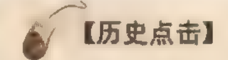
1937年的"大清洗"，使苏联空军中75%的高级将领被清除(其中包括空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和远东地区空军司令)，一些掌握先进空战思想和理论的人被荡涤一空，到诺门罕战争时苏联空军司令员只能由一名少将担任。苏联远东空军与日军数量上相比虽占有压倒性优势，大多数时间掌握着战略和战术上的主动权，但所有这一切，最初都被复杂的指挥结构、低落的士气和糟糕的训练所抵消，仗打得十分艰苦。由于刚开始苏军歼击机性能落后(远东苏军当时装备的多是双翼战斗机)，轰炸机数量偏少，而前线航空兵又分别配属给各级陆军单位，作战没有形成拳头，以至于制空权数次易手。据后贝加尔第22歼击机航空团飞行副大队长斯科巴里欣回忆：1939年5月23日，苏日战机在诺门罕上空遭遇，苏联空军有一个歼击机大队几乎全军覆灭。次日，斯科巴里欣大队与友邻一个伊－15歼击机大队联合作战。由于伊－15飞行速度较慢，斯科巴里欣率领伊－16大队飞抵集合空域盘旋很久也没有找到伊－15的踪迹，只好返航。后来才得知，这个大队竟被日军全部击落了。苏联远东空军连续失利，迫使国防人民委员会下令暂停一切空中行动。伏罗希洛夫元帅在事后痛苦地承认："在空战中单凭对敌人的仇恨和勇敢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还必须有娴熟的专业技能和作战经验，这正是苏联空军所缺少的。"后来在苏军飞行教官组的紧急培训下，远东空军才逐步改变颓势，在6月22日的一次空战中，苏机95架对日机120架在哈拉哈河上空激战，一举击落日机30架，苏联空军第一次以少胜多打败了日军。

第一、第二线脱节，然后再来一个包围歼灭。他们不像日军一样付出巨大的牺牲以求速战速决，而是尽可能减少自我牺牲，采取合理、有效的作战方法，所以总是先攻击日军空虚的二线。

就苏军和日军的战前准备，我事后进行了粗略的分析和整理：

(1) 苏军是知己知彼，日军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苏军早就通过谍报网收集到了日军的兵力、兵器、装备等军事情报，并根据这些情报进行战前准备。相反，日军对苏军的了解可以说几乎是一无所知，辻政信参谋推测的苏军兵力装备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了，苏军的实际兵力装备比他推测的要多出一倍以上。

(2) 苏军居高临下，日军处处挨打。苏军利用哈拉哈河左




【历史点击】

“空中撞击术”

“空中撞击术”的始创者是俄国飞行员涅斯捷罗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这位勇敢的飞行员独出新裁，在自己的飞机尾部安装上一把锋利的刀子和一条带有重锤的钢索，遇上飞艇就用刀子剖开其气囊的外皮让其泄气坠毁，遇上飞机就用钢索缠住其螺旋桨。当时对于普遍没有机载武器的空军来说，涅斯捷罗夫这架飞机不亚于一个武装到了牙齿的怪兽。涅斯捷罗夫上尉1914年9月8日在撞击一架奥国飞机时阵亡(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空中筋斗特技的飞行员)。

从此空中撞击术便作为一种极端的战术，在没有格外珍视飞行员性命的年代得以普及，尤其是作为一种勇敢精神和传统，被苏军继承下来。在苏联航空队援华抗日作战中，古边科曾首次用撞击战术击落日军一架轰炸机；诺门罕战争中斯科巴里欣大队长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迎面撞击日机的奇迹；更令人惊奇的是，斯科巴里欣的飞机竟带着日机碎片残骸平安飞回了自己的机场(后他被授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到二战期间，共有500多名苏军飞行员采用“空中撞击术”，最多的一人保持了曾先后4次撞击成功、自己却毫发无损的纪录。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空战是勇敢者中勇敢的体现，而空中撞击术则是勇敢者中勇敢体现的顶峰。(空中撞击战术同期也被年轻的中国空军采用，顽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4月4日，中国空军飞行员陈天民在侦察台儿庄返航途中遭遇敌机，陈天民驾驶侦察机撞下了日军一架九七式战斗机后跳伞，为中国空军撞击敌机第一人。陈天民牺牲于3个星期后的武汉空战，他又击落和撞下了各一架敌机。)

岸蒙古高台的优势，一直监视着日军的一举一动，依此来调兵布阵。相反，日军却无法了解苏军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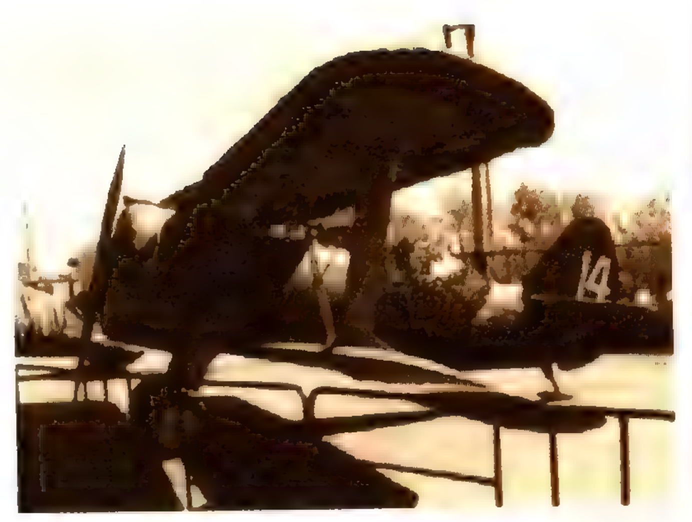
(3) 苏军张网以待，日军是飞蛾投火。苏军利用地形地势上的优势和合理的战略战术，在诺门罕早就布好了一张网，只等诱敌上钩了。相反，日军没有战略不说，在战术上也是一塌糊涂。

2. 空中绞杀

战云消散以后，周围又恢复了平静和安宁，卫生队的抢救所也总算平安无事地支起架来了。

一些卫生兵早早就掏出饭盒做晚饭了，三个一堆五个一簇，看上去就像到这儿野营似的。在战场上，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没

有别的乐趣，所以每当炮火一停，第一件事就是去抓饭盒，安慰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



伊—15战斗机是苏军的一种高机动性双翼战斗机。初期型号的上机翼为鸥式布置，以便给飞行员提供较好的视野，起落架为固定式，外形比较简洁。飞机的前部机身是铝蒙皮，其余部分为布蒙皮；有2挺带同步射击装置的PV—1机枪，主要是用机载的6枚RS—82/RS—132火箭，远距离对敌军飞机进行攻击。它当时成为苏联空军的主要战斗机之一，曾广泛地在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使用。伊—15是当时双翼战斗机中性能最优越的，在抗日战争初期，伊—15系列和日军的早期战斗机性能不相上下。

哈拉哈河西岸的蒙古高台上，停放着数以百计的苏军坦克、装甲车、卡车等等。用望远镜看上去卡车就像甲壳虫那么大，依此来推测敌我双方的距离大约在20公里左右。再往前虽然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可以想像苏军的军用物资是相当惊人的。看看苏军的武器装备，再看看日军的武器装备，这显著的对比不免使人有些垂头丧气，有的士兵叹息，也有的士兵甚至自嘲起来。

就在这时，天上突然出现了苏军和日军的飞机，在空中展开了大战。黑压压的苏军战斗机的机群下，几架日军的战斗机几乎垂直着机身冲了上去，在空中展开了纵横交错、眼花缭乱的较量，一开始便有一架苏军飞机撞下了一架日军飞机，趴在战壕里观看的士兵们个个手里捏着一把汗。后来冒着黑烟、打着旋儿栽下来的几乎都是苏军的飞机，不得不承认，日军战斗机的数量虽然比苏军少，但是飞行员的空战技术却比苏军要精湛得多。

令我吃惊和不可思议的是，卫生兵们的小道消息来的也真快，马上就有人指着头顶上的战斗机告诉我说："这三架战斗机的飞行队长是筱原准尉，他在关东军中可是赫赫有名呀。""咱们的战斗机呀，空中回旋度世界第一，所以空中战当然是拿手戏啦。"一个个就像自己立下了什么战功一样，挺着胸脯吹了起来。起初还以为他们只是凭空想像、胡吹乱侃呢，所以根本就没当回事，可后来一证实，这些小道消息竟然全是真的，实在是令人惊讶不已，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呢。

短短的一会儿，就有五六架苏军的战斗机栽了下来，并且就在两军阵地的上空。这次空战对苏军来说可能是一次很大的精神打击，以后一连好几天也没有看到苏军的战斗机，飞来的只有速度很快的侦察机，制空权完全控制在日军手里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日军的战斗机也没再在阵地上空出现过，只是6月27日远远见过日军的一个大机群在空中一掠而过，据说是

去轰炸蒙古境内的塔木斯克军用机场。为什么不再出击了呢?要想速战速决的话，眼下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诺门罕这地方，白天烈日炎炎，可一到晚上就冷得难以入睡，再加上蚊子的叮咬折磨，晚上根本就睡不安宁。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突然发起烧来，体温很快升到38.5度，接下来就是腹痛、腹泻、血便，从症状上看无疑是患了阿米巴痢疾。这种病当时没有什么特效药，只有靠自身的抵抗力来慢慢治愈。卫生队里不光我一个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患有同样的症状，再加上一些症状类似的患者，卫生队大约有一半的人发烧、腹泻起来。

这么多患者要是全部都住进野战医院的话，卫生队的机能就会陷入瘫痪状态，所以秦医长命令所有的患者要坚持、忍耐，继续执行各自的战地救护任务。我平时就患有胃肠病，三天连续发烧38度以上，腹泻血便不止，折腾得很快就消瘦、衰弱下来。秦医长看我实在可怜，也可能是担心我倒下去军医人手不够，所以特别批准我可以住进野战医院。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大战一旦开始要立即返回卫生队。

住进野战医院，点滴上葡萄糖和维生素B1，这才觉得浑身有了一点力气，并且还吃上了好久没有吃到的大米饭饭团子。住了两天院，尽管又是打针又是吃药，可是阿米巴痢疾的症状却一点也不见好转，再这么躺下去实在是不好意思，所以第三天我就自己要求出院了。

3. 【战史记录】

日军空袭塔木斯克机场

1939年5月22日到24日，苏联远东空军先后出动了150架伊－15比斯双翼战斗机，与关东军第2飞行集团120架九五式中岛陆攻在诺门罕上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日本的中岛陆攻相比苏联的伊－15要小巧灵活得多，在近战格斗中优势尤为突出。加上日本飞行员都是经过多年训练的老兵，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相当一部分还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王牌”，苏军年轻的飞行员一时远远不是其对手，几天空战下来损失较大，制空权反复易手。

【历史点击】



关东军的“下克上”

其实日本关东军“下克上”的行为，是“作战至上”思想根深蒂固存在于日本军队及高层决策者中间的一种外露。早在1929年日军颁布的《统帅纲领》中就明确表示，战端一开，作战就不能单纯考虑政治上的方便，必须在其实施过程中保持完全独立而不受制约。这与德国军事家毛奇主张开战、议和是政府的事，军队应遵从政府；但战争一旦爆发，作战行为和战略就应一切为了取胜而独立不羁完全师出一辙。因此自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整个对外侵略扩张的70年中，日本军队在作战问题上，一贯不愿受政略指导和制约，日本军部和政府、军部和下属各兵种之间经常就国防方针、军事战略及作战计划发生龃龉，彼此谁也不买谁的账，这里面又以侵华日军中的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最为明显。可以说，鲁登道夫的“政治应服务于战争”的“国家总体战”思想深深地扎根于日本军队之中，促使他们在20世纪中期以前到处兴风作浪，肆意施暴。

但苏联远东空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损失的飞机和飞行员都能及时得到补充，升空的飞机始终未见减少。而日军则逐渐后继乏力，飞机越打越少，国内根本补充不及，尤其是飞行员的损失无法弥补，让第2飞行集团尤为头痛。后来，日军只好靠加大起飞频率来弥补飞行员的短缺。即使这样，前线兵力也是捉襟见肘，而日本飞行员则个个疲于奔命，战斗力一落再落。6月中旬苏军几个新型的伊－16战斗机大队投入战斗后，与伊－15形成高低搭配，给日军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战场主动权慢慢转移到苏军手中。

日军不甘心丧失空中优势，为改变颓势，第2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中将提出集中兵力，



日本陆军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它是三菱公司为日本陆军“北进作战”、对苏联远东地区进行轰炸而专门研制的。此机是空袭塔木斯克机场的主力机种。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军仍将其作为运输机使用。1945年5月24日，7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运载自杀突击队飞往冲绳。其中2架在冲绳读谷机场强行降落，炸毁了机场上7架美军飞机，并引燃一个7万加仑的汽油库。该机也是日本陆军使用期最长的飞机。（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日军轰炸机群。

越境空袭苏空军基地——塔木斯克机场，一劳永逸解决制空问题。东京大本营得知这一方案后，有些顾虑，迟迟没有批准越境轰炸计划。很明显，长沙会战在即，侵华日军主力深陷大陆腹地，如果越境空袭引起苏军报复性轰炸满洲工业基地，影响到大陆战事所急需的军需供应，就得不偿失了。而苏联在远东边境地区没有什么重工业，日军事后就是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再三考虑之后，东京认为还是暂不越境袭击为好。为说服关东军，参谋本部决定派作战课的有末中佐亲赴前线传达东京的旨意。

关东军已与苏联红军在战场上打红了眼，急于报复好挽回面子。再说以前多次“下克上”没听从参谋本部的指挥，只要最后能取得胜利东京从没追究过什么，所以决定这次仍不理会东京的指令，按计划照打不误。嵯峨彻二激动万分，指挥部下连夜准备，待6月27日气象条件合适就立即起飞；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则负责应付东京来客。有末一行飞抵大连，马上有人陪他参观大连市容，视察旅顺要塞，上黄金山，下老虎尾，折腾了一天，等第二天傍晚坐火车到达长春关东军司令部时，矶谷很“遗憾”地告诉有末中佐，嵯峨的轰炸机群已经轰炸完毕回来了，只能是“下不为例”了。

6月27日清晨4时，甘珠尔庙机场和海拉尔机场百机轰鸣，57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和80架九五陆攻一架接一架起飞升空，在空中编成4个机群，由第7飞行旅团长宝藏寺少将率领开始了冒险偷袭。机群以3000米的高度飞向外蒙，预计到达苏军机场正是早操时间，这也是苏军一天中警戒最松懈的时候。6点左右，第一梯队的日本轰炸机将炸弹投向了塔木斯克机场，机场上浓烟顿时滚滚升起，烈焰很快吞噬了机库和营房，苏联空军措手不及，大批飞机在地面上被炸毁。由于日军飞机由东向西切入投弹，部署在机场周围的高炮部队只能迎着刺眼的朝阳

瞄准射击。85毫米和37毫米的高炮群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严密火网，4架值班的伊－16战斗机也发挥了作用，猛扑向日本轰炸机编队发射了火箭弹，6架日本轰炸机凌空爆炸，数架起火受伤。这是世界空战史上首次使用航空火箭弹，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日军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匆匆投下了近百吨炸弹后快速撤离了塔木斯克，宝藏寺驾驶着飞机望着黑烟笼罩的机场，得意地发出了“轰炸成功”的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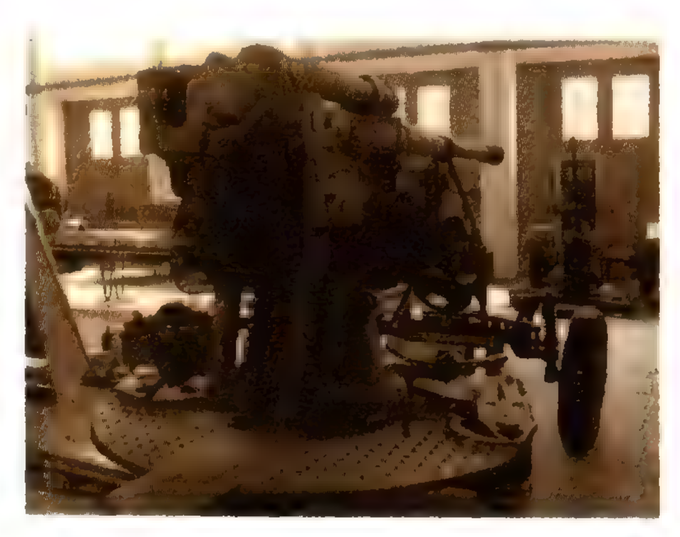
事后日军统计的战果为：击毁击伤苏军飞机124架(含空中击落两架)，炸毁油库一座；日机损失6架，受伤若干(多为高炮击中)。苏军有关哈拉哈河战役的描述中没有具体提及飞机的损失情况，但带队轰炸的宝藏寺少将回忆道：“由于地面炮火异常猛烈，加上苏军战斗机袭扰，轰炸被迫采用了高空水平投弹方式，无法精确命中目标，至少有一半炸弹投到了空地上，关东军宣传的战果明显被夸大了。”

不管怎么样，空袭还是成功了，关东军好不得意，这么大规模的出击在陆军航空史上尚属首次，战果也令人满意，足可以让东京大本营默认这次“抗旨”行为。

孰料，参谋本部却对关东军这次阳奉阴违的举动大为恼火。接到“报捷”电话后，不但没有只字赞许，反而骂了娘，摔了电话。这可令关东军气愤异常，第2飞行集团闻讯后尤为恼火，认为3个少将旅团长（除宝藏寺外，还有第9飞行旅团长下野少将、第12飞行旅团长东少将）亲率部下冒死轰炸，胜利后没得到表彰反遭训斥，实在是窝囊。一气之下借口飞机连续作战损坏严重，应维修保养，多日赌气“罢飞”。关东军的飞机不升空，苏军的飞机损失严重，又一时补充不及，诺门罕上空顿时安静了下来。

塔木斯克空袭是亚洲空战史上第一次大机群成功突袭敌方机场，战术上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此役使苏军前线飞机损失大半，一时丧失了制空权(但苏军机场设施、导航台、修理厂损失甚微，飞行员伤亡很小，补充的新飞机源源不断地

苏军1939式85mm高射炮。
这种大口径高炮在诺门罕战争中首次亮相便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抵达，十几天后苏联空军就逐步恢复了元气）。关东军虽掌握了制空权却没能抓住这短暂的机会，直到后来日军地面主力被苏军炮火打得头破血流时，植田谦吉大将才后悔当初没趁这个机会去摧毁苏军重炮阵地。但历史不是游戏，game over 后可以重新开始。这一仗，日军是虽胜犹败，苏军是虽败犹胜，战争的主动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朱可夫手中。

4. 【战史记录】

瘟神行动 ——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的细菌战

1939年6月底，在诺门罕出现了一支奇特的日军部队，这支部队的军服并非日军常着的土黄色，而是草绿色，臂带“山”字型袖章，胸佩紫星、黄星、白星不等以区分阶级。这支队伍虽人数不多，却戒备森严，驻地周围布满哨兵，高射炮林立，即使日军各作战部队也不准接近这块禁区。略知些内情的日军各部队长们对其更是敬而远之，这是日本陆军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熟知的、臭名昭著的日本“七三一”细菌战部队。由于其部队长是石井四郎大佐，故日军内部习惯称之为“石井部队”。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成立于1936年，驻地设在距哈尔滨20公里处的平房镇，是日本陆军研发细菌战的大本营。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军事强国都在高度关注细菌转化为武器的理论探讨，有的已开始在实验室秘密研究，但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细菌武器用于实战，惟独日本在此成为世界上的首例。由于国际法明确规定不允许研究和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所以日本陆军的细菌战部队只好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对外称“防疫给水部”。

诺门罕战争开始不久，关东军司令部就秘密指示石井部队拟订出在哈拉哈河两岸进行细菌战的作战预案，准备一旦日军进攻受挫，便付诸实施。石井四郎对鼠疫菌情有独钟(14世纪中叶的一次鼠疫流行，横扫整个欧洲大陆，几乎毁灭了半个欧洲。事后，西方人谈之色变，欧洲列强仿佛相互有协议似的都不将鼠疫考虑为细菌战武器，

日军的一式氰酸毒气手榴弹。携带时有专门的保护套，碰炸后毒性极大，人员在杀害范围中心只要2秒时间就会失去意识死亡，但无持续毒性，一般染毒地点10分钟后毒云就散去。日军捕获坦克时也会使用这种手雷。这种手雷中装的氰酸毒剂普通的过滤式防毒面具无法防护。



惟独日本将这种传染性和杀伤力极强的“死神”悄悄放入武库中)，他一开始准备用带菌炮弹轰击或飞机布撒，但关东军诺门罕前线指挥官小松原认为炮兵射击把握性不大，一旦引起苏军还击，这些堆放在日军阵地上的“细菌弹”会殃及自己；至于飞机布撒，更是天方夜谭，关东军到此时又有哪一架飞机能飞越哈拉哈河?既然石井部队来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让“防疫给水部”直接派人到苏军水源地布撒去好了。

石井见此只好命令碇常重少佐组织敢死队，准备人工布撒。6月30日午后1时，石井大佐正式向诺门罕战区内的日军部队宣布：“从此时起，不准饮用河水，因为河水可能已被污染。”同时，日军一线部队开始启用“石井滤水器”和“石井滤水车”，饮用过滤后的水。随后，石井四郎又带人四处走访，再三叮嘱所到部队千万不要饮用河水。此时，碇常重率领22人的敢死队已秘密出发，所有人在出发前都用鲜血签了血书，发誓无论成败决不泄露此次行动的任何机密，直到死去。

黄昏时分，敢死队悄悄摸到了哈拉哈河上游，碇常重钻出一人高的芦苇丛，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河对岸，见确无动静后，才一挥手，两只大型充气橡皮舟划了出来，船上载有十几个金属桶，还有长柄勺、铁皮水桶、玻璃容器和仪器皮箱等一大堆东西，敢死队员挤在橡皮舟两侧拼命地划向河中央。时值盛夏，河面上又闷又热，加上心情紧张，所有日军官兵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抵达河中心后，一只只金属桶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盖子，



利用简易木筏渡河的苏军。日军在诺门罕水源地实施细菌战，将会对占领哈拉哈河两岸的苏军造成极大威胁。(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投入水中，里面装的是鼠疫、鼻疽等烈性传染病菌，当时还没有治疗此类病菌的特效药。两名军医趴在船边提取水样，测量温度，有人做着记录，并进行了拍照。橡皮舟逆水行驶了约一公里，所有细菌容器全被投入河中，布撒细菌共重22.5公斤，哈拉哈河上游被病菌完全污染了。

原“七三一”细菌部队成员秋山浩在《731细菌部队》一书中描述到：“部队从诺门罕的水源地哈拉哈河上游地带，对敌人方面撒下了鼠疫、伤寒、霍乱等培养菌。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殊死作业，前后有30多名军医和军佐牺牲。其中有些是在作业中感染了我们自己布撒的细菌而死亡的，但大多数是后来死于敌军的炮火下。”

战后，关东军于1939年10月2日，专门向石井部队颁发了奖状，以表彰其在诺门罕战争中的“特殊贡献”。不过，关东军自知这种泯灭人性的细菌战难逃法网追究，故从一开始就制造了大量的假象企图蒙骗世人。小松原在7月15日石井四郎与他见面的第二天，在日记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昨日苏军重型轰炸机轰炸了水源地一带，在水中检测出了有赤痢等细菌，目前石井部队正在调查之中……”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哈拉哈河的水源地污染是苏军轰炸的结果，简直是欲盖弥彰。

幸好诺门罕战场进行细菌战的照片底版及碇常重少佐等22人签名的血书都保存在“七三一”细菌部队教育部长圆田中佐的保险柜中。1949年12月26日，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军事法庭上，“七三一”部队教育部长西军中佐作证时供述，他在接任圆田教育部长一职时，发现保险柜中存有碇常重少佐在诺门罕进行细菌战的文件和照片。历史就是历史，不容抹杀和歪曲。

苏联在诺门罕战后没有公布因石井部队细菌战造成的人员伤亡数字，但蒙古人民军却有骑兵第5师的军马感染了鼻疽病大量减员的记录；另外，苏蒙军队在诺门罕战争中因病减员相当多，这里面不排除因天气炎热、条件恶劣造成的自然减员，但有没有“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功劳”目前还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日军虽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还是有不少日军在极度干渴之下偷偷喝了哈拉哈河中的水，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统计，整个作战期间前线共有1173人因病死亡。关东军搬起石头也砸了自己的脚。

5. 渡过了哈拉哈河

7月2日，小松原师团长下达了攻击命令，第二次诺门罕之战的帷幕终于拉开了。不久卫生队也接到命令：抽调一部分人员，今晚跟随左岸攻击队夜袭渡河。

秦医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人员共50来人。傍晚时分与秦医长依依不舍告别后，就率领这支卫生队跟随大部队出发了，不用说这个卫生支队的医长就成了草平军医了。

天空乌云密布看不见一颗星星，整个大地也被浓浓的雾霭笼罩起来，就像在没有灯火的地道里行走一样，视野几乎等于零。行军途中不断发生脱节、掉队现象，所以不得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整个部队的行进就像龟行一样缓慢。每当停下来的时候，后面的人总是一头撞到前面人的背包上，吓得一下子醒过来。这在往常简直就是不可想像的事，可是现在大家都被阿米巴痢疾折腾得筋疲力尽，所以一边走一边睡觉，尽管责任感驱使着双腿还在行走，可是精力已经跟不上了。

我们好歹总算到达了预定的渡河地点，天已经大亮了。可能觉察到了渡河行动，苏军不停地用炮弹来欢迎我们，哈拉哈河上的工兵桥周围水柱冲天，烟雾加上水雾，四周什么也看不见。

一股日军在进行渡河前的动员，其右臂所束的白毛巾是为夜袭准备的。（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浮桥时时中弹，工兵们不停地冒死下水修补，头顶上炮弹乱炸，脚下是水深流急的哈拉哈河，修补工作可谓难上加难。好不容易把桥修好，苏军轰炸机又来狂轰滥炸，又是水柱冲天，硝烟弥漫，还在右岸等待渡河的卫生队队员个个手里捏着一把汗，随着阵阵爆炸声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苏军的轰炸机

不管怎么巧妙地俯冲投弹，可是很难准确命中河面上这座小小的工兵桥。另外，河边架设的高射机关炮可能也起了很大作用，这种机关炮还是从诺门罕开战以来第一次见到。

就这样，此次夜间偷袭渡河作战进展得很不顺利。由于工兵桥的被炸和轰炸机的连续轰炸，第一线和第二线又出现了脱节，我们渡过工兵桥时，听说第一线主力部队已经和苏蒙军展开了激战，一线和二线的间隔大约在6公里左右。

卫生队总算渡过了哈拉哈河，踏上了外蒙一方的蒙古高台。登上30多米高的陡坡河堤，宽阔无际的外蒙大草原就在眼前，再转过身来一看，诺门罕旷野就在眼皮子底下，哈拉哈河像一条白色飘带一样，飘飘悠悠地消失在荒野遥远的尽头。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览无余，往前看就是连绵起伏的大兴安岭了，真是雄伟壮观。好多卫生兵不由地发出“嗨——”、“嗨——”的感叹声。

但不久我就感到，渡河作战计划其实不过是一场南柯梦。岂止如此，我们踏上的这块外蒙之地，谁也没有想到日后竟成了鲜血淋漓、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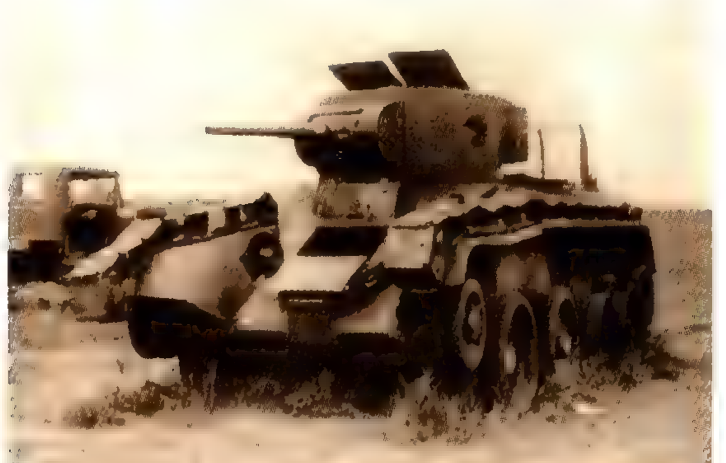
（二）蒙古高台上的惨败

1．苏军的坦克群

7月3日，登上蒙古高台的卫生队，把物品装上3辆马车，又出发了。

可是刚走了不到一里路，就听有人尖叫：“右前方苏军坦克15辆！”

我急忙拔出战刀大喊：“全体卧倒！”话音未落，苏军的坦克就开了火，15辆坦克扇形散开朝着卫生队冲了过来。“快埋反坦克地雷!快埋反坦克地雷!”急得我是一个劲儿地喊，可是埋地雷已经来不及了，坦克离卫生队越来越近。



第二次诺门罕之战中被击毁的苏军T–26坦克，T–26的汽油发动机极易被引燃，换成柴油机后才得改观。旁边是一辆损毁的日军九四式丰田卡车。（出自《太平洋战争·1937～1945》，每日新闻社）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轰”的一声巨响，一辆坦克爆炸起火，紧接着又是“轰”的一声，又一辆坦克燃烧起来。我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在卫生队后面的反坦克炮中队开了火，虽说距离很近，但是两发能打趴下两辆坦克，这恐怕也是一个不小的战绩吧。剩下的坦克一看情况不妙，掉转方向一溜烟地逃走了。

虽一心想追赶一线部队，可是遍地的死伤士兵又不能不管，他们有的被坦克压成了乌鱼干，有的被压断了腿，还有被炮弹炸死、炸伤的，眼前的战地救护已忙得团团转，根本顾不上去追赶前线部队。

正当我们手忙脚乱、心急如焚的时候，忽然又听到有人悲鸣一般地尖叫起来：“又有5辆坦克冲过来了！”抬头一看，5辆坦克已经冲到卫生队跟前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卧倒，就听“轰”、“轰”两声巨响，又有两辆坦克被速射炮中队打中了。剩下的一辆掉头逃去，另外两辆竟然加足马力往前冲了过来。不知是迷失了方向，还是坦克上的视窗太小看不到四周的缘故，两辆坦克慌乱之中在离卫生队二十几米远的地方突然“嗵”的一声，来了一个正面撞车：一辆坦克被撞趴下了，坦克上的盖子也被撞飞了；另一辆则匆忙撤走了。

这辆坦克距离卫生队还不到25米，我的复仇心一下子燃烧



关东军首次跨过了哈拉哈河，过河不容易，回去就更不容易了。（出自《太平洋战争·1937～1945》，每日新闻社）

起来，对士兵们高喊了一声："抓住它！"自己也掏出腰里的手枪，朝着坦克匍匐而去，在我前面大约10米的地方，已经有一个人也在匍匐前进，看后影好像是通讯队的军曹，我想这样爬也太慢了，抬起头刚想站起来的时候，只见前面的军曹从地上一下子飞到一米多高的空中，呈一个大字在空中打着旋，"扑通"一声摔了下来。

这个军曹可能和我想的一样，嫌爬太慢而刚站起来的一瞬间，被坦克炮弹打穿了胸部，我一下子又紧紧地趴到地上再也不敢动了，心里直为这个不知姓名、像我替身一样的军曹的冥福而祈祷。这时卫生兵和通讯兵们挥舞着刀枪把坦克包围起来，两个苏军坦克兵虽然拼命抵抗，但毕竟寡不敌众，一个被打死，另一个成了俘虏。

俘虏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苏军士兵，看着这个俘虏，卫生兵们杀气腾腾地叫喊起来："杀了这小子！""拿他做血祭！"我急忙制止了他们，告诉他们俘虏是不能随便杀的，再说说不定还有些情报价值，还是把他送到指挥部为好。正好有一辆来运送物资的卡车，于是就把这个五花大绑的俘虏和一些伤员一起装上了卡车。

忽然，身后传来一片响亮的欢呼声，回头一看只见炮兵队的6个人分乘6匹战马，挥舞着马鞭向卫生队这个方向奔跑而来，战马的身后是一辆崭新的金黄色的轿车。卫生兵们都好像是在黑暗中见到一丝光明一样兴奋起来，可我却为这一大胆无谋的举动而感到惊讶。

日军通过简陋狭窄的工兵桥时拥挤不堪。



战马刚刚登到半坡上，就听有人哭嚎似的尖叫起来："坦克！敌军坦克！"回头一看，4辆苏军坦克像发疯一样冲了过去。就听"轰"、"轰"、"轰"，几声炮响，紧接着就是战马"嘿——嘿——"的悲鸣。几匹战马和沙土一起飞向空中，战马的惨状和悲鸣吓坏了卫生队的挽

马，它们撒开四蹄刨起沙土，拉着卫生队的“荞麦车”朝着旷野没命地逃走了。

就在这时，站在卡车上的那个苏军俘虏突然开怀大笑起来。这一笑可把卫生兵们给气坏了，一些被激怒的卫生兵甚至叫喊着要用刀劈死这小子。对卫生队来说，这个受到宽大处理才得以活命的俘虏，在这个时候放声大笑也实在是太放肆、太无礼了。可是反过来对苏军俘虏来说，看到自己部队的坦克打乱了日军的阵脚，战马被炸，挽马逃跑，可能觉得很解气、很开心吧。日本士兵有“无敌皇军”的骄傲，苏联士兵可能有比这更高的自负。

这边的凄惨景象还没有完，那边的悲惨镜头又开始了，两辆坦克屁股后面卷起滚滚沙土，正玩命地追赶着那辆金黄色的轿车！

事后才知道，金光闪闪的轿车里坐着两个人——第23师团的小松原师团长和大内参谋长，据说他们是为了亲自指挥第一线作战才冒险而来的，没料到刚刚过河就遭到苏军坦克的袭击。可能这辆金光闪闪的轿车还没有过河，苏军从高台上就已经发现了，并且断定这是日军大头目的专用车，所以等轿车一过河就来了一个突然袭击。

不管怎么说，在毫无遮挡、一望无际的旷野上，坐着金光灿烂、引人注目的轿车跑到前线来，本身就是不自量力的轻举妄动。像这样的胡来举动一般是那个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的辻政信“大参谋”的拿手戏，可是第23师团的头头们竟然也来了一个照搬照抄。

突然，我的四周“哒哒哒”、“轰、轰”，枪炮声大作，沙土随着枪炮声飞舞起来，坦克的轰鸣声也越来越近了。“不好坦克又冲这边来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撒腿就跑，也顾不上什么卫生队不卫生队的了。只觉得眼前是飞舞的沙土，周围是爆炸的热浪，耳边是嗖嗖的子弹尖叫声。轰鸣声越来越大了，我紧跑几步往旁边来了一个鱼跃扑倒在地，再也没敢动弹。坦克的履带紧擦着头皮飞驶过去，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坦克的轰鸣声渐渐远去之后，我才总算松了一口气，同时一种疲惫感涌了上来，觉得全身软绵绵的。刚从地上爬起来，忽然觉得眼前金星乱冒，站立不稳，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刚才为了指挥打坦克玩命地喊了一阵子，躲避坦克又玩命地跑了一

阵子，全身的力气好像一下子全部都用完了，再加上连日来发烧、腹泻、血便，身体实在是支撑不住了。

这叫打的什么仗呀?简直是一塌糊涂。嘿，去他妈的吧，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反正老子是不打了!一瞬间这么一种念头涌了上来，什么自负感、什么责任感统统见鬼去吧。旁边就有一个好像是苏蒙军挖好的战壕，我连滚带爬滚落进去，没想到不一会儿竟然昏睡过去。

2. 【战史记录】

巴音查山上的较量

巴音查山之战应该是诺门罕战争中最为经典的一场战斗，先是日军避实击虚，利用优势兵力一举突破苏军防线，关东军主力首次踏上外蒙土地，威胁到苏军的侧后方，再是朱可夫沉着应对，巧妙用兵化险为夷，最后变被动为主动，几乎全歼入侵之敌。这场战斗好像是整个诺门罕战争的缩影。

哈拉哈河沿岸蚊蝇肆虐，日军休息时被迫戴上“防蝇罩”和手套。



序幕于7月1日黄昏时分拉开，日军主力经过一天多的急行军，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没有惊动苏蒙军队，顺利抵达哈拉哈河下游，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岸几处高地，准备执行渡河包抄作战计划。不过这次小松原中将并没有太多的兴奋：一方面他根本不清楚西岸对手的部署情况，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一方面是出发前夜，师团兵器勤务部长近泽大佐对渡河后超长距离的补给保障信心不足，压力颇大的近泽竟开枪自杀了。未出征先折将，小松原觉得不是什么好兆头。

18000名日军潜伏在沙丘后面，等待工兵架桥。河边一丝风也没有，被烈日烤灼了一天的沙地蒸腾出一股股令人窒息的热浪，日军的水壶早干了，个个渴得嘴唇干裂。太阳被证明是比苏军更厉害的敌人，日本士兵不得不与高达40℃的酷热、干渴和疲劳搏斗。后勤部门这次还是没有带饮用水，弹药都带不了，别的就更顾不上了。哈拉哈河

两岸有茂密的芦苇和灌木丛，蚊蝇多得出奇，日军一面忍受着蚊蝇的叮咬，一面眼巴巴地望着哈拉哈河清凉的流水不能喝。因为一天前，石原的防疫给水部队刚刚向河中投放了细菌，各部队接到的通知是一律不准饮用河水。石原派人投菌时可没想到会作茧自缚。

工兵联队上千人也站在河边干着急，第4汽车联队还没有将舟桥设备运过来。哈拉哈河水面宽50米左右，深2～3米，流速为2米／秒，徒涉不行，架简易桥在荒漠上又难寻树木，联队长斋藤又热又急，望着旅团长小林恒一少将那越来越难看的脸，汗水早湿透了全身。第4汽车联队此刻比工兵联队更急，一个大队的汽车拉上舟桥离开甘珠尔庙后，在地貌相似的沙丘地带迷了路，转悠到天黑才走出来，由于不敢开大灯，只能一辆尾随一辆蹒跚而行，结果又把一个咸水湖错当成了哈拉哈河，卸下了舟桥就匆匆回去了。好在日军人多，斋藤一声令下，上千日军连拖带拽，忙了半夜好歹将舟桥弄到了河边。

7月2日凌晨，舟桥终于架设完毕。不过由于日军缺乏重型舟桥设备，这座单薄的工兵桥上只能通行步兵，卡车过河时必须将所载货物卸下才能勉强上桥，并且需要小心翼翼地行驶以免掉入2.5米宽的桥外；火炮也必须大卸八块分解后运过去，只有37毫米速射炮可以直接通过。即使这样，不堪重负的舟桥还是时好时坏，需要不断地修修补补，工兵忙得团团转，桥上桥下的过河部队乱成一锅粥。上午10点，日军主力费尽周折终于全部渡过了河，登上了西岸的蒙古高台。小松原顾不上远眺蒙古大草原上的壮丽风光，忙命令第23师团第71、72联队为前锋，炮兵联队和师团直属部队居中，第7师团第26联队殿后为总预备队，马上沿河一路向上游杀去。此处离苏军的渡口和重炮阵地不足13公里，距朱可夫的指挥所不到15公里，小松原乐观地想，如果一切顺利，到中午他就可以切断东岸苏军的退路，完成包抄计划。

塔木斯克机场遭日军空袭后，苏联空军一时没有恢复过元气来，空中侦察大大减少，没能及时发现日军这次大规模兵力调动。7月2日上午，苏军驻蒙军总顾问阿布宁上校正巧去蒙6师阵地途中，意外地发现了日军先头部队。

阿布宁立即调转车头赶回前沿指挥部，向朱可夫将军汇报了紧急事态，朱可夫也为日军这次大胆偷袭感到吃惊，苏军主

力此时全在河东，西岸极为空虚，必须立即调回应对这股入侵之敌。朱可夫马上下令调兵回援。指挥部的人都清楚在哈拉哈河西岸4.6英里长的防线上，现在只有2541名蒙军士兵，而面对的日军却是数万人。这将是一场决定整个战争态势的关键战斗，问题就在于谁能先形成优势兵力歼灭对方，现在关键是看东岸苏蒙主力部队能不能及时返回西岸。幸亏朱可夫不是费克连科，他早就在侧翼安排了警戒部队，这一招伏笔为东岸主力回防赢得了宝贵时间。

真可谓冤家路窄，守卫在日军必经之地——巴音查山的恰巧是蒙军骑兵第6师第15团。骑6师由于在第一次诺门罕之战时与第23师团的山县联队交手多次，减员较大，朱可夫有意将其调回二线修整，安排在西岸的巴音查山一带边休整边担任侧翼警戒任务，没想到却遇上了诺门罕战争中最艰苦的一场阻击战。

日军先头部队刚靠近巴音查山，蒙军哨兵便发现了河边灌木丛中的异常，马上开枪示警。骑15团团长达尔玛扎布上尉举起望远镜，透过薄雾发现至少有七八千日本兵正拉开散兵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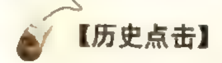
据壕防守的蒙军步兵，他们手中拿的就是著名的俄制M1891型莫辛步枪。



漫山遍野地扑了上来，骑15团立刻开火阻击。偷袭被发现后，日军立刻改为强攻，蒙军第15团400多支莫辛步枪单薄脆弱的枪声很快被近万名日军疯狂的呐喊声、枪炮声给淹没了。日军迅速冲上了山坡，巴音查山虽名义上是个山冈，实际上只是一个60多米高的大沙丘，四周全是缓坡，根本无险可守。达尔玛扎布心里非常明白，不擅长阵地战的骑兵15团绝对顶不住这么多日军的疯狂冲击。正常情况下他应发挥骑兵部队快速机动的优势立即与日军步兵脱离接触，展开袭扰战。但这次不同，他身后不到8公里处就是重炮阵地，就是浮桥渡口，就是朱可夫的指挥部，他们无处可退也不能后退。年轻的骑兵团长向全团下达了“寸土不让，死守待援”的命令，这意味着骑15团将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进攻的日军搞清面对的只是一支蒙军部队时，刚开始根本没把这支小小的骑兵部队放在眼里。还用打吗?两个齐装满员的主力联队只要一个冲锋，就会像洪水一样淹没巴音查山上的蒙军。可是不一会儿，日军便感觉不太对劲，蒙军阻击罕见地顽强，当日军潮水般地涌上阵地后，许多蒙军士兵冲入敌群拉响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山坡上到处是拼刺的士兵，刀光闪闪，枪声阵阵。按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拼刺前要子弹退膛，以免走火误伤(日本三八式步枪6.5mm子弹近距离贯穿三两个人没问题)。蒙军可顾不上考虑这么多了，趁日军稀里哗啦子弹退膛之际，机枪手跳出战壕平端着机枪猛扫过去，第一排的日军还没摆好架势便倒下一片。蒙军军官们也是一手马刀、一手短枪，远打近砍，让一些跃跃欲试的日本“武士”吃尽了苦头。第71联队第1大队长横田千野少佐就是对刺时眉心中弹丧命，率先为天皇的“八纮一宇”“尽忠”了。不过近战肉搏毕竟是日军的传统优势，在强大兵力围攻下，骑15团很快便伤亡殆尽。但他们以全团的牺牲为全局的胜利争取了宝贵的两个小时，朱可夫利用这段时间已迅速调集了强大的反攻力量。

朱可夫反击的第一步棋就是马上派轰炸机炸毁日军浮桥，尽快切断两岸日军之间的联系和补给；第二步是命令所有炮兵团调转炮口集中火力轰击巴音查山一线，阻击日军的进一步推进；第三步命令两个摩步团守卫东岸阵地，坚决顶住日军坦克师团的正面进攻，将坦克第11旅、装甲第7旅和摩托化步兵第24团全部调回西岸，集中主力先消灭过河之敌。征求政委的意





【历史点击】

苏军的战时“双重指挥”制度

“双重指挥制度”亦称“政委最终决定”制度，设立于“大肃反”盛期的1937年。具体要求是部队的战术计划和决定必须先提交同级“政委”们主管的军事委员会同意后方可执行，使政治军官拥有了与战地指挥官一样甚至更多的军事指挥权。因此，“政委”们可以轻易地建议军事委员会把部队主官降级、罢免或关进监狱，政委实际拥有了最终决定权。这种畸形的军队指挥体系严重妨碍了军事指挥员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损害了军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降低了指挥、决策效率。诺门罕战争期间，有些部队已经暴露出一些不和谐的征兆，但由于上层朱可夫和尼基舍夫政委之间协调得还算顺畅，没有造成大的问题。等到3个月后的苏芬战争爆发时，这种笨拙的指挥系统令苏军深受其害，在前线官兵的疾呼之下，后被迫取消。

见时，政委尼基舍夫少将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使朱可夫感到莫大的欣慰。

占领巴音查山的日军刚刚清点完伤亡情况(包括两个大队长在内共有600人伤亡，损失之大令旅团长小林恒一吃惊)，苏军的第一批炮弹便降临了，密集的火力将高地打成了一片火海，滚滚黑烟直冲云霄。炮击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日军被压制在巴音查山一线寸步难行，只能蜷缩在在战壕里听天由命了。此时苏军的重型轰炸机也将几十吨炸弹倾泻到日军浮桥处，关东军高射炮联队20mm的九八式机关炮虽打得天空烟雾点点，可作用不大。停在岸边等待过河的补给车辆被炸得四处横飞，浮桥也是时通时断，工兵伤亡惨重，过河日军的补给线基本被切断了。

中午时分，守卫在巴音查山的日军士兵听到远处传来了令人恐惧的巨大轰鸣声，沙丘好像也在隐隐颤抖，他们扒着战壕向外看，顿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足足有500多辆



日军反坦克炮阵地。

树枝遮掩的是设在巴音查山上的日军37mm反坦克速射炮。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用树枝伪装起来的火炮旁，居然竖着一面醒目的太阳旗，难道怕苏军坦克找不到目标？

各型坦克、装甲车组成的钢铁洪流从地平线尽处冲了过来。苏军的坦克第11旅、装甲第7旅和蒙军的两个装甲营赶到了。



苏联T－28中型坦克。

1933年苏联制造了31吨的T－28样车，拥有4个炮塔。主炮塔装有76.2mm榴弹炮，副炮塔分布在左前、右前、右后并装备45mm火炮。1938年取消了后部炮塔，并将辅助武器改为机枪。

T—28坦克参加了诺门罕战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在苏芬战争中表现较差。T－28糟糕的平衡式悬挂装置和低威力火炮都使它无法与德式坦克相抗衡。苏联后来换装了“克里斯蒂”悬挂装置，制造了机动性较好的T－29坦克。

苏军以T—28坦克群为首，组成多个梯形方阵快速逼近了巴音查山，日军架设在高地上16门37mm反坦克速射炮，虽拼命射击，但根本阻止不了这么庞大的坦克集团的冲锋，反而很快被坦克炮一门门地击毁了，各联队只好收集燃烧瓶命令“肉弹敢死队”出击。(据日方资料记载，第23师团出发前曾给每人发了瓶汽水，要求喝完后灌满汽油随身携带，日军士兵这才知道是要做燃烧瓶。)日军士兵三三两两地抱起反坦克雷、炸药包、集束手榴弹、燃烧瓶甚至绑上迫击炮弹，高呼着“万岁”冲向了坦克，大部分人还没跑出几步便被打得血肉横飞。但随着苏军坦克冲入敌阵，速度降了下来，反扑的日军越来越多，担任火力支援的BA—10装甲车顾此失彼，加上夏季长途疾驶，苏军坦克的汽油发动机外壳极为灼热，一旦被燃烧瓶投中，便会迅速燃烧，一些防范不及的战车被“肉弹”陆续击中，冒起了黑烟。有些日军士兵甚至爬上坦克，用铁锹、枪托捣毁观测镜、天线，使坦克无法正常行驶。战后一名参加过巴音查山反击的苏军装甲兵少校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随着坦克缓慢前进，隐藏在散兵坑内的日军火力点一个个地被清除掉了，但硝烟中血肉横飞的日本兵并没有撤退，反而身上挂满手榴弹从掩体中冲了出来，狂叫着毫不隐蔽地向前冲。虽然接二连三地被我们用机枪打倒，但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起初是单个士兵的‘肉弹’攻击，后来发展为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几百人的自杀攻击。身材短小的日本兵绝望地试图用身体来阻挡坦克的进攻。我们实在应付不过来，有一些坦克被陆续击毁了……”为减少无谓的损失，雅柯夫少将命令全旅立刻与日军脱离接触，苏军波涛汹涌的钢铁洪流暂时退了下去。小林旅团遗尸遍野，携带的反坦克手雷

和燃烧瓶基本耗尽，一些士兵只能用步枪向远处的坦克徒劳地射击。

巴音查山双方鏖兵的同时，刚过河的第23师团司令部也危如累卵、险象环生。浮桥被苏军封锁后，炮兵联队的山炮、野炮很快打光了炮弹，成了哑巴。殿后的预备队——第7师团第26联队被侧翼包抄过来的蒙军装甲营死死地缠住，36辆BA—10装甲车始终与日军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让“肉弹”有机可乘，打得第26联队几千人进退两难。一个协同作战的苏军坦克连则直扑日军指挥部，坦克炮弹纷纷在其周围爆炸，参谋长大内少将中弹阵亡。小松原此刻手中已无一兵一卒，望着快速逼近的坦克，十几个军官绝望地拔出了东洋刀准备剖腹。幸亏一个刚刚抢渡过河的速射炮中队赶到了，救了小松原一命。日军七手八脚地架好火炮，仓促开火，由于双方距离已非常近，两辆苏军T—26坦克猝不及防被击中，冒出了火焰，其他几辆坦克猛烈还击一阵后，因情况不明退了下去。小松原亲眼目睹了这场短促的反坦克战，短短的7分钟，虽击退了苏军坦克连的进攻，但速射炮中队只活下来6个人，剩下1门炮。小松原第一次对战胜朱可夫的苏军失去了信心(这场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激战对他刺激很大，事后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此事，认为关东军仅靠步兵作战将无法承受如此大的损失)。

日军虽三面被围，但仍死守阵地，企图保住西岸这块立足之地。苏摩步24团和蒙8师到达后，苏蒙各部队立刻对巴音查山等地发起了总攻。到了这个时候，过河的日军已寸步难行，朱可夫开始考虑如何“收网”了，据军政委尼基舍夫少将回忆：“朱可夫胸有成竹地坐在指挥部的帆布凳上，告诉刚到的装甲8旅旅长米秀林大校应迅速派出一个装甲营迂回到渡口处，切断日军的退路。



二战初期斗志昂扬的苏军摩托化步兵。

“任务明确了吗?”朱可夫盯着米秀林问。

“明确了，司令员同志!”

“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靴子夹脚吗?”

“不。一个营去抢占登陆场会

不会损失太大了?司令员同志。”

“等全歼了日军后，你会发现这点损失不算什么了，执行吧，大校同志！”朱可夫走出帐篷指着远处的坦克说：“这一仗打胜后，我们将在巴音查山上放上一辆坦克作为英勇的红军装甲兵的纪念碑。”



被击毁的苏军BA-20M装甲车。

苏军的攻势在傍晚明显减弱了，不惯于夜战的苏联装甲兵虽一度逼近了日军登陆场但又退了回去。这给了小松原师团最后一个机会——突围撤回河东岸。一天战斗下来，日军各部队纷纷报告已弹尽粮绝，而且伤亡均已过半，补给线也完全被切断。到了下午，空中再也看不到日军的飞机，第2飞行集团的几个战斗机大队损失殆尽。更令小松原中将震惊的消息是，长时间的断水不但使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而且难以控制，严重脱水的士兵渴得几乎发疯，经常不顾死活地向苏军重机枪阵地发起冒险冲锋，仅仅是为了夺取苏制水冷式重机枪散热筒内约5公升掺着润滑油的水(至此日军断水已有近40个小时)。沮丧的小松原中将终于不得不承认日军的渡河包抄计划已失败，再硬拖下去，所有过河的日军将面临被全歼的危险。午夜时分，第23师团司令部下达了撤退命令。日军各部队趁夜色踏着几千具同伴的尸体狼狈地逃回了河东岸，在蒙古高台上留下了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和机枪残骸。

这一仗的惨败使崇尚“大步兵主义”和“精神力量第一”的日军清醒了许多，一些官兵在战后都回忆，正是从此役开始他们才认识到日军与苏军无论是在战术运用上，还是在武器配备上都相差甚远，苏联红军根本不像沙俄军队那样恐惧侧翼被包抄，反而是越发作战勇猛，进攻中步炮坦协同十分娴熟，基本上无懈可击。关东军的士气开始出现颓丧，兵无斗志、将无决心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而苏军则基本摸清了号称“皇军之

花”的关东军战斗力不过如此，官兵的信心倍增。朱可夫向伏罗希洛夫元帅发报，首次明确地肯定，远东之役，第57特别军及配属的特种兵部队完全有能力在国防人民委员会要求的时间内击败越境挑衅的日本军队。

3．逃出了死亡地狱

“喂，军医!喂，军医!军医!”

我忽然觉得有人在呼唤自己，一边摇晃一边喊。睁开蒙眬的双眼瞅了一下天空，“嗯、嗯”地回答了一声，脑袋里还是一片空虚。

“军医!军医!”

那人又放大声音，拼命地摇晃着我。这下我终于醒了，腾地一下站起来，只见眼前站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军曹。

“军医，你怎么了?”军曹问道。

“不知道怎么了，在这儿睡着了。”我回答。

“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哪个部队的?”军曹显然有些不高兴了。

“卫，卫生队的。”

“什么?卫生队的?卫生队都快全军覆没了,剩下的人集合到渡河地点了，你快去吧。”

军曹说完，撇下我就急急忙忙往战场方向跑去了。望着活佛一样的军曹的身影，我一直目送了好远、好远。一个人只身徒步敢于奔向激战的前线，真是令人目瞪口呆。

环视了一下四周，地上横七竖八到处都是人、马的尸体和血染的军衣，仿佛是在讲述着激战的经过。阵地上已经找不到一个人影了，只有远处的枪炮声还阵阵传来。

太阳已经西下，夕阳淡淡地映照着血染的荒野。看着夕阳屈指一算，我不禁暗暗感到惊讶，这一睡不是整整10个小时吗?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战壕边上，回顾一下眼前所发生的情况，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感到茫然。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并且一睡就是10个小时，还是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睡了10个小时，自己对此全然没有记忆!作为卫生队医长真是失职，真该严加惩办呀!一想到这儿，我的双腿就像灌满了铅一样沉，耷拉着脑袋慢慢向河边走去。

刚刚走了几步，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坦克的轰鸣声，“不好!

坦克袭击！”我猛地回头一看，可是身后除了硝烟以外什么都没有，这才知道是自己的一种幻觉。爬起来接着走，就像一个梦游患者一样，踉踉跄跄走向渡河点。

来到河堤陡坡时才发现，残兵败将的队伍正甩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奔向渡河点，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悲凉凄惨。哈拉哈河就在眼前了，我迈着沉重的步伐在河床的草丛中扑腾扑腾地往前走。

大约走了一公里左右，忽听隐隐约约的喊声：“哎——大胡子将军回来啦。”这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哨兵和两个卫生兵跑了过来。

“军医，原来你还活着呀？”

“我们大家还以为你已经战死了呢。”

“活着回来太好了，太好了！”几个人七嘴八舌、高兴地跑过来迎接我。

被列上死亡名单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742高地上没吃没喝地打了三天三夜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是不会活着回来了。“大胡子将军”这个外号也不知道是谁给起的，可能是因为自开战以来就没有刮过胡子，再加上一副蓬头垢面的模样，所以卫生兵们才这么叫的吧？我心里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固守在河边的日军后卫部队，其手中所拿的就是著名的三八式步枪。



“军医呀，我们找不到你了，你上哪儿去了?”一卫生兵问。

“咳，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在一个战壕里就昏过去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

原来就在昏睡的这段时间里，50来人的卫生队伤亡了近一半，马车和装备也都丢失了，剩下的人一个个也是破衣烂衫，看上去就像一群要饭的一样。好歹把剩下的几个人集合起来，渡过工兵桥返回哈拉哈河右岸，重新集结到了河床上的临时急救所前。

秦医长迎了出来，脸上依旧是满脸的笑容：“辛苦啦!辛苦啦!”

刚想汇报一下自己在阵地上昏睡了10个小时的事，不料秦医长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用说了，都知道了，都知道了，能活着回来就好啊!”被秦医长这么一说，我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秦医长忙又说：“也别老站在那儿发愣了，快去处理伤员吧。”

我一看，几百名伤兵横七竖八地躺在河床的草地上，白色的绷带在暮色降临的幽暗中显得格外显眼，白灿灿的一大片，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这情景就像地狱图一样，一幅活生生的阿鼻地狱图!

4．潜入“敌后”

我马上开始处置伤员，可是刚刚处置了5名，就传来了秦医长紧急集合的命令。不知道又出现了什么情况，大家心里不由得又紧张起来。

原来，担架队在哈拉哈河左岸的蒙古高台上收容了一批伤员，上面有令叫卫生队夜间渡河去把这些伤员接回来。卫生队刚刚渡过哈拉哈河，气还没有喘过来就要再次渡河登上蒙古高台，到夜色茫茫的旷野上去收容伤员，这任务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弄不好的话，好歹才逃出来的一条小命也要搭进去。整个卫生队动摇起来，黑暗之中一下子沉默了，谁也不吱声。

秦医长好像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专门挑选那些没有登上蒙古高台的下级官兵去执行任务。可是这些下级官兵们却以不熟悉地形为由逃避任务，推来拖去就是不答应。漆黑而寂静的河床上飘荡着死尸的臭味儿，还有那些重伤员痛苦不堪的呻吟

声，不知为什么秦医长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遥远，那么虚无缥缈。

秦医长终于按捺不住怒吼起来，说话的声音也变了调儿："那么谁去?谁去?啊?"可是还是没有一个人吱声，一时间河床上鸦雀无声，寂静得令人不安。

突然，"秦医长，我去!"一声响亮的报名声打破了夜空，打破了这可怕的寂静。这一声肯定是我的"亡灵"喊的，因为声音不像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秦医长一听大喜，差一点抓着我的手蹦起来。

为什么要自告奋勇地报名，本人也是稀里糊涂地说不出个究竟，到今天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既不是为了什么天皇，也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利益，更不是出自什么"皇军士兵"的义务感和责任感。要是追究原因的话，这恐怕还是与自己天生的性格以及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不忍心看着秦医长骑虎难下；还有一个潜在动机，那就是作为医长竟然在激战中昏睡了10个小时之久，怠慢了自己的工作，一种立功赎罪的念头在驱动着自己。

我这一声之后，医务兵一班和担架兵二班也站了出来。可是下士的人选却迟迟定不下来，这人这么一个理由，那人那么一个借口，反正就是不想去。我终于忍不住了："愿去不愿去，都得给我去!"一怒之下来了个强行点名，从人群中挑出了一个愁眉苦脸的下士，那人的表情当时比死人也好不到哪儿去。

晚上11点来钟，收容队出发了。左岸的蒙古高台就像张开大嘴的狮子一样在等待着我们，巡逻的坦克不时吐着火龙。我们一伙人小心翼翼地跨过工兵桥到达了哈拉哈河左岸，然后沿着河边逆流而上，集合到了一个火焰喷射器照不到的地方。在这儿稍加休整之后，我手提军刀一马当先，士兵们刺刀上膛紧跟在后，朝着部队曾经驻扎过的方向而去。

苏军的BT－5快速坦克示意图。诺门罕前线的苏军曾广泛利用这种坦克进行夜袭和伏击，凭借无可比拟的速度优势，其可以进退自如。草平等人遭遇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坦克。



刚走了不大一会儿，突然"刺溜"、"刺溜"，荧光弹飞

向我们的四周，“怎么回事?”还没琢磨过来，头顶上就出现了一个大的荧光，垂直着飞落下来。“危险!”身后有人轻声喊，我马上就地卧倒。回头一看后面的士兵，他们的行动比我快得多，已经在我身后二十几米的地方趴在地上了。

一个士兵爬过来说，这一发是坦克曳光弹，最初打的是机枪曳光弹。曳光弹都向这儿打，这是为什么呢?莫非是收容队的行动被发现了?不会这么快吧?

后面的士兵慢慢爬过来，刺刀随着他们的身体晃动而一闪一闪的。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是刺刀被火焰一照，反射出来的一点亮光被苏蒙军发现了，所以才往这儿打曳光弹。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看来战场上真是来不得半点马虎。我当即轻声下令：“全员收起刺刀，压低身子前进。”

就这样走了一公里左右，总算到达了左岸河堤的陡坡附近。可是要在这一片杂草丛生的河堤上，并且是在苏蒙军的眼皮子底下寻找伤员，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一旦被发现了，就卫生队这几支破枪根本无法抵挡。

黑灯瞎火转悠了半天，可是连个伤员的影子也没发现。怎么办?大伙渐渐焦急起来，这么瞎转悠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可一时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咳！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束手无策之际我小声地半喊半唱起来:“茫茫黑夜哪是头啊，伤兵员又在哪里呀?”这一句还没有哼哼完，就听前面有人低声喊了一声：“谁?”

是日本人的声音，“老天保佑啊!”我喜出望外，跑了过去。原来平野队长率领的担架队已经把伤员送到这儿，全都隐蔽在河堤的斜坡上了。平野队长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就把伤员交给了我们。重伤员3人、轻伤员10人，一共13人。

把3名重伤员抬上担架，轻伤员徒步，收容队马上开始往回返。关于返回的路线，我突然闪出一个大胆的计划：不走原路而从这儿沿着河边涉水迂回到下游的渡河点。因为刚才来的路途太危险，再带着这么多伤员移动就更危险了；涉水迂回虽然路途难走，需多花费一些时间，但总比冒险送命要好得多。

跟士兵们一商量，大家都没有意见，于是就这么决定下来了。接受了来时的经验教训，军刀不出鞘，刺刀不上枪，沿着左岸的河堤轻手轻脚向下游移动。大约走了一里来路，在一个火焰完全照射不到的地方我命令停止前进，就在这儿下河。

在河滩上折了根有两米来长的树枝，拄着它我一个人先下水摸摸底儿。一下水我就像个孩子一样高兴起来，河水很浅，河底平坦，而且河水还是温乎乎的。从这儿顺水而下肯定能到达渡河点，并且这一带河堤很高，不容易被苏蒙军发现。这可真是天算不如人算，老天爷保佑啊。



浮桥被苏军切断后，西岸残存的日军只能趁夜色涉水逃回。(出自《太平洋战争·1937～1945》，每日新闻社)

于是我手持树枝在前面摸索着引路，担架兵抬着重伤员、卫生兵搀扶着轻伤员紧跟其后，踏着过膝深的河水一路顺水而下。偶尔有大鱼撞到树枝上，好像很吃惊的样子跃出河面打个挺匆匆逃走。据说蒙古人信奉喇嘛教，喇嘛教禁止杀生，当然也禁止捕捉河鱼，所以哈拉哈河的鱼个头很大，动作迟缓，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在这样一个平稳的撤退途中，我也好，士兵们也好，紧张的神经都放松了，忐忑不安的心情也多少平静了一些。

涉水前进一里来路，河床上出现了一个柳树茂密、杂草丛生的树林，在漆黑的夜晚看上去就像一座小山。“树林里会不会有苏蒙军的埋伏?”我一看到这个黑洞洞的树林，心里顿时起了疑问，刚刚平稳下来的心情又忐忑不安起来。怎么办?绕过去还是闯过去?绕过去时间来不及了，看来只有往前闯了，没准儿是一场虚惊。

我一边琢磨着一边慢慢往前走，可是刚刚靠近树林，突然“嘎嘎”、“嘎嘎”，“突——”、“突——”，树林里响起了引擎点火启动的轰鸣声，同时照明灯也一齐打开，顿时眼前光芒四射，晃得人睁不开眼，我们大吃一惊，急忙蹲下身，整个屁股都泡到了水里。

“完了！中埋伏了！”我大呼不妙，收容队在水里毫无藏身之地，逃也没处可逃，再加上还带着这么多轻重伤员，“怎么办?”我一时没了主意，只能蹲在水里一动也不敢动。

只见两辆苏军坦克从树林子里窜了出来，爬上堤岸飞奔而去，一转眼的工夫就不见了踪影。看着匆忙逃去的坦克，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两辆坦克看来是埋伏在这里的，至于埋伏在这里干什么就不知道了，大概听到有人涉水而来，他们以为是来袭击他们的，所以才仓皇而逃吧?就收容队这几支破枪，怎么可能去袭击坦克呢，真是天大的笑话。不管怎么说坦克被吓跑了，收容队也无一伤亡，大家禁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

坦克一去周围又是一片幽静和黑暗，寂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知苏蒙军是否还有埋伏，所以我手提军刀走在前面先行侦察。好在坦克没有再吐火，也用不着担心军刀反光什么的。查明不像还有埋伏的样子之后，收容队一伙才爬上河滩，弯着腰向集合地点狂奔而去。

刚走了百十来米，突然前方传来“唬——唬——”声和猛犬低吼的声音，我一听急忙跪倒在地，双手举起了军刀。这一来那狗反倒汪汪地狂叫着，朝这个方向冲了过来。心想糟了，这下逃也来不及逃了，举着军刀真想把那狗一刀劈死，可是双腿跪在地上使不上劲儿，想站起来又怕挨枪子儿。再说就是真的站起来，就我这两下恐怕也对付不了这个黑乎乎的大家伙，真是进退两难。

这时忽听一卫生兵小声对狗喊了一声，那狗马上就不吼也不叫了，一打听才知道是自己部队的一条军犬。这边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前边有人低声喊：“谁?”我一听是日本人的声音，无名火腾地一下就上来了，粗声粗气地答了一声：“我!”就见草丛中跳出几个黑影来，近前一看当头的是一个军医中尉，带着3名轻伤员也是去渡河点的。这个军



尸横遍野的日军。

医中尉官虽然比我官大，但岁数小，所以我一肚子的火就按捺不住了，朝着他就吼上了："干什么呀?弄条破狗想吓死我们呀?"火发出去了，气也就消了。两支队伍结伴一起向后撤退。



日军九二式70mm步兵炮。

这是日军主力联队一级才配属的重火力，但与苏军团属火炮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

快到渡河点时，忽听河床的草丛中有人喊："谁?"吓了我们一大跳，心想今晚是怎么了，老有人躲在路边一惊一乍地问，刚要回答，不料草丛里的人却探出脑袋苦苦哀求，"救救我吧"，仔细一看竟是刚才出发时点名挑出来的下士。

"原来是你呀，你藏在这儿干什么?啊?"我顿时就火了。

"我……我刚才，刚才遇到了坦克的袭击。"下士小声嘟囔着。

"混蛋!那坦克是被我们赶跑的!"

"我……那高台我实在是不敢去呀，带我回去吧。"下士哀求道。

"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了，要你也没有用了，快滚回去吧!"

冒险完成了任务，心头刚刚涌出了一点喜悦感和满足感，偏在这种时候碰到这样一个窝囊废，实在是令人丧气。我故意严加训斥，一是为了自我显示一下，二是为了给收容队打打气儿，提提精神。

迂回撤退计划很成功，收容队和伤员们都平安无事地撤退到工兵桥前。清点完人数，整理了一下队伍，很快渡过了工兵桥，顺利地返回到了哈拉哈河的右岸。我谢过守卫桥梁的工兵部队后，下令："向临时急救所快速前进!"一边走一边琢磨："秦医长该会怎么样来欢迎我们呢?"

可是，越往前走越觉得不对劲儿，没有人出来迎接不说，河床上连个人影也看不到。怎么回事?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顺着伤员的呻吟声很快就找到了临时急救所，可一查看，伤兵只剩下了150来人，并且大部分都成了冰凉的尸体了。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肯定是出了什么事，要不然不会扔下这么多伤员和尸体的。

"秦医长——秦医长——"我大声呼喊了几声，可是除了河

床上的回音外什么反应都没有。无奈只好把这些伤员先安顿在河滩上，发给他们一些压缩饼干填填肚子，让他们好好睡上一觉，等待明天和秦医长联系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我只得也和这些伤员、尸体一起在河滩上露营了，头枕黄沙面朝苍天，身边除了呻吟不止的伤员就是冰凉的尸体。

真是：头枕黄沙和衣眠，寒尸残骨伴身边。

5. 生死之分——红十字

“军医！军医！”

蒙眬之中，忽然觉得有人在摇晃着自己的肩膀一个劲地喊叫，我吃了一惊，腾地跳了起来，心想莫非睡过了头不成？

“军医，我们找到秦医长的急救站了！”一士兵急忙汇报道。

看了一下四周，河床上仍然是雾气腾腾黑洞洞的，可爬到河堤上一看就傻了眼，东方的天空已经开始放亮了，再不赶快撤退的话就要挨炮弹了！

卫生兵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五辆卡车，其中的两辆是卫生队的救护车。我马上下令：“把所有的伤员和尸体装上车，立即撤退！”可是要把这么多尸体、伤员一下子全部装上车，也实在费劲，尤其是尸体的搬运花费了很长时间。等全部装上车时，太阳已经跃出了地平线，河床上也铺满了淡淡的旭光。

缺少必要的装甲车辆，日军步兵靠两条腿根本追不上疾驶的坦克，步坦协同始终是日军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开始撤退！”第一辆车向河堤冲去，3 分钟后第二辆车也开始启动。可就在这时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河对岸苏军大炮突然开了火，炮弹在河堤上“轰”、“轰”地爆炸了。



我趴在河堤斜坡上抬头一看，坏了！第一辆车中弹了！卡车带着硝烟从河堤上打着滚翻落了下来。咳，好不容易才逃到这儿，眼看就要逃出虎口了，没想到却……我想哭，却哭不出来，全身禁不住一个劲地哆嗦。再看第二辆车，在炮火弹雨之中左冲右拐竟冒死冲了出去，看到这儿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面对苏军猛烈的炮火，有人建议第三辆车暂时不要开出去为好，

我一时也犹豫起来。“战场上犹豫不决是指挥官的大敌”，我一下子想起了《阵中要务令》中的这一条，于是便断然下令：“第三辆车，前进!”结果第三辆车刚刚爬上河堤就中弹了，也是冒着烟从斜坡上栽了下来。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脸憋得发紫，两眼气得血红，仿佛是一个急疯了的夜叉一样。自己亲自爬上第四辆车，像狂暴的魔鬼一样狂叫起来：“第四辆车，前进!前进!前进!”不是不怕死，我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可是作为一名指挥官，这个时候心里再怎么怕死，在士兵面前也要装出不怕死的样子。上了车我一下子想起了红十字标志，马上命令车上的卫生兵：“把所有的红十字标志，统统挂到卡车外面去!”

卡车像一匹撒了欢的野马一样，卷着沙土从河床上斜着向河堤冲去，我们都把头压得低低的，几乎都要贴着卡车上的地板了，心里充满了恐惧，是死是活听天由命了!不知道是不是红十字标志起了作用，对岸的大炮一下子哑了，第四辆卡车在一片寂静之中吼叫着冲上了河堤，安全地逃脱出来。看起来苏联兵很有道义感，也非常遵守国际红十字法的规定，要不然第四辆卡车是不可能逃出来的。可是趴在卡车上的人却觉得炮弹随时都有可能落到自己的头上，紧张得全身直打哆嗦。

我像个梦游病患者一样从卡车上跳下来，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河堤上，望着翻落下去的两辆卡车发起愣来。“这全都怪我呀，怪我考虑不周才造成这么悲惨的结局，这是我犯下的又一个重大过失呀!”嘴里这么嘟囔着，心里后悔得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刚才慌乱之中忘了给前三辆车挂上红十字标志才造成了这么大损失，这三辆车都是临时调来的，车上没有一个红十字标志。第四、第五辆车是卫生队的专用车，尽管平时没有注意到，但是车上却印有明显的红十字标志。和上次收容东搜索队尸体一样，一招不慎损失惨重，后悔得我揪心挖胆一般难受，直觉得自己罪过严重，对不起这两辆车上的伤兵们。明知对岸的苏蒙军居高临下，



一个全负荷的日军卫生兵。(出自《太平洋战争·1937～1945》，每日新闻社)

一天24小时都在监视着这边的行动，可是手忙脚乱之际还是忘记了这一点，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

越反省就越窝心，军医管抢救和治疗就行了，干吗连运输伤员的事都要管呢?留着专管运输的担架队长、担架班长干什么使呢?再说了，军医原本是没有指挥士兵的权力的，这一点在《阵中要务令》中写得明明白白。也就是说，我作为军医指挥士兵一事本身，严格说起来就是一种越权行为，没有指挥士兵的资格却偏偏要指挥，结果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越想越觉得窝囊，自己这不是扮演了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吗?

就在一个人呆若木鸡、胡思乱想之时，苏军的122毫米榴弹炮开了火，炮弹在眼前的河堤上“轰”、“轰”地炸开了。这一炸才把我从梦游中炸醒了，转过身撒腿就逃。炮弹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因为一直追着我的屁股打，一个人跑得再怎么快也跑不过炮弹呀，心想再这么跑下去的话肯定要一命呜呼了。好在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大草垛，我拼命地冲了过去，一头就钻到了大草垛下面。这个大草垛大概是炮兵部队的马饲料，堆得厚厚的，弹片打上去就像拳头打到棉花上一样。靠这个大草垛才好歹拣回了一条命。

在大草垛的下面正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时，哨兵带着一个卫生兵找来了，说秦医长正找我呢。虽说我心里还在惦记着滚下河堤的两辆卡车，但还是连滚带爬地跟卫生兵走了。

刚走出150米，就发现了一个日军的野炮阵地，炮兵们都蹲在战壕里严阵以待，炮口对准了左岸的蒙古高台方向。我们刚要通过时，不知是日军还是苏军的大炮先开了火，接着双方开始了炮击战，炮弹呼啸着在空中飞来飞去。“这可太危险啦。”我来不及打招呼了，一个鱼跃就跳进了炮兵的战壕里。日军每打出一发炮弹，竟能召来五六发炮弹的反击，炮击战日军更不沾光。

不知为什么一个炮兵爬出了战壕，就在这一瞬间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炮兵受了重伤。另一个炮兵从战壕的另一端爬出来打算去营救时，也中弹倒下了。两个重伤员很快被拖到战壕里，我给他们紧急包扎了一下，然后把他们放在便携式小帐篷上，几个人压低身子像拉雪橇一样慢慢把他们拖到了急救站。

“报告秦医长，草平现在归队!”我在秦医长面前笔直地站了起来。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啊！"秦医长高兴地拥抱起我，那张娃娃脸上笑得不能再笑了。看着秦医长如此高兴的样子，我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对一个完成任务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事了，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了。

左岸河床上的伤员和尸体，除翻落下去的两车以外，无一遗漏全部撤到了后方。连同在半道上带回来的两个炮兵重伤员，经紧急处置后也马上送到后方的野战医院去了。

[三] 【战史记录】

牛群冲进了羊群——正面战场上的苏日坦克决战

1939年7月3日上午，接到小松原师团成功越过哈拉哈河的消息后，安冈正臣马上命令手下的坦克部队，按计划分左、右两个方向对东岸苏军阵地展开进攻。

独立野炮第1联队的36门九〇式野炮实施了30分钟的压制性炮击后，担负主攻任务的第3坦克联队便率先出发了。35辆八九式中型坦克和27辆九四式重型装甲车争先恐后地冲出了掩体，第23师团的第64步兵联队(即山县联队)和工兵联队尾随其后，直奔东岸的巴尔夏嘎尔高地。由于苏军的装甲部队都调回西岸去狙击小松原师团了，苏军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后，便主动放弃了两道前沿警戒阵地。进展如此顺利，令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心花怒放，他命令各中队全速行驶，争取尽快拿下浮桥，与西岸的小松原部队会师。坦克一加速，伴随的步兵可受不了了，跟在坦克屁股后面吃了一上午沙土的山县连忙派人来联络（说来可笑，日军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联络当时是靠枪托猛敲装甲外壳。步坦如何协同和联络的问题，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始终没有解决好)，吉丸的答复是步兵能走多快就走多快，说完便关上舱盖绝尘而去。望着战车部队远去的滚滚尘烟，山县部队的步兵发泄了很多对吉丸母亲不恭敬的话。

日本九五式轻型坦克。由于日军的九二式装甲车火力弱，而八九式中型坦克机动性差，于是1933年日本军方决定研制一种新式轻型坦克，即九五式坦克。九五式坦克一共生产了1250辆，一直服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年代，九五式坦克尚算一种优秀的轻型坦克，它的致命弱点是防护差、火力弱。在诺门罕战斗中遭到苏军坦克的重创，侵华战争中，中国军队的火炮也能轻易击穿其装甲，太平洋战争中更遭惨败。



此刻，守在河东岸主阵地的是彼得罗夫少将的第36摩托化步兵师的两个团，半个多月来，在工兵帮助下已修

筑了一个纵深达3公里的防线，布设了7万枚地雷和十几道蛇腹铁丝网。而且彼得罗夫刚得到了一种新式装备——120毫米的重型迫击炮，其射程远、威力大，足可以与105毫米榴弹炮相媲美，在操作上却十分简单，人力就可以搬运。这种秘密武器第36师有12门，他一点儿也不担心日军的步兵冲锋（1939年一个苏军步兵师的标准配备是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76mm口径以上的火炮126门，火力远远超过日军一个师团）。但面对日军一个坦克师团的进攻，彼得罗夫还是有点紧张。

日军的炮火平息后，透过硝烟已隐隐可以望见远方驶来的日军坦克，彼得罗夫少将放下望远镜松了一口气，敌人的坦克装甲车加起来不过百辆，而且小得可笑，这点坦克还不足苏军两个坦克营的编制，大批的反坦克枪和反坦克手雷已经发给了一线连队，足以对付这些小坦克。

坦克越驶越近，苏军100多门50毫米、82毫米、120毫米迫击炮开火了，炮弹准确地落在了吉丸的战车群中，不过这种榴霰弹打击对坦克威胁不大，日军战车继续向前冲锋，很快便逼近了阵地前沿。（苏军大口径火炮此时正按朱可夫的命令，集中火力轰击西岸占领了巴音查山的小松原师团，彼得罗夫只能靠小口径轻型火炮来压制日军。）

戴着老式钢盔、持M1891型摩辛步枪的第149摩步团的士兵们。注意钢盔顶上的脊棱，这是苏军1936式钢盔的显著标志。

就在吉丸清武认为马上就要冲进苏军阵地大功告成时，遍布在阵地前沿上的蛇形钢丝网发挥了奇效。这些细细的钢丝卷成螺旋形，坦克履带只要压上去，钢丝便会很快缠住传动齿轮或履带，拽也拽不出，扽又扽不动，坦克只能原地打转。日军装甲兵只要一钻出坦克，便会遭到苏军迫击炮的密集杀伤。吉丸暗暗叫苦，这才明白苏军为什么用榴霰弹，他开始盼望山县联队和工兵联队赶快追上来，帮助他解脱困境。他一阵后怕，幸好面对的不是苏军45毫米反坦克炮阵地，否则这一辆辆嗡嗡原地打转的坦克会成为苏军绝好的活靶子。



山县部队赶到时，吉丸的坦克已被困了两个多小时，车身被打得伤痕累累，几辆装甲车已冒起了黑烟，噼噼啪啪地燃烧着。步兵刚靠近前沿，苏军的迫击炮弹便雨点般落了下来，进攻部队顿时人仰马翻，乱成了一团。上气不接下气跑

了一天，已疲惫不堪的日本步兵趴在地上再也冲不动了；工兵联队只能冒着横飞的弹片，开始帮助坦克清理钢丝。苏军一面猛烈炮击，一面组织特等射手射杀坦克周围的日军。烟尘中工兵一个个地倒了下去，吉丸见工兵伤亡惨重，且天近黄昏，只好命令部队撤回。第一天的进攻就这样草草收场了，苏军步兵

【历史点击】



苏军摩托化步兵团编装情况

苏联在大整肃后公布了最新的步兵团编装表，如果一切按照下表来编制的话，1939 年的苏军步兵团可谓当时全世界战斗力最强的步兵团。

1939 年红军步兵团编制

团部与团部连		装 备
团通信连		
团侦察连		
步兵营 × 3	营部连	
	步兵连 × 3	每连有冲锋枪 × 12，轻机枪 × 12，50mm 迫击炮 × 3
	机枪连	重机枪 × 12
	迫击炮连	82mm 迫击炮 × 4
	反坦克炮连	45mm 反坦克炮 × 2
团属步兵炮连		76mm 步兵炮 × 6
团属反坦克炮连		45mm 反坦克炮 × 6
团属迫击炮连		120mm 重迫击炮 × 4
团属防空连		双联装高射机枪 × 3，重机枪 × 6
团属战斗工兵连		火焰喷射器 × 12

相比之下，当时中国陆军一个团只有 4 门 82mm 迫击炮的支援火力，可以想像到苏军一个步兵团战斗力有多强。

虽然表上的红军步兵团编装完整、战斗力强大，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大肃反后人心惶惶，许多部队军官严重短缺，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夜，苏军在西部边境最好的一线主力部队编装也只达到了上表的 80%，齐装满员的师、团极少。

成功顶住了日军坦克群的进攻。

吃罢晚饭，第4坦克联队长玉田大佐来找安冈师团长，请求夜间向苏军阵地发起袭击。安冈正为白天进攻失利而犯愁，见玉田美郎要夜间连续作战，有些担心：第3联队的中型坦克都没能从苏军那儿占到便宜，玉田美郎手下主要是九五式轻型坦克，这种坦克的装甲最厚处不过1.2厘米，对付步兵还凑合，要是撞上苏军T—26坦克，可成了给人家送礼了。玉田坚持要去试一试，理由很简单：既然白天靠他们进攻不行，那么只有利用夜晚偷袭了，即使被苏军发现，也可借九五式坦克的速度优势趁夜色逃脱。（日本九五式轻坦克的最高时速可达44公里／小时，除苏军的BT快速坦克外，是当时世界各国装备的轻型坦克中机动性最好的一种。）安冈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第4联队出击，条件是不能恋战，速去速回。

图中右边的日军八九式中型坦克部队无奈地看着姗姗来迟的步兵，最左边的是一支日军骑兵部队，他们之间的协同经常出问题。

7月3日晚11点30分，准备完毕的第4坦克联队以密集的队形出发了。玉田美郎十分狡猾，他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绕了一个大圈迂回到了苏军阵地侧面，避开了第36摩步师布设的雷区和蛇形钢丝网。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所有坦克都闭灯前行，缺少无线电通讯设施的坦克车长们只好打开舱盖，探出头互相小声喊着保持队形（日军坦克没有车载通讯设施，只在联队长乘坐的指挥坦克上装有车载电台）。同时，为减少引擎噪声，玉田美郎规定各车时速控制在5公里左右，一辆接一辆在暗夜中缓慢潜行。没有信号灯和观通设备的日军，在夜间行驶变得越来越困难，坦克手们对苏军的位置、接敌路线、地形等都只有一个模糊概念，完全是在凭运气瞎闯。走了不到半个小时，草原上突然下起了雷阵雨，一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玉田大佐一阵狂喜，马上下令全速行驶。雨声和雷声掩盖住了发动机的轰鸣声，闪电则帮助日军看清了道路。等苏军哨兵听到动静时，一切都太晚了，几十辆日本坦克喷射



着火焰一拥而上冲进了苏军营地，值班机枪刚刚打出一排子弹便被坦克炮击毁了。



玉田坦克联队误打误撞碰上的是第36摩步师的重炮阵地，重炮团远在主阵地后方，松懈轻敌，根本没想到日军会夜袭，猝不及防的苏军士兵刚跑出帐篷便被机枪扫倒了，大炮被撞得东倒西歪，牵引卡车、弹药车、指挥车和帐篷纷纷被击中爆炸燃烧。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日军坦克便完全摧毁了这个炮兵阵地，苏军损失了一个122毫米榴弹炮营（18门火炮）、一个152毫米榴弹炮营（6门火炮）。日军第4联队第2中队长一藤喜久的座车被击毁放弃，一名随车军医阵亡，一名下士负伤，损失轻微。玉田美郎欣喜若狂，马上率部狂奔而退，等苏军的BT快速坦克到达时，阵地上只剩下一片狼藉和未散尽的硝烟。

八九式中型坦克1929年4月在大阪兵工厂出产。有甲、乙两型，甲型装汽油发动机，乙型为柴油发动机。

八九式中型坦克净重12.1吨，战斗全重13吨，乘员4人。主要武器为1门九〇式57mm火炮，辅助武器为2挺6.5mm九一式机枪。炮塔在车体右侧，有高射机枪座。铆接结构，材料为镍铬合金钢。最大行驶速度25km/h，最大行程170km。

八九式坦克参加了1938年的苏日哈桑湖冲突和1939年的诺门罕战争，在与苏军坦克的实战中被证明存在诸多缺陷，故很快被淘汰。（出自《太平洋战争·1937～1945》，每日新闻社）

苏军事后的战斗总结中有如下记载："7月3日夜晚，一股日军经过秘密集结，在几十辆坦克掩护下，向我东岸第36摩托化步兵师炮兵第2团发起了进攻。日军的这次进攻出乎我炮兵部队的预料，完全是一次无耻的偷袭。敌军突破了我军防御阵地，迫使红军后撤了2至3千米。战斗中，有10辆日本坦克被我军击伤，缴获1辆。次日晨，我军最终击溃了日军的疯狂进攻，收复了阵地。这次战斗暴露出我军指挥员麻痹轻敌、侧翼警戒松懈的问题。"事后，苏军亡羊补牢，向后方阵地加派了警卫部队，并在多处日军可能会利用的通道，设置了45毫米反坦克炮阵地。

从战术意义上看，这的确是一次成功的奇袭，这也是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诺门罕战争中惟一的一次胜利。日军这次袭击成为首次在夜间利用恶劣天气实施大规模坦克集群攻击的成功范例，后来被许多国家的军事院校列入战例教材。

7月4日，将小松原师团赶回河东岸之后，朱可夫将军腾出手来开始收拾安冈的坦克师团，第11坦克旅和第7装甲旅立即返回东岸，寻找战机以求决战。中午时分，一架苏军波-2双翼

侦察机发现了在巴尔夏嘎尔高地附近，日军坦克集团正在缓慢向西移动。雅可夫列夫少将马上带领第11坦克旅扑了过去，近百辆T—26、T—28、T—130坦克卷起的沙尘，久久浮在半空中；列索维伊少将的第7装甲旅负责在外围包抄，200多辆BA6、BA10装甲车发出震耳的轰鸣，一起冲出了隐蔽地。

安冈师团浑然不知，继续按计划从侧面向浮桥进攻，起伏的沙丘影响了观察视线，等前哨发现大批苏军坦克铺天盖地从沙丘上压下来时，双方的距离已不足1公里了。吉丸清武的第3坦克联队首当其冲，他只好硬起头皮迎了上去。

日军当时的坦克分类是10吨以下为轻型坦克，10吨以上为中型坦克，20吨以上为重型坦克。（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也没有研制成功一种像样的重型坦克，其装备最重的坦克不过是18.8吨的三式。但时间都到了1944年末，日本已是秋后的蚂蚱，再有什么先进的武器也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了。）吉丸的八九式中型坦克战斗全重为13吨，是当时日本火力最强、装甲最厚的一种型号，而苏军的T—28坦克全重为31吨，两者相比，如同一头犀牛对一只绵羊，苏军坦克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冲进了日军丑陋单薄的战车群中。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近600辆各型战车相互厮杀，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烟尘弥漫，苏军的T—28、T—26、T—130、BT—6、BT—7坦克和BA—6、BA—10装甲车等各型现役战车一应俱全，相互配合，扬长避短，简直要把诺门罕当成新武器实验场了，打得日军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

苏军仗着装甲厚重，火炮优良，左冲右突毫无顾忌；日军则只能躲躲闪闪，靠快速机动贴近苏军坦克后部，给予其致命一击。即使这样，没一会儿，安冈师团也顶不住了，一辆辆八九式坦克被击中后发生殉爆，炮塔被炸上了天；九四式重装甲车更不顶用，接二连三地被打成零件状态；吉丸清武的指挥坦克一上来就成了苏军集中攻击的目标（指挥坦克由于炮塔内空间有限，装上观测、通讯设施后已十分狭窄，故一般不加载火炮。西方的指挥坦克多装一根钢管冒充炮筒以起鱼目混珠的作用，日军当时则没有采取这种掩蔽措施），几辆T—28坦克死死咬住了他，76.2mm的坦克炮弹轻而易举地击穿了20mm厚的装甲，随着一声巨响，吉丸清武大佐连同他的指挥坦克一同人间蒸发了。

玉田美郎第4坦克联队的轻型坦克更不是苏军的对手，只

【历史点击】



二战时日本落后的坦克工业及战术

与西方列强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陆军坦克兵种，在诸多领域表现出明显的滞后。主要体现在坦克的质量、数量以及战略战术的运用上。

虽然日本拼命压缩日用商品的生产以扩大重工业的比重，但军需工业在列强中依然是“最脆弱和最不成熟的”。这是发展坦克兵器难以逾越的障碍。

战争爆发后，随着军工规模不断扩大，日本更是感到钢产量严重不足，“只好靠收集全国的废铁，甚而剥夺居民的一部分金属用具，拆除花园和私人领地上的铁栅栏，用木柱代替电车路牌的金属柱子”。但毕竟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日本贫弱的钢铁和汽车工业，注定了其坦克制造业难有大的作为。日本迟至1926年才开始自己试造坦克。1929年4月，大阪兵工厂研制成第2号战车，定名为八九式中战车。另两种主战坦克，即九五式轻战车和九七式中战车则分别列装于1935年和1939年。（日军二战时最好的九七式，还是停留在铆接车体、小口径47mm短炮的基础上，大体与苏联早期的T－26，德国的Ⅱ式，Ⅲ式坦克同一个级别。）期间，日本还先后研制了其他一些辅助战车和装甲车，水平同样不高。另外，日本的坦克制造企业95%属于民营，其余5%属军营，生产能力总体较低，30年代年产量不足百辆。考虑到战时坦克车辆的大量损坏，如此低产显然很难满足军方的需求。

日军的主战坦克实际上都是轻型的。它和欧美坦克综合比较中的主要技术弱点是：火炮口径小、装甲薄弱、吨位低、速度慢、行程短等。这在实战中直接导致了火力、防护力和持续力低下。此外，在悬挂装置、发电和传动装置、液压气动装置、机件坚牢度、无线电通讯、光学器材等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当时欧美军事界人士对日本坦克有这样一些评价：“日本的坦克是陈旧的，相当于20年





左图为日军的坦克，右图为我赴缅远征军缴获的日军轻型坦克，由此可以看出其有多“大”！这种和玩具一般的轻型小战车与苏、英、法、美等国装备的坦克相差了整整有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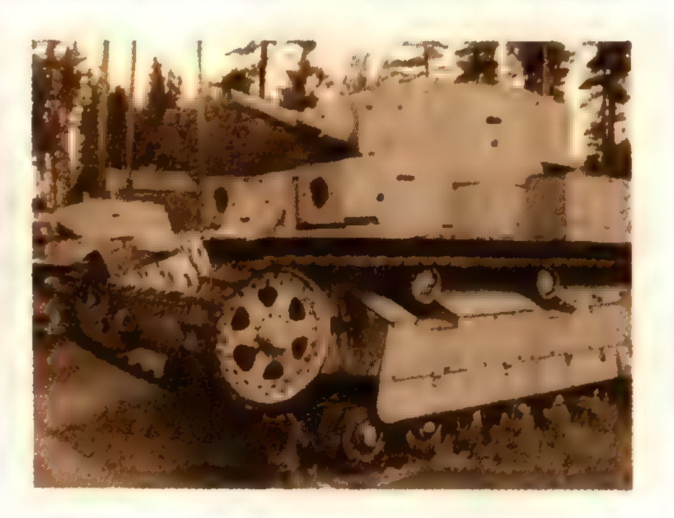
代初的欧式坦克”；“日本战车多数是小型的双座轻坦克，正如我们旧日大量应用的……”；“日本坦克的技术品质都很低劣，它没有冲击用的重坦克，也没有高速坦克……就欧洲的标准来说，是非常平凡的”。在总体性能上，日本坦克比苏、美、英、德各国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仅能与意大利为伍。

日本的“坦克工业只能生产出性能低劣且数量极少的坦克，不容否认的是，使用的战略及其他方面也是绝对的落后”。

由于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同弱敌交战，日军凭借稍好的物质装备和优良的单兵技术便能轻易取胜，从而产生骄傲情绪，自以为无敌于天下。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刺刀前进决定战争胜负”，然而，那些拼刺刀式的战争充其量不过相当于18、19世纪的战术水平。30年代，日本陆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出现了浓厚的唯意志论倾向，即过分夸大人的体力、精神力在战争中的作用，迷恋于用士兵的近身接战和白刃格斗战胜对手；同时漠视军事技术的更新和战备物资的保障，刻意贬低武器因素，试图以精神力量弥补物质不足，以拼命主义代替科学指导，甚至以“大和魂”万能来否定事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类似于“数量要用训练来抵挡，钢铁要用肉弹去碰撞”这样的妄语在日本陆军中比比皆是。

如果说日本对坦克兵种的时代潮流完全熟视无睹，那是不真实的，1918年“一战”刚结束，它就急急忙忙从欧洲购进了坦克。对西方的新事物，日本人向来乐于学习，但是，这一次却只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并未进行认真和结合实际的研究。军事当局有这样的观点：“欧美和日本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亚洲的战场未必适应坦克的大规模使用。”此外，既然耗费低廉、轻而易举的战争一直能换来巨大的侵略成果，那么似无必要在国家财力严重拮据的情况下，在坦克兵种上再花费巨额军费。

从1939年起，日本才开始有了较大编制的坦克部队。6月，在关东军内编组了第1战车师团，辖战车第3、第4、第5联队及其他辅助部队。这一时期，日军进行了一些集群使用坦克的尝试，但效果不佳，问题总是出在坦克低劣的性能上。在诺门罕战争中暴露出技术上的许多致命弱点，如：



芬兰战车博物馆中收藏的T-28（1938型）型坦克，从这张图可以看出苏式坦克的块头之大。

1．易受天气影响。遇连续降雨而平地积水时，100多辆坦克不得不连日寻找高地停放。

2．渡河技能差。大兴安岭林区河网纵横，且常降雨，致使河宽水深，由于工兵架桥和驾驶人员操作方面的问题，致使数辆坦克落水沉没。

3．发动机质量不尽如人意。道路泥泞，行驶困难，需要使用发动机加大转速来获得较大功率，造成发动机温度过高、故障频发等问题。

4．后勤保障不力。器材、弹药、油料随同困难，坦克常常要停下来等待供应，大大影响了前进速度。

二战后期日本又陆续成立了4个战车师团和9个独立战车旅团，但基本战术没有改变，仍十分呆板。（菲律宾战役期间，日军坦克第3旅团长重见伊三雄少将在美军的打击下屡战屡败，惊慌失措，竟然自作主张把坦克埋进土坑里作为固定炮台使用。结果被美军飞机非常"舒服"地一一炸毁，重见少将本人也在乘坐指挥车逃跑时被连车带人一炮打飞。这也算是二战史上一大笑料。）日军坦克部队后勤保障不善，以致"形似而神不似"，始终无法达到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突击力。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坦克兵种绝不可与列强同日而语。

（马军：《二战中日本坦克兵种的滞后》）

能依靠高速机动来躲避苏军的瞄准和射击，被追得狼奔豕突。有一些被苏军追上后，庞大的T-28根本不屑射击，索性将其撞翻直接压了过去；九五式焊接的钢板被撞得七零八落，往往像火柴盒一样被碾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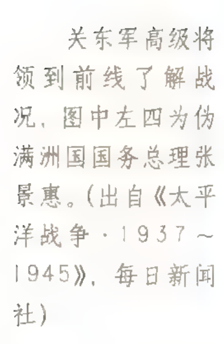
战至黄昏，安冈师团一半以上的坦克和所有的装甲车，都成了一堆堆冒着黑烟的钢铁垃圾。就在安冈正臣面临灭顶之灾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沙暴救了他，残余的日军坦克趁机拼命逃回了将军庙。事后，玉田美郎心有余悸地回忆道："（苏军）射击迅速而准确，弹药充分，几乎没有臭弹。敌人对草原地形作战研究充分，准备周密，先以重型战车冲乱我队形，轻型战车再对我单车进行围攻。"玉田美郎这样讲是有原因的，此战之后，由于补给跟不上，日军坦克部队燃料基本用完，每车平均仅剩5发炮弹，安冈坦克师团基本瘫痪了。

安冈坦克师团的溃败极大震动了东京大本营，刚刚成立半年的第1坦克师团是日本首个坦克师，担负着积累坦克战术经

验、检验战车性能的任务，如有闪失将使日本陆军大失颜面。再说坦克造价昂贵，日本的国力和资源状况都无法承受这种损失。美国政府刚刚宣布废除现行的日美商务条约，从欧美获取先进机械技术的路被堵死了。(虽然日本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方面在过去的85年间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步，但其冶金加工所依赖的工作母机和精密仪器，仍不得不从国外——主要是从美国——加以购买，以应付其正在迅速扩大的机械工业部门特别是军工部门的需要。)参谋本部坚决不同意关东军将如此"宝贵"的部队消耗在与苏作战初期，授意植田谦吉要确保战车部队的安全。有了东京的这道"圣旨"保护，安冈和他的部下总算是躲过了这场战争。此后第23师团的几次大规模进攻中，坦克只出动了一次，还是远远地跟在步兵后面；一见战局不妙，就早早地开回了将军庙。直熬到第二次诺门罕之战结束，安冈师团果真"吉星高照"，总算还留下了几辆坦克。

诺门罕战争结束后，日军纷纷反映自己的坦克在战场简直不堪一击，迫使日军兵工部门根据缴获的苏式坦克研制了一种新战车取代八九式，这就是二战期间日本著名的九七式中战车，绰号"奇哈"，这型坦克一直使用到战争结束，为日军装备最多的一种主力战车，但九七式也未从根本上改变日式战车装甲单薄、火力羸弱的情况，在太平洋战场上远不是美军M4A1"谢尔曼"坦克的对手。整体上看，日军坦克部队在二战期间既无战术也无技术可标榜。朱可夫将军战后向斯大林元帅这样评价日




关东军高级将领到前线了解战况，图中左四为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出自《太平洋战争·1937～1945》，每日新闻社)

军坦克："(他们)的坦克仅相当于我们早期的MC—1式(需要说明的是，朱可夫所说的MC—1型坦克是苏军20年代的早期装备)，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日军的基本战术动作也很呆板，进攻目标固定而且有限，死盯着迂回和侧击这一种办法，很容易被消灭。"



九七式"奇哈"中型坦克是日本在二战期间装备最多的一种主力坦克，由日本三菱公司于1937年制成，一直服役到1945年，共装备1500多辆。

九七式坦克战斗全重15.3吨，乘员4人，炮塔位于车体纵向中心偏右的位置，装有扶手栏杆，以便检阅及步兵搭乘，兼作无线电天线。主要武器为1门57mm短身管火炮，可发射榴弹和穿甲弹，辅助武器为2挺7.7mm机枪，车辆最大速度38公里／小时，车体和炮塔均为钢质装甲，采用落后的铆接结构，最大厚度仅25mm。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辆坦克即是这种坦克，常称为一百式坦克。1945年12月1日，正是凭着这种坦克成立了人民军队的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坦克大队。

(四) 休整了一周

1. 醉卧乌兹尔湖

当天傍晚，卫生队撤向乌兹尔湖，急救所也转移到了乌兹尔湖畔。到达乌兹尔湖时大约是下午4点来钟，太阳已经偏西了。虽然远处的炮声还阵阵传来，但是这边的风景却是相当迷人，美丽的乌兹尔湖在晚霞的映照下碧波粼粼，好一幅大自然的别致景观。可是不知为什么，在这个风景秀丽的环境里，反倒勾起了那些死里逃生的士兵们内心的忧伤。

我一个人站在湖边，茫然地凝视着湖面发起愣来。可是，看着看着不知什么时候湖面上映出了翻落下去的卡车的影子，垂死的伤员正在痛苦地挣扎、呼喊着救命……我禁不住战栗起来，急忙把头扭到一边去了。

顺着激烈的炮声向遥远的北方望去，火烧云像个燃烧的大火球一样把天空映得通红通红，火烧云的下面3架苏军的飞机正在低空飞行，飞机的下面就是721高地。我仿佛听到了低空扫射的声音，仿佛看到了高地的上空是烈火熊熊，地上是沙土乱舞，日军士兵们被烤得、被烧得、被压得越来越小，一个个

痛苦不堪地蜷缩在战壕里……

自诺门罕开战以来，我心里就始终有两个涂也涂不掉的懊悔：虽说都是自顾不暇的紧迫时刻，但先后两次都忘了给运送伤兵的卡车挂红十字标志。我现在所能够做的、所应该做的就是立功赎罪，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那些滚落下去的伤员、士兵中，有的与我在蒙古高台上一起患过难，有的与我夜间冒死渡河营救过伤员，所以我不能抛弃他们，不能把他们就那么扔在河床上不管！

就在垂头沉思之际，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秦医长。“想什么呢?是不是想家了?别想了，世间的事都忘了吧，自己明天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愁眉苦脸想这想那又有什么用呢?别想了，什么都不要想了。刚才我叫士兵为咱俩选了一个双人战壕的位置，快跟我来吧。”秦医长一边安慰我，一边拉起我就走。

我有些委曲：“秦医长，都这个时候了，草平哪里还有心思去儿女情长呀。说老实话，我是忘不了那两辆翻落下去的卡车，秦医长，今晚您派一台车和几个人给我，我去把他们的尸体拉回来!”秦医长哑然了，停了半天才慢慢开了口：“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军医是没有指挥权的。再说这事我也说了不算，必须经师团参谋长批准才行。我们是受命在这儿驻守，轻举妄动是不行的，假设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卫生队有其他任务，那你就成临阵逃脱了，要按逃兵来处理，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就不能感情用事，你说是不是呀?”

在多雨的季节，基本依靠骡马和大车补给的日军不免要陷入这种境地。



我低着头一言不发，对秦医长的说教只能是以泪相对。秦医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所谓的军队就是这么残酷无情!心底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反感情绪。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其实就那么回事，士兵不过是

战争中的一堆“炮灰”，当官的才不会关心这些人呢。军队是非常时期才招兵的，我们这些人也就傻乎乎地应召了，现在大家都是一个洞里的獾，彼此都很不幸，都面临着死亡的命运，他们不过先行了一步而已，只是个先后问题。也许不久就能相见了，到那时再向他们道歉吧。现在想这个考虑那个的，倒不如趁着天还没黑先把战壕挖好。

想到这儿就只好站起来，跟着秦医长去挖战壕了。战壕已经挖好了一半，我抓过一把铁铲像个疯子一样猛挖了起来，可眼泪还是控制不住，一边挖一边哭。

秦医长站在一旁，一边抽着他的“金鸡牌”香烟，一边就打趣起来：“喔，这不是挺带劲的吗?”

“这才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原本就不是块当兵的料!”我赌气回了一句。

战壕挖好了，刚爬上来喘了口气，秦医长在一边就嚷开了：“噢，挺漂亮的、挺漂亮的嘛。不过呢，两只公狐狸就这么钻进去，是不是少点什么呢?好了，下面就看我的喽。”说着就兴冲冲地跑开了。我一个人在周围溜溜达达散起步来，天色一黑下来气温也骤然下降，甚至觉得有点冷了。

“哎——，你在哪儿?快过来呀。”顺着秦医长的喊声走过去一看，秦医长得意洋洋地坐在刚挖好的战壕里，手里晃着一瓶“伏特加”酒，满脸都是笑。

“秦医长，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了，本人原本也不是当兵的料嘛。”他嘴里重复着我刚才的那句话，就是不说酒是从哪儿弄来的。

满载辎重的日军运输队。（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一闻到酒香，我喜笑颜开，一跃跳进了战壕，不料一下子踩到秦医长的脚上，痛得秦医长龇牙咧嘴："你小子，没长眼睛呢?"

"报告长官，草平奉命前来，一不小心踩了长官的贵脚!"我也嘻嘻哈哈开起玩笑，伸手就接过了酒瓶子。

优美的湖畔，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坐在战壕里喝着酒聊着天，两个人的心情真是好极了。你一口我一口，一瓶酒一会儿就下去了一大半。喝得快醉得也快，喝着喝着秦医长就歪倒在我身上，张开大嘴打起像闷雷一样的呼噜来了。把他推到一边，可一会儿他又歪倒在你身上。在这么小的战壕里也真是没有办法，推来推去我的眼也睁不开了，两个人你压我、我压你睡过去了。

在诺门罕，当时还没有雷达设备和缺乏高射武器的日军只有靠这种方法对空警戒，效果可想而知。仅凭旁边那挺普通的重机枪想击落苏军的飞机简直比中六合彩还难。

等再睁开眼的时候，曙光已经照到战壕的顶上了，使劲儿推开倒在我身上的秦医长后，我从战壕里爬了出来。两手向上一举，使劲伸了一个大懒腰，深深地吸了几口清晨的新鲜空气。大陆清晨的空气真是新鲜，深深吸上几口顿时觉得一阵清爽，脑子也清醒起来了。几天来呼吸的都是热乎乎的干燥空气，所以现在能呼吸到湖畔清凉、湿润的空气，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湖面平静如镜，一点风都没有，只有薄雾轻轻地笼罩在湖面上。不知是从哪里飞来了二十几只野鸭子，在湖面上优哉优哉地嬉耍起来。一个年轻而淘气的士兵端起步枪"啪"地打了一枪，不知是士兵的枪法太臭，还是鸭子的运气太好，这么近竟没有打中。鸭子呼啦一下子飞到空中，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忽忽悠悠又降落到湖面上。那个士兵举枪又要打时，被大家给制止住了。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微妙，在战场上杀人无数的士兵们，此时却不忍心杀掉眼前的这些小动物。

几个士兵在湖面淘起米来，开始准备早饭。十几天没有吃到大米饭了，一闻到大米饭的香味，心里都觉得热乎乎的。大

米饭上再加上几块罐头青花鱼，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几碗下肚，顿时浑身上下都有了力气。

只是这大米饭颜色不大对劲儿，有点发黄。仔细一看，原来米饭里掺杂着数不清的蚊子幼虫!不看还好，这一看就觉得胃里有些发痒，怪不得这米饭吃起来稍稍有点苦味，还有一点咸味。说老实话，尽管有些心理作用，但味道的确是不怎么样，再加上这些闪闪发亮的、跟珊瑚颜色一样的蚊子幼虫!虽不好吃，但我还是一连吃了好几碗。我一边不停地揉着胀鼓鼓的肚子，一边眺望起湖面来。秦医长也笑嘻嘻地走了过来，“喂，你觉得味道怎么样?”秦医长转过脸来问了一句，手也是在不停地揉着肚子。两个人都不愿意说出口罢了，其实都在阵阵恶心，胃里不是个滋味。

就在这时，一匹野马不知从哪儿跑了过来，走进湖里喝水，一阵大喝大饮之后，竟然翘起尾巴“哗——哗——”撒起尿来!这一下子胃里可就更难受了，那米饭的咸味儿恐怕还有这马尿的味道吧?

诺门罕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漠地带，松软的沙土上生长着茂密的杂草和稀稀拉拉的一些灌木，天和地之间只有一条地平线，地平线上偶尔可以看见几个沙丘，其中比较高一点的就数742高地、733高地和721高地了。士兵们每天接触的除了沙土还是沙土，住在土壕里，睡在沙土上，沙里滚土里爬。所以在这种地方与其叫他们“士兵”，倒不如叫他们“土兵”更合适。每天与沙土打交道，对沙土越来越觉得亲密起来，甚至对沙土抒发情感，向沙土忏悔自己的过去，仿佛已经魂归于土，恢复了人的天然本性一样。苦战死斗之中，眼看着周围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并且谁都不知道自己明天是死是活，在这样一种生死境地里产生出来的友情，才是浮世中难以得到的、真正的友情。在战场上，秦医长和草平之间也好，卫生兵与卫生兵之间也好，这种友情就成了惟一的精神支柱。

我就是这样每天住在沙土，睡在沙土，向沙土叙说自己的伤感，仿佛自己就是一把沙土一样，忘却了一切世俗烦恼，整个身心已经完全融于沙土中了。不分你、我、他，大家谁都有可能在这儿魂归于土，大家的命运就是这么悲惨。可越是这种时候就越发觉得自己身边的人是那么可亲、可爱，一到了这种生死关头，平时相互之间的隔阂也好，不快也好，怨恨也好，都

如同烟云一样消散而去。

上午10点来钟，北方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向北方望去，只见天空中硝烟蒙蒙，苏军的飞机来回地俯冲进行低空扫射，T－130喷火坦克喷射出来的青蓝色火焰隐约可见……

后来才知道，苏蒙军以五六倍的兵力包围了721高地，发起猛烈的攻击。镇守721高地的日军部队虽然伤亡惨重，但是阵地还是死守下来了。

2. 寂寥的卫生队

当天下午，告别了秦医长，我奉命率领卫生队转移到了伊林银查干湖畔。至于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这儿干什么，没有人来告诉我们。好像是临时的应急待命，所以卫生队在这儿也没有挖战壕，晚上大家就睡在露天地上。

查干湖里几乎没有湖水，只有湖的中央还残留着一小湾污黄的泥水，除此之外整个是白黄色的盐碱板。据说这查干湖因地势比较低洼，只有到了雨季才能有水，所以起名叫查干湖。湖里既没有生物游动，也没有植物的生长，就连蚊子的幼虫也找不到，整个就像死海一样，不，确切地说应该叫“死湖”才对。查干湖不但没有一丝生气，反而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恶臭味儿，就像尸体腐烂后散发出来的臭味儿一样，这味道直冲你的鼻子，刺激你的胃口，使你一点食欲都没有。

查干湖的周围是一片沙漠地带，星星点点的杂草也都干枯了，伴随着我们的只有干燥的空气和满嘴的沙子。乌兹尔湖里有水，有野鸭子，湖畔有野马，在那里士兵们的身心得到了滋润。可是到了这个查干湖，大家好像都随着湖水的干枯而干枯了一样，欢声没了，笑语也没了，温馨的交流也没了，剩下的只有荒凉和索然。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野菜，要是在这周围能找到一点野菜，那该多好啊！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到新鲜蔬菜了，再加上长时间的阿米巴痢疾的折腾，身体已经是处于一种极度的营养失调状态。

于是大家就在周围寻找起来，可是甭说野菜了，就连一点绿色都很难找到，到处是干枯的杂草和干枯了的诺门罕樱花，就连生命力极强的艾蒿也都干枯了。在查干湖湖畔驻扎的两天里，两条腿跑得酸疼酸疼的，也没有找到一棵野菜，只是白白

增添了身心的疲劳和喉咙的干渴。

一提到诺门罕樱花，人们可能会联想到粗大的樱花树上盛开的美丽樱花，可是诺门罕樱花并不是开在树上，它只是灌木丛里开出来的一种花形像君影草、颜色稍稍带有一点粉红色的小野花。没有人知道它的正式名称，“诺门罕樱花”这个名字是生了乡愁的士兵们给它起的一个爱称。茫茫的荒野之中，偶尔能看到这种小野花，它显得格外艳丽夺目。

下午4点来钟，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接着是惊天动地的榴弹炮弹的爆炸声，爆豆一般的枪声中再掺和进这炮弹的爆炸声，就如同交响乐大提琴的低音伴奏一样，令人一下子联想起贝多芬来。但这里演奏的是死亡交响曲。向北方望去，天空一片火红，使人觉得酷热难忍，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显然，721高地正受到苏蒙军的猛烈攻击，高地上的士兵们正在忍受着重炮灼热的煎烤。

随着夜幕的降临，浓浓的大雾笼罩了整个大地。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干燥灼热的沙漠地带竟然会有这么多的水分，今天的夜雾特别浓，来得也特别早。卫生兵们蹲在臭味飘荡的查干湖畔，谁也没有心思去说话聊天了。我安排好步哨后找了块草地也躺下了，心里觉得有说不出的寂寞。想跟旁边的卫生兵聊上两句吧，可是怎么也提不起情绪来，干脆闭上眼睡觉吧。

哈拉哈河左岸雾气腾腾的蒙古高台上，突然出现了黑服红襟、肩章闪亮、威风堂堂的苏军指挥官朱可夫大将，只见他用威严的目光盯着我们一伙：“你们完蛋了!”接着大家被赶到茫茫的沙漠之中，身穿黑色军服的苏军士兵端起枪来，“啪!啪……”

我一惊猛地坐了起来，看看四周才知道原来是做了一个噩梦，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寒冷之中禁不住打起哆嗦来。大地仍然被浓浓的大雾笼罩着，四周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抬头看看天空，东方已经出现了一点鱼肚白，大概有凌晨4点来钟了吧。

夜雾打湿了衣服，从脚一直湿到大腿根，冷冰冰的令人寒战不止。想换换衣服吧可又没的可换，原本就只有这么一身衣服；想从草地上爬起来坐一会儿吧，可又一想坐起来岂不是更冷?倒不如就这么躺着还好受一些，咬咬牙再忍耐一会儿吧。

早上5点来钟浓雾消散，又迎来一个清爽的拂晓。雾气一散，721高地方向又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卫生队的驻扎地虽



日本九七式陆战。

日本中岛制Ki-27战斗机，俗称九七式陆战，武器为7.7mm机枪2挺，执行轰炸任务时还能携带220公斤炸弹，1938年服役，是战争前期日本陆军装备的标准战斗机。诺门罕战争时也是关东军的主力机种。1943年后已不能和盟军战机匹敌，1944年后多改为自杀式飞机。

然距离721高地有6公里之多，可是爆炸的震动还是能传过来。大家都握紧拳头眺望着北方，谁都无能为力。

3．被击落的王牌

北方的枪炮声未止，天空上突然传来万雷咆哮一般的轰鸣声，抬头往上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令人毛骨悚然。几十架苏军战斗机铺天盖地而来，大地都一下子显得昏暗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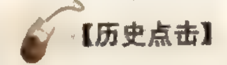
这可能是苏军的一种战场示威，一种精神搅乱战术?心里一边这么琢磨着，一边想再抬起头来往上看，可是我的脑袋就好像被谁给按住了一样，怎么抬也抬不起来。心里不由得责骂自己，真是没出息!骂归骂，可头还是不敢向上看。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缓过神来。

就在这时，低空出现了3架日军的战斗机，喷着白烟画着弧线直冲云霄，和苏军的战斗机展开了空中大战。3架日军战斗机利用一大片云彩做掩护，抓住时机频频向苏军飞机发起攻击，天空中不时传来“嗒嗒、嗒嗒”的扫射声和“嗵、嗵”的金属爆炸声，每次爆炸声之后总有飞机冒着黑烟退出战斗。日军的飞机虽然击中了多架苏联飞机，但很快也被击落了。

我趴在地上两眼直盯着上空，紧张得心都快要提到嗓子眼儿了。苏军战斗机好像一下子被打蒙了似的，立刻四下分散离开了。

我的心头逐渐涌出一种恐慌和不安。空战要是一对一的话，那么靠个人的技术还说得过去，可是苏军的战斗机是我们的数倍以上，就这么打下去的话，再怎么技术精湛恐怕也是无济于事的。不光是本次空战，在整个诺门罕之战中情况都是如此，并且这也是全体参战将士的亲身体验、亲身感受。一种难以形容的胆怯，说不出的空虚，就像一个影子一样一直围着我转。再想一想自己的明天，不觉胸口有些隐隐作痛起来。

下午4点来钟，伴随着西边传来的巨大轰鸣声，又有几十架苏军战斗机突然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几架日军的战斗机也不





【历史点击】

苏联空军的“双机攻击”队形

西班牙内战期间，苏、法、德、意等国都派出了大批先进的飞机参战，并在实战中摸索检验新战法。苏联红军在战斗中率先采用了“四机双组”的新空战队形，使仍保持第一次大战时陈旧的三机“V”字队形的西班牙叛军损失惨重。新队形是将四机编队，分为两组双机，互相配合，采取了“谁先看到，谁先攻击”的先进战术思想，首次允许僚机在位置相对有利时可以先于长机发起攻击，长机此时为其掩护，充当僚机的角色。这种四机指尖形空战队形当时十分先进，战术指导思想更富有攻击性和主动性。诺门罕空战中，苏联远东军也在西班牙内战老兵的带领下多次尝试了这种战术队形，先后击落了日本关东军航空兵王牌筱原弘道、安部克已（第15飞行大队长，死后追谥为少将）、原田文雄（第1飞行大队长）、竹尾等多人。

知道是从哪儿飞来的，贴着我们的头顶呼啸而过，然后一个急上升直冲云霄。一阵阵激烈的枪炮声之后，马上就有架飞机屁股后冒着黑烟栽了下来，和上次一样，先栽下来的还是苏军的战斗机。

就在这时，突然从云层里钻出两架苏军的战斗机，一齐扑向日军飞机。其中一架苏军的战斗机喷着火的同时，日军的一架战斗机就在我们头顶的空中爆炸分解，一个身影从飞机里甩了出来，直挺挺地从空中坠落而下。

地上的卫生兵们好像谁下了起跑令一样，一齐向身影落下的方向跑去。跑了没多远就听前方“扑通”一声巨响，好像是人的身体撞击到了地面上，一股尘烟“腾”地一声冲天而起。

发疯似的跑了300来米，卫生兵们都愕然地站住了，只见飞行员呈一个大字摔落在地，其状目不忍睹。可能是从高空急速落下的原因，整



苏军的伊-16战斗机

苏联第一种悬臂式下单翼、可收放起落架的战斗机。1935年7月开始生产，产量约1500架。当时伊-16型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战斗机，苏联共向中国空军提供了216架该型飞机，在抗日战争初期发挥了很大作用。绝大部分伊-16都可以在机翼下携带4～6枚火箭弹。

但是，伊-16始终存在操纵困难的缺点，在急跃升时容易陷入螺旋状态

被击毁的飞机。



个身体都是肿胖胖的，面部又紫又黑。我赶紧检查了一下他的脉搏、心音、瞳孔，可是所有的生命迹象都已经没有了，人早就断气了。有人建议一定要给飞行员进行厚葬，我觉得也有道理，忙对周围的人说："大家分头去找，一定要找棵诺门罕樱花回来。"

不一会儿，一个卫生兵高举一棵干枯了的诺门罕樱花跑了过来："军医，找到了一棵!"听到这喊声，我松了一口气，停下了脚步。就在低头往下一看的时候，不由得惊叫起来，脚底下居然出现了三棵干瘦的蓼菜!"这可真是老天保佑啊！"我一边小声念叨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把蓼菜连根挖了出来，紧紧地揣到怀里。

诺门罕樱花献给了飞行员，大家双手合掌默默地为他祈祷，举行了简单的战场告别仪式。仪式结束以后，大家为怎么才能把尸体运送到后方一事而犯了愁，因为第一这儿距离野战医院较远，第二手里又没有运输卡车。

大家正犯愁的时候，只见一辆卡车卷着滚滚沙尘飞奔而来，一个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让我们来运送吧。"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大概是也看到了刚才那场空中惨剧，所以才赶过来的吧。这时大家才知道阵亡的飞行员竟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关东军航空兵王牌——筱原准尉!大伙七手八脚把筱原准尉的尸体抬上卡车，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目送着卡车在滚滚的沙尘中消失而去。

记得小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神武天皇[①]总是背朝阳光，利用弓箭讨伐敌军。尽管这只是个故事，但是我却对这个故事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分析。太古时代的原始战斗，胜败与否和天时地利有很大关系，所以神武天皇的箭法尽管是出类拔萃、百发百中，但在原始森林里还是采取了背朝阳光、利用山岳地带与敌军进行交战的战术。而敌军却不知道这一点，总是迎着阳光猛冲猛打，大树间投射进来的耀眼光芒往往使他们眼花缭乱，看不清楚前方的情况，所以他们总是打败仗。我后来有幸去了一趟故事中所描写的“箱根关所”这个地方，迎着大树间射出来的阳光，才真正领悟到了敌军为什么总也打不了胜仗的原因所在。



诺门罕战争时，苏军一些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飞行员用伊-16战斗机击落了大量关东军王牌

另外，日本有名的剑圣——宫本武藏，在严流岛上与另一剑道高手——佐佐木小次郎的决斗中，也是靠背朝阳光、背朝海水的反射光而战胜了佐佐木的。

今天这两次苏军对日军的空战，第一次空战是早晨5点来钟，日军是背朝阳光而战，所以才侥幸取胜的。而第二次空战呢，是下午4点来钟，苏军可能总结了第一次空战的教训，所以这次他们来了个背光作战，而日军就只能迎光而上了，从战略战术上讲苏军占了上风，日军处于下风，所以号称“关东军第一机”的筱原准尉才魂散蓝天的。后悔也罢，痛惜也罢，都已经是马后炮了，“关东军第一机”也是人，身上也免不了带有一些凡夫俗子的愚昧。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这也许是对他过于骄狂的一种惩罚吧。

我患阿米巴痢疾已经一个多月了，身体长期处于营养失调的状态，并且一个多月来几乎每天都是干面包和鱼罐头，所以一闻到罐头的气味儿都觉得恶心，想吃的东西就是新鲜的蔬菜，想的甚至有些抠心挖胆之感。托筱原准尉亡灵的福，好歹

【历史点击】



筱原弘道

他是关东军第2飞行集团第12飞行联队空军准尉，日军王牌飞行员。此人空战经验极为丰富，驾驶技术熟练刁钻，每次空战都有战果，成为关东军航空兵的精神支柱。他曾在一次空战中孤机深入，先后击落5架苏军飞机，安全返回。日军宣称，其一生曾击落敌机58架。筱原被苏空军击落后，关东军航空兵的士气从此一蹶不振，接连又有几名所谓“王牌”毙命。日本陆军航空兵承认，诺门罕战争中的飞行员损失，是事后绝对无法弥补的。

①神武天皇：公元2世纪的第一代天皇，以竭力推进日本全国统一而闻名。

发现了三棵野蓼菜，美得心里就像开了花一样。野菜的味道是那么的鲜美可口，我甚至觉得那是自己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东西。三棵野菜一下肚，顿时觉得浑身上下有了力气，食欲也上来了，生命就像又复苏了一样。

(就在草平百无聊赖大发感慨的时候，第23师团作战部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垂死的反扑，企图夺取苏军在哈拉哈河东岸的阵地……)

4. 【战史记录】

第23师团的疯狂反扑——夜袭

小松原师团和安冈坦克师团的接连失利，让关东军总部一筹莫展。通过对西岸巴音查山和东岸巴尔夏嘎尔高地两次典型战斗的分析，一些日军前线指挥官终于从骄狂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认识到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与装备精良的苏联红军正面作战，双方实力差距有多大。他们纷纷建议，今后应尽量减少白昼大规模交战，在重型火炮和新型坦克抵达前线之前，下一步应主要利用恶劣天气或夜晚进攻，发挥出日军步兵部队众多和擅长夜战、近战、拼刺肉搏的优势。小松原认为这些建议有道理，同

【历史点击】



日军的“夜袭”战术

日俄战争中，在辽阳会战时，日军第7师团曾利用夜晚悄悄爬上了弓张岭高地，一举击溃了俄军一个师的防守，使这个反复攻击了数日、伤亡几千人也没拿下的高地轻易到手。这是日军师团规模第一次成功的夜袭，从此利用夜暗实施近战、夜战成为日军惯用的战法。在日军的《作战要务令》中，突出了利用夜暗接近敌人、以小部队夜袭敌人的必要性。实战中日军夜袭时主要靠步兵用刺刀和军刀进行白刃格斗，联队以下夜袭时很少实施火力准备，以求达到突然性。另外夜袭部队与炮兵之间无法协调也是一般不予以火力支援的主要原因。诺门罕战争后期，苏军普遍装备的自动火器曾给予夜袭日军以沉重打击，使日军的多次夜袭都无功而返。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对美军也多次采取了夜袭，刚开始美军很不习惯，后来美军改变了对策，广泛使用了照明弹等措施，并利用密集的前沿火力逐步扼制住了日军的夜袭攻势。

安冈交换下一步作战方案时，提出了先用步兵夜袭或歼灭东岸苏军一部，或夺取部分阵地，以求稳扎稳打的设想。安冈的坦克部队缺油少弹，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惟一还保存点战斗力的玉田第4坦克联队，7月6日清晨突遭苏军第11坦克旅6辆坦克的袭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幸亏山县联队救援及时才得以逃脱，这一下又损失了中型坦克6辆、轻型坦克5辆。第4联队彻底丧失了战斗能力。此时，安冈手中已无可战之兵，对小松原的步兵夜袭计划只有赞同，也提不出什么异议。

方案上报到关东军总部，参谋长矢野也感到目前这种状况下别无良策，即批准了夜袭计划，为此关东军从驻海拉尔的第8国境守备队(旅团)抽调出2000多名经验丰富的老兵，补充到第23师团冲抵渡河作战中的减员，几十门崭新的速射炮和上百挺重机枪也陆续运抵前线。第23师团和第7师团各步兵大队都接到了夜袭命令，纷纷组织工兵分队和“肉弹突击”队进行模拟训练，一时间，诺门罕前线的日军各部队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7月7日夜，天空下起了淅淅小雨，夜色漆黑，日军展开了第一轮夜袭，各联队悄悄向指定位置潜行。苏军一支装甲侦察分队意外地与第23师团第72联队遭遇，西岸苏军152mm重炮群在侦察兵导引下，马上对日军步兵集结区域进行了暴风骤雨般的轰击。日军无处可躲伤亡巨大，中队长以上的军官阵亡了一多半，进攻是不可能了，酒井带着残部光收尸就忙活了一夜。第7师团更是出师不利，第26联队还未走多远，就被一支执行“进攻防御”任务的苏军坦克营给缠住了，双方你来我往打了半天，待须见大佐摆好阵势，苏军的坦克营早撤走了，这时天近黎明，夜袭只好作罢。

第二次诺门罕之战时，日军一个重机枪小组正火力掩护步兵班利用黄昏向前小心翼翼地攻击。在苏军强大的火力打击下，夜袭或利用恶劣天气偷袭成了日军后来惟一的战法。



其他联队还算顺利，按时到达了潜伏地点。晚10时，日军集中2个野炮联队70余门75mm野炮对



日军在发起"猪突攻击"。在自动火器的打击下，如此密集的冲锋队形，无异于一场冒险的自杀。

苏军一线阵地进行了30分钟的火力急袭，随后各路日军同时发起了进攻。第24工兵联队照例是冲在最前面清障排雷，被苏军的机枪和迫击炮打死打伤不计其数，联队长川村也在排雷时被诡雷炸死。障碍扫清后，日军各"肉弹突击"队和新调来的火焰喷射器小队迅速扑向苏军各火力点，黑夜中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缺乏夜战训练的苏军步兵连队顿时慌了，经验不足的一线指挥官忙乱之中竟下达了放弃阵地的命令，防线立刻垮了。日军趁势夺取了苏军一线阵地，夜袭成功的信号弹先后在几处高地上空升起，小松原和安冈放下望远镜，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夜袭成功"的"捷报"立刻上报给了关东军总部。

天刚亮，苏军就展开了猛烈的反击，一排排烟幕弹落在了日军刚占领的阵地中央，四处弥漫的烟雾呛得日本兵涕泪满面，整个前沿形成了一片浓厚的烟雾云，什么也看不清楚。苏军的BT快速坦克群趁机高速冲进了日军速射炮阵地，连打带压，将日军辛辛苦苦忙了大半夜才拖上来的反坦克炮撞了个七零八落，苏军第5机枪旅也一拥而上把日军全部赶出了阵地。日本兵被苏军坦克撵着屁股一直打回了出发阵地，苏联的轰炸机群同时把一堆堆炸弹扔到了第23师团各联队的头顶上，一路上关东军是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小松原师团白忙活了一夜，除了遗尸上千之外，什么也没捞到。



苏制120mm迫击炮。

7月8日晚，夜空又下起了小

雨，第23师团由于前夜受创严重，还未恢复过来。第二次夜袭就由第7师团担纲(第26联队和第28联队梶川加强大队共6000余人)。出发不久，小雨变大雨，大雨成暴雨，不一会儿地上积水过膝，泥泞不堪，日本步兵一步三滑，跌跌撞撞地向前摸索行进了半夜，在途中又迷了路。第26联队的曹长谷原回忆："雨水之大是一生从未见过的，虽然出发前都穿了雨衣，但不到一分钟就从上到下全湿透了，背包、皮鞋全灌满了水，沉得根本迈不动腿。大伙冻得嘴唇发紫，后来，雨水打到脸上眼睛都睁不开了，只好闭着眼睛一个拉着一个向前挪。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想这会不会是神不满意我们这些人，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呀。"下半夜雨逐渐停了，第7师团才好不容易靠近了苏军第149摩步团阵地。可是苏军白天早悄悄地在前沿布设了一种新型阻拦步兵的钢丝网，这种细弦一般的刺网贴近地面10公分左右，直行绊脚，伏行挂肩，苏军昵称之为"琴弦"。几千名日军很快便被"琴弦"给缠住了，第149团发现有夜袭之敌，立刻呼叫炮火来袭。第149团团属炮兵连早将前沿每块区域编好了号，测定好了射击单元，接到通报后按测好的数据一通猛打，进退两难的日军在炮火打击下叫苦不迭，最后丢下大片尸体逃了回去。



日军九〇式75mm野炮初期型。1932生产的这种炮虽然射程很远(可达13.8公里)，但并不受部队的欢迎。日军主要是嫌这种炮比其他的75mm野炮重，这对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日军来说是个极重的负担。太平洋战争后期九〇式野炮经常被当作反坦克炮使用，用来攻击美军的M4中型坦克。后期生产出的这种装橡胶轮胎的野炮，日军称为机动式，意味着便于小型机动车牵引。上图大铁轮的为初期型，一般由马匹牵引。

夜袭屡屡失手，令小松原恼羞成怒，他决定孤注一掷，集中诺门罕战区所有的日军部队，再次发起集团冲锋，以兵力优势冲垮苏军防线。出发前各联队的主官都搭乘第2飞行集团专门派来的几架运输机侦察了一番地形和进攻路线，师团部还为进攻部队配属了通讯分队，规定了相互联络的信号，并命令炮兵联队将射程较近的克式山炮(这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产物，最大射程不足10公里)尽量向前移动，以伴随步兵冲锋提供火力支援。

7月9日夜10时，日军开始集中所有炮火进行弹幕射击。随着炮火的逐步延伸，近2万名日本步兵一起冲出了掩体，端着刺刀呐喊着发起了集团冲锋。一时间日军歇斯底里地叫喊声响

彻了整个诺门罕夜空，令人毛骨悚然。

朱可夫通过前几次夜间战斗，初步摸清了日军的夜袭规律和战术特点，为解决苏军不习惯夜战的弱点，他一方面向前线部队配发了大量的曳光弹和照明弹，并向各炮兵团、营提供了两个基数的燃烧弹；另一方面又从防空部队中抽调出12部探照灯车秘密开赴前沿，还紧急为坦克、装甲车换装了大功率远射车灯，准备把日军进攻时的黑夜变成白昼。

当日军冲锋到苏军阵地前沿时，苏军突然打开了所有灯光，几千发照明弹也先后升空，几平方公里内一片光明，燃烧弹、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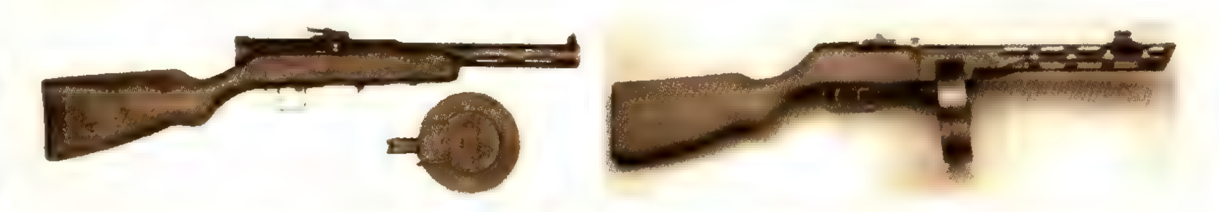
【历史点击】



日苏两军二战时对冲锋枪的不同认识

日本直到战争后期才有一支海军陆战队装备了百式冲锋枪，还是实验性质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不适合装备冲锋枪，所以一直没有将冲锋枪列为步兵标准武器。其原因有二：（1）日军战术思想严重落后，认为还是步枪打得准，宁可保证步枪和弹药的质量（其实连这个也没有做到），也不浪费资源造冲锋枪（冲锋枪对弹药的需求量远远超过步枪，但不及步枪准）。（2）日本工业生产力有限，无法大量地制造冲锋枪和弹药。

苏军正好相反，苏军二战时的冲锋枪产量最高，使用最广泛，前线的步兵几乎都放弃了步枪而改用冲锋枪。原因也很简单：苏军作战经常靠人和武器数量上的优势取胜，需要不断地用新兵补充战场损失。新兵接受训练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反复练习枪法。因此，冲锋枪要比步枪更适合苏联的战术。



苏制PPSH38冲锋枪。PPSH是一种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卓越的武器。与德国的MP40冲锋枪相比，它显得相当平凡，但比MP40更加可靠，有更高的射速，能装两倍于MP40的弹药，发射更大威力的枪弹，被称为二战时期最好的冲锋枪。它包括一个冲压和焊接的枪管护管、机匣安装在木枪托上，非常适于战争时期简单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射击时，其射击效果类似于M1卡宾枪，抛壳非常有力，而且可以很快进入射击状态，几乎不后坐，枪口不跳起，连续发射几百发枪弹几乎不出故障。1938年，苏军仅生产了8000余支该冲锋枪的早期型PPSH38，基本都用于远东地区的红军部队测试。战斗中发现弹鼓易吃土、供弹口部位易变形等问题。1942年初，继苏军反复测试改进后，PPSH41冲锋枪开始大量生产（如右图）。朝鲜战争时我军曾部分装备过其后期改进型。

光弹像节日的焰火一样四处开花。上万名突然暴露在强光下的日军一下子惊呆了，傻傻地愣在了原地，半天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苏军前沿的所有武器一同开了火，成片成片的日军士兵被打倒。双方的冲击与反冲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士兵的尸体漫山遍野都是。打到最激烈时，苏军的师长、团长们都赤膊上阵，带头与敌展开肉搏。日军不顾死活像发疯一般向前猛冲，就在第149团感到快要顶不住的时候，战前刚刚配发的波波沙（PPSH）早期型冲锋枪在近战中发挥了作用（由于主要是用于战场实验，当时只配发到第149团班长一级）。拉开架子准备拼刺的日本兵被这种弹鼓装有71发子弹的冲锋枪打得血肉横飞，一些活下来的日军士兵以后一提及这种武器便心惊胆战。日军实在承受不住这种打击溃退下去，第149团顶住了第一次攻击。

午夜时分，日军的伴随火炮运了上来，小松原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先击灭苏军的灯光。克式山炮开始抵近射击，苏军的探照灯车被一一击毁，四处横飞的弹片也将装在坦克上的车灯大部击碎，光线顿时暗了下来。由于两方几乎胶合在一起，远在西岸的苏军重炮部队怕误伤友军不敢开炮，急得干瞪眼；而日本炮兵则越打越猛，最后索性赤膊上阵，将一发发炮弹不停地填进发烫的炮管中……

多年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使日军官兵普遍有一种亡命徒似的作风。在日军指挥官的带领下，日军各联队接着发起了第二次集团冲锋。苏军的照明弹已消耗殆尽，黑暗中第149团的盲目射击根本压制不住日军走火入魔般的进攻，半夜1时左右，前沿阵地被突破，大批日军涌入防线，第149团团长列米佐夫少校率队反突击时牺牲。(为纪念这位勇敢的团长，后来苏军将此处阵地命名为列米佐夫山冈，并于8月29日在此歼灭了最后一股抵抗的日军。)失去指挥的第149团被迫放弃了一线阵地向纵深撤退，两侧其他几个高地的守军也按预定计划一起撤了下来。

天亮以后，小松原发觉刚占领的这几个高地成了第23师团的“鸡肋”。苏军密集的炮火将每个阵地都



苏式探照灯车。

苏军在卫国战争时，也曾多次利用声光效果震撼敌军，取得过较好战果。这是1953年中国军队装备的苏式探照灯车。



【历史点击】

日军的“猪突攻击”自杀式冲锋

“猪突”，即像野猪一样勇往直前地冲锋。日军历来强调进攻，机械地认为进攻是惟一的手段，其《作战要务令》中要求各部队必须将进攻意志彻底“信念化”，即使相差悬殊，也要果断发起冲锋。到侵华战争时，这一理论发展到顶峰。

物质匮乏是日本的先天不足，日军从日俄战争中得出的经验是：勇敢的精神和娴熟的拼刺完全可以战胜强敌。对部队片面地强调精神教育，“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面对弱小且缺乏训练的中国军队，日军这种亡命徒式的冲锋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就更助长了日军“进攻至上”的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使其越发轻视物质的作用和威力。

当日本的国策把苏、美等强国悄悄列为假想敌后，日军认为，高强度的训练、为国捐躯的精神和勇敢无畏的进攻足以弥补装备和物质上的不足。

片面地强调集团冲锋、猪突进攻，轻视防御作战思想和理论的研究，以及对防御作战缺乏精神上、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在诺门罕战争中和太平洋战争后期，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日军的全面溃败。如：1943年5月11日，美军一个陆战师在浓雾掩蔽和几艘战舰的火力支援下，在北太平洋的阿图岛登陆，经过反复激战，守岛日军大部被歼，剩余2000多人退入群山中，美军为此大伤脑筋，因为清剿残兵不但耗时费力，伤亡也大。谁知，日军竟在次日清晨发起了一次自杀式冲锋，除26人被俘外，其余皆被打死在美军阵地前，让美军指挥官长舒了一口气。对一个猝不及防、病弱无力的人来说，野猪狂冲过来的确很危险；但对于一群弯弓搭箭的猎户来说，冲过来的野猪正好是盘中餐。

严密地封锁住了，日军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各步、炮大队只能蹲在战壕里一动不敢动，每天光为了送水送饭就要伤亡多人。守下去代价颇大，要放弃两万多官兵血战多日才得到的这些阵地，脸面上又说不过去，再说关东军总部也绝不会同意。此时，小松原隐隐感觉好像是中了朱可夫的“请君入瓮”计，这样消耗下去，第23师团会逐渐油枯灯灭。

据战后统计，关东军这三次连续大规模夜袭作战，共伤亡5000多人，队属火炮损失了1/2左右；苏军阵亡263人，防线后缩2公里～3公里。谁都看得出，关东军得不偿失。观战的德国武官目睹了日军这些疯狂的举动后，瞠目结舌，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称日军的战术水平至多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第四章 肉弹没顶住炮弹



第四章　肉弹没顶住炮弹

——第三次诺门罕之战

【相关背景】

第二次诺门罕之战打响不到半个月，关东军损兵折将已高达万人，坦克、装甲车、飞机、野战炮等技术兵器损毁过半，前线弹药也已告罄，再硬撑下去后果不堪设想。7月12日，关东军司令部下令诺门罕前线部队立即停止进攻，转入战场休整。小松原只好悻悻地带着余部退了回来，疲惫不堪的部队开始沮丧地在划定的防区挖壕筑垒。

两天后，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和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匆匆赶到了诺门罕战区，与随军作战的关东军司令部战地观察组(副参谋长矢野少将和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会合，对前一阶段日军的作战进行了总结，结论是：

一、据统计，日军60%的伤亡为苏军炮火杀伤，前线现有的野战炮兵联队火炮口径和射程都不足以与苏军炮群对抗，有必要动用关东军远程重炮部队参战。

二、苏军的坦克部队始终是日军进攻中的一大障碍，在日军坦克装备没有明显改进之前，安冈坦克师团不宜再战，以免造价昂贵的战车白白损耗掉。(还有一个理由矶谷不好明说，利用士兵组成“肉弹”攻击坦克既简单又便宜，还能体现出日军的“勇敢”，即使伤亡大一些，也不会像坦克损失以后产生那么大的震动。)

三、参战部队减员太大，已无法再战，应从其他师团抽调有作战经验的部队补充。

四、小松原中将这一时期的指挥没有错误，应继续予以支持和鼓励。

小松原对矶谷一行的结论感激涕零，这说明关东军总部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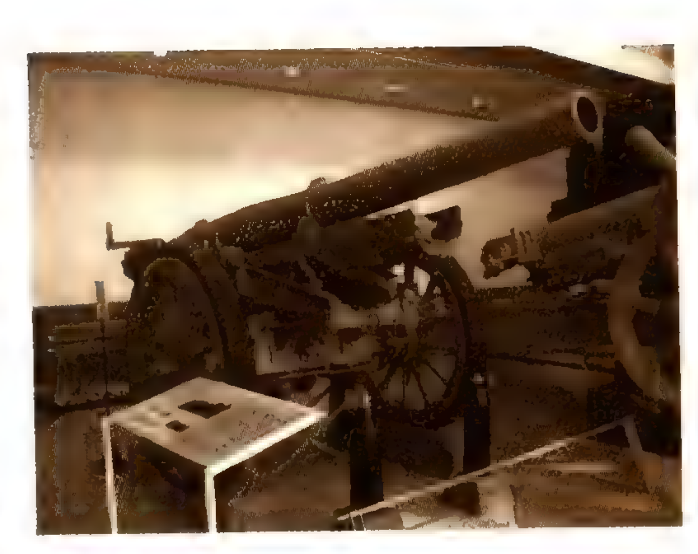
没有因为进攻失利而迁怒于他，他有了再报一箭之仇的机会。植田谦吉认可了矶谷等人的看法，同意重整人马再战一场，以挽回关东军的面子。

从7月15日起，关东军驻满洲各地的炮兵联队纷纷忙碌起来，九八式重型履带牵引车吭吭哧哧地将一门门炮管硕长的加农炮从洞库中拖拽出来（日军100mm的九二式加农炮是当时惟一一种射程可以与苏式重炮相媲美的火炮，其射程达17.5公里，虽比不上苏式150mm重炮30公里的射程，但比苏式107mm九二式加农炮射程远700米），关东军这次几乎用上了全部家底。驻旅顺的第3重炮旅团、穆陵重炮联队、野战重炮第1联队、独立重炮第7联队先后接到命令赶赴诺门罕，由于日本天皇的女婿盛厚正好在独立第7重炮联队服役"镀金"，关东军宣传部门还专门将皇族殿下亲临前线的消息大肆渲染了一番，以求鼓舞士气。

安冈坦克师团残存的几辆八九式中战车灰溜溜地撤出了诺门罕战场。

日军炮兵的机械化程度普遍较低，除少数机械化炮兵大队配有牵引车外，绝大多数重炮还是依靠骡马拖拽。一门150mm的榴弹炮重达数吨，在硬土路上需要16匹马才能勉强拉动，可在诺门罕地区的松软沙土上，增加一倍的畜力也不管用，这使炮兵转移困难重重。而且几十门重炮加上观测、通讯、军械、兽医、粮秣、弹药、被服、器材、修理等专业分队，一个炮兵联队至少要有3000余匹马。每日光是喂马的草料就数量惊人，本身就自顾不暇的关东军辎重部门叫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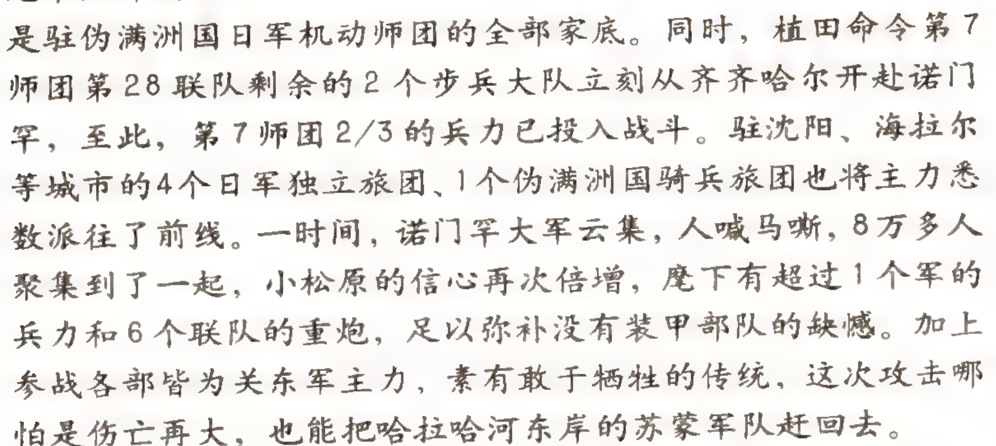


日军的 150mm 重炮。

这是一种 1911 年生产的老式火炮，弹丸重达 36 Kg，但射程较近，只有 5890 米。这种炮的性能虽已过时，不过由于其威力很大，且研发新型 150mm 火炮的费用较高，所以日军没舍得淘汰这种老式大炮。这种炮在战争后期还被装在九七式战车底盘上改成了自行火炮，一直使用到战争结束。

不迭。为此日军将海拉尔市所有的民用车辆和牲口都强征为军用，向前线抢运物资。可直到战斗开始，诺门罕前方的物资也没见有多少，日军士兵尚可喂饱肚子，协同作战的伪满洲国军队可就惨了，兴安骑兵师吃不饱、喝不着，仗还没打，人先跑了一半。

为了弥补反坦克武器的不足，关东军将第 1、第 7 师团的所有速射炮中队都调出补充到第 23 师团，这是驻伪满洲国日军机动师团的全部家底。同时，植田命令第 7 师团第 28 联队剩余的 2 个步兵大队立刻从齐齐哈尔开赴诺门罕，至此，第 7 师团 2/3 的兵力已投入战斗。驻沈阳、海拉尔等城市的4个日军独立旅团、1个伪满洲国骑兵旅团也将主力悉数派往了前线。一时间，诺门罕大军云集，人喊马嘶，8 万多人聚集到了一起，小松原的信心再次倍增，麾下有超过 1 个军的兵力和 6 个联队的重炮，足以弥补没有装甲部队的缺憾。加上参战各部皆为关东军主力，素有敢于牺牲的传统，这次攻击哪怕是伤亡再大，也能把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队赶回去。



就在关东军咬牙切齿筹划报复行动的同时，朱可夫也在着手解决苏军战斗中暴露的一些问题。虽然成功打退了日军的正面进攻和侧翼包抄，但第 36 摩步师的一些连队实战经验不足，在日军夜袭时手忙脚乱、拼刺肉搏过程中用冲锋枪盲目扫射，误伤率很大。为此，除了及时调换部队外，苏军还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夜间主动放弃一些次要阵地，天亮后再用装甲部队夺回来。这样做，既可反复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又尽量避免了不熟悉的夜战和肉搏战。坦克部队在第二次诺门罕之战中立了奇功，不仅击溃了包抄的日军，还彻底打垮了安冈坦克师团，使其一蹶不振；但苏式坦克的汽油发动机给部队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苏军损失的坦克 80% 是被日军步兵击毁的，而其中一多半是被火焰瓶所引燃。前线的反映引起了兵工部门的高度关注，几百台柴油引擎被紧急运到外蒙，各旅的战地修理营日夜不停地为 T—26、T—28 坦克更换发动机，并在要害部位加装钢丝网，防范日军的集束手榴弹袭击。忙到 8 月中旬，所



苏军狙击手。2名手持狙击步枪的苏军士兵正悄悄爬上河岸。苏军狙击手给日军造成的心理压力远远大于其实际损失。

有一线战车都改装完毕。

在双方修整期间，朱可夫在命令坦克部队继续执行“进攻防御”策略的同时，还要求前沿各步兵连队组建“猎杀小组”。大批莫甘纳辛M1891/30式狙击步枪发了下去，苏军狙击手不放过日军一切暴露目标，每日的狙击给日军一线部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日军一份战地通报中曾这样提醒前沿部队：“步枪原地射击时间每次不能超过30秒，轻机枪射击每打完一个点射就必须转移阵地，重机枪阵地不要轻易暴露。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待上10秒钟(指暴露状态)。”一些幸存的日本兵后来回忆道：“我们蹲在战壕里，身边一个人把头探出沟沿一点，向外看，只过了一会儿，突然像被电了一下似的，向后倒去，我过去一看，他的前额上有一个圆圆的弹洞。太可怕了，仅仅一枪就要了他的命，而我们却连子弹是从哪儿飞过来的都不清楚。”“有时趴在地上，身子刚一动，子弹就飞了过来，甚至姿势稍高一些，都会招来子弹，不少人只顾低头，结果屁股被打了个窟窿。”前线日军被苏军狙击手搞得惶惶不可终日。日军虽然也少量装备了三八式狙击步枪，但战术运用较差，狙击手往往成了“敢死队”，待在一个地方死打硬拼，很快便被苏

军集中火力干掉了。

这期间，苏联空军的SB—2M103式重型轰炸机群针对日本战斗机没有夜航能力的弱点，对将军庙、甘珠尔庙一带的日军物资集散地进行了持续夜间轰炸，仅将军庙一地就先后有50多吨弹药被炸毁。日军配备的八九式20mm高射机关炮数量有限，且射高仅有3500米，对苏军的高空轰炸只能望洋兴叹。到了白天，苏军梯次配置的炮群又接着开始轰击，从120mm的重型迫击炮、76mm野战炮到122mm和152mm的远程榴弹炮，各自按照预设区域每天炮击不断。日军前沿阵地上整天烟火滚滚，许多新兵精神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关东军总部几次来电催促小松原尽快发起总攻，可是炮兵没到位，步兵互不熟悉（第23师团的步兵联队此时已有1/3左右的官兵是由别的师团补充来的），作战物资补给缓慢，令小松原一筹莫展。7月18日，关东军在将军庙召开了高级作战会议，研究总攻的时间及战术。小松原竭力主张即使展开总攻，也要以步兵夜袭突击为主，炮兵负责火力支援和压制；而关东军炮兵司令官内山少将则坚持要以炮火攻击为主，待基本摧毁苏军防御阵地后，由步兵上去打扫战场即可。步兵旅团长小林少将支持小松原，炮兵旅团长畑勇少将支持内山，双方吵成一团，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动肝火。最后只好报请关东军司令官植田拍板。植田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不过考虑到既然把全满洲几乎所有的重炮部队都调上了前线，连旅顺要塞的守备炮兵也被调来了，总得让炮兵先打一下，日后对东京大本营也好有个说法；再说前线的步、炮部队建制有十几个之多，这么多不同建制的部队，搞步炮协同很困难，还是让内山的重炮打完再进攻吧。小松原只好服从，不过在总攻时间上，小松原和内山的意见倒是惊人的相似，一致要求再等上一周左右，因为补给跟不上。植田最后将总攻时间定为7月22日早6时30分。

会议还未开完，几发苏军

下图为山东八路军缴获的一门日军的九八式20mm高射机关炮。主要用于防空，也可以射击地面目标，1938年投入使用，弹种与九七式步兵反坦克机枪可以通用，射击地面装甲武器时穿透力比九七式反坦克机枪还大。但全重达373 kg，对于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日军来说，移动是个极大的问题。



150mm加农炮弹恰巧落在了前线司令部附近，把一辆炮兵弹药车炸成碎片，13名日军炮手飞上了半空。一时间，将军庙周围血肉横飞、人喊马嘶乱成一团。小松原和内山面面相觑，脸色苍白。像这样的零星炮击成了家常便饭，日军每天都有人员伤亡和器材损耗，与会的关东军将领们这次捡了一条命。

（一）三角山，弹雨下的半个月

1．蛋壳一样的日本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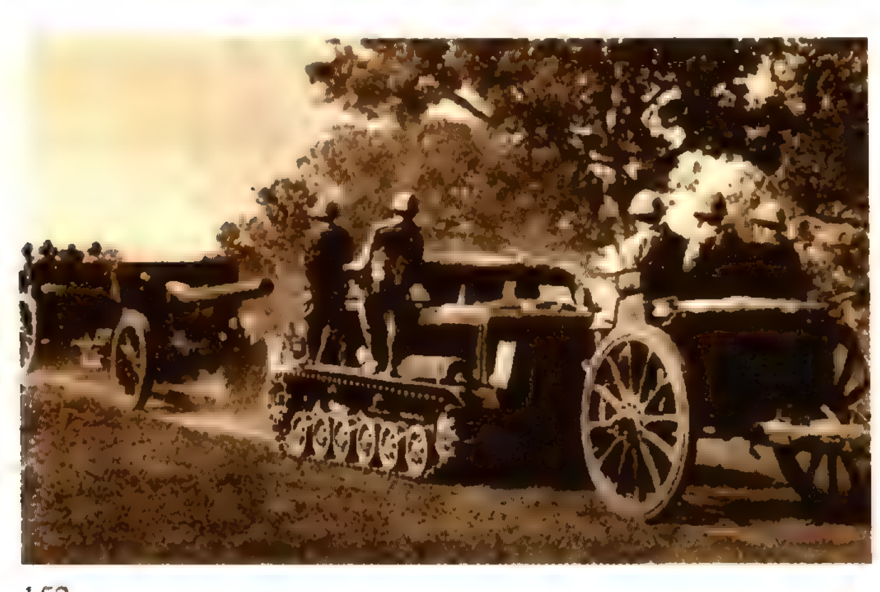
7月中旬的呼伦贝尔，早晨的太阳一出来就让人觉得暖洋洋的，像小阳春一样，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普照大地，再加上微风一吹，使人觉得好清凉、爽快。可能是天气好的缘故，大家的心情也随着好起来，仿佛忘记了打仗。

下图为九八式6吨野战重炮牵引车。日本野战重炮牵引车用于牵引105mm野战重炮与九六式150mm野炮。日本的这些牵引车大部分是20世纪30年代设计的，性能和质量都不太好，而且数量少，很多炮兵部队还得靠骡马拖拽。

一大早卫生队就接到命令：跟随辎重队向三角山转移。辎重队加上卫生队一共几十人，在荒野上慢慢地行军，看上去就像乡村的学童去上学一样。四五天前还在恶战苦斗，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可今天好像一下子和平起来，想一想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在伊林银查干湖畔经过臭味熏陶的卫生队，生气又恢复过来了，大家忘记了昨天的筱原准尉，忘却了战争，有人开起玩笑，队伍中还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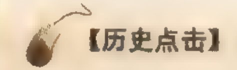
“哎，军医，咱们这是去哪儿呀?”身后有人问道。



“去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头也不回地答了一句。

“你说什么?妈的，瞧你那副臭德行。”身后那人突然骂了起来。

我回头一看，是辎重队的一个老兵油子，他肩上斜扛着一支步枪，枪口冲前，一边骂一边开心地笑，一些士兵也跟着笑起来。看样



【历史点击】



日本军队内对新兵的体罚和虐待

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的过程中，任何军队都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的事。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有人会采取一些野蛮残忍的行为，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文明国家的军队中，这类行为会受到军纪追究。但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当新兵到达兵营，开始他们的第一次训练时，一群可能是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为的是让你俯首帖耳。军官之间的纪律实施也同样，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成凶狠的野兽、变成一名“皇军”的计划的一部分。久而久之，日本士兵就像一只注满了暴力情绪的压力锅，所有曾加到他头上的凶残和伤害，都将向敌人发泄。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他们的下属——对战俘和平民经常施加暴行。他们随意的、想都不想就径直发泄的凶残令人发指。一名叫坂田毅的老兵回忆道：“我的军旅生涯，一言以蔽之就是训练和挨打。老兵就是神，老兵闲下来就不知干什么好。虽说教育性的惩罚也有，但多数惩罚往往是老兵闲极无聊或来了情绪。先得说一通这是给你们灌输军人魂，然后命令我们排成一排，保持立姿。老兵用拳头挨个打我们，这算是好的，还有用皮带和皮靴筒使劲抽打的，打得我们额头上汗津津的，几乎到了人体忍耐的极限。长官告诉我们，战争无非是杀人和被杀，以人类的平常心，是无法杀人的。所以，要用无理由的残酷惩罚，把人改造得没有思考能力、只会条件反射地执行长官命令。我曾暗暗发誓永不忘记挨打的经历，记得我一共挨打260回。”

子不过是个无聊的恶作剧，想拿人开开心而已。

“去哪儿，你去问当官的好了，我只是跟着走。”

“你不也算个官儿吗?”老兵油子又嘲讽道。

在士兵当中，这样的老兵油子是最厉害的，当兵时间长、经验多，又滑头又蛮不讲理。老兵油子一般是不会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别看在战场上不怎么威风，但是在新兵面前却威风得很，打起新兵的嘴巴来左右开弓、又毒又狠，所以新兵是不敢招惹他们的。

“军医是没有当官的气派，卫生兵也不像你们大兵那么威风，可是你记住了，有本事你永远不要找军医，也别找卫生兵!”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冲着老兵油子吼上了，这么一吼，那个老兵油子不吱声了。军医大小也算个官，老兵油子资格再怎么老，

也不敢打我的嘴巴子。

就这么胡打瞎闹、吊儿郎当，队伍行进到了胡鲁斯台河的军桥前。说是军桥，其实就是把五六艘小铁船连接起来，上面再放上几块厚厚的木板而已。不知道胡鲁斯台河到了雨季是个什么样子，反正现在河水很浅，猛地一看完全不像条河，浅归浅，但清澄透明，几乎能一眼看到底，站在河堤上向河床望去，只见沿着河边生长着一大溜低矮的河柳，弯弯曲曲的像蛇一样。向身后望去，周围是一大片湿地。

跨过军桥向南又行进了一公里左右，眼前出现了两个小沙丘，据说是758高地和741高地，一左一右就像人的两个肩膀。沙丘之间的平地上有数不清的车轱辘印，人来车往已经压出了一条大路。从两个沙丘之间再往前望去，不远处有一座稍大一些的沙丘，山顶呈三角形，这个沙丘就叫三角山。

穿过这两座沙丘，大家的脚步都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只见沙丘的右前方停着两辆被打成蜂窝一样的日军坦克，并且坦克的上半部都已经烧成灰白色了！

我凑上前去低下身子仔细观察了一番，才发现杂草和沙土之中有许多很不容易发现的细钢丝，这两辆坦克肯定是先被这些钢丝给缠住了，然后又遭到苏军从三角山上的火力袭击。也就是说，苏军已在三角山上筑好阵地，在三角山下布好钢丝网，只等日军的坦克往里钻了，只要一钻进来就是有来无回。另外

苏军前线步兵团配属的反坦克炮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但苏军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战地记者拍照的一瞬间，下图这个炮兵班就不幸全体中弹牺牲了。



从种种迹象来看，苏军很可能早把这儿作为坦克战的预设战场，在这儿先制定出战略战术，然后再来训练如何打坦克。

我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三角山的北坡，斜坡上有好多早已挖好的战壕，这儿以前是苏军的阵地，不用说这些战壕都是苏军挖的。士兵们呼啦一下子散开了，争先恐后地挑选起自己的战壕。我不愿意和他们抢，比起抢战壕来我更惦记着那些坦克的残骸，所以就一个人下山去了。

坦克炮塔那么厚的钢板竟然能烧成灰，谁听了都不会相信，但是炮塔的确是已经烧成了灰。用以往的常识来考虑的话，铁板即使是烧化了也不会变成灰的，况且只是燃烧，并没有什么其他外界因素，所以我左思右想怎么也找不出答案。坦克上还有几个完全被击穿的洞，直径在5厘米左右，大小跟苏军的穿甲弹差不多。从这儿可以推测，苏军在对付日军坦克时使用了两种炮弹：一种是燃烧的，另一种是穿甲的。

看看这儿，摸摸那儿，研究了半天，我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被打得体无完肤的坦克的残骸，踩着地上的钢丝开始往山上返。走到半山坡再往下一看，坦克的残骸就在正下方，苏军可能就是从这个位置打的穿甲弹吧?坦克里面的士兵大概不是被穿甲弹打死的，就是震死的，或者被大火烧死的，或者是被闷死在里面……忽然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感涌上心头，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又能怪谁呢?要是没有那些狂妄无谋的关东军将佐们的话，要是他们不视人命如草芥的话，要是日本不侵略满洲的话，这些年轻的士兵现在还应该在日本幸福地生活着……

回到阵地，我才开始寻找空着的战壕，可是还能用的战壕都被人抢走了，空着的一个也没有。没办法，只好自己挖了，可是找来找去连个合适的地方也找不到，好一点儿的地方也早叫别人给抢走了。

一直快到山顶时，我才发现一个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挖战壕是再好不过的了。弯下腰刚要动手挖的时候，忽然发现地面上有被炸过、被烧过的痕迹。“炮弹一度落下过的地方，十有八九炮弹还会飞来。”我一下子想起了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说过的这句话，说什么也不敢在这儿挖了。提着圆铁铲在周围溜达起来，在离刚才那个地点八九米的地方我停了下来，看看四周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就在这里吧。

诺门罕战争期间，朱可夫（左）与蒙古人民军元帅乔巴山（中）在一起。苏蒙两军的良好合作和协同也是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挖了两个来小时，战壕总算是挖好了，可是坐在战壕里总是心神不宁、疑神疑鬼，脑子里老想着那个炮弹落下过的地方。为了慎重起见，我又把垫背包的那块宽木板抽出来盖住洞口，在上面蒙了一块毛毯，这才多少放心了一些。

俗话说，“衣食足而知礼仪”，饥饿难忍、生死未卜的时候，礼仪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剩下的只有人伦的颓废。平时显得亲切有礼的士兵们，此时此刻都自顾自了，所以你挖战壕也好，你干什么也好，没有人会来帮忙，也没有人对你感兴趣。苦战恶斗之前，能想方设法保全自己一条性命就不错了，他人之事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再说恐怕也没有精力去管别人的事。

三角山的北坡光秃秃的，几乎看不到什么杂草，这是日苏两军为了争夺阵地不断炮击的结果。就是这个三角山，多少年以后我才听说，在后来的炮战中被苏军的炮火炸成了平地，现在连个影子也找不到了。

这也说明，位于各个高地中央的小山头，作为一个攻防战略上的据点，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偏偏就上了这个漩涡的中心。

2. 差点被活埋

钻进自己挖好的“章鱼罐”里，很快呼呼睡着了。

不知是不是昨天挖战壕太累了的缘故，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就觉得腰酸腿疼、浑身无力，蜷缩在战壕里不想动弹，想接着睡吧可又睡不着，就那么闭着眼胡思乱想起来。正在这时候，忽听头顶上有人说话，探头一看是辎重队的曹长和一个军曹正在炮弹落下过的地方挖战壕。

“哎，那里危险，有炮弹在那里落下过!”我急忙大声提醒他们。

“喊什么呀，军医，这儿没你什么事，别瞎说。”两个人根本不理，还是一个劲地往下挖。我是觉得那个地方凶多吉少才提醒他们的，可是他们全当成耳旁风了。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把脑袋又缩进战壕里。

第三天下午，苏军的大炮突然吼叫起来，炮弹像下冰雹一样落下来，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沙土飞扬，呼吸都觉得有些困难。好在苏军这次的测量上有些偏差，炮弹都落到我们战壕的前面爆炸了，部队几乎没有什么伤亡。炮击一停，大家就从战壕里探出头来，为自己还活着而欢呼起来。

第四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但是蹲在“章鱼罐”里却觉得有点儿凉飕飕的。下午4点来钟，大炮的“洗礼”又开始了，和昨天不同的是，今天的炮击打得特别准，炮弹都落到我们的阵地上了。阵地上沙土飞扬、热浪袭人，弹片在头顶上呼呼作响，几块弹片甚至落到了我的壕口上。我双手抱着脑袋，使劲把身子往战壕底上靠，心里觉得情况不妙。

突然，头顶上一声巨响，一阵热浪随之扑面而来，天地一瞬间暗了下来，我眼前金星闪烁，耳朵嗡嗡直响。“不好!‘章鱼罐’被炸了!”一明白过来，我就在黑暗中乱抓乱蹬起来，手虽然还能动，可是腰和腿却怎么也动不了了。“坏了，我这不是被活埋了吗?”想往外逃，可是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反而是越动压得越厉害了，一种未曾有过的恐惧感袭来，呼吸也急促起来。

情急之中我忙用双手去扒身上的沙土，扒到大腿时身子还是动弹不了，接着往下扒，一直扒到膝盖时身体才恢复了自由。我一跃跳出了“章鱼罐”，像一个受了惊的兔子一样逃了出去。

在跳出战壕前，“是逃，还是留?”我犹豫了一会儿，周围炮火连天、弹片横飞，出去随时有中弹的危险，但与其守在这儿被压死，倒不如冲出去碰碰运气，没准儿还能拣条性命，是死是活就听天由命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并且是

拿自己的性命赌的。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赌博我赢了，逃出阵地是正确的，不逃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今天，也就不会坐在这儿写什么书了。

在诺门罕之战中，有许多士兵在战壕中被活埋，光我亲眼所见的就为数不少。那些死里逃生的人，都是借助于他人之手得救的，完全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力量逃出来的，恐怕屈指可数。

我之所以能自己逃出来，靠的是"土遁秘法"和神的帮助。"土遁秘法"就是那块木板和那条毛毯，虽然短暂的一瞬间我的眼前漆黑一片，仿佛掉进了死亡的深渊，但是由于有木板的支撑，所以还有一点亮光投射进来，借助于这点亮光我才看清了"章鱼罐"里面的情况。木板和毛毯挡住了不少沙土，所以我才没有整个被活埋，身后虽然埋到了肩膀，但是前面有木板和毛毯的遮挡，只埋到肚脐，双手还可以动。说老实话，要是没有那块木板和毛毯的话，小命早就呜呼了。

逃出战壕后，我压低身子玩命地向地势低的地方冲去，可是刚跑了没几步，一发炮弹就在眼前不远的地方"轰"地一声炸开了。爆炸的气浪冲击把我一下子掀倒在地，热乎乎的弹片紧贴着耳朵呼啸而过。"完了!完了!"我心想这下可真的是完蛋了，然而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不但还活着，并且毫发未损，真是万幸，接着跑吧。

阵地上硝烟蒙蒙、沙土滚滚，热浪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没死就得接着逃呀!"我是地上躲炮弹、脚下躲战壕，左冲右拐东倒西歪地跑下山去。跑了三四百米，终于逃出了弹雨火海的地狱，在一个小沙丘上一屁股坐了下来，看看苏军的炮弹打不到这儿，才松了一口气。



苏军1939式152mm加榴炮，这种火炮在诺门罕给日军阵地以摧毁性打击。

就在余惊未消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差一点把我的魂吓飞了，转头一看，原来是卫生队的渡边伍长。

"干、干、干什么你?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是……"我用手按住还怦怦跳个不停的胸

口。

“军医呀，你逃出战壕的样子可真够潇洒的，那个帅劲儿我可是学不来。”渡边一边说一边就哈哈大笑起来。

“啊，原来你小子都看见了?有什么可笑的?死里逃生还管它潇洒不潇洒的，真是大惊小怪。”

“有意思，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渡边说着又大笑起来。

“你、你小子擅自脱离阵地!一个人躲在这儿干什么?啊?”这家伙真把我给惹火了。

“我说军医呀，都这会儿了，干吗还一本正经的。”渡边还是笑个不停。

真是拿他没有办法，吓又吓不住，唬又唬不倒，只好随他去瞎咧咧吧。这个渡边伍长久经沙场，有胆量、有气魄，都这么一种时候了他还有心思开玩笑。差一点死在“章鱼罐”里的我，此时此刻却完全没有心思跟他斗嘴，望着还是炮火硝烟的阵地，禁不住为那些还蹲在战壕里的士兵们担起心来。

仔细一看才发现，苏军的炮弹是掠过战壕的上空，打在靠近山顶的地方，也就是我和辎重队曹长、军曹的战壕附近，滚滚的硝烟中不时冒出一个大火球“啪、啪”作响，还发着闪电一样的强光。我在心里暗暗叫道：“逃得好啊!逃得对啊!”要是不逃的话，这会儿恐怕早就死在战壕里了。只是不知道那曹长和军曹怎么样了，他们是不是也逃出来了呢?

昨天的炮击打了一个来小时，今天只打了30分钟就结束了。硝烟开始慢慢消散，透过硝烟可以看到火红的夕阳正从地平线上沉落下去。三角山北面的斜坡上，挖了许多像章鱼罐一样的战壕，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个蜂窝。

三角山北面的坡度只有15度左右。苏军的炮弹不知是从哪儿打来的，从方向和角度来推测，大概是从哈拉哈河左岸上的“小松台”方向打过来的。小松台比三角山要高出不少，因为苏军的炮弹都是沿着10度左右的抛物线飞过来的。

依我的战场经验来判断，苏军的炮击主要是在拂晓和傍晚这两个时间进行。当然，在诺门罕之战中也有白天连续炮击的情况，但是大部分炮击都集中在一早、一晚两个时间。三角山也好，721高地也好，都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尽管大家都说这只不过是苏军的一种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但是我却认为这与日军擅长夜袭作战有关。夜袭当然不能赤手空拳，傍晚肯定要

做充分的准备才行，而苏军正是抓住这一时机进行炮击，破坏日军的夜袭准备。而一旦自己的阵地被夜袭占领，为了协助地面部队夺回阵地，就进行拂晓的集中炮击。

据说张鼓峰一战时，日军一个大队的兵力就是利用一个雨天，趁苏军麻痹大意而进行夜间偷袭，结果使苏军伤亡惨重。苏军大概不会忘记一年前的这个痛苦教训，为了破坏日军的夜袭作战，才采用了傍晚炮击的战略战术吧。夜袭作战是日军的一个特长，看来苏军为此也是大伤脑筋。只是拂晓的炮击一般打得并不准，这可能与苏军面对阳光无法进行准确测量有关。与此相反，傍晚背朝阳光，测量准确，所以下午的炮击总是打得很准，我们伤亡也大。

被炮火赶出来后，我再也找不到可安身的地方了，正坐在地上犯愁的时候，渡边伍长又嬉皮笑脸地凑了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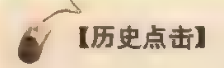
“军医啊，依你之见本战的胜负如何?”这个渡边也不管你有心思没心思、想听不想听，缠着你唠叨个没完。

“我看十有八九得败!”

“同感!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索性把一直憋在心里的一大堆话一下子都倒了出来。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俄战争和现在的这场战争，这之间存在着40年的文明和文化的落差。苏联已不是当年的俄国啦，他们现在是把这儿当作试验场，拿新研制出来的武器进行军事试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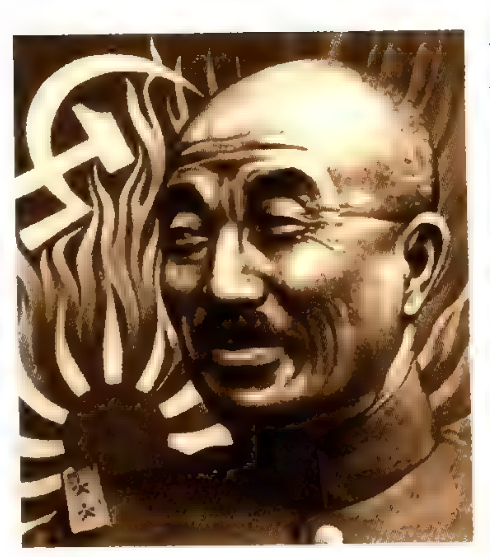


日俄战争

1904年～1905年，日本的殖民扩张与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发生冲突，双方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而大打出手。战争中日本在英国的暗中帮助下，在付出重大伤亡后终于靠优势兵力击败了沙俄远东陆军，夺取了沙俄设在中国辽宁的旅顺要塞；并在对马海战中以逸待劳几乎全歼了俄国远洋舰队，迫使俄国的势力范围退出了东北地区。战后，日本不仅获得了朝鲜的统治权和南桦太岛，还继承了俄国在我国东三省的半殖民统治，开始向东三省移民，并疯狂掠夺东北地区的煤炭、铁矿及森林资源。在获取了丰富的战略资源后，日本也从此由一个轻工业国转向重工业国。

目的嘛，当然是为了将来的战争。

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军队到底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国内的军队整天抖着肩膀在日本狭窄的山野里瞎转悠，中国派遣军倒是没少跟中国军队作战，可那完全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这说明不了什么。夺取了中国那么多土地，除了让更多国家警惕和讨厌日本外，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在亚洲到处咋咋呼呼发号施令，鼓吹武士道精神，一些人钻进无敌皇军的空壳里，根本就不想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其中一个典型人物就是辻政信，像这样闭关自守、暴举蛮干的军队，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板垣征四郎。板垣征四郎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制造者。他一直在关东军中担任要职，是"北上计划"的积极策划人，后晋升为上将，调任日本驻朝鲜军司令。他当年还是侵华日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战后被远东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而处死。此图为诺门罕战争时《时代周刊》的一期封面，背景中日本的旭日旗正演变成战火烧向苏联的镰刀斧头。

虽然东京大本营的地位高高在上，但是思维方式却很愚蠢，他们之中有几个人是真正为国民着想?国家也好、国民也好，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只有一个，那就是个人的功名、自己的荣华。"

听了我一番"高谈"之后，渡边一个劲地点头称是，接着他也来了一番"阔论"。

"军医说得很有道理，依我看在本次大战中，关东军的作战计划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为国境线之争属轻举妄动。第二，不懂近代战的战略战术。第三，战略物资贫乏。第四，兵器性能落后。第五，缺乏天时地利。第六，缺乏协同作战和陆空的立体作战。第七，缺乏平坦草原上的作战经验。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愚蠢的战争，那么为什么还要打呢?"

"作为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当然的义务。"嘴里虽然这么回答，其实我也是找不到答案的。

"话是这么说，可是这义务能得以实现才有意义，实现不了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军医，你说对不对?上面有令不得不从时，那就要看你怎么理解、看你怎么随机应变了。

说老实话，我不是临阵脱逃，你看看那个阵地，那么多人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要是真的命中几发炮弹、燃烧弹什么的，不知要死多少人呢，我才不那么傻，不想白白送死。不过，军医，我可不是一个胆小鬼，这一点请无论如何要相信我……"

渡边伍长属于先天乐观派，平时脸上总是带着笑，走起路来慢慢悠悠的，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然而一旦打起仗来，他两个眼珠子就会瞪得老大，竹竿头上捆上一颗反坦克地雷，抱着它哪里有坦克就往哪里冲，一副玩命的模样。

大漠的夜幕降临得早，返回阵地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的战壕已经找不到了，只有那块救命的木板从土里露出一个角来，看到这个木板角才知道那里曾经是自己的战壕。

再回头去看那个曹长和军曹的战壕，连个战壕的影子也找不到了。战壕已经被炸成了一个大坑，坑里的土看上去白燎燎的，好像是被火烧过一样。坑的边缘上还有没完全烧焦的襟章、刀把儿什么的，坑的四周散乱着一些带血的碎肉、骨头，其中有一块鲜血淋漓的皮肉，好像是人的下巴和脸皮，上面还有许多胡子……

明明知道这是一场不义之战，是一场暴举蛮干的糊涂战争，可还要白白去送死，这叫什么事呀。在这里，穷途末路看不到一丝光明，真可谓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战友们一个接一个犬死而去，死得毫无价值。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既不是什么天皇，也不是自己的军人责任感，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逃出这个阿鼻地狱！这个自己马上就要陷进去的人间地狱！可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自己仿佛是一个被拴在地狱铁窗上的幽囚一样，逃脱不得。

我从土里扒出那块木板和毛毯抱在怀里，像个梦游者，又好像一个亡灵在阵地上游荡起来。不想再去挖什么战壕了，也



在苏军炮火的严密封锁下，饮用水的补给始终令日军头痛，即便是后方日军用水也需要严加限制。（出自《太平洋战争·1937～1945》，每日新闻社）

没有挖战壕的力气了，心灰意冷、意气消沉，“妈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铺着木板盖着毛毯，背朝黄土面朝天，我在露天地上躺成一个“大”字就睡着了。

3. 蹲在战壕里的日日夜夜

曙光透过薄雾照射到大地上的时候，我才醒了过来，不免觉得浑身有些寒冷。

睁开眼刚想爬起来，却忽然发现旁边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阳光正往这边看，好像是对我躺在露天地里甚感不解，又好像是在确认一下我是否还活着。我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原来又是那个渡边。

“军医呀，你怎么睡在这儿?太危险了。上边有一个空着的战壕，跟我来吧。”说着拉起我就走。

我像个要饭的乞丐一样，抱着木板、拖着毛毯，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战壕在高高的山顶上，可能是这个缘故吧，所以这个战壕既没有人抢也没有人要。战壕像一个猫耳洞一样，洞口虽然很小，但是里面却很宽敞，能容下三四个人，洞深大约有两米。看样子这儿以前曾经是苏军的连指挥所，否则的话是不会挖这么大的战壕的。

可是，洞越大也就越危险，挨炮弹的机会也越大，出现塌方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么大的一个洞要是一旦塌方的话，恐怕就不会像上次那么幸运了，事到如今也没有力气再挖战壕了，有个洞就比没有强，先将就着住吧。

收拾收拾这儿，整理整理那儿，忙忙碌碌不觉就到了中午，也累了也饿了，这才坐下来喘口气，掏出干面包啃了起来。啃着啃着忽然想起了刚才渡边伍长还给了两个乌梅干，急忙找出来塞进嘴里。这乌梅干是那么酸甜可口，一进嘴里顿时便唾液四溢，干渴的喉咙一下子得到了滋润。



几个日军士兵正在专心致志地挖掘“章鱼罐”战壕。(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这一吃不要紧，我一下子想起了故乡、想起了老父亲。老父亲有个习惯，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先来几个乌梅干蘸砂糖，然后抽着烟袋、喝着酽



沙丘上修筑的日军阵地。

茶看报纸。嘴里嚼着乌梅干，眼前却浮现出老父亲的身影，那疲惫苍老的面容越来越清晰起来……

要是就这么白白死了，上了年纪的父母该怎么过呀，再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尽过孝心呢，太对不住他们了。越想越觉得心里内疚，越想越觉得心里寂寞得慌。

吃完午饭，点上一支烟，望着这么一个空荡荡的大战壕我就琢磨开了，苏军为什么要把战壕修在山顶上呢?凭以往的经验分析，怎么都觉得不合理，都难以解释。可是在战略战术总是胜人一筹的苏军，一般是不会做糊涂事的。我把脑袋伸出洞口，向四周仔细观察起来。这一看禁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心里顿时豁然开朗起来。

这个位置正冲着三角山下的通道，山下的情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并且这个位置从胡鲁斯台河的方向、也就是日军的阵地来看，由于有左侧沙丘的遮挡，什么也看不见。苏军大概就是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将指挥所设在这里监视指挥，把日军诱进山下的通道，然后所有的兵器一齐向山下开火的，怪不得日军的坦克会被打成蜂窝一样呢。还有一点，那就是洞口附近生长着一些杂草，所以即使从正面看，指挥所也不容易被发现。

看看苏军的指挥，再看看日军的指挥，顿觉日军的指挥是多么的愚蠢可笑。苏军总是抓住日军的短处打，并且事先进行周密的作战准备，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势诱敌深入，然后再包围歼灭。而日军就知道集团冲锋、猪突前进，夺下一星半点的阵地后光会笨拙地死守，死伤了这么多人也不调整战术。

三角山下被打成蜂窝一样的坦克，并不是日军的一个偶然失败，它是整个战线上的一个缩影。在第二次诺门罕之战中，日军搞的所谓的秘密军事行动，其实苏军早已经都预料到了，所以是处处牵着日军的鼻子打，设圈套让日军往里钻。依我看，其中最大的一个圈套就是故意放日军突入，然后再给日军来一个

彻底的大围歼。

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曾经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可是关东军不光是不知“彼”，甚至连“己”也不知道。

打个比方来形容一下的话，哈拉哈河那边是提着大棒的彪形大汉，河这边是腰挂长剑的毛孩子，毛孩子舞了几次剑见大汉不理，就拔出长剑、呐喊着冲了过去，结果迎头挨了一棒，一头就栽倒在河里了。这简直就像一幅幽默漫画一样滑稽可笑，实在是愚蠢透顶。士兵们都知道这是一场没有意义、白白流血的战争，可还是不得不拿出所谓的“大和魂”来，去充当炮灰、去猪突、去送死。

这儿地处山顶，在外面待的时间太长，没准儿就会被苏军发现，一旦被发现的话，马上就会有炮弹飞过来“热烈欢迎”你了。所以探出脑袋张望了一会儿，赶紧把脑袋又缩回到洞里。

坐下来以后，我的目光停顿在洞内的墙壁上，担心会不会发生塌方。墙壁看上去很结实，摸起来也很坚硬，挖下一块用



【历史点击】



战场情况

就在草平等人蹲在三角山的战壕里边挨炮弹、边发牢骚时，苏军已于7月15日将诺门罕前线的部队扩编成第1集团军，并利用这段时间向前方增派了6个飞行团(581架战斗机、轰炸机)、1个T-28坦克旅，1个伞兵旅，并派重型轰炸机群轰炸了“满洲”腹地中东铁路的咽喉——富拉尔基铁路桥，迫使关东军在全“满洲”首次实施了灯火管制，关东军各部进入一级战备。东京大本营对诺门罕一战拖住8万多精锐部队和大量重武器十分不安，提醒关东军要速战速决。这一时期，李兆麟将军领导的抗联第3路军在嫩海地区频繁出击，袭扰日军，关东军抽调出2个步兵大队增援诺门罕战区后，再也无法从此调兵，只得舍近求远，在旅顺一带抽调兵力。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为此专门授予李兆麟将军一枚“红旗勋章”，以表彰他带领的抗联部队在诺门罕战争中的突出表现。



抗日联军在密林中与日军战斗。

手捏了捏，土质的确不像其他战壕那样松散，而且又黏又硬。可能是山顶部分久经风吹雨打，已经形成了坚硬的土质，这样的土质是很难出现塌方的。再说了，苏军既然选定了这个地方，就说明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的指挥官都敢住，我又有什么不敢住的呢？

另外，从苏军的炮击情况来看，他们可能估计日军的兵力都集中在北坡上，所以炮弹集中往北坡打，山顶方向并不是他们的炮击目标。从洞口周围杂草丛生的情况来看，也说明炮弹很少打过来。

综合以上情况，反而感觉山顶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个战壕就成了安全之中的安全之处，放心住好了。我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儿，自己也深信这是祖上有德、佛爷保佑。

俗话说“危难之际抱佛脚”，以前听了这句话总以为是一句诙谐语，没有放在心上。可是现在回顾一下从诺门罕参战以来的这两个多月，每每都是在受难、在痛苦、在危急的时候才想起了神，才求神保佑的。所以这句话就好像是在讽刺自己一样，令人哭笑不得。

参战之前我没有任何的信仰，一贯是无神论者，一直是靠着自己认准的“理儿”而闯过来的。可是，一旦到了现在的这种境地，不自觉地就变成了求神保佑的信徒。

我们在三角山上镇守了两个星期，在战壕里过了两个星期的穴居生活。这两个星期里是真正尝到了孤独、寂寞的滋味，那滋味就像是一个孤儿掉进了一个漆黑的黑洞、一个人在里面痛苦地挣扎一样，并且还要忍受着炮火硝烟的熏烤。

下午3点刚刚过，炮弹又像冰雹一样打过来，刚才还趴在战壕边上吹牛聊天的士兵们，一下子全都钻进了战壕里。炮弹带着呼啸声飞来，爆炸卷起来的硝烟、沙土直往洞里飞，灼热的空气也阵阵冲进来，洞里的空气好像一下子稀薄了。

刚开始我还蹲在洞里，可是不知什么时候身子已经趴下了，脑袋也紧紧地贴到了地面上。心里直骂自己胆小、窝囊，硬撑着抬起头来，可是刚刚一抬起来又身不由己地趴下了，结果只能是趴在地上自嘲苦笑，任凭怎么给自己打气加油，可就是爬不起来。

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憋得油汗直冒，太阳穴嘣嘣直跳，觉得全身像在受火烤一样，烤得都快要燃烧起来似的。心想就

这么趴在这儿等死，还真不如挨上一刀死得痛快，真想拔出刀来跳出去拼个你死我活，可是苏蒙军现在都退回哈拉哈河对岸了，想拼命也找不到个对手，想痛快地死也痛快不了。

炮声终于停了，硝烟渐渐随风而去，天空又晴朗起来。炮声一停，阵地上就传来“哎——”、“哎——”的吆喝声，随着这吆喝声，一个个光头从“章鱼罐”里拱出来，相互招手打起招呼，那光景看上去真滑稽可笑。士兵们有的叫，有的喊，为自己、为同伴们还活着而欢呼雀跃。一些士兵甚至大声开起玩笑，扔起沙土打闹起来。

趴在黑暗而充满硝烟味的“章鱼罐”里，听着外面令人心惊肉跳的爆炸声，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恐怖、觉得害怕。其他人会不会都被炸死了?会不会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还在这儿苟延残喘呢?一想到这儿，一种孤独感和恐怖感就会涌上心头。所以每当弹雨一停、战云一散，大家就急忙互相打招呼，好确认一下战友是否还活着。

日军九四式装甲车。1934年，日本研制出九四式装甲车并开始投入使用。九四式装甲车受卡登洛依德超轻型坦克的影响较深，一直没有摆脱英国坦克的影子。日军在骑兵部队中经常混编九二式和九四式重型装甲车。安冈坦克师团撤走后，步兵师团所辖的九四式重型装甲车就成了主力战车，结果更不堪一击。

呼啸的炮弹没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没了，洞里一下子显得格外安静起来。端坐在洞里，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有一种进入仙境的感觉，眼前模模糊糊出现了一堆黄土，一堆毫不显眼的、但是历经了几亿年才形成的黄尘积土，黄土堆里什么都没有，没有生命，没有希望，没有烦恼，甚至连一棵杂草、一块沙石都没有，它只是一堆大自然里纯正的净土……揉了揉眼睛一看，眼前的黄土不见了，我急忙在地上寻找起来，可是找来找去什么也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那堆黄土，倒是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小窟窿，一个3厘米×4厘米大小的“洞中洞”!看样子像是个什么动物的窝。我贴在洞口往里

瞅了瞅，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

大概是个老鼠的窝吧?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4. 眼皮下的坦克战

不可思议的是，这次炮击尽管打得十分激烈，但是阵地上却没有出现一个伤员。

没有伤员的话卫生队也就无事可干，整天蹲在“章鱼罐”里混日子，无所事事、无欲无念，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天一黑就睡、天一亮就起，在坑里一蹲就是一天，从这一点来看的确是跟动物园的动物们没什么两样。

每天早上睁开眼头一件事，就是爬出洞来方便。一爬出洞来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深深吸上几口清沁凉爽的空气，使劲伸个大懒腰，浑身真是觉得痛快。

向遥远的蒙古高台方向望去，云涛雾海之中露出灿烂通红的红日，红日又编织出紫色的薄纱，架起一座长长的五色彩桥来。这是草原上特有的宏大而神秘的景观，使人不由自主地怀疑这是不是龙在升天呢。我被眼前的这个壮观景色给吸引住了，久久地站在那儿眺望。

方便完了以后，又用饭盒盖收集了一点露水刷了刷牙、擦了一把脸。今天早上的天气不错、景色也漂亮，心情也随之欣然起来。忽然听到隐隐约约的坦克轰鸣声，起初还以为是自己



三四式37mm速射炮是日军在诺门罕之战中惟一一种勉强可以与苏军坦克抗衡的武器，每门炮需6人来操作，图中戴布帽者为炮队指挥官，远处即为蒙古高台。(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一辆日军九二式5吨牵引车不知为什么开进了步兵阵地，引起了步兵的好奇和围观，这个大家伙即使在日军炮兵部队也不多见。

的幻觉呢，可是往山下一看，只见一辆小型坦克从胡鲁斯台河的方向开了过来，已经开到离山下大约600米远的地方了。

我吃了一惊，急忙卧倒在地，偷偷抬起头来又望了一眼，马上看明白了，那是一辆日军的坦克，因为个头比苏军的小得多，炮筒也比苏军的短得多，式样难看不说，全身还生满了铁锈。刚刚松了一口气，可一想又觉得不对劲儿了，大白天的开着个破坦克在苏军的眼皮子底下招摇过市，哪有这么胡来的？

“这儿危险！回去！”我急忙大声喊叫起来。坦克根本听不见，还是一个劲儿地往这边开。我一看这一招不灵，干脆站了起来，连喊带比划地想让坦克往回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辆墨绿瓦亮、炮筒修长的苏军大坦克，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冲了过来。小坦克来了个先发制人，向大坦克连开了5炮，可是火力太弱，5发炮弹都落到离大坦克老远的地方爆炸了。大坦克倒是不慌不忙、沉着冷静，稳稳当当地打了一发，小坦克一下子就燃烧起来。大家在山上看得是一清二楚，气得顿足捶胸，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更不敢惹苏军的坦克，这简直就像是小孩子和大人打架一样，哪有小孩子赢的道理？

这不仅仅是双方一对一的坦克战的情景，而且是整个诺门罕之战的缩影。大概哈拉哈河那边的苏军士兵们正在哈哈大笑，嘲笑日军儿戏一般的军事行动。

喊了半天也白喊，比划了半天也白比划，坦克最终还是被打中了。我醒过神儿来一想，老这么待在外面也不是个事，没准儿炮弹马上就会打过来，所以撒腿就往自己的战壕里奔。刚刚钻进洞里，炮弹就呼啸着打了过来，阵地上又是硝烟冲天、沙土飞舞，刚刚明亮起来的天空一下子又暗了下来。

可能是对炮击已经习惯了的缘故吧，今天倒是没怎么害怕，再仔细听听外面的声音，炮弹好像都打到三角山的南坡上去了。因为这是拂晓的炮击，日光和硝烟可能给苏军在测量上造成了一些困难，炮打得并不准。南山坡上打得热火朝天，北山坡上却安然无事。

一个小时的炮击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阵地上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紧张的神经也放松下来了。这一放松不要紧，倒是一下子勾起了我的便意，我急忙把地上的沙子堆成一座"小山"，然后在"小山"的山顶挖一个小坑，做成富士山的样子，对准那"富士山"的山顶，痛痛快快地大解了一通。

患阿米巴痢疾已经两月有余，至今还是黏血便。这病患上了想治好是非常困难的，最令人头痛的是顽固的黏血便，不光是我一个人，许多士兵也是被黏血便折腾得够呛。方便完了就把黏血便埋在"富士山"里，然后再用纸把"富士山"包起来，用绳子捆好放在洞边。不知道是谁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燃烧弹"，大概从外表上看像个土造的燃烧弹，所以大家才这么叫。

白天待在洞里很少有憋不住尿的情况，可能是饮用水不足、喝水太少的缘故，小便一天两次就可以了。可是大便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患上阿米巴痢疾一天就要拉上好几次，我的洞里经常摆着四五个"燃烧弹"。要是在平常的日子，身边放上几个臭屎包，肯定会把人熏得捏鼻子，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我一点也没觉得臭，倒是感觉只要不死，和



苏制47mm里霍宁式迫击炮。

当时这是苏军步兵营的基本配置，旧译的50mm迫击炮即指此炮。草平等侵华日军在诺门罕阵地上没少挨这种炮的轰击。

臭屎包生活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燃烧弹”到了傍晚才能拿出去，趁着天黑扔到南山坡上。不光是我一个人扔，其他人也都往那里扔，幸亏这些“燃烧弹”每天都被苏军的炮弹炸得无影无踪，所以南山坡才没变得臭气熏天、屎包成堆。

把捆好的“燃烧弹”放在洞边上，顺便歪着脑袋往那个小窟窿里瞅了一眼，这一瞅不要紧，可把我吓了一跳，小窟窿里有一对闪亮的小眼珠!蛇?这样一想我顿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后悔刚才不该在洞里制造“燃烧弹”，是不是黏血便把蛇给熏出来了或者把蛇给勾引出来了呢?这叫什么事呀，现在这不是前门有虎后门有狼吗！不，确切地说应该是前门有炮弹、后门有毒蛇才对。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小窟窿，紧张得全身都哆嗦起来，生怕那蛇会突然爬出来。这会儿比起炮弹来，我更害怕这条蛇了。

5．和一只青蛙交了朋友

天一黑，困劲就上来了，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可是今天再怎么困，也不敢像往常那样倒下去呼呼大睡了。那个小窟窿里的那双闪亮的小眼睛，令我坐卧不安、夜不能寐。就这样睡睡醒醒、醒醒睡睡，折腾来折腾去的，眼终于睁不开了。

等再睁开眼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看看那个小窟窿方向还没什么动静，这才有些放心。刚要爬起来，才发现自己的膝盖上蹲着一只青蛙!那青蛙借着拂晓的一点亮光，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噢，小窟窿里的那对小眼睛，原来是这个小玩意儿呀，不是毒蛇就好了，一颗悬着的心好歹放了下来。

这一夜可真把我给折腾苦了，爬出洞来我使劲儿伸了一个大懒腰，尽情地舒展了一下麻木的肢体，下意识地向蒙古高台方向望去，只见天空一片晴朗，透过云层可以看见通红通红的太阳正在慢慢升起，把东方天空上的云彩映得一片火红。

我不想再看到昨天早晨那悲惨的战斗情景了，所以方便完毕马上就钻进洞里，一个人面壁而坐静静地思考起来。据说螃蟹是根据自己壳的大小而挖洞的，这个青蛙看起来也是根据自己身体大小而挖的洞。螃蟹能挖洞是因为它有坚硬的大钳子，可是这青蛙全身都软软的，它用什么来挖洞呢?并且这个洞看起

来相当长，是不是与外面通着呢?是不是和隧道一样有出口也有入口呢?洞里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可以中途调头拐弯儿，还是像公共汽车一样有好多站点儿?

这个青蛙看起来像个田蛙，但是颜色却跟田蛙不太一样，绿色之中带有一点土灰色，不知道是田蛙生活在土里而形成的自然保护色呢，还是沙漠地带中的田蛙本来就是这种颜色，反正跟日本的田蛙颜色不太一样。

在洞里胡思乱想瞎琢磨，一天很快就过去了，连苏军打没打炮都没注意。

第二天，早晨的阳光从洞口射进来，洞里顿时亮堂起来，揉了揉眼睛正要爬起来时，却发现那个青蛙又坐在我的大腿上，正注视着我。讨厌青蛙的我此时此刻却一点也不觉得这青蛙讨厌，反而觉得它非常可爱，就像一只漂亮可爱的小宠物一样。我用手指在它的嘴上轻轻碰了一下，青蛙没叫也没逃，只是晃动了一下脑袋改变了方向，依然坐在我的大腿上。

这只青蛙好像也挺寂寞的，此后几天，它经常爬到我的脚上、腿上甚至爬到身上来玩耍，每来一次我就能从无聊之中解脱一次。青蛙一爬到我身上，我就一动不动地待着，用眼睛和青蛙玩耍，它好像也能理解我的心情似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两眼一眨一眨地，偶尔突然腾空而起，好像是在空中捕捉苍蝇、蚊子什么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人的眼睛再怎么快也还是跟不上青蛙那快速的瞬间动作。虽然没有看清它在空中到底捕捉到了什么，但是却看见它那像章鱼脚一样的舌头“刺溜”一下伸得老长。吃到一点儿东西以后，青蛙好像挺满足，大摇大摆地向自己的洞里爬去，那架势好像是在说：“瞧，我的本事怎么样?”

不知为什么我也钻进了青蛙的洞里，那是一条阴暗而幽静的地道，地道的墙壁呈琥珀色，地上飘荡着淡淡的紫色烟雾。走啊走啊，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突然宽敞明亮起来，四周是一层闪闪发光的七色光环，光环的下面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莲花池，池中盛开着洁白如玉的莲花。低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站在一片莲叶上了。

池子当中有一个莲花台，有一只青蛙安详地坐在上面，我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这不是常常和我一起玩耍的那只青蛙吗？我伸手想去抓它，可是怎么也够不着，划着莲叶想靠近

莲花台，可是怎么划也靠不上去，莲叶和莲花台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你走莲花台也走，你停莲花台也停。追着追着一下子追到了一条河里，河水蔚蓝蔚蓝的，这不是哈拉哈河吗？河的对岸就是火热的地狱、阿鼻叫唤的战场，东倒西歪的伤员正在那里痛苦地呻吟，无数的青蛙往返于河边与伤员之间，每个青蛙的嘴里都含着河水。

我转过头向哈拉哈河的下游望去，只见运庆仁王[1]脚下踩着的一只癞蛤蟆，正瞪大眼睛瞅着我。

“抬起头来！”阎魔大王突然大声吼道，那吼声真是惊天动地，余音在空中久久回荡。胆战心惊的我刚刚抬起头来，“张开嘴！伸出舌头来！”阎魔大王左手拿着一个大钉子，右手指着我又吼道。我哆哆嗦嗦地把舌头伸出来，“行了，你的舌头不足一寸，说明你不会撒谎。你给我好好听着！人的舌头是为了知味道、讲真话而长的，绝对不是为了撒谎而长的。我的工作就是拔掉那些专爱撒谎者的舌头，所以我的工作没有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人类世界和平的到来。到了那个时候，人类才能从虚伪、欺诈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才能有一个没有战争、真正的和平时代。这个和平时代会到来的，到那时候青蛙将支配你们的这个世界、支配你们人类。这个青蛙女王将成为‘永久和平党’的领袖，将由它来主宰、维持这个永久和平的理想世界。

“为什么呢？因为青蛙生来就不会撒谎、生来就不对人抱有敌意，它善良慈爱，天性开朗。青蛙还是驱除害虫的天才，这说明它具有分辨善恶的本领。并且青蛙的生命力顽强，它不光能在热带、在水中生存，在寒冷地带、在土壤里也能生存，甚至在你们人类所说的冰河时代也能生存。

“青蛙的世界才是万众普生、真正的乌托邦的理想世界，没有你争我斗，就没有相互残杀，有的只是和平、自由、微笑。所以只有青蛙才具有创造天地、主宰天地的本领。你要相信青蛙！只有这样你才能和平地活下去，并且在危急时刻也只有青蛙知道怎么救你。”

阎魔大王说罢，转过脸去对青蛙女王说：“好，给这个人传授‘蛙呆陀罗经’吧。”坐在莲花台上的青蛙女王眨了一下眼睛，微笑着点了一下头。我急忙转过身来，向青蛙女王跪下叩拜，闭

---

[1]运庆仁王：日本东大寺南门的金刚力士像。

目合掌，拜启经文。

青蛙女王慢慢打开一个梧桐木的盒子，恭恭敬敬地从里面捧出一卷紫色经文，然后高高举起来："经文，这就是蛙呆陀罗经的经文。天心地道空行！人类啊，要有真心！要去虚存实！要苦行苦修！"青蛙女王念完以后，严肃地对我说："梦、心、道！这三个字你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连忙给青蛙女王磕头，嘴里喊道："梦、心、道！南无妙法蛙呆陀罗经！天心地道空行！我都记住了。"

青蛙女王听了以后满脸的欢喜，用一片莲叶盛了一些圣水放在我面前，我伸手去接，可是怎么够也够不着，嗓子干得像要冒火，就使劲把手往前伸。

就在这时，随着阎魔大王的一声大喝，就见一道电光石火从天而降，朝着我直劈下来，吓得我急忙挥手去挡……

梦一下子破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呼地一下从地上坐了起来。往地上一看我可就傻眼了：那青蛙四腿朝天摔在地上，四条小腿一个劲地乱蹬，看起来真是可怜极了。

可能是青蛙在忘我地捕捉蚊子时，不小心落到了我的脸上，我在梦中去挡电光石火的那一巴掌，正好把青蛙击落到地上了。看着青蛙的可怜样，我懊悔得不得了，忙弯下身去用手指扶了它一下。

卫生队来到三角山已经10天有余了，几乎天天是接受苏军的炮火"洗礼"，自从发现了这个青蛙以后，一连3天都没有听到炮声，阵地上寂静得令人害怕。我心想，这大概和青蛙的出现没有什么关系吧，会不会是苏军又在研究什么新的作战方案、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战斗呢？

（二）"重炮轰击、猪突前进"——关东军使出"必杀技"

1. 【战史记录】

"短臂"的关东军炮兵

7月22日，阴云密布，细雨绵绵。原定的炮火攻击时间已到，但日军前沿各炮兵观测所普遍反映能见度太差，无法提供

射击所需的精确方位，内山司令官只好通知小松原中将，要将炮击计划顺延至天气转好。小松原指挥的步兵联队此时已在出发阵地各就各位，几万人马只得原地隐蔽待命。在平坦的大草原上，如此大规模的兵力集结调动，根本无法瞒过苏军的侦察机，朱可夫在得知前线日军有异动时，马上命令前线各部用一切办法阻止日军调动兵力，挫败日军这次冒险，不过朱可夫也没有料到关东军这次要跟他赌一把“炮战”，步兵只是陪衬。苏军的炮兵可不在乎天气好坏，他们按提前测好的坐标方位进行概略射击，军属的远程加农炮、榴弹炮，师属山炮、野炮，团属步兵炮、重型迫击炮组成了三道火网，不停地变叉轰击日军集结区域。

日军各步兵联队蹲在草草挖成的单兵坑内，被炸得七荤八素，苏军一颗大口径炮弹的杀伤半径是50米～60米，很多日军士兵不是被直接击中毙命的，而是全身发青被震死在掩体内的。器材损失则更大，工兵分队一半以上的破障器具损毁。各联队纷纷向小松原报告被炸的惨状，要求炮兵还击以解脱步兵的困境，内山少将拒绝重炮还击，理由很简单，盲目还击不仅起不到多大作用，还会暴露目标；还有一点内山不便明说，炮兵各大队的炮弹尤其是150毫米重炮的弹药十分有限，他没有概略射击的本钱。

一天炮击下来，前沿埋伏的步兵部队减员严重，第72联队



将军庙机场的日军九七式重型轰炸机群，这种飞机在诺门罕战争中是关东军的主力机种，被苏军击伤多架，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后期则完全销声匿迹了。（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第2步兵大队（编制1200人）损失最大，仅剩260人，有几个小队（编制80人）竟无一生存，气得联队长酒井躲在沙坑里大骂炮兵"马鹿（混蛋）"！其他联队的伤亡也超过了1/6。晚上，雨停月出，苏军的夜航轰炸机又飞临日军头顶，轰炸了两个多小时，关东军第2飞行集团的战斗机没有夜航能力，前沿的高炮部队也没配备探照灯，只能看着步兵挨炸。步兵联队长们向师团长小松原抱怨道："人家苏军不管白天黑夜，晴天雨天，可是全天候照打不误呀，咱们的大炮和飞机怎么就这么娇贵呀？"小松原有火发不出来，只能坐在掩蔽部内大生闷气。

7月23日，雨过天晴，早晨6点，关东军第2飞行集团终于按原计划出动了，58架九七式轰炸机和战斗机刚飞抵诺门罕上空，便被苏军铺天盖地而来的200多架伊－16、伊－15战斗机给包围了，空中炮声隆隆，黑烟滚滚，一架架中弹的飞机拖着长长的火焰栽了下来。不用说，一大半都是关东军的轰炸机。靠空中力量摧毁苏军重炮阵地，显然是不可能了。

6点30分，日军开始用部分克式山炮做诱饵进行零星射击，企图引诱苏军重炮开火，以寻找其阵地位置。日军断断续续地打了一个半小时，除了引来苏军前沿一些步兵炮和重型迫击炮的还击外，西岸苏军重炮一声不吭。内山等得不耐烦了，命令8时整，所有火炮对预测地域进行全效力射，轰击时间为2个小时。顿时，地动山摇的大炮战开始了。日军76门大口径火炮一起开了火，整个诺门罕战场火光冲天，黑烟弥漫，大地随着炮声一阵阵地颤抖，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炮击，据记载为日本陆军的首次。内山兴奋得热血上涌，坐卧不安，他不但开创了日本炮兵的一个新纪元，而且军部来电还告诉他，本次炮战每门炮至少要打足5个基数。这可是空前的大方，受国力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日军对不同型号火炮每天的耗弹量都有严格规定

日军的150mm重炮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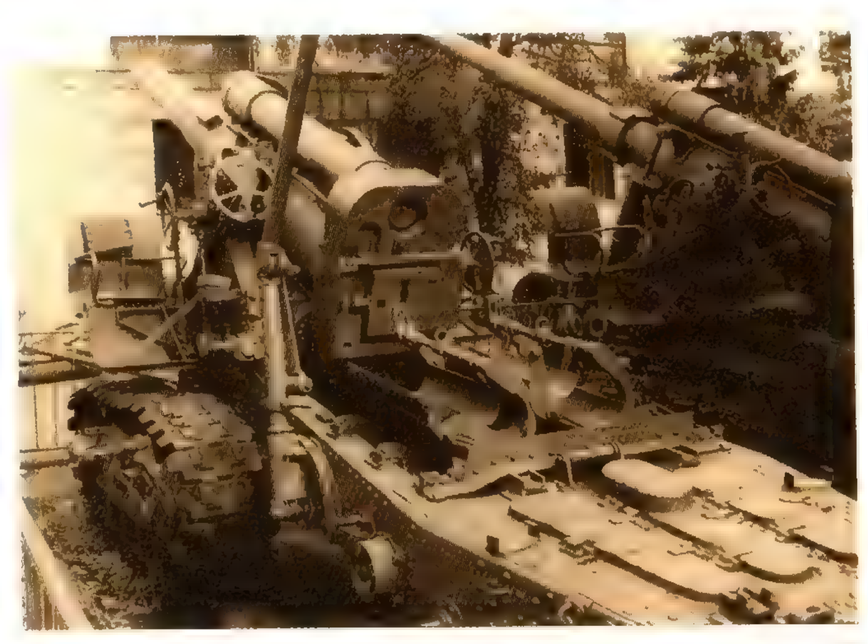
(如100毫米加农炮为50发，150毫米加农炮为30发，150毫米榴弹炮为40发，等等)，所以平常炮兵在射击时都斤斤计较，一次能打1个基数都觉得很奢侈，根本不像苏军那样大手大脚地不停轰击。关东军这次确实要砸锅卖铁拼命了。

不过日本炮兵从未受过10公里以上的远程射击训练，也从未经历过大量炮弹的饱和射击训练，虽打得热火朝天，滚烫锃亮的黄铜弹壳在每门炮后扔了一堆，但从观测气球及前沿观测所传回的消息来看，射击效果不是太好，精度尤为不够。苏军牵引车拖着火炮正从前沿向后撤退，只有不到10门火炮被击毁，冒起了黑烟。内山认为这是因为炮击时间还不够长，临时决定再延长炮击1小时。(这一打，可害苦了小松原的步兵，日军已按原计划在炮击后两小时发起冲锋，刚到苏军阵地跟前，正好被内山的炮火覆盖，苏军又是一通猛揍，步兵两头挨打叫苦不迭，下一章对此有细述。)

炮战到中午，内山炮群一口气打出了5000多发炮弹，这种消耗在日军战史上是惊人的，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几天关东军就得破产。令内山恼火的是重炮相继发生故障，主要原因是炮架强度不够，由于要远距离射击，火炮以最大仰角连续发射时，多门炮炮架折断；另外，炮身过热、膛炸、炮管烧蚀等事故也层出不穷。射程最远的九二式100毫米加农炮竟连续损坏了6门，气得内山暴跳如雷。

下午，转移到新阵地上的苏军炮群开始反击，大量炮弹发出令人恐惧的呼啸声，暴风骤雨般砸在了日军炮兵阵地上，内山的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许多日军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被苏军强大的火力所吞噬，日军官兵在钢铁炽雨和烈焰海洋中哭天喊地，面对苏军排山倒海般的打击，日军还击的火力近乎于呻吟，以至一些步兵部队请求旁边的炮兵

这是当年令日军胆战心寒的苏军1931式203mm榴弹炮，其独特的履带式炮轮很易识别。





日军三七式75mm火炮阵地。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各列强师属炮兵口径均增加到105mm，而日本陆军师团炮兵还以75mm口径作为主要火力单位，火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由于缺少有效通讯工具，加上日军火炮多采用骡马牵引，机动能力有限，因此日本陆军师团炮兵无法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作出快速的火力转移。再加上火炮性能上的差异，日军炮兵很难与苏军抗衡。当然最致命的还是日军战术上的落后。(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千万不要还手，以免招来更猛烈的打击。重炮大队长上村曾连续派出3人传令，但都先后倒在了炮火中，走得最远的一个也没超过200米，日军的通讯联络已完全中断，指挥失灵。由于占有绝对制空权，苏军侦察机直接飞到日军阵地上空校正目标，指挥着炮火将一门门日军重炮打成了一堆堆废铁。战至日落，内山炮群的1/4的火炮被击毁，人员伤亡更是惨重，几乎所有的重炮牵引车、弹药运输车皆被打烂。第1野战重炮联队的三鸠一郎在阵中日记里记载道："苏军重炮数量之多，威力之大，弹药之充足，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他们设有多个假阵地和预备阵地，机械化程度高，可以快速而有效地转移，我军所在阵地，事先已被苏军测好诸元，重要地区还设置了人工土堆作为参照物。这样一来，炮战实际上成了苏军大规模的炮击演习。"更要命的是，苏军的新阵地退后了10公里，在大多数日军重炮射程之外(日、苏重炮性能差距十分明显，同为150毫米加农炮，苏军射程的可达30公里，日本的只有18公里，中、小口径火炮相差更大)，日本炮兵可望不可即，整个下午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其实日军后来连望也望不到了，观测气球被击落后，日军派出的侦察机又接连被击落了3架，内山炮兵基本成了"瞎子"。)

一天下来，日军耗弹1万余发，苏军耗弹3万多发。朱可夫手里还有20多万发炮弹，打下去游刃有余；而内山则消耗了前线储量的2/3，后继乏力。内山心里非常明白，关东军为此战已动用了全部炮弹储备的70%，如果既压制不了苏军炮兵，又封索不住苏军浮桥，那么失败的命运也就无可挽回了。

晚上，关东军连夜召开会议，分析首日战况，研究下一步方案，小松原中将代表步兵部队指出炮兵射击准确率太低，误伤严重，要求炮兵必须趁夜色前移，以便缩短距离，发挥火力。内山则坚决不同意转移阵地。牵引车大半被毁，挽马受惊四散逃脱，在松弛的沙地上移动几吨重的火炮谈何容易，而且构筑火炮发射阵地既要考虑安全隐蔽，又要利于发挥火力，不像步兵那样随便找地方刨个坑就行，一夜之间如何能完成？双方大



没有车辆，在沙地上转移火炮阵地绝非易事，为拖拽一门中型火炮，日军往往要耗用大量的兵力。（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动肝火，争执不下。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左右为难，最后只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两个九〇式75mm野炮大队随步兵前移，重点压制苏军火力，其余原地不动。既然够不着苏军的重炮阵地，下一步就重点打击苏军架设在哈拉哈河上的浮桥，切断苏军两岸联系和补给。

7月24日早8时，日军重炮群再次展开攻击，炮弹纷纷落在浮桥周围，哈拉哈河被打得沸腾起来，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不一会儿，浮桥被击中，碎片四处飞散。日军前沿观察所欣喜若狂地将消息报告给了内山少将，可日本侦察兵很快发现，苏军运输车队、坦克竟贴着水面在河上跑来跑去，内山听后也糊涂了，苏军不可能调这么多水陆两用车辆到蒙古荒原上来呀！（实际上，苏联工兵除架设了一道浮桥外，还在哈拉哈河上修筑了两条“水下桥”，桥面在水面下30厘米处，隐蔽性较强，不走近根本看不出来，而且炮弹不直接命中，很难摧毁这种桥，其安全系数很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时，也多次采用这种“水下桥”，有效地对付了美军飞机的侦察和狂轰滥炸。）

苏军前线炮兵司令高尔金少将发现日军攻击的重点转向浮桥之后，心里乐开了花，如果日军继续对攻，可能还会给他造成点麻烦，这样一来，内山可是自寻死路了。高尔金少将命令所有远程火炮和各旅、团前沿火炮掀开伪装，集中火力痛击日本炮兵。毫无顾忌的苏联红军大声吼叫着冲上炮位，把一发发炮弹填进滚烫的炮膛里，指挥官嗓子嘶哑重复着开火的命令，巨大的轰鸣声让很多红军战士几天后都听不清对面说话的声音。



在关东军“镀金”的日本天皇的女婿、野炮第1联队炮兵上尉——盛厚。

日军炮兵阵地被爆炸的烟尘和掀起的冲天沙尘整个笼罩住了，受惊的挽马嘶鸣着四处乱窜，天皇的宝贝女婿盛厚上尉差点被炮弹掀起的沙土活埋了，等旁边的人七手八脚地把他从土里扒出来时，一个飞上半空的炮车轮子掉下来又砸伤了他。听说盛厚负伤，野炮第1联队长三鸠一郎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炮战这么激烈，如果这位“金枝玉叶”再出点什么问题，他可吃不消。他忙电告关东军司令部，请求务必将这位驸马调离战场，起码也要调出他的联队。植田大将见诺门罕战事一天比一天激烈，正琢磨着找个什么理由让盛厚殿下“体面”地脱离战场，一收到三鸠一郎的电报，便借坡下驴，立即下令调盛厚到驻哈尔滨的阿城重炮联队，继续履行皇族从军的义务。一架小型飞机很快飞抵前线，接走了这位头部擦伤的炮兵中队长。

其他的日本兵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只能守在阵地上挨炮弹，独立野炮第7联队的一个中队长回忆道：“高地一带被黑云一般的烟尘覆盖，能见度只有两三米，呼啸而至的炮弹每秒钟至少有三发，密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一生从未见过的，周围的士兵接连倒下，兵器被毁，战壕坍塌，阵地被打成了蜂窝。”据日军野战重炮第1联队的阵中日记记载：“7月24日，炮战日趋激烈，浓烟遮住了视线，阵地上到处是伤员、尸体和损毁的兵器，火炮无法有效地射击。战至傍晚，阵地上已无一处完好的炮位。”

炮战延续到第三天，更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苏军的机械化炮兵团在几个预设阵地之间不停地转移，灵活地射击，配备的少量自行火炮更是优势明显，走走打打，让日军摸不清方位，日军还击的炮弹大部分都落在了空地上。这一天，内山又打出了最后的3000发炮弹，至此，前线日军储存的大口径炮弹已全部耗尽，全“满洲”总共还剩下不足5000发重炮炮弹，但都远在旅顺要塞，远水解不了近渴，植田谦吉只好命令内山少将停止攻击。内山实际上想攻击也攻击不了了。(据日本战史记载，紧

急补充了一个星期弹药后，29 日，每门炮所分配的炮弹是：三八式野炮 15 发、九〇式野炮 5 发、重炮 10 发。这点炮弹根本支持不了 1 小时。)内山垂下了头，炮兵决战关东军又输了一阵。

2．【战史记录】

两面挨打的“野猪”

7 月 23 日 10 点整，埋伏在前沿的日军 21 个步兵大队在忍受了一天一夜的炮击后，终于熬到了总攻的时刻，几万名日本士兵按原定计划跃出掩体，高呼着“万岁”向苏军阵地发起了“猪突攻击”。内山炮群的突然袭击果然奏效，两岸苏军的重炮部队忙于转移阵地，日军步兵在进攻途中没遭受炮火阻拦。远远望去，日军前锋部队已顺利地冲上了苏军的前沿。小松原激动得热泪盈眶，多日的血战终于有了结果，只要他手下的这几万步兵能冲进苏军阵地展开近战拼刺，胜利的天平就会偏向他这一方。

苏军第36摩步师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步兵炮顶着日军炮火顽强射击，虽然打倒了一片片日军，但并没能完全阻止住日军进攻的步伐，日军前锋一步步地逼近了。就在苏军指挥官下令“上刺刀”准备肉搏时，一排排炮弹突然劈头盖脸砸到了日军队伍当中，冲上前沿的日军在此起彼伏的爆炸中纷纷倒下，苏军趁机一通猛打，剩下的日军在前后夹击下实在顶不住了，像潮水一般退了下去。彼得罗夫少将有些奇怪，幸亏这通炮击压住了日军的疯狂气焰，可自己的炮兵都在紧急转移之中，难道是日军自己打自己？

苏军机械化炮兵可以迅速转移阵地，令日军望而生畏。

的确如此，是内山的炮群打了小松原的步兵集团！内山临时决定延长1小时炮击时，忽略了通知前沿各部队所需的时间，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就日军的通讯技术和水平根本不可能通知到前沿所有部队。(由于苏军在战区实施了强大的无线电





日本关东军九五式轻型坦克和九七式战斗机陆空协同进攻示意图。不过这只是日军的幻想而已，没有敌我识别能力的日军航空兵对此有心无力。

干扰，日军电台成了摆设。各部之间的传令兵常常迷路，汽车一移动马上就成为对方的打击目标，这样日军的命令一经下达就难以变更，作战指挥根本没有灵活性可言。）步兵被这一通轰击给打蒙了，第一梯队几乎全军覆没，关东军航空兵第15战队的一架侦察机正巧在空中发现了这个情况，用无线电疾呼内山司令部："马上停止炮击，笨蛋！"可苏军强大的无线电干扰让内山的指挥部根本听不清侦察机喊的是什么，反而认为是对炮兵战术的鼓励，打得更起劲了。日军退下来后，各个步兵联队均伤亡巨大，联队长们捶胸顿足，大骂内山的炮兵，发誓战后要将这位糊涂的炮兵司令官送上法庭。小松原在日记中写道："整个白天的攻击简直是一场谋杀。"误炸对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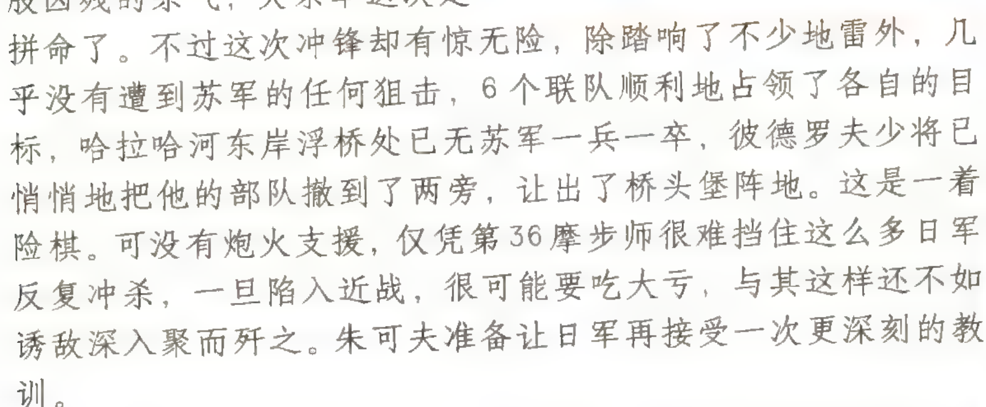
日军在武士道精神的支撑下，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再次越过了哈拉哈河。（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伪装在浓密草丛中正伺机射击的苏军平射炮兵。

士气的打击是不可挽回的，冲在前面的几个步兵大队都是第23师团和第7师团的精锐主力，在内山和彼得罗夫的“合战”打击下，已荡然无存了。小松原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动员部队休整后再发起第二次冲锋。

两个小时后，日军重新发起了集团冲锋。阳光下，几万把闪亮的刺刀明晃晃地射出一股凶残的杀气，关东军这次是拼命了。不过这次冲锋却有惊无险，除踏响了不少地雷外，几乎没有遭到苏军的任何狙击，6个联队顺利地占领了各自的目标，哈拉哈河东岸浮桥处已无苏军一兵一卒，彼德罗夫少将已悄悄地把他的部队撤到了两旁，让出了桥头堡阵地。这是一着险棋。可没有炮火支援，仅凭第36摩步师很难挡住这么多日军反复冲杀，一旦陷入近战，很可能要吃大亏，与其这样还不如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朱可夫准备让日军再接受一次更深刻的教训。



第72联队率先沿着苏军的“水下桥”冲过了哈拉哈河，这是诺门罕战争中日军第二次登上蒙古土地，也是最后一次。日军刚刚爬上足有五六十米高的河岸，顿时就傻了眼，面前从僧布敖拉东到西山口的蒙古大草原上，600多辆苏联各型坦克、装甲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旷野上，炮口、枪口一齐指向河岸，正等着敌人送上门来。随着一声炮响，所有的枪炮几乎同时喷出了火焰，1000多名傻乎乎站在河岸上发愣的日本士兵被打得血肉横飞，翻滚着摔下河沿。后面的日军看不到蒙古高台上的情况，还在低着头向上猛冲，苏军装甲部队像狩猎一样，稳稳地将一片片冲上高台的日本兵打下河去。此时，日军所崇尚的刺刀在苏联的装甲面前变得一文不值，联队长酒井首先发现情况不妙，感觉是中了苏军的圈套。苏军的坦克离河岸边缘足有200米远，日军携带的反坦克手雷根本够不着，机枪、掷弹筒打过去也不起作用，步兵冲上高台立足未稳便被打倒，毫无还手的机会。照这样打下去，不一会儿全师团都得打光了。酒井急忙



诺门罕战争纪念碑。

下令“肉弹突击队”掩护，其余人员立即撤回东岸。

过河容易想回去可就不容易了，雅柯夫少将的第11坦克旅立即发起了追击，日军的“肉弹”们拼死阻拦，一个个怀抱地雷、背负炸药躺在路旁道边，准备等坦克开近后与之同归于尽。雅可夫少将的坦克一马领先冲在前面，日军好像发现了这辆带着两根天线的坦克不一般，立即组织了十几名“肉弹”队员，他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护卫坦克虽然打倒了大部分日本兵，但还是有一个军曹借坦克观察的死角扑近了坦克。随着一声巨响，浓烟烈火吞没了这辆T—26指挥坦克，雅柯夫少将和车组人员全部牺牲，这是苏军在诺门罕战争中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军官。(雅可夫少将牺牲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第11坦克旅也被命名为雅可夫坦克旅。至今在蒙古巴彦察干山上还耸立着一座数十公里外就能看见的纪念碑，碑座上放着一辆T—26坦克，碑上用镏金大字写着：“献给苏联红军雅可夫旅的坦克兵——1939年7月1日至7月5日巴彦察干战役中大胜日军的胜利者。”)

雅柯夫少将的牺牲，激怒了所有的苏联坦克兵，战车部队像疯了一般冲进日军队伍中左突右冲，“肉弹”再多毕竟也是肉的，终究阻拦不住苏军的钢铁洪流。第11坦克旅一气夺回了“水下桥”和东岸的阵地，没逃过河的日军要么当了俘虏，要么掉

进哈拉哈河里喂了鱼。第36摩步师也从两翼包抄过来，日军三面受敌，往下退的部队和继续往上冲的部队撞在了一起，乱成一团。小松原见大势已去，急令内山炮兵群立即开炮支援，被苏军炮火打昏了头的内山炮兵又一次把炮火倾泻在小松原的步兵头上，与苏军又来了一次成功的"前后夹击"。

战至日落，小松原步兵集团好歹趁夜色逃回了自己的阵地，清点一下人数，半数"玉碎"，中队长以下的基层指挥官损失了70%左右，当然这也有内山指挥的炮兵部队的"功劳"。日军一贯不注重步炮协同作战，平时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小松原看着丢盔卸甲的部队，只好独自吞咽苦果。仗打到了这种地步，内山这个炮兵司令官是干不下去了，他只好将职务交给了旅顺重炮第3旅团的烟勇少将，自己灰溜溜地回了长春。不过他却因祸得福，虽说大丢面子，可也捡了一条命。诺门罕战争后期，日军炮兵指挥部被苏军装甲部队奇袭，全员"玉碎"，内山闻之好不庆幸。

3. 关东军炮兵的眼睛瞎了

7月25日，卫生队驻扎在733高地的时候，突然从第二线方向升起一个乌黑的、像个大秃和尚一样的大气球。

我先是大吃一惊，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以后，禁不住想："混蛋！在这种地方升起这么大一个黑茄子，岂不是找死吗？"卫生兵有的说它像个大黑茄子，有的干脆就说那简直就是个呆和尚。

望眼欲穿的重炮好不容易拖到诺门罕来了，哪知道哈拉哈河西岸的蒙古高台比东岸要高出五六十米，从东岸看不到西岸，所以重炮难以发挥其威力。为了既



日军炮兵侦察部队正在为观测气球充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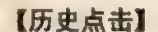
节约炮弹又打得准，关东军急忙把独立气球中队调往诺门罕，在穆陵重炮团的炮兵阵地上升起一个巨大的侦察气球，用来侦察和观测苏军的炮兵阵地情况，以便给重炮部队提供准确的炮击方位和目标。

侦察气球升起来还不到10分钟，一架苏军飞机便低空袭来，“哒哒哒”地一阵猛烈扫射之后，就见那个大黑气球在空中变成了一团通红通红的火焰。过了一会儿，又传来“轰”的一声爆炸声。不用说，乘坐在气球上的侦察官兵也和气球是同样的命运了。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以为有航空兵在空中警戒和保护呢，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飞机的影子，倒是看见不少苏军的飞机从头顶上一掠而过。后来才听说，护卫气球的只有一门高射机关炮，其他什么保护措施也没有。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上升起这么一个引人注目的大气球，却又没有任何空中警戒和护卫，这不是在给苏军飞机提供射击目标吗?这不就等于告诉苏军:气球下面就是我们的重炮阵地，你来炮击好了。简直是毫无头脑的胡来，这样的举动连小学生都会觉得可笑。无谋、无策、无头脑、无责任感……除此之外无法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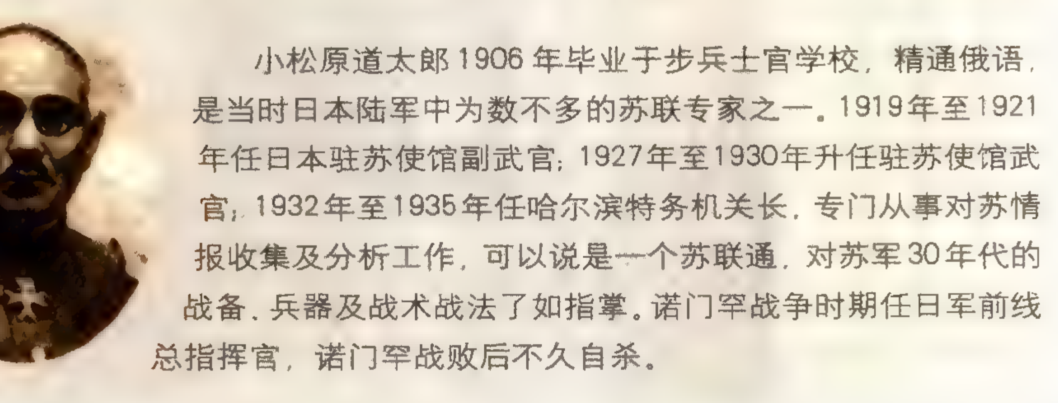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关东军真是束手无策、走投无路了，实在也找不出什么好办法。一个气球被炸事小，但它给第一线官兵心理和精神上造成的压力却太大了，一些官兵马上就垂头丧气了。

“陆空一体”一词在日军中也经常使用，但实际上只不过是


【历史点击】



小松原道太郎



小松原道太郎1906年毕业于步兵士官学校，精通俄语，是当时日本陆军中为数不多的苏联专家之一。1919年至1921年任日本驻苏使馆副武官；1927年至1930年升任驻苏使馆武官；1932年至1935年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专门从事对苏情报收集及分析工作，可以说是一个苏联通，对苏军30年代的战备、兵器及战术战法了如指掌。诺门罕战争时期任日军前线总指挥官，诺门罕战败后不久自杀。

一个华丽的措辞而已，从来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和训练。翻阅一下日本帝国军队的侵略史，历来都是陆军制陆，海军制海，陆航制陆空，海航制海空，陆海空协同作战的“光辉事例”空无一页。

要问为什么，一句话：出力不讨好，功劳不好分。陆海空为了各自的功名，历来都是你抢我夺、明争暗斗，哪里还有心思去搞什么协同作战。



士气高涨的苏军飞行员。7月份苏军牢牢掌握了制空权后，苏军飞行员的士气越发高涨。

诺门罕一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陆航只打空中的飞机，空中有苏军的飞机我就飞，没有我就不飞，陆地战是你们陆军的事，由你们自己解决，和我无关。事实上诺门罕之战后期，第2飞行集团消耗殆尽，制空权也被苏军给夺走了，战争就更与陆航无关了。

苦就苦了第一线的士兵，坦克撤走、重炮不灵、飞机不飞，升起的那么贵重的一个大气球又在空中被炸了，期待就像肥皂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侦察气球不但没能帮上忙，反而成了苏军飞机的射击靶子。

4. 为谁而战——士兵的愤怒

今天整整一天，一发炮弹也没有打过来，听不到爆炸声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蹲在洞里寂寞难受，连那可爱的青蛙好像都懒得出来了。真想出洞去散散心，可是那无疑会招来炮弹，等于去送死。

外面寂静得可怕，听不到任何人的声音。部队怎么样了？大家是否都还活着？会不会只剩下我一个人，其他人都走了或者都死了呢？脑海里就像过幻灯片一样，不安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闪过。

一直等到天黑，阵地上才传来士兵们相互打招呼的声音。我从战壕里爬出来，一边和他们打招呼一边方便起来。

呼伦贝尔已是秋色浓郁，一到晚上萧瑟的秋风一吹，肌肤甚感寒冷。荒草丛中白色的芒穗随着秋风左右摇摆，在傍晚的



日本裕仁天皇。1945年，身着戎装的裕仁天皇像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二战末期，他有许多结束战争的机会，可以使千千万万的人免于死亡，但他就是迟迟不肯宣布投降，直到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拖至8月15日，他才最终无奈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从此结束。（出自《时代周刊》，1945年）

雾霭中显得格外洁白、漂亮。

望着眼前的这夜景，寂寞惆怅的我禁不住吟了两句小诗，以抒发一下自己伤感的情怀：

北飘云间月光淡，茫茫草原忧无限，
天地幽暗虽无尽，炮弹无眼且心安。

转过身正要往回走的时候，却发现身后不知什么时候站着四五个卫生兵，一个个都沉默不语、表情阴郁。

这时，一个平时严肃得像个萨摩武士一样的上等兵站了出来，说："军医，让我来上两句诗吧！"

此天此地此山中，来日遍野暴尸横，
武励空挂魂魄去，血气男儿留空名。

诗作得怎么样不说，他吟诵的语调很低沉，使本来就阴沉的气氛显得更加沉闷、阴郁起来。

"混蛋！什么叫'血气男儿留空名'?啊?"我的好朋友松永大声吼叫起来，他抓起一把沙土狠狠地摔在地上："咱们要是战死了，一张讣报就给打发了，连个空名也留不下，死了也白死！留名的是军部的那些人，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叫他妈的什么事呀。"

松永愤怒的吼叫，使我大为震惊。松永上等兵在卫生队里是我的一个臂膀，从开战到现在我们一直一起出生入死，他是一个正直老实的士兵，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诚实温厚的老实人，竟然也会如此愤怒、如此怒吼。

松永也参加过第一次诺门之战，并且亲眼见过战场上日军横尸遍野、狼狈不堪的样子。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只是在军统制度之下这么说下去的话，没准儿会惹出什么麻烦来，所以我忙对大家说："咱们这么多人老是待在这儿也不好，时间长了很危险的，大家还是快回去吧。"

钻进自己的战壕里，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刚才的那一幕，使我的胸口有些隐隐作痛，那沉闷阴郁的气氛让人喘不过气来。

松永只是一个士兵、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可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心底也会有这么大的愤怒。这愤怒是对那些不顾第一线士兵的死活、一味下令“肉弹猪突”的关东军上层指挥的一种抗议，也是对自己被逼向死亡的一种反抗。



青蛙连续三天没有露面了，今天却慢慢悠悠、大摇大摆地爬了出来，一副惟我独尊的样子。它爬到我的腿上坐下来，“骨碌”一下转了转两个小眼珠，算是和我打了个招呼，那神态真是招人喜爱。

阳光从洞口直射到青蛙的身上，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看着看着，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小家伙是不是一个小精灵呢?会不会是那冥土的使者呢？这么一想又有些害怕，眼前这个小家伙也越看越像个可怕的小妖精了。

这当然是错觉、是一种心理作用，是一种被逼向死亡而感到恐怖时的心理作用。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现在都很脆弱，以至于卫生队有的人在夜晚把枯尾花当成了幽灵，吓得大吼大叫。

从遥远的721高地方向，隐隐约约传来噼噼啪啪像炒豆一样的枪炮声。战斗打得好像很激烈。从炮弹爆炸的频率来看，就知道肯定不是日军大炮打的，不用问，一线阵地上的日军又挨打了。我已经没什么感慨了，大概是听得太多变得麻木不仁了吧。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下，日本深感兵力不足，开始疯狂扩军。

上图为日本开展大规模的战前准备，对永平寺僧人也进行了军事训练。

下图为日本妇女进行射击训练。

不过从这乱七八糟的队列中除了能感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疯狂外，很难看出有什么实际效果。

天空上出现了两架乌黑的苏军飞机，由北向南飞去，也许是低空飞行的缘故，令人觉得飞行速度相当快，从头顶上“嗖”地一下就飞过去了。自从筱原准尉阵亡的那场空中大战以后，苏军的飞机从我们头顶出现得越来越多了，肯定是要发生更大规模的战斗了。



这场诺门罕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打起来的?诺门罕只不过是一片荒野、一片毫无人烟的荒野，那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来打仗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处于下层的我们这些兵卒们来说，是无权知道、无法理

【历史点击】



日本军刀

日本军刀，主要是指1934年至1945年间旧日本“皇军”陆、海、空军官和士官佩带的颇具日本传统的指挥刀。

明治维新后，日本陆军的战术和军制师从德国，当时连指挥刀也跟着西洋化了。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3月11日中国军队第29军第37师大刀队在赵登禹旅长的率领下，乘雪夜迂回至喜峰口日军侧后，摧毁敌炮兵阵地，歼敌服部炮兵大佐以下步、骑、炮兵3000余人。中国大刀凛凛生威。当时的日本报纸说：“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以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因此，日军遂于1934年废弃华而不实的西洋式指挥刀，军官一律改佩日本式的军刀以谋应对。

一般日本刀刀柄与刀刃的比例是1：4，刀柄双手持握，劈刺凶狠有力，是杀伤力较强的一种冷兵器。

日本的军刀等级森严，刀穗是日本军刀重要的饰物，丝带内侧的色彩，以金、红、蓝等颜色作为区分将、佐、尉军阶的标志。军刀刀鞘与挂钩连接的环也因兵种不同而有区别，陆军为单环，海、空军为双环。

1935年起士官也配发军刀，称九五式军刀。士官军刀刀刃有血槽，型制与三八式步枪配用的三十年式刺刀相似。

在军国主义熏陶之下，军刀成为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像步兵重视刺杀训练一样，军官从军校开始就注重军刀搏杀的“剑道”训练。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由于侵略扩张需要而急剧扩充，军官只配发军服和手枪，军刀、望远镜等物品皆需自己掏钱购买装备。许多世家子弟带着家传的战刀出征，既想沾点祖宗的余威保佑平安，又有为战刀添彩的愿望。但再好的战刀也挽救不了其灭亡的命运。

日本军刀在侵华战争中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1937年10月侵华日军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率部攻占南京后，所属的第6、第18、第14师团和国崎支队烧杀最为凶残，中华门、通济门、挹江门、下关等处的屠杀都是第10军所为。柳川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曾丧心病狂地说：“请问日本哪一位将军的军刀上没沾过血，战争还分得清士兵和百姓吗?将军挎宝刀，功在杀人多!大和民族的武威离不开一柄青锋杀人刀!”

日本军刀的另一作用是战败后切腹。在军校中就有武士道的剖腹程序训练。二战期间，许多战败的日军指挥官都选择了剖腹自杀的方式，以显示其“武士道”精神。

日本军官受日本传统武士道的影响，钟爱自己的军刀，视其为精神象征。1945年中日双方在研究日军投降问题时，还专门研究过投降日军的军刀问题。冈村宁次在9月2日向何应钦提出《有关停战协定之请示事项》，共五条，其中第一条第二款要求“请允许指挥官携带刀剑返回日本”，立遭中国拒绝。据记载，仅在中国抗战胜利后受降时就接受了日本军刀30多万把。由于内战爆发，这些刀大都失散于民间。曾有这样一件事，在遣返回国的日本战俘船上，一个大佐仍像往日一样向一群士兵发号施令，一个士兵发现这个军官没有带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就问：“长官，你的军刀呢？”军官遂羞愧无语。

（沈克尼·《日本军刀》）

解的。再说了，哈拉哈河这边是中国的领土，那边是蒙古的领土，而在此大动干戈的却是日本军。简直是笑话。我们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 亚洲邻国的民众能不讨厌日本吗?

诺门罕战争爆发之初，我曾经跟随东八百藏搜索队到哈拉哈河进行过侦察，当时只发现几个蒙古兵在饮马，如果这就是导火线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就更令人气愤了。

当时哈拉哈河两岸都是蒙族牧民，他们经常策马来这儿喝水、饮马，所以为了争水而发生一些小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可为这么一点小事关东军就出动正规部队大打出手，就像路人吵架你出来干涉一样，怎么说都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日本正在发动“大东亚战争”，实施所谓的“圣战”，关东军先是一马当先侵占了满洲，接着就在满蒙边境和苏联干上了，苏蒙两国不能不想日本关东军到底想干些什么。

惨就惨了我们这些士兵了，明明知道这是一场不义之战、一场必败之战，可是却不得不服从命令，不得不跑到这片茫茫的旷野上来打仗。这是为什么呢? 可谁也不敢说，谁不服从命令谁就会被贴上“非国民”的标签，让你和你的一家老少一辈子不得翻身。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这些士兵又和奴隶有什么两样?愚顽胡来的军部又和暴力团、黑社会有什么两样?

在这个空旷的荒野之上，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蚊子、苍蝇，没有充足的饵食它们好像也能生存似的，生命力实在是惊人地旺盛。尤其是这蚊子，真是令人头痛，你在外面方便的

这么一会儿，就会遭到成群结队的蚊子的袭击，咬得你满屁股疙瘩，痒得难受。为了对付这些讨厌的蚊子，后来每人发了一个防蚊面罩，睡觉的时候得戴着面罩才行。万一面罩没戴好，露出一点点空隙，马上就会成为蚊子攻击的目标。这真可称得上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来侵占别人的领土，异国的蚊虫就来咬我们。

光线透过薄薄的晨雾照射到大地上，要是在内地的话早就该听到雄鸡报晓了，可是在这茫茫的荒野之上却什么也听不到。爬出战壕活动一下筋骨，凉风一吹令人觉得甚是爽快。红日正在一点一点升起，站在山顶上看得清清楚楚，那气宇壮大的景观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使人怀疑这一切是不是神在天上操纵的。

5. 准备“玉碎”——怨恨满腹的遗书

卫生队在三角山上镇守待命已满两个星期了，头一个星期是连日的“炮火洗礼”，三角山都快被打得变形了，可是到了后期却意外地平静，这几天一发炮弹也没打过来。

其实我们心里越来越恐慌，这会不会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时寂静呢？因为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蒙古高台上来回移动的机动车辆比以前明显地增多了，这意味着要打更大的仗了。三角山上虽然听不到炮声，但是大家心里更加惶恐不安。

可是，军队统帅部的头头们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起码我是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行动。除了每天督促一线部队修筑过冬工事外，就是让人都躲在战壕里待着。恐怕武器弹药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为什么不赶快运输补充呢？拥有几十万兵马的关东军不会只待在原地挨打，连个办法也想不出来吧？



日军一个兵步班在阵地上苦苦支撑着。（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傍晚时分，卫生队接到命令：“卫生队明天一早向巴尔夏嘎尔高地（733高地）转移，今晚所有人都要写好遗书。”每人还发给了两张信纸。

“要命的时刻终于到

了!”接到这个命令以后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拿起笔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写、写什么好了，再说就是写了又能怎么样?在这炮火连天的荒漠，遗书也不知道能不能转交到家人的手里，还是算了吧。待了一会儿，又一想反正也没事，让写就写吧。于是把信纸铺在膝盖上，用一支破烂铅笔头潦潦草草地写了起来：



一群群日本兵在军国主义狂热的鼓噪下，稀里糊涂地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炮灰。

“遗书：拂战尘，望明月。”

这是遗书的开头，猛一看这像是一首超越忧伤、歌颂月亮的短诗，其实我是想借此讽刺一下当时的军政统治。从表面上看自己是以一种无怨无恨的心情去迎接死亡，实际上是把诺门罕比作尘埃，说与其打这样的仗倒不如一死来得痛快，起码可以使自己的灵魂像月亮一样清澄无埃。因当时有军统监视，为了不给家里人招惹麻烦才采取了这么个手法。

遗书是写给妻子的：

“把孩子健康地抚养长大，老父老母也拜托给你了，向街坊邻居转达我的问候，我在阴间祝你幸福。”

这封遗书现在还在我手里，只是原本字写得就不怎么样，再加上当时是在一种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心情下，以膝盖代替桌子而写出来的，所以根本拿不出手来。

淡淡的月光透过薄雾洒落到三角山上，洒落到卫生队的阵地上，洒落到每一个战壕里。可是，此时此刻在我看来，那已经不是什么战壕了，而是一口口棺材!一口口单人棺材！棺材里面坐着悲哀的士兵，他们一边给妻儿老小写遗书，一边抽泣不止，思念遥远的故乡、思念故乡的亲人。

我蹲在那口“大棺材”里写好遗书，然后仔细地把它折叠起来揣进怀里。遗书是写好了，但是心里却充满了怨恨：为什么要我们写遗书?为什么要我们来送死?为什么要我们到诺门罕来？为什么非要为这么一块不毛之地去流血？这种怨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膨胀，愤怒的血直往头上涌，我的怒气终于忍耐不住爆发出来。

我手提祖传的宝刀“长船”，像个夜叉一样吼叫着冲出了那口“大棺材”，在夜雾迷蒙的三角山上疯狂地挥刀乱砍、歇斯底里地怒号起来。直砍到筋疲力尽再也挥不起刀了，直喊到连叫唤的力气都没有了，才停止折腾。到如今也搞不明白，自己那时为什么会那么疯狂、会如此失去理智，只觉得那是我的亡灵似的。

当时处于精神错乱状态的，不光我一个人。士兵们虽然不像我一样乱砍乱叫，但是他们心中的怨恨并不亚于我。既然要写遗书，既然要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出来，那么就应该有个去死的理由，就应该有个正当名分吧?可是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名分就叫你去死，你又怎么能没有怨恨呢?又怎么能想得通呢?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去死，家里人又怎么能知道呢?这样的遗书有什么意义呢?

军队统帅部连个理由也不说就让士兵们写遗书，这简直就是无视人格的暴行，所以我们有怨恨也是理所当然的。怨恨自己宝贵的生命遭涂炭，怨恨自己的鲜血就这么白流，怨恨自己的诚实遭到了戏弄。

其实命令写遗书的理由是无法解释的，或者说是不用解释的，如果硬要解释的话，那就是这个样子了：命令你们明天向733高地转移，要求你们冲到苏军的炮火里去当炮灰！冲到苏军坦克下去送死！士兵如同虫子，虫子死多少都是无所谓的！

发泄完后，我精疲力竭瘫倒在地，张开大嘴“呼哧呼哧”一个劲儿地喘。

透过薄雾可以看见一轮明月悬挂在中天上，明月的下面飘着一团黑云，看着看着忽然那团黑云变成了一群饿鬼，那是“猪突”而死的士兵们的亡灵，他们正在天空中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呐喊，在悲痛地放声大哭……我赶紧把眼睛闭上了。

醒来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浓雾飘进战壕里，使人觉得肌肤有些寒冷。爬出洞来，迎着晨风使劲儿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头脑这才觉得有些清醒了。

向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方向望去，一望无际的云彩在阳光的映照下五彩斑斓，壮观无比，宛如大海的万里波涛一样。云涛下面就是草原，在阳光的映照和云彩的衬托之下，大草原显得是那么宽广辽阔、生机勃勃。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觉得这个世界是那么美好、那么动人，我禁不住感叹起来：“还是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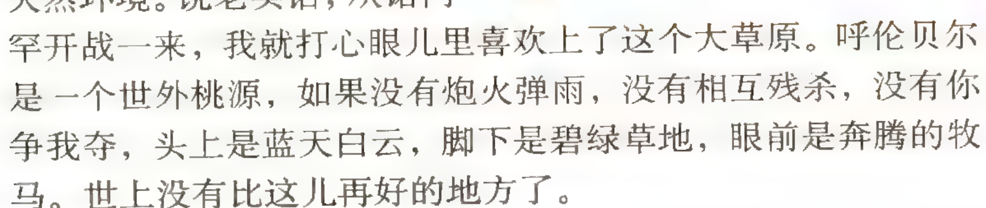
在这个世界好啊！”



苏军的BT－7型坦克。1931年，苏联设计了一种基于美国“克里斯蒂”坦克的简化型坦克，称为BT快速坦克。1935年又设计出更优秀的BT－7快速坦克。该坦克采用新设计的炮塔，安装一门45mm火炮和3挺7.62mm机枪。乘员3人，还换用了柴油发动机，使机动性有明显提高，装甲防护也有所加强。BT快速坦克经过多次改进，已具有现代坦克的特点。该种坦克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诺门罕战争、苏芬战争和苏德战争等。草平看到的就是苏军坦克第11旅的一辆BT－7快速坦克。

突然，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逃跑！逃向呼伦贝尔！扔掉刀枪拿起牧鞭，在呼伦贝尔这个美丽的大草原上放牧，在这里平平安安地过上一辈子！

我的性格是很适合放牧生活的，很适应呼伦贝尔的天然环境。说老实话，从诺门罕开战一来，我就打心眼儿里喜欢上了这个大草原。呼伦贝尔是一个世外桃源，如果没有炮火弹雨，没有相互残杀，没有你争我夺，头上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碧绿草地，眼前是奔腾的牧马。世上没有比这儿再好的地方了。



“逃，还是不逃？逃了会怎么样？不逃又会怎么样？”几个问号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海里不停地转动，我一时下不了决心。诺门罕开战以来，我豁出命来在炮火弹雨的第一线救护伤员，有好几次差一点丧命，有过不满、有过怨恨、有过悲愤，但是从来没有想过逃跑。今天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脑海里会突然产生逃跑的念头？

天渐渐亮了起来，我返回战壕里无力地坐下来，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怎么理也理不出个头绪来，看着挂在洞壁上的祖传宝刀发起愣来。这把宝刀是祖上传下来的，名叫“长船”，从军出征的时候老父亲把它送给了我，并且嘱咐道：“出门在外不知道都能遇上什么事，但是有两句话你要记住了，一是不要撒谎骗人，二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当时我根本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一个耳朵听另一个耳朵就冒出去了，根本没往心里去。可是现在想起这句话，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似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我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事到如今才知道了这句话的分量，要是真的逃跑了，我的一家、我的亲属们就要受到牵连，他们在国内就无法抬起头来，这还不说，更可怕的是还要受到军政当局的凌辱和迫害。一个人逃出去了，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过着悠然自在的放牧生活，我是满足了，可是，将有更多的亲人为此而倒

霉，为此而低着头过一辈子。

想来想去，只好打消逃跑的念头。那么眼前的路只有一条了，那就是去当炮灰，去送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伤感之余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学生时代经常唱的一支歌——“流浪歌”：

流啊流，
山涧的清泉，
昨天流向东方，
今天流向西，
流浪的归宿在哪里？

为什么死到临头了却忽然想起了这支歌，连我自己也觉得有些纳闷，唱完后一想，军队不就跟流水一样吗？从日本流到满洲、从海拉尔流到诺门罕、从河东岸流到河西岸、从乌兹尔湖流到伊林银查干湖、从伊林银查干湖流到三角山，现在又要从三角山流向巴尔夏嘎尔，然后再流向哪里？哪里是我们这些人的归宿？没有人知道，大家都像流水一样身不由己，只能是随水漂流、死无葬身之地了。

“军医！军医！马上就要进——军——啦。”听到洞外有人呼喊，我急忙爬了出来，一看是渡边伍长，他故意把“进军”两个字拖长，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有意嘲弄这次行动，遥相呼应，我也来了一句：“是吗，那咱们就来个呐——喊、突——击吧！”

日军的这种75mm火炮，显然不是苏军122mm火炮的对手。



回到洞里，我向坐在地上发愣的青蛙说了一声：“青蛙阁下，草平走了！”然后背起自己的行李，挺起身来整整衣帽，正儿八经地给青蛙打了一个敬礼，转身就钻出了战壕。

只听身后传来“呱呱呱”几声低沉的叫声，我知道那是青蛙在哭泣。

6．苏军遗弃的新坦克

早上8点来钟，三角山上的士兵们都陆陆续续下来了，山下的大道上这儿两三个、那儿四五个凑在一起，一个个吊儿郎当、松松垮垮，没有人来点名也没有人去排队。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就像春天一样风和日丽，太阳一出来晒得人懒洋洋的，看看这天气再看看眼前这光景，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不是去打仗，而是战后回国似的。想想也是，我们这一伙人在三角山上待了这么长时间，尤其是后一阵子，听不到炮声也听不到枪声，整天蹲在战壕里除了睡觉就是胡思乱想，大家已经把战争给忘记了，或者说是对战争已经麻木了。

一个军官发出了出发的命令，没有人去排队，大家三三两两跟在下士的身后就出发了。

队伍踏着低矮的杂草，很快行进到了胡鲁斯台河的下游，这儿是一片潮湿地带，到处都生长着茂盛的河柳，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一个个大的河柳丛。哪个地方有河柳丛就说明哪个地方潮湿，所以部队尽可能绕开这样的地方，在河柳丛之间迂回前进。

绕过一个河柳丛时突然发现柳树下停着一辆苏军坦克，大家吃了一惊，四散卧倒，仔细观察一会儿，才发现这辆坦克大概是陷进沼泽地动弹不了了，坦克上上下下完好无损，看不出有激战过的痕迹，坦克的四周散乱地放着一些炮弹，大概有人已经跳进坦克里面去过，不然的话炮弹是不会自己跑出来的。等了好一会儿，见坦克没有动静，我们便围了上去。

我问道："谁会开坦克？"周围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吱声。我抱起一颗炮弹研究起来，从这颗炮弹的长短、大小来看，大约是日军坦克炮弹的两倍。

看着这颗炮弹，我眼前一下子浮现出那天早上日军坦克被击中燃烧起来的情景。当时日军的炮弹打不到苏军坦克，而苏军的炮弹却能打到日军坦克，现在看来如果苏军的炮弹是日军的两倍的话，那么射程大概也得是两倍吧？怪不得苏军坦克那么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呢。不光是炮弹大出一倍，炮筒也几乎长出一倍，所以在同等的距离内，日军的坦克炮弹只能在离苏军坦克老远的地方炸起一股沙尘来，而苏军坦克却能很轻松地把日军坦克给干掉。

研究完了炮弹以后又想研究研究这个坦克。我曾经玩过汽车，对开车多少有一点经验，汽车和坦克应该都是一个道理，没准儿我能把坦克发动起来，要是再能把坦克开回去的话就更好了，还能立个功什么的。再说这辆坦克还挺新的，既有利用价值又有情报价值，日后肯定会派上用场。

打开顶盖跳进去一看可傻眼了，敢情开坦克和开汽车完全不是一回事，里面根本没有方向盘，只有两根操纵杆，再加上这坦克又是苏联造的，根本就找不着门路。想找个人问问，可是出来一看坦克四周一个人也没有了，队伍已经走出去好远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种寂寞感、恐惧感突然劈头袭来，我也顾不上再去研究什么坦克了，急忙爬了出来，一溜小跑就追赶队伍去了。

一边追着队伍一边想，为什么日军不把这辆坦克拖回去呢？这不是研究苏军坦克的最好机会吗？坦克师团的头头们是不是都被打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诺门罕之战从某种意义上讲，胜败的关键就取决于坦克的性能，这也是第一线士兵们的亲身体验。退一步说，即使已经掌握了苏军坦克的资料，这可是一辆崭新的坦克，拖回去修理一下不是还能用吗?为什么把这么新的坦克扔在这儿不管了呢?琢磨来琢磨去，不管从哪个角度琢磨，我至今对统帅部的做法都无法理解。

与此相反，苏军则非常重视收集日军的兵器情报，并且对此加以研究，以开发新的对抗兵器。苏军不像日军那样打士兵消耗战，而是尽可能用近代化兵器来解决问题，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尽可能采取科学合理的战略战术。坦克虽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却能体现出对近代战的认识、对士兵生命的重视程度，况且日军的兵器性能及数量还达不到苏军的一半呢。

一边琢磨一边走，时间过得也真是快，不知不觉就到了733高地了。“停止前进！在这个战壕镇守待命！”命令一出，大家呼啦一下都跳进了战壕，先放下行李喘口气儿。这里的战壕和三角山上的“章鱼罐”不一样，说是战壕其实就是在地上挖了一条深沟而已，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只有炮兵部队才用这样的战壕。

跳进战壕没一会儿，有一个人笑嘻嘻地朝我走来。他的脸已经被太阳晒成紫褐色了，咧嘴一笑时只有牙齿还是白的，原来是担架小队的小队长岛田少尉。他向我“哎——”地打了个

招呼，我应了一声，刚想和他聊上两句，他却举起手："回头见了。"撂下这句话就急急忙忙地跑开了，看样子好像有什么紧急任务一样。

原来岛田的担架小队就在左前方200米的一个小沙丘上待命，从那个小沙丘再往前300来米的地方有一个大沙丘，高度跟三角山差不多，大家称其为巴尔夏嘎尔高地，海拔733米，军事上叫733高地。诺门罕一带是一片平均海拔700米左右的半沙漠半草原地带，说是海拔733米，其实也就是一个30来米高的沙丘而已。

冈田炮兵大队的一个分队已经在733高地上布好了阵地，下午3点来钟日军的大炮开了火，一连向苏军的阵地上打了五六发炮弹，一些士兵顿时拍手欢呼，就像孩子过年放鞭炮一样高兴。可是欢呼声未停，苏军大炮就开始还礼了，30来发炮弹一口气打了过来，是这边的5倍以上，士兵们都抱着脑袋趴在战壕里，除了祈祷一点办法也没有。

冈田炮兵分队好像很不服气，苏军的炮火才停了几分钟，他们又挑衅似的打了3发炮弹，这3发炮弹可真把苏军给惹火了，马上就还击过来几百发炮弹，打得733高地四周硝烟弥漫、沙土飞扬，不时有人中弹大声惨叫。

部队冲着炮兵叫喊道："别打了！"我也觉得炮击没什么用，要打就来个彻底的，要不打就干脆一发也不打。火炮不行却偏要逞能，打那么几发炮弹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说，反而暴



躲在这种极为简陋的掩体里，日军被打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露了自己的炮兵阵地，徒增伤亡，这不是欠揍吗？

炮火一停，忽听有人喊：“岛田小队长被活埋了！”岛田肯定是和我在三角山的情况一样，是被炮弹掀起来的沙土给压住了，要不赶紧挖出来的话，人在里面时间一长就会被憋死的。我抓起急救箱猫着腰一溜小跑奔了过去，等赶到时岛田已被担架兵挖了出来，脸上苍白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我急忙给他检查了一下，除了有一点缺氧症状外，没有发现别的问题，总算是拣了一条命。

过了一会儿，岛田又重新站了起来，士兵们为救助成功而欢呼，可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硝烟一散，夕阳又照射到阵地上，岛田还在不停地和士兵们说着话，大概是在讲述刚才差一点去了另一世界的感受，夕阳把他的身影投射到还冒着烟的地上，拉得老长老长的。

岛田少尉没有死在诺门罕，而死于两年后的太平洋战争。

第五章 横扫千军如卷席





第五章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朱可夫开始反击

【相关背景】

诺门罕战事已持续了3个多月，日军虽一再受挫，却没有丝毫的退意，反而有越打越大的势头。尤其是近期的一系列战斗，兵力规模越来越大，日军动用的重武器越来越多。苏军空中侦察又发现，从将军庙到阿木古郎一线长达70公里的草原上，布满了日军宿营的帐篷，而且在滨洲线(哈尔滨到满洲里)、白阿线(白城子到阿尔山)上，关东军的运兵专列绵延不断。一切迹象表明，日军在诺门罕绝不会就此罢手，关东军有将战事蓄意扩大甚至演变成日苏战争的意图。前线捕获的日本俘虏竟来自十几个不同建制的部队，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朱可夫的判断，继续被动防御已无法扼止日军的疯狂意图，连续的胜利使苏军充满了自信，士气高涨。到了该大反攻的时候了。

斯大林非常赞同朱可夫的判断，他进一步指出：远东地区如爆发苏日大战，将与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的苏联基本国策发生矛盾，日军在哈拉哈河畔的肆意挑衅和冒险，很可能是在德日反共协定中早就商定好的，以吸引苏联的注意力，并将苏军主力牵制在远东，从而配合纳粹德国在欧洲的行动。朱可夫的及时反击会打乱日军的企图，是非常聪明的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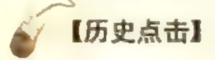
苏军总参谋部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决定将驻蒙第57特别军升格扩编为第1集团军，在蒙的4个摩托化步兵师，3个装甲汽车旅，3个坦克旅和新到的1个伞兵旅以及所有炮兵团、旅都暂归第1集团军管辖。7月15日，朱可夫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命令朱可夫的第1集团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结束远东战事，并从欧洲地区调动兵力，再向第1集团军增派2个摩托化步兵师和1个机枪旅、1个坦克旅。(由于补给的原因，



斗志昂扬的苏军正离开欧洲驻地奔赴远东前线。

朱可夫把这些援兵大都放在了乌兰巴托一线，作为战役预备队。）

朱可夫和第1集团军的将领们反复研究，都感到如不干净利索地歼灭日军一两个主力师团，不完全摧毁其部署在哈拉哈河东岸的重炮群，日军就不可能认败服输，远东边境也不可能有长期的稳定。但诺门罕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不允许苏军向前线再增派更多的兵力，朱可夫只有靠加强一线部队的火力部署来达到目的。到反攻前，苏军一线步兵师的重武器配备已比正常编制超出50%，作战的坦克部队由驻温都尔汗的2个坦克旅补充调换战损车辆，使出动率始终保持在100%。所以日军面对的一直是坦克第11旅和装甲第9旅，可怎么打也不见少。朱可夫这一招果真奏效，关东军惊叹苏军的火力之猛、装备之多远远超出他们的想像，后期日军越打越沮丧（草平在这本回忆录中就多次感叹关东军技不如人，各方面差距甚大），连关东军高级将领也开始怀疑日军这样的装备能否完成“北上”任务。据伪满兴安师上校正珠尔扎布回忆：1943年，驻五叉沟的中将师团长笠原和阿南大将在王爷庙会谈时说：“（一旦执行北进方案）幸



【历史点击】

蒙古援助和动员



诺门罕战争爆发后，蒙军骑兵第6师、第8师在前方协助苏军浴血奋战。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由于部队经验不足，伤亡很大，骑兵第6师师长沙日布、国境警备队政委色德布、炮兵政委格勒格巴特尔等先后牺牲。为鼓舞军心，蒙古人民军副总司令拉格巴苏荣大将代表统帅部向前线立功官兵颁发了红旗勋章和战功奖章，1300多名士兵火线入党入团。6月下旬，蒙军最高统帅乔巴山元帅亲临哈拉哈河前线，视察并慰问了一线官兵，蒙军士气大振。

为弥补前线伤亡，蒙古宣布全国进入总动员，19岁到35岁的男子准备应征，所有军校的三、四年级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开赴前线。蒙古对这场战争志在必得。

亏我们现在是助攻了(指从五叉沟、海拉尔方向)，负担不太大，东部(指绥芬河、宁古塔一带)才是主攻方向，要打起来可真够他们受的。”关东军由刚开始狂妄地挑衅“求战”，到这时已变成了推诿“怯战”。



政治鼓动和适时的奖励是苏军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

从历史上看，无论俄军还是苏军，无论是在日俄战争还是在列强干涉十月革命的战争中，对日作战都鲜有胜绩，以致造成当时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对苏联军队的战斗力持怀疑态度。这次诺门罕之战，憋了一肚子气的苏军当然想扳回一局。从政治角度上说是为国家荣誉而战，从军事角度上说，这也是欧洲大战前检验新装备、新战术以及锻炼新一代指挥官的难得机会。为此，苏联红军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特别是注重发挥政治鼓动的优势：各级政工人员深入到连队、排、班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军事指挥官则向刚从内地调来的士兵传授在沙漠、草原地带战斗和生活的经验；大批年轻的士兵火线入团、入党，先进个人和连队受到了隆重表彰。苏军前线部队的士气被充分调动起来，群情振奋，志在必得。

朱可夫是苏联将领中极为冷静和细心的人，擅长大兵团作战的他，非常了解后勤保障对于现代战争的作用。早在刚刚接手哈拉哈河战事之际，他就及时安排了2个铁路工程兵团和1个筑路工兵营开始抢铺博尔集亚至蒙古的铁路。58天后(即苏军发起总攻前)，铁路如期铺设到324公里外的桑贝斯(今蒙古的乔巴山市)，使补给线缩短了近一半，为快速集结物资和调送兵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同时，苏军还集中了近4000辆载重卡车

和1400辆油罐车，日夜不停地从桑贝斯向哈拉哈河抢运物资。到总攻前共运送了炮弹1.8万吨、航空炸弹6500吨、各种燃油和润滑油2.3万吨、食品4000吨、其他物资4500吨，总计6万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朱可夫创造了一个奇迹。相比之下，关东军同期竭尽全力也只向前线补充了1500吨物资，一线士兵的饮用水问题也没能解决。日军一个师团的辎重兵联队在编人员不多，一般只有1000人左右，多是警卫部队和管理人员，其余为军事雇佣人员，如司机、装卸工等，战时靠就地征用民间车辆和民工挑夫来弥补运力不足。日军在诺门罕前线的卡车总共不足700辆，有些还是民用车辆，根本不符合在崎岖道路上行驶的军用标准，经常抛锚。据关东军后勤部战后分析，当时前线日军共缺少运输卡车约3000辆。日军落后的补给方式和后勤观念使部队的粮弹在诺门罕战争中始终处于青黄不接的窘境。

为确保反攻的突然性，苏军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总攻计划只有集团军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和作战部部长清楚，所有战役计划、命令、战斗号令及有关作战文书都由司令部的一名专门的打字员打印。并规定，8月18日前，一切部队不准进入进攻出发地域，潜伏到前沿勘察地形的各部队军官一律换成士兵着装，战斗开始前3小时，再向一线士兵下达作战动员令。

雨季泥泞的道路使日军汽车兵和辎重部队叫苦连天，一筹莫展。

为麻痹日军，苏军无线电干扰部队停止了对诺门罕地区的通信干扰，还故意泄露了许多假情报，日军第7师团就曾多次截获苏军前沿部队反映构筑过冬工事的木料不足以及水泥质量不好的电报；苏军同时还把大功率音响装置运往前线，模仿打桩的声音，给日军造成一种要在哈拉哈河西岸修建营房、工事，准备过冬的假象。苏军甚至还在前线散发了一些《战士防御须知》的小册子，故意让其落入日军手中。



装甲部队在集结过程中，一律利用夜间或恶劣天气，并用轰炸机低空编队飞行来掩盖声音，前沿值班火器也进行射击以分散日军注意力。到后

来，苏军坦克兵索性故意拆除了几辆坦克发动机上的消音装置，日夜不断地在前方开来开去，使日军对坦克引擎声逐渐习以为常。(到总攻前夜，当苏军大批坦克部队向前秘密移动时，还是引起了日军前沿哨兵的警觉，但日军值班军官接到报告后，轻描淡写地答复："不用理他们，朱可夫总得让他的部队有点事干。"欺骗战术奏效了。)

面对苏军的秣马厉兵，关东军的反应相当迟钝。7月29日，植田谦吉大将亲自到了将军庙，这是诺门罕战争爆发后，关东军司令官首次抵达前线视察。当植田拖着一条假肢笨拙地走下飞机时，小松原中将带着由将校军官排列成的方阵正在等候着他的检阅。植田在号兵演奏的军乐声中一瘸一拐地一一检阅了第23师团，第7师团，第14旅团，第8国境守备队(旅团)，第1独立守备队(旅团)，旅顺重炮第3旅团，穆陵重炮联队，独立野战重炮第7联队，野战炮兵第1联队，野战炮兵第13联队，高射炮兵第4联队，炮兵情报侦察联队，工兵第23联队，独立工兵第24联队，汽车兵第4联队，步兵第64、第71、第72、第26、第28联队，陆军航空兵第2飞行集团第7、第9、第12、第15飞行旅团，以及伪"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兴安骑兵师的军官方阵。植田怎么也搞不明白，关东军出动了这么多部队，近

【历史点击】

植田谦吉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植田为进攻上海的第9师团长。事变结束后，植田谦吉因与第19路军作战有功被天皇授予一级金鹰勋章。4月29日，驻沪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并庆祝"天长节"(日本天皇的生日)，朝鲜义士尹奉吉携带炸弹袭击了主席台，植田被炸断了一条腿（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等人当场被炸死），伤好后不方便再随野战师团四处征战，故瘸着一条腿到了伪满洲国，升官当了关东军司令官。后因诺门罕战争失败而被免职，转入了预备役。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



日军新任第6军军长荻州立兵在检阅部队，不过此时的日军已是穷途末路了。

10万人马，怎么就是打不过朱可夫呢?问题是不是出在部队调度和指挥上？他还真猜对了，朱可夫无论在战略战术上，还是在指挥调度上，都比他高出了一大截。

植田来前线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前一阶段炮战中受伤的东久弥宫盛厚殿下授勋。天皇的东床快婿从海拉尔乘飞机赶到了将军庙，接受了一枚一级武功勋章后又匆匆乘机返回，弄得在场的日本将佐们面面相觑：一个受了点轻伤的普通陆军上尉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吗?

植田谦吉返回长春不久，东京大本营8月4日下令在海拉尔成立第6军司令部，统辖所有诺门罕战区的部队，司令官由第13师团荻州立兵中将担任。新成立的第6军兵力上没有什么变化，除了把第7师团留在齐齐哈尔的最后一个联队(缺一个大队)也调到前线外，几乎兵还是那些兵，将还是那些将，只多了一层指挥机构。(日军糟糕的补给系统使关东军再也无法向前线增兵了。)

荻州飞抵将军庙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战况不明。小松原和前线的将领对他采取了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地面侦察发现对面的苏蒙军队正在“专心致志”地修建永久性过冬工事，偶尔的几次空中侦察，除了发现川流不息的苏军运输车队外，几乎没有发现哈拉哈河西岸地区的苏军有任何新动向，整个诺门罕战场上看不出苏军有发动反攻的迹象。荻州立兵的第6军司令部认为苏军的载重卡车像这样的运输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在沙原过冬需要抵御—40℃的严寒，构筑几万人住的过冬工事当然要准备大量的物资才行，这样运输是正常的；而且苏军也不可能在8月份从西部沙漠地带发动进攻，饮用水和酷热都是大兵团作战无法克服的障碍。荻州的这种判断和小松原他们的意见不谋而合，关东军一致认为当前的任务是做好过冬准备，待物资储备充足后，养精蓄锐以备明年开春再战。

在准备反攻的这段时间里，朱可夫感到自己已经疲劳到极点，他双眼布满血丝，声音嘶哑，特别想打瞌睡。但他凭借着非凡的毅力坚持着。他的桌子上总是放着几杯酽茶，借此提神醒脑。靠着一种坚强的意志，朱可夫保持着惊人的精力，焕发出无穷的智慧。8月中旬，一个好消息传来，纳粹德国再次明确拒绝了日本要求军事结盟的请求，同时前线侦察发现担任侧翼阵地掩护的伪“满洲国”兴安骑兵师不堪日军的虐待，发生大规模溃散。朱可夫将军发起总攻的决心就更大了，时间初步定为8月20日(星期天)上午6时，因为按照惯例，此时前线日军将校级军官有半数要轮流到海拉尔去休假。(果不其然，那一天连第6军司令官荻州立兵也在远离战场200多公里的海拉尔休假，日军前沿部队40%以上的军官缺员。)进攻的命令20日凌晨2点45分传达到一线连队，对面的日军阵地仍是一片沉寂，苏军的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和保密性。



伪满兴安骑兵师。此师的主要军官皆由日军现役军官担任，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皆为蒙古族，擅长骑射。该师下辖6个团，其装备与日军基本相似，当时被认为是伪满洲国中最精锐的部队，由于不堪凌辱，蒙族官兵大量逃亡，一个师最后仅剩下31个人，其中30个是日本人，剩下的惟一一个蒙古人还是从小在日本长大的——兴安师上校正珠尔扎布。

(一) 再次上前线

1. 出师不利——医务长死了

8月17日。早晨醒来一看，阵地上空一片晴朗，通红通红的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虽然我们每个人怀里都揣着遗书，但是至少今天早上没有去送死的迹象，没有枪声也没有炮声。

连日来老是做噩梦，但是昨天晚上却睡得很香，没有再做噩梦。昨天行军的疲劳也缓过来了，身体觉得十分轻松，吃罢早饭大家无事可做，一个个就呆坐在战壕里眼望着天发愣。

正在这时候，上面传下“卫生队向尼盖索里莫特转移”的命令，并且还派来了一个引路的向导。卫生队刚刚来到第一线，为什么又叫我们向后方阵地转移呢？没有人给我们解释什么，也没有人向我们说明什么，后来才听说，师部要求部队尽可能节约第一线兵力(可能是在苏军炮火的封锁下，补给异常困难吧)，抽出一部分兵力到后方修筑工事，准备冬营。

引路兵哼着小调在前面带路，卫生队三三两两跟在后面，

怎么看都给人一种松松散散的感觉，不像是一支部队。

到了尼盖索里莫特，想不到秦医长笑嘻嘻地出来迎接我们了。看见秦医长真是喜出望外，秦医长也挺兴奋："这不是草平吗?你还活着呀，太好了太好了，能活下来就不容易呀。"说着眼圈儿都红了，一张笑嘻嘻的脸也变得通红通红的。看到秦医长那高兴劲儿，我的心里热乎乎的，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尼盖索里莫特也是一片荒野，但是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儿到处散生着一些低矮的灌木，甚至有的地方还生长着一些瘦小的松树，所以大家都称这一带为"尼盖索里莫特森林"。秦医长手下有30来个人，我这边也有30来个人，真是人多力量大，大家齐心协力动起手来，没多长时间就在小森林里建起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临时医务所。

临时医务所建起来以后，秦医长说："咱俩还是老规矩，挖一个双人战壕吧。"挖双人战壕当然没有意见，但是在哪儿挖我俩却产生了分歧。

秦医长说就在前面的一个断崖下挖一个猫耳洞，可是我却认为这样挖不安全，有塌方的危险，建议找一个平坦的地方挖一个章鱼罐式的战壕。秦医长坚持自己的主张："有灌木生长的地方才不会塌方呢，就在这儿挖吧。"尽管我一百个不愿意，可我还是迁就了秦医长，挥舞着铁铲就在断崖下挖了起来。

秦医长睡起觉来依旧是躺成一个"大"字，打着闷雷一般的鼾声呼呼大睡，完全不去管什么危险不危险。我可难以高枕无忧，一直担心猫耳洞会出现塌方，所以两眼一直盯着头顶上的土壁，一个晚上都迷迷瞪瞪的，没有得到一点安宁。早晨起来觉得脑袋痛得厉害，便冲着秦医长发起牢骚来："你那呼噜真够水平，搅得我一个晚上都不得安睡。我说呀，这个猫耳洞让给您老人家了，我干脆还是再挖一个吧。"

没想到秦医长却哈



日军的骑兵巡逻队，旁边是蒙古敖包。

哈大笑起来："开玩笑吧？打呼噜的是我还是你？快天亮的时候我听到呼隆呼隆地响，开始还以为是打雷了呢，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你小子打呼噜呢，还说我呢，真是的！行了，行了，别哭丧着脸了，告诉你吧，咱们俩可是分不开的。我是一只老虎你就是一对翅膀，这就叫如虎添翼嘛，放心吧，放心吧，咱们俩只要在一起呀，谁也死不了！"说完笑嘻嘻地摆了摆手，哼着小调就走开了，弄得人哭笑不得，一点办法也没有。



日军第23师团的士兵在诺门罕用空油桶搭起的高台上警戒。

没过多长时间，秦医长又板着脸回来了，说是步兵部队今晚要去夜袭，上面有令要卫生队随队参加。"怎么样？今晚你带队跑一趟好不好？"秦医长沉思了半天才开了口，并不是下命令，而是以商量的口气说的。秦医长平时对我不薄，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哪有不去的道理呢?于是我一个立正敬礼："哈依！下官遵命，今晚带队参加夜袭！"

老天爷保佑，夜空中既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大地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率领几个卫生兵，带上急救药品，跟在夜袭部队的后面就出发了。夜袭部队是一支小部队，看上去还不足一个中队的兵力。看着这支部队我心里直犯嘀咕：就这么几个步兵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部队在黑暗中摸索着行进了4公里左右，前面忽然传下令来："卫生队在这儿待命，没有命令不许擅自行动！"

夜袭部队一走，卫生队就像一个孩子被扔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上一样，一种恐怖感顿时涌上我们心头，可是喊又不敢喊，动又不敢动，只能趴在地上两眼紧紧盯着前方。"前面随时都有可能打起来，也许就要动手了，也许马上就要展开一场血战了！"我心里这么想着，竟止不住地哆嗦起来。

可是，等来等去前面什么动静也没有，听不到枪声也听不到呐喊声，不见夜袭部队返回，也不见有谁前来跟我们联系。卫生队就像一群被狐狸骗出来的小羊羔一样，陪伴着我们的只有寂寞和恐怖。我心里不禁有些焦躁："怎么回事儿？会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3点了，黑夜也渐渐地变成了白夜，相互之间隐隐约约能看见对方的脸了。我越发焦躁不安起来："天要是再亮一点的话，卫生队可就回不去了！怎么办？"我虽然实战经验不多，但是凭直觉判断，夜袭部队应

该已经撤退回去了，所以才没有谁来管我们。

这夜袭部队真是可恶，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不说，撤退时总该告诉我们卫生队一声，把我们扔在这儿不管，还让我们没有命令不许擅自行动，哪有这么胡来的？“待命”就是送命，不能再等了，所以我马上下令：“卫生队全体撤退，马上行动！”

我一边观察着前面的动静，一边开始往后撤退。可是走了没多长时间，就发现自己的身边只剩下一个兵了，其他人一听到撤退早就撒腿跑了。

去时慢回时快，看来真是那么回事儿，去的时候觉得走了好半天，回来的时候觉得一会儿就到了。回到卫生队的阵地，我想还是别去钻那个猫耳洞了吧，进去肯定会把秦医长给吵醒的。何必呢，再说天快亮了，也睡不了多长时间，随便找个地方迷糊一会儿就得啦。心里这么想着，我就和卫生兵在旁边的一块草地上躺了下来，也许是一夜的紧张和疲劳的缘故吧，一倒下就酣睡过去了。

“军医！军医！”听到有人在急三火四地大声呼喊，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呼”地一下从地上爬了起来。

“秦、秦、秦医长他……”听到“秦医长”这三个字，我的脑袋“嗡”地一下，“不会是秦医长出了什么事儿吧？”我急忙跑到猫耳洞一看，糟了！猫耳洞已经塌了！看不到秦医长，只看到他的刀把儿露出一点点。我顿时从头一下子凉到了脚后跟。

“快挖！快挖！”我嘴里喊叫着，手忙脚乱地和士兵一起拼命挖起来。好不容易才把秦医长从乱石堆里挖出来，急忙给他检查，可是心跳和呼吸都没有了，瞳孔已经散大，身体也僵硬了。太晚了！时针正好指在5点上，东方地平线上的红日正要升起的时候。

向前线秘密集结的苏军。就在草平等人为塌方的猫耳洞悲伤时，大批苏军正向前线秘密集结，日军的末日快来临了。



刚刚返回来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从猫耳洞里传出的鼾声，那么也就是在我刚刚酣睡过去的时候，猫耳洞出现了塌方，把秦医长活活地埋在里面了。

“当初我说要在平地上挖一个章鱼罐式的战

壕，可你不听，非要在断崖下挖什么猫耳洞，你怎么就那么固执呢？”看着秦医长那冷冰冰的尸体，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

与秦医长那悲惨的命运正相反，跟随部队参加夜袭本来是走向死亡之路，可是对我来说却成了逃生之路。夜袭战并没有打起来，我只是离开猫耳洞在漆黑的露天地里转悠了一夜，没有遇上子弹也没有遇上塌方，拣了一条命。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神灵在保护着我呢？我既为秦医长难过，也为自己的侥幸逃生而出了一身冷汗。

命运总是这样捉弄人，下令参加夜袭的秦医长死掉了，而执行命令参加夜袭的我却活下来了。卫生队的军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报告军医，卫生队全体集合完毕！”我慢慢拔出军刀，高高举过头顶，哭嚎似的叫喊道：“全体立正！举枪！收枪！默哀！”阵地上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大家都深深地低下头。默哀结束以后没有人离开，队员们依旧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大家心里可能都在想，秦医长今天的命运会不会就是我们明天的命运呢？

哈拉哈河渡河作战失败以来，日军一败再败，卫生队整天钻到“章鱼罐”里躲避苏军的炮火。卫生队就像是一艘小船，一艘在黑夜里漂流的小破船一样，现在这艘小破船又遇上了狂风



日军也在不停地转移阵地。

怒涛，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每个人都性命难保。漆黑的夜里找不到灯塔，看不到亮光，小破船随波漂流，死亡就在前面等待着我们。

这一天都干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到了傍晚突然刮起了大风，狂风卷起沙土漫天飞舞，吹得人睁不开眼。倒塌了的猫耳洞上面生长着一棵瘦小的灌木，小灌木在狂风中左右摇摆晃动得厉害，仿佛是在诉说着什么，又好像是在低声哭泣。

“准备前进！”第二天一早，听到集合的命令，我才醒了过来，睁开睡意蒙眬的双眼瞅了瞅，发现天已经大亮了。想爬起来可就是起不来，身子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一样，好沉好沉的。睁大眼睛仔细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身体的一半已经埋在沙子里了，裤腿里、袖口里灌满了沙子，嘴里、耳朵里、鼻子里也全是沙子，嗓子干得难受，像要冒烟似的。再看看大家，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活像从沙土里刚刨出来的木乃伊。

这茫茫荒野上的风沙实在是厉害，一夜之间至少给尼盖索里莫特盖上了一层15厘米厚的黄沙。

2．泥泞中的行军

卫生队一大早又接到了向2号阵地转移的命令，这些活着的“木乃伊”们只好急忙打起背包，朝着2号阵地出发了。

2号阵地位于752高地南侧约3公里处，说是阵地，其实根本就没有个阵地的模样，只不过是一个不大的沙丘而已。至于为什么让卫生队向2号阵地转移，我们当然还是一无所知。

大量的日军被调往前线。



每个人怀里都揣着遗书，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可是没有人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死，只是等待、等待。有的时候甚至让人觉得等得有点不耐烦，这样活着简直比死还要难受，真不

如冲到哈拉哈河里，来个一了百了。前进是地狱，后退也是地狱，明知是地狱，可还是不得不往前走。

狂风卷着黄沙漫天飞舞，尽管戴着风镜和口罩，黄沙还是一个劲儿地往眼里、嘴里钻，一咬牙就“嘎吱嘎吱”地响。嘴里嚼着沙子，嗓子干渴得冒烟儿，眯缝着眼睛跟着队伍往前跑，生怕自己落下了。人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越是要走向死亡的时候，求生的欲望也就越强烈。

忽然觉得有什么冰凉的东西打到脸上，噼里啪啦越打越猛，打得脸好疼，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天空已是乌云翻滚，狂风卷着沙土就像子弹一样劈头盖脸打下来。雨水打到脸上并不觉得怎么疼，可是这泥雨打到脸上却真是疼痛，就像三九天的雪豆打到脸上一样。

草原的气候变化无常，刚才还是风沙满天，转眼之间就是狂风暴雨。不过这泥雨倒让卫生队这些“木乃伊”们高兴了起来，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只不过这泥雨并不是甘甜的。摸着脸上的雨水，队员们一个个禁不住咧开大嘴笑了起来。脸上的雨水激起了我们喝水的欲望，干渴的喉咙越发觉得痒痒，扬起头张开大嘴让雨水往嘴里流，想滋润一下冒烟儿的嗓子，可是这雨水到了嘴里却很难咽下去：与其说是雨水倒不如说是泥水更合适。

蒙古荒原的风沙昨晚给我们洗过一个“风沙浴”，今天又给我们洗了一个“泥水浴”。卫生队一伙人就像刚刚从稀泥里钻出来的泥鳅一样，满身满脸都是稀泥巴，只有眼睛还闪亮，只有牙齿还是白的，一个个滑稽可笑。

天上是雨水，地下是泥水，我们这些泥人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行军，越靠近前线大家好像越不知道害怕了。

上午10点，我们这些泥人终于到达了2号阵地，向部队长报到以后，大家马上开始更换衣服。你说巧不巧，我们刚刚换完衣服，天就一下子晴朗起来，风也停了，雨也停了，太阳也从天上露出了笑脸儿。

一个中尉把我领到一个隐蔽壕的洞口，说你先在这儿休息休息吧，说完就走开了。我站在洞口漫不经心地往四下看了看，忽然，我吃了一惊：“这不是福田军医吗？”原来从第一次诺门罕之战以来就一直下落不明的卫生队见习医官福田，就坐在洞



前线家书抵万金。由于拥有绝对制空权和强大的火力压制能力，苏军战士可以安谧地在前线掩蔽部外阅读家信。

口最外边的地上！

福田这时也认出了我。他先是一脸的惊讶，然后露出了一口的白牙笑了，“呼”地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你小子原来还活着呢！怎么也没个信儿呢？”“还没见到你，怎么能死呢。”我们俩一边开着玩笑，一边聊了起来。经过这么多激烈的战斗，两个人都能平安地活下来，并且能在这么个时候、在这么个地方相遇，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我们俩说话的工夫，阵地的上空不时有炮弹带着呼啸声“嗖嗖”地掠过，飞向后方的日军阵地。2号阵地上只是偶尔有几发重迫击炮弹落下来，爆炸声不大，造成的伤亡却不小。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这么多人就在苏军的眼皮底下，他们的重炮炮弹为什么不向2号阵地打呢？

福田说，这是因为2号阵地离苏蒙军阵地太近的缘故，所以苏军重炮才不敢轻易地往这儿打，怕伤着自己人。只不过苏军的坦克经常会攻击到眼前袭击一下，除此之外蹲在隐蔽壕里还是比较安全的。伤员都是被迫击炮打伤的，所以伤势并不严重。福田军医还说，镇守这个2号阵地的是山县部队。

听了福田军医的一番解释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我往隐蔽壕里面瞅了瞅，隐蔽壕分内、外两个洞，里面的洞面积大约有10平方米，高约3米左右，专供高级军官使用。外面的洞小一些，面积只有六七个平方米，高度也比里面的要矮一些，下级军官都集中在这里。像我这样地位低一些的，就只能挤在靠近洞口的地方了。

洞口修得很小，进出时得弯着腰才行。隐蔽壕的顶上是一排圆松木，松木的上面是一层1寸厚的木板，木板的上面是一层沙袋子，沙袋子上面铺着5层钢筋水泥板，每层大约有5寸

厚，再上面又是一层松木、沙袋子、钢筋水泥板，最上面又盖了一层沙土作隐蔽。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坚固的隐蔽壕，这很可能是工兵部队的杰作，步兵是修不出这么坚固的隐蔽壕的。

诺门罕之战爆发已经快3个月了，虽然每个人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但是现实却是令人绝望的，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现实，面对死期的到来。说老实话，大家的精神状态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二）在酒井联队的阵地上

1. 第一次当“肉弹”

我们在暴风雨中的移动，可能早已被蒙古高台上的苏军给发现了，到了2号阵地没有一会儿，阵地前200多米的地方就出现了两辆苏军坦克，坦克炮加上追击炮一齐向2号阵地开了火，一时间阵地上沙土飞扬，隐蔽壕里硝烟弥漫。我蹲在洞里木然地瞅着外面，心里没怎么害怕，只是默默地听着炮声，静静地等待着炮火的停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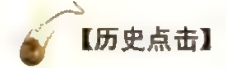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我禁不住爬出洞往外看，只见一辆苏军坦克爆炸燃烧起来，另一辆见势不妙掉转方向仓皇逃去，躲避在隐蔽壕里的人真是又惊又喜，禁不住欢呼起来。福田军医兴奋地告诉我这是渡边伍长的战功，他用反坦克地雷把苏军的坦克给炸了，以前他还用同样的方法炸毁过一辆装甲车。

苏军T35型坦克。

T35型坦克是苏军当时最大的一种多炮塔重型坦克，战斗全重达50吨，坦克乘员11人，武器装备有76.2mm坦克炮1门、45mm坦克炮2门、7.62mm机枪5挺。诺门罕战争中，苏军使用了当时所有的各类型坦克，甚至包括尚在实验中的，目的是在实战中检验其性能。T35型坦克虽然理论上火力强大，但行动缓慢笨拙，容易被日军的“肉弹”利用其观察死角贴近炸毁，故不为苏军看好。

当天下午，又有两辆大坦克攻了过来，这次坦克的后面好像还跟着一些苏军的狙击兵。两辆大坦克一直攻到离隐蔽壕只有15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辆坦克既不开枪也不打炮，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就在这时，悲惨的事情发生了——诺门罕战争已经过去近40年了，但那悲惨的镜头至今仍然深深




【历史点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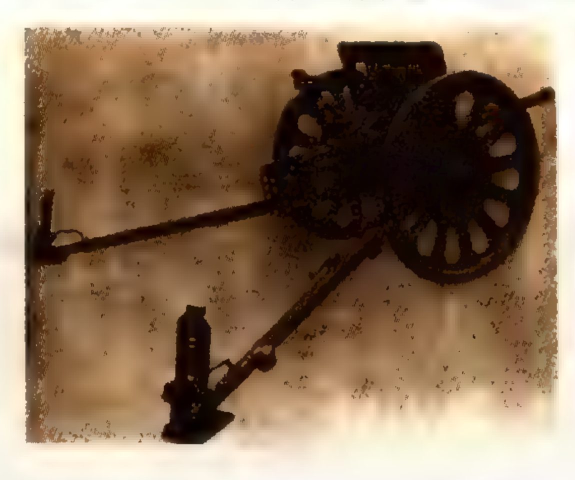


日本的反坦克战术及武器

日军在二战时的反坦克武器，最有名的是反坦克机枪和一种小口径反坦克火炮。反坦克机枪就是九七式20mm 自动反坦克枪，它是日本最接近独创性的一种武器。但这种反坦克枪，连同一个满装的弹夹一起，共重69kg，也是当时同类武器中最重的一种，机枪班必须借助两个特制的提把才能勉强搬动它。由于过于笨重没能大量装备。再就是三四式37 mm速射炮，这种火炮可以分解成若干部件进行携带，也可使用车辆或骡马牵引。它的炮身在同一方向上可以转动60度，为左手方向的炮手提供了一个较大的活动空间，并且它的左轮可以在不脱离轮轴的情况下向外偏转45度。除了这个新颖点以外，它与当时世界上的37 mm火炮并无很大区别，它一直被沿用到战争结束。在日本步兵师团内，每个步兵联队辖属一个反坦克炮兵中队，这个中队标准的火炮装备数量是6门，这些火炮往往会被推到步兵防区内，作为近距离反坦克防御使用。其缺点是不便于隐蔽，而且一旦被摧毁，全联队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反坦克武器。

至于位于散兵坑内的日本步兵，则很少有什么有效的反坦克手段。1939年曾生产了一种磁性雷，它可以紧紧地吸在坦克的任一部位上。这使日军认为：向坦克投掷磁性雷不失为消灭坦克的一种好方法。当时日军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到建立“肉弹攻击”小组上，这些小组专门伏击速度较慢或与步兵相脱离的坦克，伏击点大多选在十字路口附近。依照规定，首先破坏敌方的指挥坦克，如果能够发现的话。攻击行动事先都经过周密的协同训练，例如，1号士兵先把燃烧手榴弹扔在发动机盖板上转移坦克乘员的注意力，而2号士兵则把一颗磁性雷扔到坦克履带下面。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由一名士兵躺在和道路平行的长条形堑壕内，在一根2米长的长杆末端放置大型空心装药地雷，待坦克靠近时，利用长杆将地雷推送出去。这种刺雷的使用方法虽然简单，但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当坦克前进到离操作手几码远时，操作手应当首先拔下保险销，然后站起身来冲向坦克，并像拼刺刀那样，将刺雷刺向坦克。结果，炸药在将坦克炸毁的同时，操作手自己也将被炸得粉身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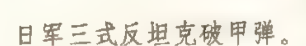
日军主要的反坦克武器——三四式37mm反坦克炮。

骨。

日本人的另一种发明，是现场指挥起爆雷。一般是在土路中间挖有很多坑，坑口都经过精心而巧妙的伪装，每个坑内弹头朝上放置着一发大型炮弹或航空炸弹，旁边坐着一名一手扶炮弹丸、一手紧握手锤的日军士兵，待坦克行进至隐蔽坑上方时，士兵用手锤锤击雷管，引爆弹丸，从而将坦克底部装甲炸穿。

根据记载，战争后期还有些日本士兵索性将几枚地雷捆在背上，然后爬到坦克附近或迅速扑倒在运动着的坦克下面，拉响导火索。





日军三式反坦克破甲弹。

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抹不掉了：

渡边伍长用竹竿绑着反坦克雷匍匐着向苏军坦克靠近而去，可是就在离坦克还有二三十米的时候，坦克的机枪突然开了火，渡边顿时被打得血肉横飞，身体在地上“扑通扑通”地哆嗦，就像一只被切断喉咙的鸡在地上挣扎一样，四肢抽搐了一会儿就再也不动了。

另一个士兵手持一把铁铲勉强爬上一辆坦克，铁铲刚刚举起来，就遭到了坦克后面狙击兵的准确射击，一头从坦克上栽落下来，再也没有爬起来。攻击还在继续，冲上去的“肉弹”又接连被打倒了好几个……

那场面简直就像演电影一样，就在离我还不到150米远的地方。隐蔽壕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吱声。大家都在默默地祈祷，祈祷这些亡灵能够升天，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怪谁呢?恨谁呢?没有战争的话，他们能来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吗?没有军部的胡来他们能在这里流血吗?

从这个悲惨的场面可以看出，整个日军的战线都被一种黯然的气氛笼罩着，败色越来越浓厚，大家的心情也都随着渡边



日军九九式磁性反坦克雷。1939年投入使用。直径120mm，厚38mm，重1.25 kg，引信延时5秒~6秒，装药1.5磅TNT。上面有4块强力磁铁，能吸附在坦克上，可以手掷。即草平所说的“面包地雷”。

伍长等人的死而一个劲儿地往下沉。

来到2号阵地不久，我就听说渡边也在这儿，早就想和他见上一面再聊上一阵子，可是白天不让随便出隐蔽壕，晚上又得医治伤兵，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与渡边相见。今生是再也见不到他了，渡边那被打成了蜂窝一样的尸体已被苏军的坦克碾成了肉泥，人死了不说连尸体也收不回来了。

说老实话，到这个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还有明天，大家对生存都已经绝望了，看着渡边悲惨地死去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死一样，谁也不再觉得那是他人之事了。

诺门罕整个日军的防御线马上就要面临一场狂风暴雨了。荒野上、天空中已经布满了战云，一场毁灭性的激战就在眼前了。日军方面的一举一动，都在蒙古高台上苏军的监视之下，日军的大部队也好，小部队也好，都已经被压缩到苏蒙军的包围圈里了。

卫生队自从来到2号阵地以后，无形中就有一种成为苏蒙军囚虏之感。我们已经基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卫生队应有的机能，除了在战壕里处理一下伤员以外，在苏军炮火的压制下，到前线收容伤员及收敛尸体等已经不可能了。

卫生队的位置虽然在山县部队的后面，但是双方已经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是无法取得联系了。日军的阵地已经被苏蒙军分割包围起来。白天不用说到阵地外面，就连战壕外面也不敢去，要想联络只能利用晚上，可能不能联络上还得另当别论。

当晚，后方又送来了一批反坦克雷。所谓反坦克雷，从外表上看就像一个夹馅面包一样，所以俗称“面包地雷”。抱着这样一颗“面包地雷”向有几吨、几十吨重的坦克底下钻，确实需要勇气、需要胆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必死无疑的肉搏攻击，人好比是一个鸡蛋的话，那坦克就是一块坚硬无比的岩石。可是在东京大本营的眼里，这些士兵的死是不足为奇的，“为皇国捐躯”是理所当然的。岂止如此，在战场上每当看到有士兵往后看，或者为了联络而奔向后方的时候，军官们总是要握着刀大吼一声：“混蛋!想逃跑啊？！”

其实，命令士兵手持自制的燃烧瓶、怀揣“面包地雷”去

炸苏军坦克的人才是真正的混蛋，普通士兵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一颗喘气儿的“面包地雷”而已。“面包地雷”和燃烧瓶都是技穷之策，应该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使用的最后一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对付坦克战理所当然的武器的话，那么他要么是个傻瓜，要么是个疯子。遗憾的是关东军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疯子，在他们看来，只有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肉搏冲锋，只有用“肉弹”去炸坦克，才是值得赞美的日本帝国军人精神。经过“诺门罕”而活下来的人们，实在是运气好。在那种情况下，死比生容易多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就是国家和国家的总实力的较量，强者胜，弱者败。日本当时的国力比起苏联来要弱得多，尽管如此，东京大本营却试图靠士兵的勇敢和武士道精神，靠士兵的肉体来弥补国力的不足，整个二战期间也是这样。这种愚蠢的国策害死了那么多人，却不准人们去揭露、去反思，像一块碰不得的遮羞布始终盖在日本的历史上。

据说诺门罕之战结束以后，苏蒙军总指挥朱可夫在向斯大林汇报时，对日军是这么评价的：“日军的下级官兵勇敢顽强，青年将校自信狂妄，高级将校昏庸无能。”朱可夫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正中要害。

可是，日本自己对诺门罕之战的主力部队——第23师团的评价却是：“失败的原因在于第23师团的不成熟。”根本不愿去触及历史的真相，只愿待在自己编织的梦幻中呓语。从历史上看，日本军队历来都把士兵的生命置之度外，一味地要求士兵们为天皇献身，拿出“大和魂”来拼命，直到“为大日本帝国像樱花一样散落”为止。军队教育只强调这种“散花精神”，新闻报道也只讴歌这种所谓的“樱花散落精神”。有人说这也许是日本这个资源贫乏的小岛国的必然之路，但是我却认为这是日本军政统治的宿命，或者说是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所带来的遗产。(草平能说出这些话可谓大胆至极，这是为当今日本主流社会所不容的。)



日本九七式手榴弹，这也是日军在诺门罕“肉弹”突击时的主要武器。

在领到反坦克雷之前，我们每人还发了一个燃烧瓶，就是一个里面装满汽油的

汽水瓶。士兵们手拿这样一个土造的燃烧瓶，向坦克屁股后面投，汽油一流到引擎及排气管等温度高的地方就燃烧，随之引发整个坦克燃烧起来。这种土造的燃烧瓶是谁发明出来的无从知晓，这种打坦克的方法是在缺乏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万般无奈才使用的一种"肉弹攻击"方法，并且这种方法只有在近距离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但是离坦克越近也就越危险，无数的士兵因此被苏军的坦克碾成了"肉酱"，压成了"肉饼"。

诺门罕之战初期，这种土造的燃烧瓶的确发挥了威力，烧毁了不少苏军装甲车。它不但造价低廉、轻便有效，并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制造，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可是到了战争后期，这种土造的武器就不怎么灵了，据说苏军把所有烧汽油的坦克、装甲车全部改造成了烧柴油的，并且屁股后面还加上了防护板，这样，即使燃烧瓶投上去，也很难燃烧起来了。

吃了些苦头的苏军，很快认识到了这种燃烧瓶的威力。他们一方面总结经验，加强了防范措施；一方面对这种燃烧瓶进行了改造，在汽油里又掺和进了生橡胶，并且还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莫洛托夫鸡尾酒"。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大举进攻苏联初期，苏军反坦克武器损失殆尽后，就广泛使用这种"莫洛托夫鸡尾酒"袭击过德军的坦克，令德军坦克部队大伤脑筋。

日本军队发明的玩意儿被苏军学习去了，并用它打日本的盟友德国，真是有点令人哭笑不得，也太具有讽刺意义了。

这天傍晚时分，一辆苏军坦克好像不知道我们潜伏在这儿

日军一处典型的反坦克阵地，从前往后依次是散兵线、肉弹突击队、反坦克火炮。（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一样，大摇大摆地开了过来，一直开到离隐蔽壕不到1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并且一停就是20分钟。这辆坦克沉着冷静，充满了自信，不慌不忙地竟然进行了20分钟之久的侦察，然后才大摇大摆地开走了。隐蔽壕是不是被发现了，是不是马上就要炮击了？看着坦克慢慢从地平线上消失，我们的心里有些惶惶不安起来。

这个阵地虽然也是山县部队的阵地，但却几乎看不到山县部队的士兵，他们大部队都被抽调到相邻的巴尔夏嘎尔高地去了，剩下的只有几支小部队和我们卫生队。苏军大概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知道卫生队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所以他们的行动才那么沉着而傲慢。

苏军的军事侦察之快、军事情报收集之广实在令人“恐怖”。他们一方面利用蒙古高台、侦察飞机等进行空中侦察，另一方面从捕获的日军俘虏嘴里收集情报，因为到8月中旬为止，已有相当数量的日军官兵成了苏军的俘虏。

夕阳慢慢地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越来越觉得苏军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确实都胜人一筹，日军的战略战术则只有一个，那就是靠士兵的勇猛和“肉弹”硬拼。这次连卫生队都发了反坦克雷，看来下一步该我们去当“肉弹”了。让毫无战斗经验的卫生兵去打坦克，简直是日本陆战史上的一大笑话。

正琢磨着的时候，上边传下命令：“今晚夜袭，命卫生队随队参加！”我立刻举起手来：“草平愿率队参加！”与其在这儿等着挨枪子、当炮灰，倒不如冲到苏蒙军的阵地里，就是挨上一枪也算是死得干净痛快，要是能杀上一两个的话，也算是够本了。

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复杂而微妙，有时甚至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想，要那么干。说老实话，残酷的战争会使正常人失去理智，渐渐坠入一个离常人感情相当遥远的感情世界，坠入一个像夜叉亡灵一样的境地里。

天黑下来了，月亮也高高地升起来了。夜袭部队沿着阵地北侧一条早已挖好的凹型通道，尽量压低身子向前行进。这条凹型通道好像就是为了夜袭而挖的，弯弯曲曲，狭窄而细长，过一个人都觉得有点儿窄，怎么看都不像是战斗用的战壕。沿着这条通道下了2号阵地，一阵急行军之后，夜袭部队就悄悄地

下图为苏军著名的波－2袭扰机。乘员2人，1930年开始大批量生产，一直持续到1953年。总产量约33000架。波－2具有极好的可操纵性。如果出现失速，只要放脱驾驶杆，飞机就会自动脱离螺旋。在二战中，波－2发挥了其他飞机不能取代的作用，作为联络机、救护机、夜间袭扰机等广泛使用。大量的波－2组成夜间轰炸机团，一到夜晚就飞临敌人的战线、机场等目标进行袭扰，虽然轰炸本身不会造成多大损失，但可使敌方整夜不能安眠。波－2夜间在超低空活动，敌方战斗机根本无法攻击，地面炮火也无法跟踪射击，所以获得了很大成功。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军完全控制制空权的情况下，人民军的波－2夜间从山区简陋的土跑道上起飞，对美军的水原等空军基地连续进行袭扰，美军对此无可奈何。由于飞机临空时间基本相同，美国兵给波－2取了一个"点名的查理"的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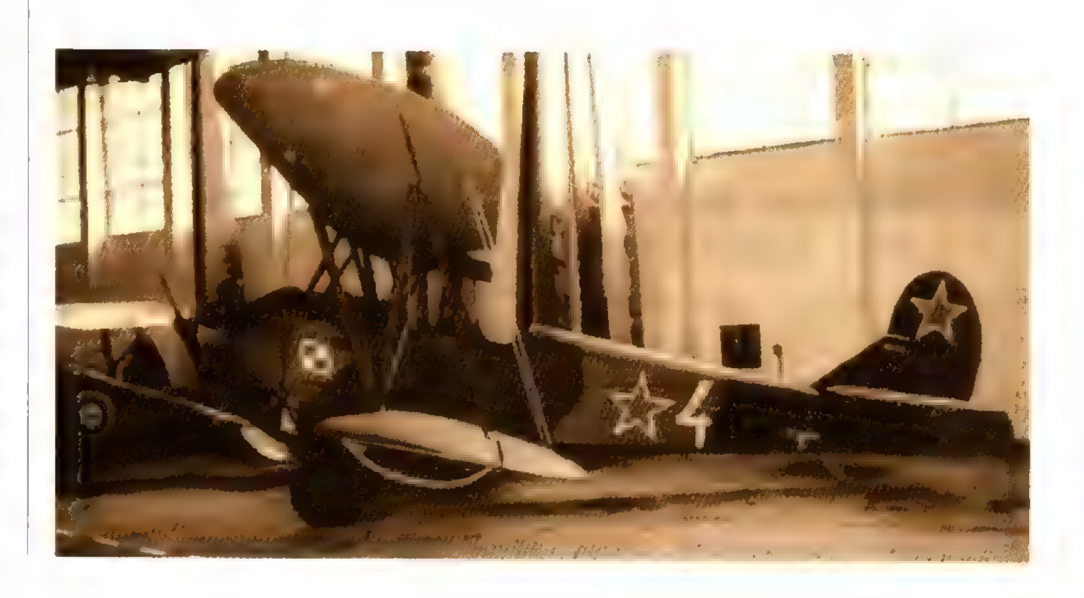
靠近了苏蒙军的阵地，这时前边又传下了命令："卫生队在此待命！"

我们就地卧倒，密切地注视着前方的动静，夜袭部队继续前进，向苏蒙军的阵地偷偷袭去。天空尽管布满了乌云，但是月光还是从乌云间洒落下来，时不时把阵地照亮，令大家手里捏了一把汗。大约过了5分钟，前面的夜袭部队好像一下子紧张起来，刀光枪影上下翻动，人头也隐隐约约地晃动起来。

"看样子马上就要打起来了，马上就要呐喊冲锋了，一场厮杀就要来临了！"我心里这么想着，紧张得浑身都哆嗦。可是等了半天，除了令人肌寒的夜风之外没有一点声音，没有枪声、没有呐喊声，甚至连个招呼声也听不到。

茫茫荒野上的夜风实在是凉，而且是越吹越凉，刚才是紧张得打哆嗦，现在是冷得打哆嗦，就这么哆里哆嗦地趴在地上等了一个来钟头，真是又紧张、又恐怖、又寒冷的一个钟头。可是，老趴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想想上次夜袭时卫生队被遗忘的教训，再看看眼下的情况，凭经验来判断，夜袭部队没准儿又撤退了，不然的话不会一点动静都没有，肯定又把我们遗忘了。事不宜迟，再等下去就危险了，我当机立断："卫生队全体撤退！"

撤回来一打听，果然不出所料，夜袭部队已经撤了回来。原来夜袭部队扑了个空，撤退的时候又找不到卫生队了。双方都怕被苏蒙军发现，所以都把身子压得很低，彼此都看不到对方的身影，也无法确认对方的准确位置，加上在苏蒙军的阵地，更



不敢出声，所以彼此之间根本无法联系。

战场上瞬息万变，随时都要根据当时的紧急情况迅速做出判断，做出果断的决定，盲目地服从命令是很危险的，这也是渡边伍长生前教给我的，我靠这条原则两次救了卫生队。



苏军1937式A—19・122mm加榴炮。这种火炮当年打得日军苦不堪言。

这次夜袭和上次一样，都是徒劳而归。在苏蒙军的阵地上没有发现一个苏蒙兵。从这两次夜袭来看，苏蒙军是有意避开日军的夜袭，天一黑就撤出阵地，天一亮再靠炮火夺回阵地，只打白天仗而不打夜仗，极力避免无意义的牺牲和损耗。另一方面，日军的夜袭作战已经不怎么灵了，在如此宽阔无边毫无遮挡又毫无标志的荒野上搞夜袭，不是迷失方向就是扑空。

夜袭回来以后，躺在地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傍晚那辆苏军侦察坦克老在脑海里晃动，我心里有一种直觉，隐蔽部明天可能要遭到袭击!那么是坦克袭击呢?还是炮火袭击呢?



2. 有如神助的苏军炮兵

天一放亮我就爬起来，拿着饭盒盖儿领了一盖儿水，就用这点水刷了刷牙，擦了擦脸。就在这时，一架苏军的双翼小侦察机出现在头顶上，在隐蔽壕的上空低空盘旋了好几个来回以后，急急忙忙地飞走了。不到10分钟，又有一架波－2侦察机飞来盘旋了几圈。

我越发不安起来，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了！我赶紧跑到福田军医的身边："我觉得这个隐蔽壕太不安全，咱们还是到士兵壕里去躲一躲吧。""这个隐蔽壕安全着呢，放心吧，放心吧。"福田一副不理会的样子。没办法，我只好又回到隐蔽壕的出入口，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却总觉得有些心惊肉跳。

果然不出所料，刚坐下还不到1分钟，头顶上突然一声晴天霹雳，我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天旋地转，眼前漆黑一片。"哗啦、哗啦"，头顶上的沙土像瀑布一样直往下落，石头落下来打在钢盔上咚咚直响。隐蔽壕一下子硝烟弥漫，壕外是一片燃烧着的火焰，我们全被沙土埋到了膝盖，满头、满嘴，浑身上下都是沙土，一个个就像土地神一样。

一共打过来6发炮弹，6发全中，弹无虚发。隐蔽壕的顶部

及四周的圆木墙壁也被震得走了形，瞬间的大爆炸仿佛一次大地震一样。隐蔽壕虽然有些走形，但好在还没有塌，人员也没有伤亡。

炮击一停，我不顾一切冲了出去，奔向附近的士兵战壕，刚逃出去不久，苏军的侦察机又一次在阵地的上空出现，低空盘旋了两圈后飞走了。马上又有6发炮弹打了过来，6发全部击中隐蔽壕，眼看着隐蔽壕在慢慢地往下陷，最后形成了一个凹型的大坑。隐蔽壕被炸塌了，没有出来的军官们，就这么被活活地埋葬在里面。

令人吃惊的是，第一次炮击6发，第二次炮击6发，12发炮弹没有一发浪费，全部击中隐蔽壕，再怎么坚固的隐蔽壕，恐怕也难以承受12发炮弹的连续轰击，坚固的隐蔽壕最终还是被炸塌了。苏军的炮击之所以能打得那么准，大概是由于坦克的地面侦察、平面测量，再加上侦察机的空中侦察、立体测量，把这两个测量数字加以计算，得出一个准确的数据，所以才打得准吧。苏军总是打科学战，所以才能战而胜之，并且苏军一兵一卒都没有伤亡，真可谓战术合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连我都能搞明白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关东军的头头们却搞不明白呢?为什么不能对自己战略战术来一个反省，向苏军好好学习一下这种科学作战方法呢?

福田军医不听我的再三劝告，非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说私自逃出是违犯军规的，就是不肯往外逃，结果他也被活埋在里面了，真是遗憾万分。与福田军医相反，我这一逃又拣了一条命，看着隐蔽壕往下塌的时候，我心里暗自庆幸，心想要是不逃的话，小命恐怕早就没了。真是幸运，几度遇难几度逃生。

爬出狭小的士兵战壕，我又一次“无家可归”了，所有的战壕都住满了士兵，找来找去只有山顶附近还空着一个小战壕。据说这个战壕几天前曾挨过苏军迫击炮的炮击，山县部队的一个军官就死在里面了，大家都忌讳这个地方，谁也不去住。可是我现在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再去挖战壕了，再说连个铁铲也没有，拿什么挖呢?“咳，还是听天由命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嘴里这么嘟囔着，我一下子就跳了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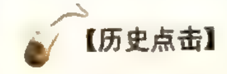
可是这个战壕挖得也太浅了，人坐在里面头却露在外面，而且挖得还窄，想躺也躺不下，这可真是“顾得了腚顾不上头”，总不能把脑袋露在外面招枪子吧。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左右为难

的时候，就听"嗖——嗖——"苏军的迫击炮弹打了过来，在战壕的四周炸开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跳出战壕撒腿就逃，一溜小跑又跑回士兵战壕里去了。

打过仗的人都知道，炮弹在你四周爆炸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暴露在阵地上移动，我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可实在是被炸得受不了了。

隐蔽壕被炸、山县部队的数名军官被活埋，一连串的打击使得阵地上的指挥官大为恼火。迫击炮炮击一停，他马上就下令："今晚要夜袭报仇，卫生队也派人参加！"

和昨晚一样，一个个弯腰猫身沿着通道下了阵地，翻过两个小沙丘以后，悄悄地袭入了苏蒙军的阵地。果然又扑了个空，没发现一个人影不说，连枪支、弹药甚至食品、水也没有捞到，更不用说突击报仇了。一无所获而归，白白地赚了一身的疲劳。日本军队的固执僵化和从不及时总结经验修订战术由此可见一斑。





石兰斌混成旅哗变

石兰斌的第1混成旅是伪满洲国的"精锐部队"，下设步、骑、炮各兵种约5000余人，第二次诺门罕之战前线吃紧时，被紧急派往哈拉哈河下游地区担任侧翼掩护。石兰斌原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下，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多是东北军旧部，参加过著名的江桥抗战，后因北满地区几次抗日活动失利，不得已暂时随石兰斌归附于伪满洲国。但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都在等待机会反戈一击。8月20日苏蒙军大举反攻，该旅认为时机已到，当夜，其步兵第14团首先"哗变"，杀死几名日军军官后投降，要求苏蒙军将其送回关内。第14团哗变的消息迅速传遍全旅，顿时各个连队备受亡国之苦的士兵们纷纷对日本军官动了手（石兰斌旅中，高级军官皆为日本军人担任）。随后整连、整营的人向苏蒙军投诚，第1混成旅的防线像雪崩一样垮了。石兰斌带领少数铁杆汉奸慌忙逃回了齐齐哈尔，不过关东军并没有因此而放过石兰斌，一怒之下还是将这个奴才关进了监狱。



伪满洲国的装甲车部队。别看这战车四不像，却属于关东军恩赐给溥仪的"重型武器"。

3．还能活多久

8月20日，天刚一放亮，苏军的各型火炮就吼叫起来，炮弹像下雨一样呼啸着飞过来，在阵地上四处开花，我担心坦克冲过来进行轰炸，所以急忙又跳进士兵的战壕里去了。

苏军的炮击战术总是采用立体协同作战，迫击炮打背面，坦克炮打正面。迫击炮一响，接下来就该是坦克的炮击了。可是从今天的炮击情况来看，苏军一改常规战术，只打迫击炮不打坦克炮了，这是为什么呢？

从种种迹象来推测，那就是苏军已经看穿了这个阵地上的日军没有多少战斗力。“杀鸡焉用宰牛刀”，对付这么一支部队，迫击炮就足够了，节省一点坦克炮弹吧，所以放心地把坦克都调到主要阵地方向去了。我相信我的推测是对的。

今天的炮击时间特别长，好像前沿各个阵地都挨了炸，不会是苏军发起反攻了吧？蜷缩在这么一个又浅又窄的战壕里，时间一长难受得要命，莫非一个战壕就是一个挖好的墓穴不成？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越琢磨越觉得心里不安。

炮火好歹停息了，我刚钻出战壕就听到有人说：“军医，上边有令，要求每个人都写好遗书。”说着就递过来两张信纸，原来是一个下士官。“遗书我早就写好了，没有必要再写了。”我一下子就拒绝了。

遗书这东西是那么随随便便就能写的吗？开什么玩笑，写遗

在苏军炮火的严密封锁下，缺乏通讯工具的日军一线部队，只好靠一些原始的手段来维持相互间的联络。图为第71联队的日军利用反光镜向外发出求救信号。（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日军第23师团山县联队在前线作战。

左起第二个日军拿的就是我们熟知的歪把子机枪。这种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使用漏斗供弹，利用重力向漏斗供弹，理论上可以无间歇发射——只要有人不停地把子弹放进漏斗里就可以了。但射击角度大了就会供弹不畅，所以它没有高射能力，也不能大角度向下射击。这种机枪还必须经常涂油擦拭，保持供弹具润滑，故其外号叫“油枪”。即使涂油后，开火时还经常因供弹不畅导致射击中断。

书又不是写作文，想写几篇就写几篇，这军部的做法也太离谱了，指挥打仗没什么本事，就有本事叫士兵们写遗书，火都烧到眉毛了，还有这闲工夫，这些人怎么就不知道去琢磨点正事呢？

后来才知道，苏军清晨发起了总攻，前线各部都在浴血抵抗，事实上这时日军已经被整个包围起来了。苏蒙军已经穿插到了卫生队的阵地的后方，卫生队的退路也被掐断了。从卫生队的这个2号阵地就能看到苏蒙军的阵地上尘土滚滚，显然这是在进行大部队的调动转移，并且距离2号阵地越来越近了，甚至都能隐隐约约听到苏蒙军的呼喊声了。

整个日军战线上出现了严重的动摇迹象，几天来，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先是从“小道消息”听说伪满军的一支骑兵部队发生了叛乱，伪满军士兵用几名日军指挥官做了血祭，然后全体向苏军投降了。另外从“大道消息”听说，镇守721高地的井置部队伤亡惨重，井置联队长为了避免全军覆灭，已经撤退了。

总而言之，当时2号阵地的身前身后好像都是苏蒙军的部队了，苏蒙军的士兵甚至敢大声地吆喝着在阵地四周来往，我们干瞪眼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一次，一辆苏军坦克竟然冲到离阵地只有50米远的地方，一名指挥官模样的人从坦克炮塔里探出大半个身子，大声地喊着什么。样子看上去还算亲切，不像有什么恶意，可惜我

们没有一个懂俄语，也不知他喊了些什么，吓得趴在战壕里一声也不敢吭。这边一声也不敢吭，那边却仍然喊个不停。

我心想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儿，万一坦克冲过来的话那卫生队可就危险了，怎么办？突然我眼前一亮，马上有了主意，急忙掏出带有红十字标志的旗帜，举过头顶拼命地挥舞起来。这一招儿还真灵，喊声马上就停了，坦克猛地来了一个大调头，朝着巴尔夏嘎尔高地的方向，卷起滚滚尘土飞奔而去。

显然坦克指挥官知道了这是一支卫生队，卫生队本身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所以他们才没有理睬我们。另外不得不承认，苏军非常遵守国际红十字规则，对战场上的卫生部队从来不大动干戈。这辆坦克也是一样，知道是卫生救护部队以后，扔下我们就直冲山县部队的主力去了。

巴尔夏嘎尔高地已经完全处于苏蒙军的包围之中了，山县部队的命运将会怎么样呢？据说打了几天几夜，山县部队主力已经是弹尽粮绝了，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悲惨的命运，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即使是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残存部队也不能撤退。因为假如他们突破包围撤退的话，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另一种悲惨的命运——背上一个“逃脱阵地”的罪名。因此，只有发给指挥官一支手枪，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死守将死于苏军的枪弹之下，撤退将死于日军的枪弹之下。我们的命运就是这么悲惨，往前是死，往后是死，往左是死，往右也是死，所以日军指挥官中的绝大多数只有选择所谓的君子之道——效忠天皇，一死了之。

刚刚松了一口气，苏军的迫击炮又吼叫起来，炮弹像冰雹一样噼里啪啦打过来，一时间阵地上硝烟弥漫、沙土飞扬，弄得人睁不开眼。

既然在哪儿都是死，那么就找个高亮亮的地方，找个能放眼四周的地方死吧。我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山顶住下了，就把这个战壕当成自己的棺材好了。要死就在这儿死吧，决心一定，我一纵身就跳了进去。

大陆的气候和岛国就是不一样，才下午4点来钟，就已经暮色苍茫了。突然，万雷齐鸣一般的枪炮声从巴尔夏嘎尔高地传来，硝烟裹着死尸臭味阵阵扑来，令人喘

日军在进行最后顽抗。日军徒劳地用重机枪向远处的苏军战车射击，近处是一辆出了故障被苏军放弃的BA—6装甲车。



不过气来。抬头望去，巴尔夏嘎尔高地已被淹没在滚滚黑烟之中，除了黑烟什么也看不见，仿佛那儿是黑色地狱。看着这滚滚的黑烟，卫生队每个人的心都在往下沉，每个人的眼神都显得那么暗淡，最后谁也不忍心再看下去了，都把脸扭向了一边。



苏军步兵发起最后的冲锋。

猛烈的炮火打了一个多小时，好歹才有些平息。巴尔夏嘎尔高地上的黑烟已经消散了，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条冒着蓝色火焰的“火龙”。一条条呈直线喷射出来，还闪着蔚蓝色的火光。显然这是苏军的火焰喷射器攻击。大家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猛烈的火焰喷射，一个个都把目光投向巴尔夏嘎尔高地，呆呆地看着。

突然，我的望远镜里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两个山县部队的士兵身上冒着蓝色的火光，正拼命地向巴尔夏嘎尔高地的顶峰冲去！我心里咯噔一下，好像是谁的手在自己的胸膛里乱抓了一把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儿？那两个士兵不顾一切跃出战壕，冒着火焰喷射器的喷射，带着一身的火焰冲向顶峰，这是为什么？不是抱有拼死的决心的话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这种行为的本身就等于是找死，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去送死呢？

答案只有一个，这两个士兵跳出战壕准备拼命，可是面对一条条苏军喷射的火龙，想拼命也没有机会。被火焰喷射器烧迷糊了，所以才疯狂地向顶峰冲刺的吧？这种精神就是日本帝国军队一再提倡和赞美的“军人精神”、“大和魂”。看着这两个士兵的举动，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这是何等的悲惨啊！这不是阿鼻地狱又是什么呢？

巴尔夏嘎尔高地离2号阵地只有4公里，但是卫生队却爱莫能助，无能为力。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不停地传过来，仿佛还

掺杂着凄惨的叫喊声。这大概不是幻觉，而真的是山县部队最后的呐喊了吧？

我不忍心再看下去，再听下去了。

激荡的心情好久好久才平静下来，我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墓穴”里。风吹来一阵阵烧焦的糊臭味儿，令人作呕，令人战栗。月亮从北飘的乌云间时隐时现，仿佛也不忍心一直看着那阿鼻地狱一样。刚才那两个浑身是火、拼命往顶峰上冲的士兵，一直在我眼前晃悠，就像放电影一样在不停地转动。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要打仗却没有弹药，眼看着苏军的枪口、刺刀、火焰渐渐逼近自己……

不知为什么今晚的夜风好像特别的冷，吹得人难以入睡，并且这夜风里还夹带着一种臭味儿，令人胸口恶悠悠的。

4. 【战史纪录】

井置骑兵联队的溃败

8月20日，苏蒙军发起总攻击以来，由于苏军连续猛烈的轰炸，第23师团骑兵联队防守的721高地就如同一个火焰地狱一般，高地的形状都变了，所有的杂草都不见了，沙土也变成了焦土，整个高地成了一座光秃秃的土堆，日军士兵连个藏身之处都没有。战壕炸平了，子弹打光了，刀砍弯了，衣服磨烂了，粮食吃完了，水喝光了，并且与指挥部联系中断。日军只能以“肉弹”对抗炮弹，除此之外毫无办法。

鬼冢初义，这个井置部队的幸存者在战后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39年夏天，诺门罕绿草茂盛、百花齐放，在诺门罕一角的721高地上，部署着808名守备官兵，这支部队就是第23师团搜索联队及配属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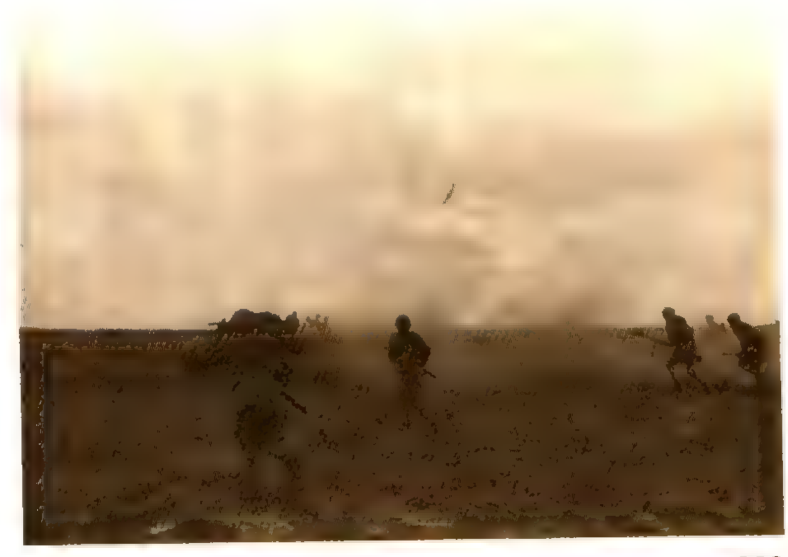
“白天是苏军大炮、坦克、步骑联合的攻击，夜里是蚊子‘军团’的彻夜袭击，常常是刚刚迷糊过去，梦做了一半天就亮了。8月20日苏军发起总攻击，几倍于我们的兵力一齐扑向了721高地。正面是苏军的第36师第601团，右侧是第11坦克旅的一个营，左侧是第7装甲旅的一个营，他们从三个方向像怒涛一样攻了过来。几十门苏军的火炮作为火力掩护，倾盆暴雨似的把炮弹打过来。721高地上是黑烟蒙蒙，咫尺难辨。阵地的

上空整个被黑烟笼罩起来，大晴天的却看不见太阳。不难想像战斗打得多么激烈、多么凄惨。

“8月21日，苏军发起了拼死的攻击，连续攻击了3天。我们的伤亡已到了极限，不过721高地仍然在我们手中。苏军久攻不下，越发焦躁起来。8月23日又把第1集团军的王牌部队——第212空降旅的一个营调过来，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击。搜索队及所属部队虽然顽强抵抗了4天4夜，但是伤亡惨重。808名官兵4天下来只剩下100来人，这100来人也是伤痕累累，疲惫到了极点。粮食一口没有，水一滴没有，弹药奇缺。配属的大炮在苏军的集中炮击下，已经全部被毁，无一能用。

“苏军用坦克把我们这100来人团团包围起来，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连蚂蚁爬出去的空隙都没有。苏军好像是在侮辱、耻笑我们这些孤兵一样，坦克在高地四周加大油门横冲直撞。冲过来的坦克并不怎么可怕，躲在章鱼罐战壕里它就压不着你。可怕的是坦克上的火焰喷射器。几十条火龙一齐喷射过来，高地一下子就变成了火焰山，喷到谁的身上谁顿时就成了一个大火球，阵地上一下子就变成了人世间的地狱。尸体成山，血流成河。

“8月23日，我们手中只有步枪了，拿着步枪和这些铁疙瘩打简直是在送死，只好‘肉弹’加‘肉弹’、突击加突击，拼命死守了。最后，一个中队仅有四五人生存。活着的人害怕苏军喷火坦克逼近攻击，甚至已不敢开枪，也不敢从战壕里露头。高地已经变成了血染的了，尸骨遍野，令人目不忍睹。700多具尸体啊，恐怕鬼神看了也会害怕的。虽然死守了4天，但是最终还是抵挡不住苏军冲击，大部分阵地失守。防守阵地在逐渐缩小，721高地好像一盏风中的油灯，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



苏军空、步、坦协同熟练地发起了攻击，这是日军在整个二战期间都无法做到的事。

“坚持到8月24日上午，井置联队长把军官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战场紧急会议，商讨下一步的对策。井置联队长表情沉痛地转达了师团

部的意见：死守到底。可是军官们却认为处于目前这么一种状况，死守不是良策，也难以守下去了，靠在这儿和白白送死没什么两样，倒不如撤出阵地，补充兵力、弹药、食品和水以后，再寻找机会重新占领721高地。

“井置闭上眼苦虑了好久，终于下达了撤退命令：‘天黑以后，守备部队全体突围。’守卫在这儿是死，突围出去也是死，死几乎已经注定了，只不过是选择哪种死亡方式而已。即使是突破包围，成功地撤退出去，这种擅自撤退，井置将是死罪难逃。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军队指挥官最可怜的一面、最悲惨的结局。死守将白白断送100多条生命，可是撤退的话就等于是用一个人的生命救出了我们100条命，井置深知这一点，所以才做出了这个悲壮的决定。

“8月25日零点，我们告别了700具战友的尸体，含着眼泪开始撤退，这次撤退行动对100多名活下来的官兵来说，真是断肠之念。”

据井置联队的一个中队长回忆，几日来滴水粒米未进，日军已疲惫到极点，撤退时大部分士兵是抓着前面人的腰带蹒跚而行，如果松手倒下，就只有等死了。其狼狈之样可以想像。利用黑夜的掩护，这股日军竟突破了苏军的铁壁包围，幸运地撤了出来。这也是整个诺门罕战场中日军惟一成建制撤回去的一个联队。不过滑稽的一幕是，当井置率领残兵败将拼命逃了回去后，关东军总部立即派去了他熟悉的两名军官——可不是慰问，而是劝了井置一夜，让他“为国尽忠”。井置只好拿着小松原送给他的手枪朝着自己的脑袋来了一枪，成全了关东军的面子和“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荣誉。

准备出击的苏军装甲第9旅的BA-6装甲车。



5．精神全垮了

8月24日一大早就刮起了大风，大风卷起沙土满天飞舞，吹得人睁不开眼。一大早就是这么个天气，卫生队也处于一种仓皇、黯然的气

氛之中，虽然大家谁都没开口，但是彼此心里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都在默默地忙着自己的事儿。一种动摇的空气，一种不同寻常的空气在2号阵地上飘荡。

在众多的卫生兵面前，我尽可能装出一副沉着冷静、不慌不忙的样子，但是内心的动摇却是禁不住的。死亡逼近到自己的眼前了，可是又不得不装出一副没事儿的样子，这种滋味真不好受。不好受是不好受，但是这是责任。作为卫生队的医长，在这种时候更不能在士兵面前显得惊慌不安。这是一种掩饰，一种死到临头却偏要装出满不在乎的掩饰。“要忍耐，要忍耐”，自己心里老在这么说。

不久听联络兵说，742高地已经插上了苏军的红旗，为了夺回失去的阵地，长谷部旅团正在浴血奋战。无奈寡不敌众，并且既没有反坦克炮又缺少弹药，所以败局已定，剩下的只是绝望的挣扎。另外三角山和巴尔夏嘎尔高地也危在旦夕，据说山已经不像个山，高地也不像个高地，都快被炸平了。

诺门罕地区到处都是苏联兵、蒙古兵，在日军守卫线的中部——胡鲁斯台河沿岸，苏军的坦克和士兵就像怒涛一样扑过来，大部队的推进就像大河流水一样源源不断而来。坦克、装甲车卷起来的滚滚尘土，以宽阔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为背景看上去，显得那么壮观。越看越像是滚滚的怒涛，像势不可挡的洪水一样。坦克的轰鸣声和士兵的呼喊声直冲云霄，真有撼山之势。大家都呆呆地看着，虽然知道那是敌人的大进军，但是却从心里感到佩服，远远看上去那就像是一幅大进军画卷的压轴卷一样。是个男人的话，是个军人的话，就应该加入到那个壮观的行列中去，我甚至这么想。

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不是日本的部队，而是苏蒙大军正在扑向我们。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我悄悄地回到自己的那个“墓穴”里，半躺半卧、无精打采地看着天上的流云发愣。

8月25日早晨，阵地上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起初我还以为是没睡醒在做梦，或者是精神紧张而引起的一种幻觉呢，可是好好一听，的确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是通过扩音大喇叭传过来的，并且说的是日本话：

“日本士兵们!你们受骗上当了!虚伪的军队指挥官欺骗了你们，所有的补给都已经中断了，没有任何部队来救援你们，你们在这儿再打下去是白白地流血。快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停

止毫无意义的战争，回到你们自己的家乡去吧!”大喇叭不断地重复着上述内容，播放一遍以后再放一段日本的民谣小调《佐渡奥开萨》。

这是苏军的又一种攻击手段——瓦解宣传和神经搅乱战术，是不见血的攻击。一听这歌就知道这是日本有名的歌手冈田嘉子唱的，听着听着思乡之情禁不住从心底油然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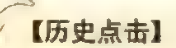
广播宣传完了，苏军的飞机又撒下大量的传单和劝降书，飘飘而下就像突然下起了大雪一样。“混蛋！”我终于禁不住心头的怒火，冲着天空就吼了一嗓子。骂归骂，我也明白最后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百姓，听到有人说日本军队的坏话，恐怕没有一个人不生气，这也是日本军统教育的结果。尤其是在这种时候，听到有人竟敢大骂日本皇军，我心头的怒火腾地一下子就上来了，恨不能冲出去拼个你死我活。

可是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到中国的土地上和苏军打仗呢?又是谁请我们来的呢？一再侵入别人的国土发动战争，道义究竟在哪里呢?

到了8月25日，日军全线都在溃退之中，令人悲伤沮丧的消息一个接一个。

整个战线都是这么一副溃败状态，我们这支毫无战斗力的



【历史点击】



冈田嘉子



冈田嘉子是日本当时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歌星。1938年1月跟随日本共产党党员、戏剧评论家杉本良吉投奔苏联。去后不久正逢苏联“肃反”，两人被以特务嫌疑而扣押审查。1939年诺门罕战争期间，冈田嘉子主动要求担负对日宣传瓦解工作，对瓦解日军士气和军心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诺门罕战争结束后，两人还是被判有罪，杉本良吉被误杀，冈田嘉子被判刑10年。1947年冈田嘉子才被平反释放，后一直担任莫斯科广播电台日语播音和日语教育工作。1992年去世，享年89岁。

卫生队应该怎么办呢？一旦苏军真的攻到眼前，卫生队到底应该怎么办好呢？作为医长的我现在不得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想来想去办法只有一个，并且能做到的恐怕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假如明天苏军攻上来要消灭卫生队，要向卫生队发起攻击的话，我就得做好送死的精神准备，一个人打着红十字旗先走出来，走到卫生队的最前头。苏军要是承认红十字标志而不来攻击我们，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假如苏军无视这一点而硬要向卫生队发起攻击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军人也应该有个军人的样子，不能给军人丢脸，就跟他们拼了。可是拿什么拼呢？

卫生队不具有任何现代化武器。除了卫生兵每人手里的一把俗称“牛蒡剑”的佩刀之外没有别的。我作为医长也不过只有一把刀、一把枪，刀是祖传的宝刀“长船”，枪是一把旧式捷克手枪，真正用途是留着自杀用的。

一把破枪、几十把军刀就能把苏军的坦克打趴下？就能抵挡住苏军潮水一般的进攻？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后的选择就只有去送死，用军政当局的话来说这叫“玉碎”。卫生队高举军刀，呐喊着冲向坦克，就这样“为大日本帝国洒尽最后一滴血”、“为皇军散花”。苦战苦斗了3个月，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活到现在的卫生队，要用自己的肉体去阻挡坦克，葬身于坦克之下……多么悲惨的死啊，又是多么没有意义的死啊！卫生队就这么“散花”，就这么“玉碎”，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了一个“玉碎”的名声，几十条生命白白死于坦克之下……想到这儿，我眼泪滂沱而下，怕别人看见赶紧把手绢掏出来，使劲儿按到眼上。

防空火力不足且机动性差是日军的老大难问题，日军只好将九二式重机枪安装在卡车上一解燃眉之急，但效果并不理想。



红十字旗就在我的背包里，现在什么都可以丢，就是这红十字旗不能丢。军队的《战阵训》中虽然明文写着“军人宁死不受虏囚之辱，日本军人沦为虏囚是极为羞耻、难以忍受的”，但是我却认为，对毫无战斗力的卫生队来说，对那些本职工作就是救护伤员的卫生兵来说，放下军刀举起红十字白旗是一



在战斗中，指挥官以身作则率先带队冲锋，是苏军一贯的传统。这虽带来了军官较大的伤亡，但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和斗志。

个明智之举。

卫生队集结在伊林银查干湖时，我曾利用那一段比较安闲的时光，又赶做了两面红十字旗，把两块包扎伤口用的白三角巾对合成一个四方形，再用红药水在上面涂上一个大大的“十”字就成了。这两面红十字旗一直打在我的背包里，准备一旦遇到危急情况好马上掏出来用。

就在枕着红十字旗胡思乱想的时候，暮色慢慢降临下来，我爬出“墓穴”向四周看了看，已经看不到一辆坦克了。随着夜色的降临，苏军的大部队就像落潮一样往后撤退。早上像涨潮一般冲过来，晚上又像落潮一样退回去，苏军为什么要来回折腾呢?答案无非有两个：一是为了尽可能避开日军神出鬼没的夜袭，减少不必要的死亡；二是补充弹药食品什么的。说老实话，苏军的这种打法才是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令人赞叹。

8月26日早上8点来钟，迫击炮的炮弹就打过来了，我急忙抱起红十字旗跳了出来，三步并作两步一溜小跑，一头就拱进了旁边不远的士兵战壕里。士兵们什么也没说，只是回过头淡淡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转过身去，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对我的到来总是热情欢迎的士兵，到了这个时候，也一反常态，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大概是知道自己的小命今天可能就要结束了，自己的事儿都顾不过来了，哪里还有心思去管他人之事呢。

阿修罗最后的世界可能马上就要到了，可能就在眼前了。我这么琢磨着，畏惧感和恐怖感袭上心头，感觉心慌得厉害，全身止不住地颤抖。就在大伙战战兢兢的时候，突然头顶上响起了刺耳的、响彻云霄的声音。起初还以为是炮弹什么的，定神一听原来又是苏军的大喇叭宣传。

今天一大早就开始了瓦解宣传，扩音器的音量可能是调到了最大，巨大的声响震得大地都有些抖动。显然苏军是想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和伤亡，知道日军已经被分隔包围且已弹尽粮绝，所以一大早就信心十足、变着法地进行精神搅乱战，不厌其烦地进行瓦解宣传。你讨厌也好、恐惧也好、愤怒也好，都得听下去，别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边大喇叭一响，天上的飞机就开始撒传单。飞机一过，满天便是忽忽悠悠、飘飘扬扬的传单。虽然那只是普普通通的印刷纸，但是此时此刻，在士兵们的眼里那就是一枚枚炸弹，摧毁精神的重磅炸弹。

一张传单忽忽悠悠飘落到脸上，我忽然觉得像是幽灵在自己的脸上抚摸了一把一样，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见有个卫生兵拣了几张一下子勾起了我的肝火，我冲着卫生兵就骂了一句："混蛋！统统都扔掉！"

日军阵地上一片焦躁、恐慌、不安，眼见的是声势浩大的苏蒙大军、气势汹汹的坦克群，耳闻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云霄的呐喊声。苏军的飞机也越飞越低，几乎一伸手就都能够着，飞机一过就是满天的传单，像白花花的雪片一样飘落而下。

接着从晴朗的北方天空，传来女人甜甜的声音，重复播放着《告日本士兵》，并且每播放一遍之后就放一段日本的民谣小调。传单可以不去看，可是这声音就没有办法了。想听也好、不想听也好，反正都往你的耳朵里钻。听着听着，哀愁和乡愁就慢慢涌上心头，伤痕累累的胸口上好像撒上了一把盐、受到了鞭打一样难受。

面对苏军的神经搅乱战、精神瓦解战，日军毫无办法。当官的气得都快发疯了，但是除了愤怒和叹息之外没有任何招术。大部分人的精神彻底垮了，士气极为低迷、沮丧，苏军的宣传战果真厉害。

我也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能就在眼前了，再做什么努力都徒劳无用。自己费那么大精力才掌握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统统都没用了，统统都用不上了。愤怒感、空虚感、恐怖感、悲切感、羞辱感掺杂在一起，折磨着我。可是我已无能为力，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剩下的就只有等死了。想到这里我心乱如麻、情绪低落，甚至自暴自弃

苏军女护士正在火线抢救伤员，另一个士兵正在用捷格加廖夫7.62mm轻机枪进行火力掩护。在战地救护方面苏军也胜出日军一筹。



起来。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了，随它去吧！

（三）“命令！玉碎突击！”

1．醉生梦死

8月27日。

“军医，醒醒！军医，醒醒呀！”

我忽然觉得有人在摇晃自己的肩膀，蒙蒙胧胧睁眼一看，的确有人在招呼自己。

“军医，醒醒。看这个，看这个。”我仔细一看，原来眼前放着一瓶日本清酒！这一看不要紧，我条件反射似的呼地一下坐了起来，睡意全没了，两个眼珠子瞪得老大，一个劲儿地盯着酒瓶子，禁不住开心地笑了起来。

自从在伊林银查干湖畔和秦医长在战壕里喝了几杯以后，一个多月来我滴酒未沾。哎呀，这可真是的，并且还是正儿八经的日本清酒！

图中丰富的食品决非普通官兵所能享用，仅有少数高级军官才可以获得，这也是草平极为愤怒的一点。此图明显为日军在做秀。（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我伸手就把酒瓶子抓了过来，打开盖倒了满满一盖儿，一饮而尽。看着我贪婪的样子，卫生兵们大概觉得挺有意思，仿佛看戏一样。

一杯下肚后，我才觉得自己这样独占一瓶太不像话，于是连忙把酒瓶子递给大家：“你们也别光看着，大家都喝两口！”可是谁也没有接酒瓶子。

“军医真是好酒量，我看这一瓶不够你喝的，再给你拿一

瓶来吧！”一卫生兵说，我连忙回答：“好!好!”

那个卫生兵急忙站起来朝阵地下面跑去，跑了几步还转过头来冲这边摆了摆手。晒得黑乎乎的脸上只有牙齿还是白的，张嘴一笑的时候真是黑白分明，格外显眼。

过了一会儿就见他一手提着一瓶酒跑回来：“一瓶怕不够，所以给你多拿了一瓶来。”“哎呀，这可真是的，谢谢了，谢谢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说着又干了一杯。左一杯右一杯，一瓶酒不知不觉就喝光了。酒喝光了，自己也倒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又一次被敲打起来：“军医！军医！支队长叫你呢。”“什么，什么支队长！有事儿叫他过来找我！”我大吼一声。酒还没醒，所以胆子也大。

我的声音可能是太大了，大得让支队长都听见了，这次支队长亲自喊我了。我一听情况不妙，赶紧从地上挣扎着爬了起来，跌跌撞撞地朝指挥部跑去。

在2号阵地，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支队长，我赶紧走过去敬了一个礼。支队长面色铁青，先是一声吼：“命令！”然后连讽带刺地说道：“看起来就数你健康了，今晚酒井部队敌后迂回玉碎突击，命你随队参加！本阵地由丸山军医中尉接管，命令完毕。”

一瞬间我愣住了，酒也醒了一大半。这叫什么事儿？自从诺门罕开战以来，我就一直被派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担当救护任务，够可以的了，现在又来了这么个命令。再说“看起来就数你健康了”，这是什么意思？

胳膊拧不过大腿，再说都到了这种地步了，大家早晚都是死，只不过是早死一会儿晚死一会儿的差别而已。早死早利索。“是，今晚随酒井部队玉碎突击！”我把声音提到最高，使出吃奶的劲喊了一声，然后转过身来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回到自己的“墓穴”里，我就骂开了：“什么支队长，肮脏的家伙！做这种缺德事儿是要受惩罚的!神只保护老实的人，不保护那些肮脏的家伙，走着瞧吧。”借着酒劲大骂了一通之后，心里才好受了一些。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在如此宽阔无际、平坦无边，又没有特定标志物的荒野里搞夜间袭击，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往往是白忙活一夜。现在又要搞“敌后迂回玉碎突击”，这些当官的怎么就不知道灵活一点呢？这种僵化的战术和指挥除了让士兵

们白白送命外能起什么效果？

死到临头了，那就先喝个够，喝个痛快，然后听天由命吧。我把红十字旗塞进背包里，又在背包的两侧一边捆上一瓶酒。“玉碎突击”的准备工作就算是准备好了。

下午5点来钟，荒野上暮色渐渐降临下来，夕阳把西天的晚霞映得通红通红，真像是云彩燃烧起来一样。这景观容易使人忘却战争，使人更向往和平。遗憾的是在东京的愚蠢国策导引下哪还有和平？只有战争！“向749高地出发！”正看得出神的时候，传来了出发的命令。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装扮是全队中独一无二的，所以不好意思走到前面去，就跟在队伍的最后面。一些士兵时不时回过头来，朝我这儿指指点点、比比划划，恶作剧般地嬉笑。“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好好走你们的路吧。”不训还好，这一训倒引得一伙人哈哈大笑起来。看这副样子，谁也不会想到这是要去“玉碎突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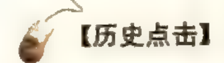
身背两瓶酒出征的“雄姿”，恐怕是自己在这个世上最后的留影了。所以我掏出自己的宝贝相机伊斯特曼，叫一个卫生兵给我拍了最后一张照片。遗憾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遗失在诺门罕茫茫的旷野上，已经找不到了。

刚走了一里来路，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大坑。坑里堆满了罐头和酒什么的，就那么乱七八糟堆放在那里，也没人去管。看样子以前这儿是一个兵营的小仓库，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罐头和酒。我喝的那瓶酒、背的这两瓶酒，大概都是从这儿拿的吧。

“这叫什么事儿？前线阵地上的士兵们吃不上、喝不上，忍饥挨饿在冒死打仗、肉弹攻击，当官的却是酒池肉林、花天酒地！这也太不像话了，该受天罚的！”看着这酒堆罐头山，我气得火冒三丈、咬牙切齿。可是在这种情形下，带又带不走、背也背不动、想吃想喝又没有时间，我只能大骂一通，发泄一下心头的怒气。

我背的日本清酒，名叫“忠勇”，是日本兵库县一个叫“滩”的地方生产的上等清酒。“滩酒”当时在日本是很有名气的。酒瓶不像现在的那么大，量也只不过有现在的七成左右。

怎样才能把那两瓶酒捆到背包上，当时可真是费了苦心：一是要捆得结实别掉下来；二是想喝的时候拽过来马上就能喝。



【历史点击】



乃木希典和“肉弹攻击”

日军“肉弹攻击”的始作俑者是日俄战争时的乃木希典大将。当时旅顺口历经沙俄10年的经营，成为固若金汤的海军要塞。沙俄用钢筋水泥修筑的碉堡，即使是重炮对它也无可奈何，炮弹命中后马上会被弹出去。加上俄军装备了先进的马克沁机枪，可谓坚不可破，当时有“东方第一要塞”之称。负责进攻旅顺口的是日本陆军第3集团军，司令官为日本著名的战将乃木希典。为了尽快攻下战略要点203高地，第3集团军司令官乃木希典认为，炮弹打不进，“肉弹”总能起作用，于是下达实施“肉弹攻击”的命令，强迫士兵实行“自杀攻击”。1904年8月19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击，一次投入兵力5万人以上。成群的日军士兵冒着俄军猛烈的炮火，向要塞冲去，一批一批的日军士兵倒在冲锋的路上。第一次攻击，日军死伤1.58万人，战场上日军遗尸累累，血流成河。已经近于疯狂的乃木接着又组织敢死队发动第二次、第三次总攻击，使用兵力总计13万人，费时155天，最终以死伤6万人的代价攻下要塞。乃木希典从此成为日本陆军追崇的“军神”。

在长期的凶残暴力压制和“一切为了天皇陛下”的精神训示下，日本士兵已经变成了“只会惟命是从的动物和奴隶”，成了信奉“天皇教”的信徒。而他们的主子却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把他们推向了战争和死亡的深渊。“肉弹”队员们已经被愚化成了一群披着“勇士”盔甲的怪物，他们成了“天皇教”的牺牲品。二战期间，日本疯狂的军国主义者们企图以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战果，但终究未能改变失败的命运。因为他们所发动的反人类的法西斯战争是非正义的。在与正义的交锋中，亡命式的勇敢并不能改变其失败的命运。



日军第23师团的“肉弹敢死队”。前面几个人手中的竹竿是绑反坦克雷用的，这些人大都在照相后几天内成了炮灰。（出自《太平洋战争·1937～1945》，每日新闻社）

为捆这两瓶酒，我花费了一个多小时。酒瓶子是圆锥型的，要把它牢牢地固定在背包上实在有些困难，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后来我找来几块小木板，先把酒瓶子牢牢地捆到木板上，再把绳子从木板和酒瓶子之间穿过来系到背包上，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难题。

说老实话，其实一瓶就足够了，死到临头大概也没有心思喝了。可是对喜欢喝酒的人来说，背上一瓶而把另一瓶白白扔掉，那简直比死还要难受。在那个时候，在那么一种绝望的环境下，运到前线的酒比命贵，至少对日军来说是这样的。

荒野上的雾气真是浓，虽说是月夜，却看不到月亮，地面上也黑乎乎的，两三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可能是这个原因，部队前后脱节、偏离目标、迷失方向的事几度发生，行军迂回曲折，极为缓慢。

诺门罕战争后期，日军的火炮损失殆尽，九二式气冷重机枪就成了第23师团的主要压制武器。这种使用弹板供弹的重机枪理论上可以无间歇射击，但实际上这类机枪的射速根本压制不住步兵的大规模冲锋，对苏军的战车更是如隔靴搔痒。

可能是白天喝得太多的缘故吧，我困得要命，眼都睁不开了，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脑袋和眼睛是睡着了，可是两条腿却没有睡，还在不停地往前走。什么时候一头撞到前面士兵的身上，什么时候才吓一跳睁开眼。走一会儿接着睡，漆黑的夜晚行军真是困难，简直就像在漆黑的地道里一样，得摸索着往前走才行。

计划的行程才走了一半，东方的天空就已是白蒙蒙的了。拂晓就要来临了，拂晓一来临，也就意味着作战计划的失败。没有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匆匆忙忙地就把部队开出来，想取胜，谈何容易?这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有什么区别。

背着背包转悠了一夜，两条腿就像是灌了铅一样步履维艰，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这背包原本就背不惯，再加上一边挂着一瓶酒，肩膀勒得生痛生痛的。“咳，管他呢，先休息休息，喝上两口再说吧。”我心里这么想着，干脆一屁股坐到草地上，抓

过一瓶“忠勇”就喝了起来。

几个士兵转过头来看了看，但是谁也没有说什么，默默地转过头继续行军了。士兵们现在想些什么？是想眼前的“玉碎突击”呢，还是疲惫不堪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呢?管他呢，我只管喝自己的酒，索性把两瓶酒都从背包上解下来，大口大口地喝，来个一醉方休。在梦里死也好，当俘虏也好，全看命运的安排吧。

到底是名酒，半瓶酒一下肚，酒劲就上来了，勇气也有了，肩膀也不怎么痛了。往前看看，部队已经走出一公里远了。走吧走吧，爱走多远就走多远。往后看看，这一看不要紧，我大吃了一惊，腾地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

透过拂晓的薄雾，我隐隐发现空旷的荒野上有一支部队正在向这边慢慢移动。“不好!得赶快逃啊！”刚才还想着一醉方休、听天由命，这会儿吓得魂儿都飞了，再也不敢待在这儿了。“忠勇”酒也不要了，我抓起背包撒腿就跑，像韦驮天一样一溜烟儿地追赶部队去了。

才跑了一里来路，就觉得心慌得要命，气也不够喘的，憋得要死。两条腿打飘发软不听使唤，怎么迈也迈不动，最后一头栽倒在地，趴在地上呼哧呼哧地一个劲地喘。一边喘一边往后瞅，看看那支部队追上来没有。瞅来瞅去才瞅明白，那支部队好像不是苏蒙军，从装束上看像是日军的部队，似乎还打着一面太阳旗。“这大概是第7师团吧？”我一下子联想到这几天

大队的苏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前线，朱可夫向诺门罕战区调集了4个摩托化步兵师，对日军已形成压倒性优势。



听到的消息，说第7师团在后方增援上来了，看来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了。是事实也好，不是事实也好，我都不在乎，只要不是苏蒙军就行。

看看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吓掉的魂儿又重新飞了回来。气也够喘的了，心也不慌了，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拍打拍打身上的沙土，把背包好好背到肩上，赶紧追赶部队去了，只是可惜了刚才扔掉的那瓶酒。

8月28日。凌晨4点来钟，大雾笼罩大地。

从部队前方突然传下命令，说终于发现了苏军的阵地，要全体士兵马上做好"肉弹攻击"的准备。尽管已经得知第7师团的增援部队正在向我们靠近，但是我们还是决定不再等待援军，就以酒井部队的名义，发起最后的"肉弹攻击"。

"朝着前面的敌军，冲击！"部队的前面传来了哭嚎似的、声嘶力竭的冲锋命令。指挥官手举军刀冲在最前面，无数士兵呐喊着紧跟在后，沙尘滚滚，喊声震天，"玉碎突击"开始了。

我至今也不明白，夜袭就是要趁夜色掩护，让敌人不知晓而一举击中。好不容易摸到了敌军阵前，为什么要大吼大叫地冲锋，这不是告诉敌人有人来袭赶快准备吗？也不能为了显示"皇军"的"神勇"这样拿士兵白白送死啊！

拂晓之前冷气袭人的大地上，飞扬的沙土之中，除了拔刀时一闪一闪的亮光和无数的钢盔在晃动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裂帛一般的呐喊声震动着大地、震撼着天空。那呐喊声听起来就像鬼哭狼嚎一样令人毛骨悚然。不，那不是在呐喊，那简直就是在吐血呕肺。那姿态看上去简直就像受惊而狂奔起来的夜叉，疯狂地扑向苏军的阵地。听这声音，看这场面，就像是在演奏一首"吐血狂奏曲"。

接下来的一瞬间，"吐血狂奏曲"中掺和进了炒爆豆一般的枪声、震耳欲聋的炮声，滚滚的沙尘之中冒起一股股冲天的硝烟。整个战场转眼之间变成了硝烟弥漫的人间地狱。

"这简直是草菅人命！"我心里这么想着。跟着冲不跟着冲都是死，整个战场就像是奔腾的洪水卷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我身不由己，也慢慢被卷了进去，全身的血渐渐地沸腾起来。我终于拔出宝刀，冲着卫生队高喊一声："冲啊！"自己率先冲了出去。

该往哪儿冲？苏蒙军又在哪儿？我一无所知，只是跟在部

队后面拼命地往前冲。身体完全处于一种忘我的状态，仿佛已经不归自己所管，鬼神附体一般只是往前冲！往前冲！冲到哪儿了，冲了多长时间，冲出去了多远全然不知，只记得周围除了硝烟就是沙尘，子弹“嗖嗖”地从耳边掠过，身旁不时有人扑通、扑通倒下，部队仿佛置身于焰山火海之中，人也变得越发疯狂起来。

突然，部队的最前方冒起一股黑色的硝烟，接着是“轰”的一声巨响，炸碎的弹片四处飞溅满天飞舞，在拂晓和晨雾中显得格外耀眼。以这一声炮响为开端，炮弹便铺天盖地地打过来，就像成千上万个空罐儿被一齐敲响了一样，惊天动地直冲云霄。

爆炸气浪卷着沙土硝烟，卷着血腥味儿，卷着死亡的气息直扑过来。几分钟以前还是冷气逼人，这会儿却烤得难受，全身像着了火一样，眼前呈现的是一幅活生生的、凄惨绝伦的人间地狱图，疯狂的、鲜血淋漓的修罗场。

2. 喷血的战地急救所

该往哪个方向冲、冲到什么地方，我全然不知。只是怒目圆睁、声嘶力竭地呐喊着，跟着前面的部队乱跑。

可是冲着冲着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了，再也喊不出来了。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鬼蜮一般的世界，地上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破衣烂衫、浑身是血的伤员——头上扎着绷带的、胸前吊着胳膊的，满脸是血像个血头公鸡的、缺一条胳膊少一条腿的、用步枪作拐杖一瘸一拐的……

此时，日军只能躲在运送伤兵的卡车下面以避开苏军的打击，“堂堂”的关东军没想到会有这一天。

看着这血淋淋的场面，我再也顾不上什么“玉碎突击”了，我是个医生，得先救人，于是便在附近找了块洼地作为临时急救所，把红十字旗掏出来插到洼地旁边的小沙丘上，然后命令卫生兵把伤员都集中到洼地里，赶紧进行战地救护。



一批伤员还没处理完，就听到“又来了”“又来了”的喊声，伤员接踵而来，蜂

拥而至，卫生队全体动手还是忙不过来，光扎止血带就已经无暇他顾了。不大会儿工夫，洼地里重伤员就收容了近百人，鲜血淋漓、鬼哭狼嚎，怎么突然涌来这么多伤员？我一时也觉得纳闷，大概是看到了小沙丘上红十字旗的缘故吧。

灰蒙蒙的洼地，顿时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有的人背来的时候就已经断了气，有的人叫着叫着就咽了气，有的人疼痛难忍惨叫不止，也有咬牙忍痛硬是一声不吭的，更多的是气息奄奄不停呻吟。鲜血从伤口直往外喷、往外涌，来不及包扎的伤员就用手死死按住伤口，包扎好了的也难以一下子止住血，雪白的纱布和绷带一会儿就染得血红血红。真是目不忍睹，悲惨至极。

最惨的是酒井部队的一个年轻的少佐，他的四肢都被炸飞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身子，像个不倒翁一样坐在地上。但令人惊奇的是，年轻的少佐硬是一声不吭，一言不发，甚至脸上也看不到痛苦的表情。他冷静而坦然地坐在那里，两个眼睛睁得老大老大，要不是时不时眨一下眼，恐怕没有人能想到他还是个活人。我给他处理伤口，他也只是默默地看着，轻轻地点一下头，仍然是一声不吭、一动也不动。事后我一想，四肢都没有了，恐怕想动也动不了了吧。

我的好朋友、酒井部队的军医森田信中尉，胸前挂着三角巾也出现在洼地上，是肩胛部的贯穿伤。在如此激烈的战场上两个人能在这样的地方相见，真可谓奇遇。“哎”、“嗳”地打了个招呼，我就赶紧去处理别的伤员去了。

那时的战地救护、紧急处置，与现代的急救医学相比相差甚远。只是用小毛刷把碘酊涂到伤口上，再用氯化汞纱布包扎起来就完事了。出血厉害的先扎上止血带，然后打上止血针和强心针，抬到沙地上一放就算是处理完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处理方法可以说纯属应付事儿，但在当时这已经是全力以赴地抢救和治疗了。

就在卫生队手忙脚乱抢救伤员的时候，几辆苏军的坦克冲到了洼地急救所的旁边，大概是红十字旗起了作用吧，坦克并没有冲进来，也没有进行射击，只是在洼地的四周徘徊，监视着我们的举动。卫生队的头顶上是子弹、炮弹横飞，身前身后硝烟弥漫，脚下是血流不止的伤员。

我们现在已经顾不上害怕了，满山遍野的伤员正等着我们

抢救呢。包扎完了一批又来了一批，这一批还没有处理完下一批又来了。到底应该先处理哪些伤员，是先来后到还是先重后轻，我们自己也糊里糊涂，只觉得焦躁得好像要发狂，身体好像已经不受自己支配了，东一头西一头忙得焦头烂额，怎么理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干着急可就是没办法，心急火燎，血直往头上涌。可是越着急越碍事，手脚就越不听指挥，抢救工作比想像的要慢得多。

这期间那几辆坦克一直在围着卫生队转，坦克在转但是乌黑的炮口却没有转，炮口一直是对准我们的。“坦克会不会开炮?什么时候开炮?”“机枪会不会开火？”“会不会用火焰喷射器来烧死我们？”“坦克有没有可能冲过来？”一边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处理伤员，一边还得时不时拿眼扫一下坦克。

就在这时上面又传下了命令:“重要的文件及资料要全部烧掉,来不及烧掉的要全部埋到土里,全体做好自杀的准备！”看来这次真是走到头了,没有任何活命的办法了，愤怒、悲哀、悔恨……百感交集一齐涌上心头，想想自己的一生就要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儿。

我急忙把自己一直好好保存的照片、笔记本连同行李全部埋到附近，又忙着去抢救伤员了。我是个医生，是个军医，抢救伤员就是自己的工作,就是自己的天职。至于自己是死是活，怎么死，在哪儿死，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了。

埋掉行李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被几百名伤员忙得团团乱转,完全处于一种意识丧失的状态。后来卫生队是怎么得救的,又是怎么撤退出来的,记忆中是一片空白。只记得到了黄昏,来了些接应部队，才稀里糊涂地跑了回来。

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如果再往前冲出几百米的话，恐怕整个卫生队早就不存在了。说是奇迹也好，说是命运也好，选择这块洼地作急救所，结果是卫生队也得救了。另外从苏军大炮的射程来看，蒙古高台就在前面不到1000米的地方。卫生队得救的这块地方叫什么名字，在什么位置，战后我查了很多战史资料，但是都没有详细的记载。从酒井部队推进的方向和距离来看，大概是位于诺门罕与巴尔夏嘎尔高地之间，俗称“伊敏高地”，军事上称为757高地的地方。如果推测得准确的话，那么酒井部队冲到了蒙古高台的正面，冲进了一片广阔平坦、毫无遮挡的荒野地带，拂晓之际才发现方向错了，敌后迂回夜

袭计划彻底失败了。没有迂回到苏军的背后，却迂回到了苏军坚固的阵地正面，并且天就要亮了，撤退也来不及了，所以酒井部队才发起了名副其实的“玉碎突击”。

说老实话，这和去送死没什么两样。敌高我低、敌强我弱，天时地利暂且不说，酒井部队好多士兵的子弹盒都是空的，步枪上插上一把刺刀就往苏军的阵地里冲，就往苏军的炮火里钻，这不是送死又是什么呢！

我的枪还留有3发子弹，那是留着自杀用的。可是那时大家都被四周的伤员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自杀的问题。自杀的恐惧也好，虏囚之辱也好，完全没有时间去考虑了，满脑子除了伤员就是伤员。

3. 【战史记录】

酒井联队的彻底覆灭

关东军酒井步兵联队的覆灭是整个诺门罕战争被歼灭的日军部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一看日本战史对这支王牌部队的最终灭亡是怎样记述的：

“酒井联队，在第23师团乃至关东军各联队中都属于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这一点是关东军上下一致公认的。

“8月20日苏蒙军发起总攻的时候，酒井部队镇守在巴尔夏嘎尔的733高地上，阻挡苏军中央集团的猛攻。上午7点，先是飞机的空袭，接着是火炮的轰炸，随后是坦克和步兵的猛烈进攻。

“苏军中央集团军的攻击兵力有：1个机枪旅、1个坦克营、1个装甲车营。日军的镇守兵力却只有1个步兵联队，外加1个步兵大队、1个工兵中队和少量的炮兵，靠这些兵力想



苏军步坦进攻。

红军士兵手里拿的是波波莎1938型冲锋枪。该枪坚实可靠，射速900发/分，使用71发弹鼓。作为苏联红军的标志性枪械，其改进型波波莎1941型冲锋枪共生产了500多万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苏联的主要步兵武器，并为其他许多国家所采用。中国的1950式7.62mm冲锋枪也是仿造该枪而成，以至于现在在世界的一些热点地区仍能看到它的身影。

要阻挡住苏军的攻势，十分困难。但凭借坚固的工事，还勉强可以坚持。

“战至傍晚，酒井部队突然接到命令撤出阵地，8月21日拂晓，酒井率领部队撤出了巴尔夏嘎尔高地。



日军九七式轻型轰炸机。

1937年生产，是与苏联的SU—2、美国的A—17同时代的单翼轻轰炸机，乘员2人。其起落架是固定式的，外型显得十分笨拙。在战斗机大多是双翼结构时，这些飞机的性能尚属先进。当大量单翼先进战斗机出现后，这类飞机迅速过时。该类型飞机参加过侵华战争和诺门罕战争，战绩平平，诺门罕战场上几次误炸日军的就是此机。入侵菲律宾战役后退役，1945年又被当成自杀飞机使用。

“为什么要把酒井部队撤出来呢?面对苏蒙军潮水一般的大攻势，关东军决定第23师团从防守阵地里抽出一部分兵力组织‘攻势反击’，要求反击部队迅速攻到苏蒙军南方兵团的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来一个大围歼。酒井部队编制保持得相对齐全，首当其冲被选中。

“此次攻势反击行动由小松原师团长亲自指挥，兵分两路左右攻击，右翼由第23师团步兵旅团长小林恒一少将指挥，左翼由第7师团步兵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指挥。

“为了便于指挥作战，8月23日晚上，小松原将师团指挥部从诺门罕推进到了752高地附近，这里离攻击目标只有7公里左右。第6军参谋长藤本少将也亲自赶来督战。

“8月23日夜晚，酒井部队趁着大雾悄悄地靠近到了苏蒙军的阵地——莫胡来恩湖附近。8月24日上午9点半，酒井部队发起了攻势反击。可是令日军意想不到的是，苏军的火力异常凶猛，三四千米之外就是苏军的阵地，怎么攻也攻不上去。正面是轻重机枪，左右两侧是20辆坦克，疯狂的扫射打得士兵们根本抬不起头来。上午10点半苏军的火炮也开了火，酒井部队的伤亡惨重，队伍混乱，副联队长阵亡，先头部队的士兵们像刮倒的竹竿一样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整个上午攻击部队前进了还不到2000米。

“中午时分，酒井部队在炮兵部队的掩护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总算是靠近了莫胡来恩湖苏军阵地的最前沿，但是由于人员伤亡太多、弹药消耗太大，已经没有再往前攻击的力量了。下午，苏军开始组织反扑。苏军士兵以坦克作掩护冲了上来，迫击炮、机枪、坦克炮、榴弹炮一齐开了火，酒井部队开始一个班、一个小队地倒下去，下午2点联络中断。

“日落时分，指挥部总算有了酒井部队的消息：右翼于12时靠近敌阵前沿，然而下午遭敌坦克反击，指挥官小林少将去

利用T—26轻型坦克作掩护向日军阵地步步逼近的苏军士兵。



向不明(小林被炸断腿后很长时间才被日军卫生队发现收容),酒井大佐重伤，大队长、中队长几乎全部死伤。第一大队大队长西川重伤,第二大队大队长小仓重伤,第三大队大队长失踪,中队长以下伤亡无数。(西川被抬到野战医院时大吃一惊:‘72联队完了。’因为以酒井为首,各级指挥官全都送了进来。)一个下午,部队的指挥系统完全被摧毁了。

“当天下午4点左右，日军的轰炸机出现在第23师团指挥部的上空，错误地瞄准师团部附近的军用物资进行了轰炸，炸毁卡车十几辆、炸死炸伤官兵多人。这种误炸已经不是第一次了,8月2日轰炸机曾误炸过满军的兴安师,炸得满军兴安师兵力逸散，战意丧失。

“傍晚时分,第一线方向的步兵像雪崩一样开始退却,失去了指挥的酒井部队基本崩溃了。(小松原在日记中记道:“小林指挥官、酒井两人负伤及军旗后送等，使得部队士气低落。健全者也开始陆续后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肆意退却现象。”)

“酒井部队8月24日参战人数为2295名官兵，一天内战死1823人(其中将校31人)、战伤377人(其中将校21人)，一天的伤亡率就达95%。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将校的伤亡率，79人之中死伤52人，伤亡率高达66%。

“兵器的损耗：轻重机枪49挺、野炮14门、速射炮21门。惨重的伤亡和损耗使得精锐的酒井部队不复存在，兵力一天之

中伤亡殆尽，所剩下的健全兵力只能缩编成两个小队。酒井美喜雄深感责任重大，9月12日在齐齐哈尔陆军医院里自杀身亡。

“右翼‘攻势反击’作战只进行了一天，便以失败告终，酒井联队全军覆没。”

虽然日本在战史中竭力描写日军的攻击是如何“顽强”，进攻、防守是如何“勇猛”，但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出些端倪，日军一个步兵联队齐装满员一般是4000人左右，酒井联队进攻时只剩下近2300人。这还是编制保持最好的，其他部队的状况可想而知。三天下来，诺门罕地区的日军大势已去。不过，酒井联队还算是日军这次反扑进攻中攻得最远、战果最显赫的一支(至少他们还攻到了苏军阵地前沿)，其他部队连苏军阵地的边都没碰上便灰飞烟灭了。

4. 【战史记录】

全体“玉碎”的山县联队

山县武光的第64步兵联队是惟一一支从头到尾参加过所有诺门罕战事的部队，让我们从其士兵的回忆中了解一下其灭亡的过程。

五味川纯平在他所著的《诺门罕》一书中和山县部队一等兵后藤金市的回忆录中，都对这支当年挑起诺门罕战争的元凶部队的灭亡有详细描述。

“8月27日一大早，巴尔夏嘎尔高地就被硝烟炮火笼罩起来，山县部队的主力已经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弹药粮食所剩无几。

“苏军以1个装甲营、1个坦克营的兵力不断发起正面进攻，并且这一天又从北方抽出1个步兵营进行右侧攻击。

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两军都相差悬殊，一天下来山县部队的死亡率就达到69%，而各炮兵部队的伤亡率则高达70%~75%。”

下午3点，苏军坦克10辆、步兵500多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攻了上来，坦克在800来米的前方停下了，利用一片洼地作掩护，只露出炮塔进行支援射击，步兵则步步逼近。阵地上硝烟滚滚、沙尘弥漫，呼吸都有些困难。有人数了一下，5分钟内苏军的重炮、野炮、迫击炮、坦克炮打过来400多发。猛烈的炮



诺门罕战争后期，在苏军的连续打击下，步步败退的日军已顾不上构筑机枪阵地，只能是随便找个地方一趴下就打了。

击使许多战壕倒塌，一些士兵被活活地埋在里面。苏军的步兵攻到阵前80来米的地方就不再往前攻，而开始投掷手榴弹。

太阳快要落山时，4辆坦克冲进了阵地，苏军士兵也"乌拉、乌拉"地冲了上来，再加把劲儿的话这块阵地肯定就是苏军的了。可是随着太阳的落山，苏军的攻击部队就像潮水一样开始后退。不管战局怎么有利，天一黑他们就撤退，这好像是苏军规定好了的一条原则一样。这一天也不例外，他们刚刚攻到了阵地附近，可是马上就退了回去。

战场上寂静下来了，月亮升到了中天，随着月亮的升起，气温也骤然下降，山县部队的士兵们还穿着夏装，每个人披着一块毛毯，冻得直打哆嗦。激战了一天已是饥肠辘辘，可是供应已经中断了，每个人只能分得一块饼干。就在士兵们啃着饼干的时候，突然阵地上传来动听悦耳的日本民谣，音乐一完接着是一个甜甜的女人的声音："日本的士兵们，你们马上打着白旗过来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小松原师团实际上已经完全被包围了，退路已经被切断了，再打的话你们就是死路一条了，快放下枪支，停止战争。"

同一天，小松原动员起手下所有残兵(步71联队500人、步72联队40人、独立守备队250人、工兵23联队300人、师团通讯队50人)1140人，组成了一支救援队去营救733高地的山县部队。整个日军前线现在只剩下这一个阵地了，并且就是这最后的一个阵地也如同风中的残灯一样，随时都有被吹灭的危险。第23师团实际上已经败了，败得溃不成军。

8月28日，天一亮苏军就开始了猛烈的炮击，坦克在距离阵地500米的地方开始了交叉炮击，所有的战壕几乎都倒塌了，救护队的身影也不见了，好多士兵活生生地被闷死在战壕里。坦克冲进了阵地，像撒了欢的野马一样到处喷射火焰，一些躲在战壕里的士兵顿时变成了一个个大火球。这一天炮火打得也格外地凶，一直打到晚上11点钟才停了下来。经过两天的激战，

日军水米早无，弹药将尽。野炮、步兵炮、速射炮及重机枪的碎片四处都是，战壕里、掩蔽部里，横七竖八全是日军的尸体，士气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增援的伊势炮兵联队残存的5门大炮到了下午6点已全部被毁，幸存下来的一些士兵只有靠步枪、燃烧瓶展开肉搏，全军覆没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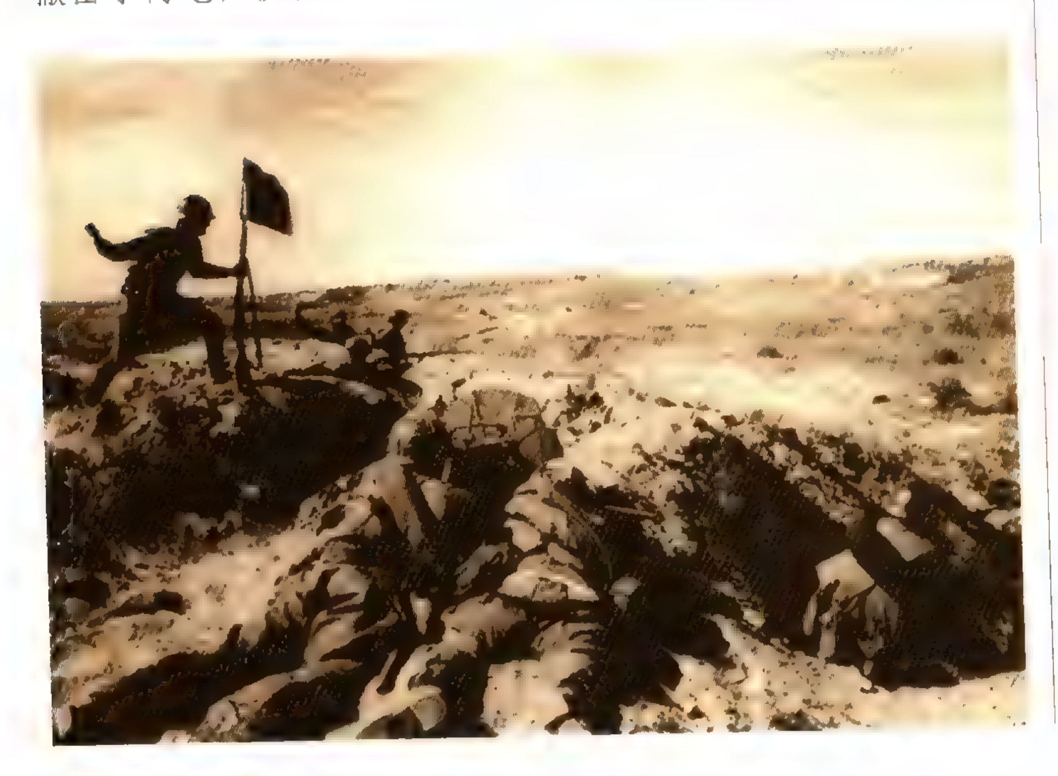
8月28日下午4点，山县部队和师团部彻底失去了联系。

山县和伊势两个联队的战斗力已尽失，明天阵地将难保，覆没就在眼前。傍晚，山县和伊势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着天黑向诺门罕方向撤退。

撤退命令于28日晚上11点左右下达，但是撤退并不容易，准备工作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主要是伤员的后撤准备，撤退推迟到29日凌晨3点。

小松原率领的救援队于27日晚上9点出发，结果出发后不久便遭遇苏军装甲部队。前卫的步兵第71联队伤亡惨重，伤员卡车在运送途中遇苏军坦克袭击，也全被消灭。夜晚行军，速度缓慢。

29日凌晨5点，等救援队登上733高地时，高地上除了尸体以外空无一人，山县部队和伊势部队残部已经于两个小时前撤出了高地，救援队扑了个空，反而被苏军包围起来，进退两



苏军向日军发起猛烈的攻击，二战时期苏联红军以坚韧顽强而著称，这是东西方军事史专家公认的。



图中所圈部分为日军的军旗。日军的军旗其实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一面旗帜，而是正中那个日军拿着的像节杖一样的东西。由于规定旗在编制存，旗丢编制裁，所以每次战斗日军都会派重兵护卫它。

难。

小松原在日记中记道："29日早晨遭敌炮火轰炸，救援队的速射炮、机关炮被毁，只能以肉搏战与之抗争。有的士兵中弹血染全身，举起步枪高呼万岁而死。弹药及急救材料奇缺。炮弹确实令人头疼，急切盼望日落。"

8月29日清晨，苏军很快就发现了山县、伊势两支部队的撤退，坦克和步兵急袭而来，将这支残部打得支离破碎、四处逃散。山县和伊势两人的身边只剩下4个人：山县部队副联队长、山县部队旗手、1个传令兵和1个士兵。6个人一直退到野炮阵地就没法再退了，苏军的步兵已经把他们包围起来了。

29日下午4点半，山县、伊势两人烧掉军旗后饮弹自杀，副联队长和旗手也自杀身亡，只有传令兵和那个士兵没有自杀，两个人等天黑后逃了出来。至此，山县武光的第64联队和伊势的独立野炮第13联队突围途中悉数被歼，仅有几个人逃了出来。

五味川在书中辛辣地写道："听说第64联队等被歼后，关东军和第6军最担心的不是山县等人死没死、怎么死的，他们最担心的是军旗是不是完全烧掉、有没有落入敌手。关东军在这之后又调集了第2师团、第4师团和其他直属部队，企图来一个大反攻，据说军旗下落不明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军旗成了他们的一大心病。

"如果这一说法真实的话，那么关东军也就太愚蠢了。军旗就是一面旗帜，只不过是一个部队的象征而已，说是天皇赐给的那也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战争是以胜败而论的，军旗怎么能决定胜败?为了一面军旗、一面下落不明的军旗而出动大军，可谓愚蠢透顶。关东军企图组织大反攻，说到底只是为了挽回败军的耻辱，说是为了军旗的安否，其实那只是个借口，想借'忠节'之名遮挡一下自己的面子而已。

"为了一面军旗而企图把成千上万的人再次投入死地，这样



苏军的BT－5型坦克示意图。

苏联一直要求坦克具有很快的速度，1932年，由此研制出BT—5快速坦克，它装有1门45mm火炮和1挺7.62mm并列机枪。BT坦克的车体用焊接装甲，并加大装甲板倾斜角度，以增强防护力。BT坦克经过多次改进，发展出了多种变型车，主要有BT架桥车、BT火力支援车、BT喷火坦克、BT指挥车等。BT坦克供远程作战的独立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使用，因其装甲防护薄弱，不适于与敌坦克作战，所以诺门罕战争中主要用来攻击敌人的后方，以夺取诸如司令部、补给基地、机场等重要目标。

的领导人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战争狂人。”

再看一看山县部队一等兵后藤金市的战后回忆，了解一下山县部队最后的下场：

“我被分配到山县部队的时候，已经是诺门罕之战的后期了，当时是第几大队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常常能看到山县部队的军旗，从这一点来看不是联队部就是第1大队，和我一起分配来的共7个人，班长是上村伍长。

“到了8月下旬，战况一天比一天糟，整个山县部队的阵地全都被苏军的坦克和步兵包围起来，我们陷入了绝望境地。8月28日夜晚11点左右时，山县联队长下了撤退命令，大家急忙收拾整理了一下，在一片漆黑之中开始撤退。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苏军一开始竟没有发觉我们这两支部队的撤退，是确实没有发现还是有意想放我们，那就没有人知道了。反正我们是从敌军的包围间隙中撤退出来的，一路直奔诺门罕而去。一些人回忆说当时是几十人，也有的说是上百人，成群结队地、一波接一波地往外撤。我们刚刚撤出包围圈，一片残月就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幽静地把月光洒落下来。月亮这一出来不要紧，我们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紧张得心‘扑通、扑通’一个劲地跳，大家谁也不敢出声，轻手轻脚地往前走。

“突破包围后不久，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喊：‘向诺门罕前进！向诺门罕前进！’是山县的声音！听到这激昂的声音，我们加快了脚步，顺着河谷逆流而上，大家都知道这样一直往前走下去就是诺门罕。

“就在这时，从诺门罕方向忽然传来了隆隆的马达轰鸣声和吱吱的坦克履带声，不一会儿就见10辆坦克冲我们奔了过来。‘是友军！是友军！’‘是我们的坦克！’‘我们得救了！’大家嘴里都在这么喊，一些人禁不住发出了万岁的欢呼声，大家一拥而上，迎着坦克跑了上去。

“可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啪啪啪



3名苏军坦克第11旅指挥官躲在坦克下面研究进攻路线。

啪’的机枪扫射声响了起来，是朝我们打的。大家这时才明白过来，眼前的坦克原来是苏军的，在敌军的坦克面前高声欢呼，这不是找死吗？

“部队一下子溃散了，大家都去找洼地、弹坑藏身，能保住自己一条命就不错了，谁也顾不上他人了。坦克是什么时候开走的我搞不清楚，等寂静下来以后我抬头向四周看了看，周围已经看不到人影了，只有遍地的尸体。刚才坦克的袭击使大多数人倒下去了，幸存下来的人三三两两地又顺着胡鲁斯台河北岸走了起来。夜幕渐渐拉起，周围也看得清楚了，8月29日来到了。

“早上8点来钟，胡鲁斯台河南岸突然出现了一大群人和坦克群，朝着我们所在的河北岸猛烈地射击，官兵们一个个就像割稻草一样倒了下去。‘那是友军！他们打错了，快摇军旗告诉他们是自己的部队，让他们别打了！’山县联队长一个劲地喊。旗手急忙揭掉军旗的外罩，展开军旗使劲地摇起来。

“可谁知那根本不是友军的部队，也是苏军。这一摇旗不要紧，对岸万枪齐放，子弹就像暴风骤雨一样打了过来，藏也没处藏、躲也没处躲，干挨打。被坦克蹂躏了一番的这支残军，现在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士兵们大片大片地倒下去，受伤士兵鬼哭狼嚎地惨叫。一些士兵逃到胡鲁斯台河里，可眼见也是

一个一个倒了下去，一时间河水都被染红了。

“我吓得魂儿都飞了。

“好在不远处就有一块洼地，我和赤崎一下子跳了进去。跳进去才发现洼地里已经有两个人趴在那里了，一个少尉和一个士兵。子弹真的就像下雨一样噼里啪啦打在身前身后，子弹掀起的沙土四处飞溅，呛得人睁不开眼。下一步该怎么办？正琢磨着的时候，那少尉和士兵突然跃出洼地向前跑去，可是刚刚跑出去十来米，他们就成了射击的靶子，扑通扑通栽倒在地，顺着斜坡骨碌骨碌地滚落下去。两个人目标太大，跑出去肯定是死路一条，我和赤崎一商量，决定各奔东西、各自逃命。

“我们同时跳出洼地，赤崎朝着诺门罕方向跑，我干脆来了个相反的方向——顺着斜坡向河里、向苏军阵地的方向跑去，跑到河边后一个猛子扎到河里了。不可思议的是，子弹好像一发也没有打过来，也听不到子弹的呼啸声。不，子弹不可能一发也没有打过来，只不过是我拼命逃跑没听到而已。

“好在河水不深、流速也不快，河面上还生长着一些茂盛的水草，我抓过几片水草叶子顶在头顶上，蹲在河里慢慢向胡鲁斯台河南岸走去。南岸比北岸高而陡峭，形成了一个几乎是直上直下的断崖，所以南岸的河边也就成了一个死角，苏军从上面根本看不到这里。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吓得魂不附体，头顶上就是苏联兵，呜哩哇啦的叫喊声和刺耳的枪声就像漩涡一样一直在头顶上打旋。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定下神来，然后蹑手蹑脚沿着断崖一点一点开始逆流而上，真是连大气儿也不敢喘。就这么偷偷摸摸爬了好几个钟头，虽然还能隐隐约约听到枪声，但是那呜哩哇啦的叫喊声终于听不到了，这时才把心又放回肚子里。‘自己这不是活着逃出来了吗？’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狂喜。

“我参加过许多战斗，也经受过无数次炮火的洗

步兵搭乘坦克一起进攻是苏军的老传统，这是因为苏军缺少运载步兵的装甲车，这种方式虽然方便有效，但有时伤亡会很大。



礼，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狼狈的场面。

“拼命地走啊走，终于发现了一个友军的炮兵阵地，就像在地狱里遇见了菩萨一样，我一个劲儿地哀求他们救救我。炮兵们还算亲切，对我这个败兵给予了怜悯和安慰，还给了我一个饭团子。可是饭团子我是一口也咽不下，喉咙干得像要冒火一样，咽几口水都像刀割一样痛，难受得要命。

“那么多的士兵都不见了，那么大一支部队就像烟云一样消散了。山县联队长等人都怎么样了？我的心里就像有一块黑云在漂浮着一样，觉得甚是不安。”

山县联队的灭亡，使小松原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诺门罕前线日军防线彻底崩溃了。现在不是顶得住、顶不住苏军进攻的问题了，而是还有多少人能活着逃出去？连小松原自己的命运都成问题了，第23师团部也被苏军团团包围，收网只是时间长短了。

5．【战史记录】

尘埃落定——关东军的自杀冲锋

8月21日，总攻的第二天，苏军就基本实现了第一阶段的目标，两翼包抄的装甲部队顺利地在日军后方会师，初步完成了对日军第6军的分割包围。同时，强大的炮火和密集的轰炸将日军所有前沿炮兵阵地、观测所、通讯站完全摧毁。伞兵第203旅空降敌后，成功地夺取了日本的甘珠尔庙后勤基地，彻底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躲在远处的日重炮部队已弹尽粮绝，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只能作壁上观，成了诺门罕战争收尾之战的旁观者。荻州立兵的第6军已成为瓮中之鳖。

植田谦吉不肯认输，他怎么也不愿相信堂堂的“大日本皇军”会失败，要最后再赌一把。虽考虑过调集其他师团参战，但远水不解近渴，机械化程度极低的日军步兵师团要集结到诺门罕，最近的需一周，远的得半个月。第6军能否撑到那个时候，谁也不敢保证。植田只好命令荻州立兵，不能坐以待毙，立刻从被包围的部队中抽出14个步兵大队(约1.5万人)组成反击兵团，集中兵力与南路苏军决战，争取时间等待救援。

荻州将反攻的命令下达到各部队后，引起部队的一片质疑声：一线部队白天作战，晚上抢修工事，几天来缺吃少喝早已

【历史点击】



日军航空兵糟糕的“敌我识别”能力

日军航空兵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没有解决好“敌我识别”这个问题，误炸误打屡见不鲜。最惊险的一次是在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一艘潜艇发现了英国远东舰队，日军急忙从西贡机场出动了53架鱼雷机和34架高空轰炸机，直扑英舰而去。第一次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作战的兴奋，刺激着狂热的日军飞行员，很快他们发现了水面上两条若隐若现的白色水带，那是军舰尾部的浪迹。机群猛扑下去，53架鱼雷机首先俯冲投弹，可是就在大队长高井刚要率先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他看到军舰桅杆上飘着一面太阳旗，“停止攻击！停止攻击！”高井歇斯底里地大叫着拉起了飞机，日军机群在最后一刻擦着军舰的桅杆向上拉起。日军巡洋舰舰队惊悉险些葬身于自己的鱼雷攻击，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吓出一身冷汗。缺乏敌我识别系统的日军航空兵没敢继续在海面上盲目搜寻英国舰队，赶快撤了回去。

疲惫不堪。如果凭借钢筋水泥工事死守，或许还能坚持几日，跳出坚固的工事向苏军坦克冲锋，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加速部队灭亡。步兵第71联队的继任联队长长野曾忧心忡忡地向参谋长冈本汇报：“第71联队只剩1800人，如果再将两个大队派出，剩下的人将守不住防线。前进的部队，恐怕前进不了多少米就会全军覆灭。”冈本的回答是：“就是全体玉碎也要进攻，为了皇军的荣誉，哪怕是前进两三米也好。”听完指挥官的这席话，长野顿时无语以对。无独有偶，右翼的森田旅团连守住现有的阵地都很困难，接到的命令却是当晚必须攻下719高地。在苏军密集的火力打击下，日军根本无法冲过开阔地带，旅团长森田担心这样硬拼下去会和左翼部队一样的下场，他向师团参谋长请示能否灵活执行命令，得到的答复是：“一寸也好，两寸也好，该进攻时就要进攻。”森田气急败坏地反问：“都死光了，还进什么攻？”



苏联工兵冒着敌军的炮火在扫雷。

8月24日凌晨3点，担任反攻的14个步兵大队纷纷从坍塌的工事中爬了出来，冲向旷野，走上了死亡之路。等进攻的日军完全脱离了阵地之后，苏军的炮火便铺天盖地般打了过去，无处躲藏的日军伤亡惨重，趴在地上，寸步难行。等到天亮，苏军的坦克纵队和装甲车部队从延绵起伏的沙丘后面开了出来，一气冲进日军队伍当中，连撞带压，打得日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伤亡已到极限。（日本战史记载，第72联队参加攻击的一个中队仅有4人生存，还全是重伤员。这时，苏军的装甲车辆的柴油发动机已不怕日军的燃烧瓶，而且车身上缠满了铁刺网，令充当“肉弹”的日本兵抓没处抓、爬没处爬，根本靠不上去。战场上日军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

诺门罕战争后期，关东军陆上航空队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地面上修飞机，偶尔出动一两次却往往炸错了对象。（出自《昭和史》·14～15年，每日新闻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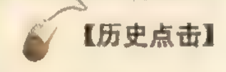


小松原很快与反攻的步兵部队失去了联系，派出去的联络参谋和通信兵一个个有去无回。天亮后，师团部周围也出现了大队的苏军装甲车，警卫大队拼命抵抗，伤亡累累，效果不大。小松原中将见势不妙，忙疾呼航空兵救援。这次第2飞行集团来得倒很及时，不一会儿12架九七式轰炸机便哼哼唧唧地来到了，一通炸弹却全都扔到了第23师团司令部汽车队的头顶上，而且出奇得准确，仅存的十几辆汽车无一幸免，被炸得支离破碎。地面上的日本兵又是摇旗，又是挥手，可是没有用。轰炸机坚持把最后一颗炸弹投完后才晃晃翅膀，得意洋洋地走了，气得日本步兵跳着脚大骂。

苏军装甲车队远远地看着一架架涂着膏药旗的轰炸机起劲地向日本阵地俯冲投弹，一时也弄不清日本鬼子是在搞什么名堂。直到看见

日军的掩体在轰炸中土崩瓦解、车辆冒起了黑烟，他们才满意地撤走了。小松原躲在崩塌的掩蔽所里侥幸保住了性命，参谋长冈本的双腿被打断(后来这位大佐在海拉尔医院治疗时，不知怎么惹恼了伤兵，被人用刀活活地砍死在病床上)。

傍晚，前线的消息终于传了回来，在一天的反击作战中，所有部队前进了仅仅不足两公里，但伤亡却是可怕的。有些地方尸体多得都摞在了一起，让人无处下脚。日本战史记载：左翼进攻的第72联队两个大队只剩下7名军官和87名士兵，联队长酒井大佐左臂被打断，只剩下一口气；旅团长小林少将右腿被坦克炮打掉了，倒地后险些被败兵给踩死，浑身是泥，幸亏被一军医发现拼死相救才幸免于难；第64联队小队长以上军官非死即伤，部队只能靠士官指挥；独立野炮第13联队的1199名官兵和1040匹挽马全都横尸荒野，36门火炮成了一堆金属残骸，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成了光杆儿司令；右翼的森田旅团情况也不妙，第71联队进了苏军的埋伏圈，刚上任的联队长森田彻大佐率队向坦克冲锋，被打成了筛子，打到最后，代理联队


【历史点击】



森田彻的下场

森田彻是“七七”事变的元凶和指挥者之一，1936年调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副联队长。“七七”事变时，森田彻在宛平现场指挥日军“演习”，还是日方战地谈判代表。据中方谈判代表回忆，这个矮家伙是个态度极为蛮横的法西斯军人，极令人讨厌。由于积极参与“七七”事变和进攻宛平作战有功，获金鹰三级勋章。1938年3月1日晋升大佐，调任关东军第7国境守备队队长，驻屯在中国东北北部边境地区。1939年5月11日，关东军挑起诺门罕战争，与苏蒙军激战，关东军损失惨重。8月2日，森田彻大佐调任第23师团步兵第71联队任联队长，接替战死的联队长。森田彻一上任就面临苏军坦克群进攻，阵地接连丢失。他驱使部下靠近坦克投掷燃烧瓶、手榴弹，但苏制坦克此时使用的是柴油机，不易燃，战车又高又大且装甲厚，日军对它奈何不得。战到22日，第71联队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到26日上午，森田彻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和密电码本，头缠白布条，率残部跳出战壕，挥舞战刀冲向苏军坦克群，集体“玉碎”。森田彻刚冲出几步，即被坦克重机枪射倒。他还未来得及做天皇亲授金鹰勋章晋升将军的美梦，就被苏军坦克碾为肉饼，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长东宗见只剩下他一个人，只好烧掉了军旗朝自己脑袋上放了一枪，宣告了第71联队的彻底灭亡；第8独立旅团拼到了油枯灯灭，长谷部大佐被苏军狙击手击中头部当场阵亡；穆陵重炮第1联队联队长三鸠大佐被炸飞了一条腿，代理联队长梅田炸毁了空炮后切腹自尽。

到此，第6军的疯狂反击宣告了彻底失败。剩下的兵力能否守住岌岌可危的防线，荻州立兵一点把握也没有。这位心灰意冷的军长躲在将军庙指挥部里，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什么主意也没有了。日军防线于8月底全线崩溃，山县步兵联队最终灭亡于8月29日。联队长山县武光和炮兵联队长伊势高秀双双自杀；酒井联队灭亡于8月25日；井置骑兵联队跑出来了100多人，但井置被劝说“自杀成仁”。不过独立野炮第7联队覆灭后，联队长鹰司大佐也是孤身逃出，下场却没有井置那么倒霉。因为鹰司沾皇亲国戚的光，只被剥夺男爵勋衔，送回国停职反省去了。没有人敢劝他自杀，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二战时期从总体上说，日本军队的作风应该是最顽强的。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前，几乎所有参战部队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都“玉碎”到底了。没有成建制投降的部队，这是日军在二战期间惟一可以标榜的一点资本。

苏军的反击到将军庙一线停了下来，教训关东军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斯大林不想在远东引发苏日大战。



苏军正在强渡一条小河汊，在后面掩护的机枪是著名的苏制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

关东军9个联队，到此(包括4个重炮联队的全部装备)全部扔在了诺门罕。第23师团仅剩下400余伤兵。小松原在此战后被转为预备役，后来羞愧难当，切腹自杀了。第7师团由于师团长圆田中将的“远见”，所有的联队旗都留在了齐齐哈尔。虽说3个联队也没剩下几个兵，但按日本陆军的理论，这些联队不能算被歼灭，可以重建。从8月20日苏蒙军发起总攻到8月30日停火，10天时间内，关东军损失了28000人。第23师团、第7师团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日军当时规定，一支部队伤亡20%视为尚可战斗；伤亡超过30%视为仅可防御作战；伤亡50%左右时，即为战斗力丧失，应退出休整。第23师团伤亡在98%，第7师团伤亡在73%，这已远远超过上述比例)。同时，所有配属的特种兵联队也全部损失殆尽(技术兵器和装备损坏率在80%以上，还未包括先行撤走的安冈坦克师团的损失)。战后，陆军省被迫承认诺门罕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遭受的最大惨败，高级军官的伤亡也是空前的。第71联队两个月之内四易主官，死三伤一，全军大佐以上军官伤亡26名，其中少将2人、中将1人。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也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矶谷，被转为预备役；国内的沼田内阁垮台，军部重新审视国策。“南进”派占了上风，日本从此将目光移向了太平洋和东南亚，准备和英、美在海上一决雌雄。

从诺门罕战场活下来的士兵编了一首《诺门罕战歌》自我解嘲，不想后来竟成了战争中日本寡妇怀念丈夫的歌谣。歌中这样唱道：

对面的山是僧布尔山，
脚下的河是哈拉哈河，
十个联队的人啊，
死得成千上万，
天皇在东京眺望，
司令官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去升天成神……

这成了对这场战争乃至日本在二战期间侵略战争的绝妙讽刺。

（四）一败涂地的关东军

1．绝望的对峙

我又拣了一条命，没死也没伤。狂奔了一夜，现在一步也挪不动了。我平躺在沙地上望着蓝悠悠的天，灿烂耀眼的阳光下，天空是那么晴朗，云朵又是那么美丽，简直就像躺在天堂一样。战争好像早已烟消云散，听不到枪声也听不到炮声，看不到硝烟也看不到坦克，跟那洼地的修罗场相比，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爬起来往四周看了看，有岩石，有瘦小的灌木、低矮的松树，我自言自语道："这不是尼盖索特莫特森林吗？"怎么稀里糊涂地跑到这儿来了？因为在整个诺门罕地区只有这一个森林。说是森林，其实只是一个名字罢了，这儿并没有高大茂密的树木，只是稀稀拉拉生长着些灌木和低矮的松树，再就是茶色的光秃秃的岩石。

正迷迷糊糊的时候，一个军曹和一个卫生兵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卫生队已经撤出了阵地。这个军曹是2号阵地丸山军医的部下，他怎么不去找丸山军医汇报却跑到我这儿汇报呢？一问才知道，原来卫生队中的6个军医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其他都已战死了。

军曹说，8月29日拂晓他们撤出2号阵地，带着两名轻伤员往诺门罕方向撤退。可是撤退途中被苏军的坦克发现，一阵

"黑色的死神"——苏制拉－2攻击机。



坦克炮的猛烈炮击把丸山卫生队打得四处逃散。丸山军医护着两名伤员就是不肯撒手，跑得慢、目标也大，结果丸山军医的胸部被坦克机枪打穿，两名伤员也倒在了机枪枪口之下。军曹跳进一个弹坑装死才逃过险关，等坦克开走后逃了出来。

听完他的汇报，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感叹自己真是命大，甚至心想是不是真的有神灵在保佑着自己？要是在2号阵地不大醉一场、大闹一通的话，也许就不会被打发出来参加“玉碎突击”，还会留在2号阵地，那么第二天被机枪打穿胸膛的也许就不是丸山军医，而是草平军医了。

我们活下来的几个人成了没娘的孩子，被遗弃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之中。辨不出东南西北，该往哪儿去、去干什么，一无所知。向四周望去，这儿和以往见到的荒野沙漠地带完全不一样。周围到处可见一些黑褐色的岩石，还有一些瘦小低矮的松树，并且这些松树和内陆的松树不一样，内陆的树都是亭亭玉立，树干老高老高的，可是这里的松树却很矮，树干又粗又短，看上去好像是坐在地上一样，除了小松树以外，就是一些小灌木和野草。

对我来说，尼盖索里莫特这个地方并不陌生。以前曾经来过两次，第一次是森林的北端，第二次是森林的西端。这个森林相当宽广，边缘部和中心部的景色也不大一样。但好歹这里有树、有岩石，是个难得的安身之处，比起那茫茫无际又毫无遮挡的荒野沙漠地带来说，这里给人一种安全感、舒适感。

这里除了我率领的卫生队残部以外，还有一个步兵小队。他们已经在岩石的四周挖好战壕，蹲在战壕里镇守待命。卫生队就好像是一伙穷要饭的一样，没有人来理睬我们，也没有人来管我们。没有命令也没有联系，卫生队现在应该归属哪支部队，到哪里去救治伤员，没有人来告诉我们，我们只是呆呆地蹲在这里待命。这天大概是8月29日，在那种时候对日期的概念已经很淡漠了，大脑已经有点像植物人的了。

正发呆的时候，头顶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大的黑影，我急忙抬头看去，原来是苏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子弹打到岩石上直冒火星，一时沙石乱飞。一架飞

日本三八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它是日本步兵在侵华战争中使用的主要步枪之一，也是中国缴获的最多的一种步枪。该步枪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定型生产，所以称为三八式。它是三十年式步枪的改进型，其主要特点是：在枪机上有防尘盖，能随枪机前进和后退，枪的保险机构在枪机的尾部，可用手掌按而转动，枪的射击精度良好，但侵彻力较小。该枪发射6.5mm友坂尖头弹和圆头弹，由4发弹仓供弹。枪全长为1.28米，重量为3.9公斤，该枪配单刃偏锋刺刀，刀长为0.5米，重0.5公斤。



机离去，我刚想从岩石旁爬起来喘口气，又来了一架，紧贴着树梢又是一阵低空扫射。一架飞机扫射完毕，另一架飞机马上就飞出，一架接一架连续不断地进行轮番扫射。

远处有一座小山丘，苏军就是巧妙地利用这个小山丘作掩护，真可谓来无影去无踪。架架都是紧贴着地面飞，其飞行技术之高实在令人叹服。一个卫生兵禁不住发出了赞叹的声音："这黑家伙，别看它大，还真灵巧，跟黑牛氓一样。"马上就有人接过来说："这种飞机是低空扫射的能手，听说在欧洲都是很有名的，外号就叫'黑氓'，厉害着呢！"士兵们的消息如此之灵敏、如此之详细，令人惊讶不止。尽管"黑氓"轮番地进行低空扫射，但是我们这儿除了几十名败兵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打击的军事目标，这种低空扫射的目的好像并不在于造成多大的伤亡，只不过是想制造一种威吓的效果罢了，以限制我方的军事行动。

下午，卫生队竟又接到参加夜袭的命令，谁下的命令，跟哪个部队，去什么地方夜袭，我一无所知。反正编制都打乱了，只好跟着去了。

虽然是个月夜，但是由于浓雾蒙蒙，所以周围漆黑一片。我们跟在夜袭部队的后面前进了两公里左右，前面传下命令："卫生队在此待命!"卫生队停了下来，全都跪在地上等待下一个命令。周围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夜风冷飕飕地吹得人心神不安。前方不远的地方隐隐约约有一个小沙丘，没准儿那儿就是苏军的阵地，接下来就该"玉碎突击"了吧。可是等了半天，前面一点动静也没有，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是毫无动静，也没有人来联络报信儿。

夜袭部队没准又撤退了，卫生队肯定又被抛弃了。一想到这里，我的一股怒火禁不住涌了上来。诺门罕之战以来这已是第5次了。每次夜袭都是顾头不顾腚，没有详细可行的计划，没有互相配合照应，就会一味地蛮干。可光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再这么等下去可真的危险了。没办法，只好下令撤退，撤退的路上，我意外地拣了一支步枪和一盒子弹，步枪是三八式的，肯定是日军士兵战死后遗留下来的。

8月30日一大早，3架"黑氓"又来了，反复低空扫射。

昨天卫生队就叫这几架"黑氓"折腾了一天，闹得头痛。今天一大早它又来了，我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无名火，抓起昨晚



冒着炮火步步向敌军逼近的苏军散兵线。面对这种压迫式进攻，残存的日军精神都快崩溃了。

拣来的步枪，身体靠在一块岩石的旁边，把枪口对准了天空。飞机从小山丘上方一出现，我就对准它打了两枪，原打算一口气儿连打5发，可是这飞机又灵活又迅速，而三八式步枪每打一枪都需要手动退膛上膛，连打5发根本不可能。

这架苏军飞机好像发现了什么，朝着我的方向一个紧急下降，接着就是一阵电闪雷鸣般的扫射，打得四周火星四溅、沙上飞舞。我也来劲了，“来吧，看看谁厉害！”飞机一飞过头顶，我就端起步枪朝着飞机的尾巴“啪啪”又是两枪。这两枪可能真的把“黑氓”给惹火了，飞机也不往回飞了，在空中调了个头俯冲下来，又是一阵猛烈扫射。

突然，我的大腿左侧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等飞机走后低头一看，大腿血流不止，裤子被染红了一大片。不好，中弹了。我终于明白过来，一支步枪是打不下飞机的。瞎打了半天全是白费劲儿，到头来只是自找苦吃、自找倒霉。还好没丢了小命。我赶快扔掉步枪，爬进了战壕里。

撕开裤子一看，伤得不深，咬着牙用探针探了一下，子弹就在皮下脂肪层里。打开急救包取出麻醉药普鲁卡因和手术刀，想给自己做一下紧急处理，可是试了半天，怎么抠也抠不出来，反而疼得满头大汗。没办法只好草草地包扎了一下，把一个卫生兵叫来当助手，打上麻药切开伤口，总算是把子弹给取了出来。将血擦干净仔细一看，原来根本不是什么子弹，是一块小

拇指头大小的石头。大概是机枪子弹打到岩石上溅起的碎石，穿过裤子打进了大腿里。

月光朦胧，幽暗的月光淡淡地洒落在狭窄的阵地上，夜风带着血腥味儿阵阵扑来，使人感到鬼气森森，联想到冥土的世界。是啊，第23师团，诺门罕开战时整整20000人的一个师团，现在只剩下残兵败将400来人。就是这400来人也刀卷刃、枪空膛，一个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形同小鬼一般。

就是这么一支苟延残喘的部队，现在又被包围在尼盖索里莫特森林里了。这里成了最后的阵地，成千上万的苏军机械化部队，已经把尼盖索里莫特围得水泄不通，而且包围圈正在逐渐缩小。他们越逼越近，第23师团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再怎么拿出“大和魂”、再怎么拿出“果敢气魄”来，都已经是螳臂挡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了。要是说诺门罕初战是“顽鼠斗白猫”的话，那么现在就是“病鼠躲白熊”了。

西北方向的天空一会儿被染成红色，一会儿被染成黄色，好像是在燃烧一样。枪炮声透过蒙蒙夜雾隆隆地传过来，微风携带着烧焦的糊臭味儿阵阵扑鼻，不知道是哪支部队又被歼灭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惊天动地的枪炮声现在听起来是那么遥远，那么空虚，那么麻木不仁。不知为什么，我眼前总是呈现出一幅太阳正在慢慢沉入大海的黄昏景观。

日军将军庙机场，远处停放的是九七式陆战机和九七式轻轰炸机。不过到了此时，完全失去制空权的日军航空兵只能望“空”兴叹了。

傍晚，苏军的精锐部队已经攻到一线阵地前300来米了。硝烟和夜雾之中不时能看到东奔西走的人影，是苏联兵还是蒙古兵无从得知，手榴弹也在空中飞来飞去。“这可能是最后的一刻了！”我和卫生兵们心里都这么想着，做好了赴死的精神准备。几个卫生兵甚至讨论起怎么死的问题来了。诺门罕战争后期，苏军在夜晚也开始发动进攻。这说明其军队自信心的进一步提高。



在如此凄惨的激战中，卫生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战线混乱、敌我难辨，卫生队该往哪个方向去、该去哪里收容伤员，没有人来告诉我们。盲目

地前进太危险，可老是这么趴在这儿也不是个办法。怎么样才好呢?我一时也束手无策。

苏军显然知道这是日军最后的挣扎了，他们并不急于速战速决，不像日军一样展开短兵战，也不急于突击冲锋，只是在四周筑起铜墙铁壁，燃起熊熊烈火，逐渐缩小包围圈，来个一点一点的歼灭战。就像给你上火刑一样，慢慢烧死你、烤死你。这时越着急就越陷入苏军的陷阱，越挣扎陷得越深，所以我认为还是“忍”为上策，这个时候忍耐才是明智之举。我心里这么想着，战战兢兢地躲在一块岩石下，咬着牙忍耐着。

就在这仓皇之时，忽然又传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师团部被摧毁了，新任参谋长冈本大佐身受重伤!看起来整个日军战线全线崩溃之际马上就要到了。

不知是谁下了一道命令:“全体人员立刻做好自杀的准备!”就在大家惊恐不安、埋文件藏东西准备自杀的时候，苏军却突然撤退了，就像退潮的潮水一样一下子撤走了。谢天谢地，我们这几百人今晚总算是熬了过去。

尼盖索里莫特在一片硝烟夜雾、阵阵令人作呕的焦煳味儿中，又迎来了一个黎明。

8月31日。天刚蒙蒙亮，3架“黑氓”又出动了。巨大的黑影在头顶上出现的同时，密集的机枪子弹，打得碎石四溅、沙土乱舞，掀起一团团沙烟，然后飞机就像一阵风一样在头顶上一掠而过，消失在地平线上。

西北方的前线阵地方向又传来隆隆的炮声和爆豆一般的枪声。可是我们早已经麻木了，对枪炮声已麻木不仁了，就像听打雷一样，不再激愤也不再恐慌。什么战争、什么皇军，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变得漠不关心。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一切都随它去吧。生的希望、活的欢乐，对我们来说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失去了价值。

早上9点来钟，天气变



灰溜溜撤下阵地的日本兵。

得晴朗起来，阳光灿烂。就在这时，3架日军的飞机——当时俗称“红蜻蜓”的轰炸机——出现在蔚蓝的天空上，飞得高并且速度也慢。它们飞着飞着突然一齐俯冲下来扑向森林，扔下几颗炸弹，然后马上就飞走了。

炸弹在卫生队前面500来米的地方炸开了，可那是日军自己的阵地，这不成了自己炸自己了吗？这种“误炸”在诺门罕战役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光我知道的至少是第三次了。“红蜻蜓”是一种老式的轰炸机，又大又笨且速度慢，是一种早已落后于时代的轰炸机。在这种时候派这种破飞机出来，由此可见日军空中力量的实力如何。再说了，出来轰炸之前也应该做做准备，起码也应该分清敌我的阵地，怎能随便找个地方就“拉屎”？！

一个卫生兵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军医，友军误炸了我们的阵地，炸死炸伤十几个人，卫生队要不要出动？”我想了想，停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没有上面的命令不许擅自出动，卫生队原地待命！”

这叫什么事呀，第23师团就剩下400来人了，这400来人被苏军围困在这里，一个个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了，自己的轰炸机却又来了一番轰炸。苏军的飞机也只是搞个低空扫射什么的，并没有动用轰炸机狂轰滥炸。这倒好，苏军不炸日军炸，关东军几架老掉牙的破飞机竟老眼昏花，把炸弹都投向自己的部队。有本事你再往前飞一飞，在苏军的阵地上空也来个“空中拉屎”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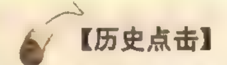
不过，冷静下来一想，这也不能只怪飞行部队，要骂还是应该骂关东军，骂大本营才对。第6军的高级将领们，事到如今还在督促第23师团往前冲，要求我们去“肉弹进攻”、“玉碎突击”，要求我们毫无意义地去送死。这个事实是从《阵地通报》中得知的。仗都打到这种程度了，既不增援也不换防，只一味地要求第23师团往眼前的铜墙铁壁上撞，这样的“肉弹攻击”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效果?把这些年轻的生命毫无意义地逼进死地，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吗?为什么他们对权利和名誉是那么贪婪，为什么非要拿这些无辜的生命当台阶往上爬呢？

我越想越气愤，越琢磨血越往头上涌。再看看眼前这悲惨的场面，想一想自己至今为止毫无意义的死战苦斗，心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感、后悔感和反感，对军政府所做的一

切都厌恶透了。

2. 撤退——没剩下几个人

8月31日，苏军的包围突然撤开了一面。这天下午，卫生队终于接到撤退的命令，卫生兵们三三两两无精打采地开始从尼盖索里莫特向后方撤退。





日军的非常规兵器

日军在二战期间发明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武器，这些创意奇特的武器很像今天电子游戏中的物品，也只有日本兵工设计部门才会认为它们能用于实战。随便举出几个例子：

肩射高炮

二战时日军的高射机枪没有自行能力，而且装备量也少得可怜。为此日军别出心裁设计了一种步兵便携式高射武器，称为"70毫米阻塞弹发射器"。这种武器炮身长1.2米，和步枪长度相当，口径是70毫米。原理就和烟火一样，炮弹靠喷射力上升到一定高度后炸开，放出7个挂在降落伞上的小炸弹，分布在敌机前，阻挡其飞行路线。敌机触及降落伞就会引爆。这种特别武器试用后，由于那些小炸弹往往会掉在己方阵地上，战果又不明显，于是就被废弃了。

"哼哼"雷达

早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陆军就已经装备了称为"电波警戒机甲型"的对空观测雷达。不过这种仪器的原理和发射脉冲电磁波的普通雷达不同，它是利用物理学上的多普勒效应，设置发射台将电波发射到接收台。当敌机穿越其间时，接收机就会发出"哼哼"的声音。这种被戏称为"哼哼"的雷达的设计原理实际上和民间拉上挂有铃铛的细绳来防盗的原理一样。但这种仪器无法发现从其他方向飞来的敌机，不久就被普通雷达（称为"电波警戒机乙型"）代替了。

遥控坦克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的假想敌一直是苏联。在苏"满"边境，为了能够突破苏军建筑的钢筋混凝土碉堡，1937年日本陆军研发了遥控小坦克，也称为"装甲作业机"。这种无人驾驶坦克长1.9米，以4马力的马达驱动，在后方的操纵者通过导线发出指令，它可以将炸药放置在敌方碉堡上再返回。这种小坦克生产了300辆，可是由于越野能力太差，在战争中几乎没有使用过。

（原载《历史与人物》，1997年8月）



向前线增援的日军机械化部队。

驻守在这里的其他残存部队也开始撤退，一个个无精打采、脚步沉重，看样子就像一群被打掉尾巴、四处逃散的秃鹰一样，再也飞不起来了。

刚刚撤出不远，突然丘陵上出现了几辆苏军的坦克。撤退的队伍顿时慌乱起来，大家纷纷找地方藏身。我和几个卫生兵逃到一块大岩石的后面，卧在那里就再也不敢动了。苏军的坦克完全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打开顶盖探出身子，相互之间好像在呼喊着什么，又好像在商议着什么，没放枪也没开炮，掉转方向一溜烟儿地开走了。

大概是苏军坦克发现了卫生队急救包上的红十字标志了，所以才饶了我们的吧?要不然是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过的，士兵们也说："多亏了你们这个红十字标志，要不这次恐怕就没命啦。"大家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整理一下破烂的衣服和行李，又开始向后方撤退，累得疲惫不堪，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记忆始终是模糊的，卫生队以后是怎么走的，走的哪条路，又是什么时候撤退到诺门罕的，一点儿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干渴难忍，嗓子干得像要冒火一样，想喝水!想喝水！想喝水!除此之外什么也记不得了，就像梦游症患者一样，在茫茫的旷野上徘徊，在半生半死的饥饿线上挣扎。幸运的是，不可思议的是，苏军没有再追击我们。

到达诺门罕以后，我全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再也没有力气动弹了。在荒野上没吃没喝地走了那么长时间，身体已经干枯了，最后的一点力气也好像被一下子抽走了似的，倒在地上就像死人一样睡了过去。

就在这一天，整个日军的战线全线崩溃。也就是说，哈拉哈河东岸纠纷地带已经完全落入苏蒙军之手。但也是苏蒙军攻到了他们自己主张的国境线以后就停止了军事攻击，坦克也只在国境线自己一侧徘徊，没有再向前攻击。这才饶了我们一命，

使第23师团残部得以逃脱。

第6军的其他残存部队也从纠纷地带撤出(准确地说应该叫败退)，全部集结到了诺门罕。小松原师团长所掌握的，总共才500来人。这还是把各个部队剩下的人都算上了，不到两个中队的兵力。

第6军虽然败退下来，但是关东军并不想承认自己的失败，不准备结束战争。事后才知道关东军正调兵遣将，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真正的作战”，作战计划大致如下：

攻击兵力：第2师团、第4师团，以这两个师团从正面发起攻击。

预备兵力：第1师团、第8师团。

火力兵器：全满洲所有的重炮、机械化山炮1个联队，独立山炮2个联队，坦克第5联队，野战重炮第4联队、第9联队，关东军高射炮部队及飞行部队的一部。

以上部队9月9日全部集结到诺门罕附近，9月10日准备发起全面攻击，整个作战于9月底结束，收复整个诺门罕以后、冬季到来之前撤出全部攻击部队。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二期作战计划没有得到实施，否则悲剧还要扩大。这个作战计划可以说还是纸上谈兵、凭空杜撰的“作文”。尽管我只是一个军医，不是什么军事家也不是关东军的什么大参谋，但是却发现这个二期作战计划有三大漏洞：一是火力不足，就凭以上这点火炮及坦克，根本无法与苏军相抗衡。火炮数量少不说，射程也比苏军的差得多，坦克就更不用说了。上次两个联队都不是苏军的对手，这次才一个联队，又能解决什么问题。二是时间之短根本来不及修筑工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把以上兵力、兵器运输到前线，已经相当困难了，根本无暇顾及修筑阵地工事。这就等于赤身裸体去和苏军打仗，必将重蹈第6军的覆辙。三是没有冬营准备，作战计划顺利进行下去还好说，假如苏军反扑过来或者双方相持不下，到了10月中旬还在打的话，到那时再准备材料、冬营物资，根本就来不及。入冬后零下40℃的奇寒非毁了这几个师团不可。

这就是日本陆军“精英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局外人都能看出漏洞的计划。他们总是无限地夸大自己，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反过来却一再轻视小看对方的力量，关东军就是一伙自大狂，而辻政信就是这伙自大狂的急先锋。在他的字典里你



日军发明的步兵反坦克防护装甲，其实这玩意儿只能让步兵在面对坦克作战时增加点心理安慰，作用顶多跟防弹衣一样。

找不到“败仗”、“败退”的字眼，阵地已危在旦夕之时还要“包围敌人、歼灭敌人”；没有坦克就用“肉弹攻击”，白天打不了就用“夜袭攻击”。对自己作战计划的拙劣之处、对自己的错判误判等完全没有一点儿反省之意，进军喇叭一吹到底，他所知道的除了“攻击！攻击！攻击”，就是“肉弹！肉弹！肉弹”。

就在关东军和参谋本部你争我斗互不相让之际，9月5日，诺门罕的残存部队继续向后方撤退。

部队一大早就开始出发，这一天天气特别好，天高气爽晴空万里。天气好是好，只是老在太阳下面走晒得难受，荒野的沙土也被太阳晒得滚烫滚烫的。快到中午时就更难受，我们一个个汗流浃背，满脸尘土。

走着走着我掉队了，一个人默默地落在后面，就觉得两条腿沉得迈不动，口渴得像要冒烟，好在身后还有两个掉队的士兵做伴，心里才多少放心一些，但是彼此之间谁也没说话，干渴和疲劳使人连话也懒得说了。在这儿不用说找到喝的水了，连那些生命力顽强的杂草也都已经干枯死了。

刚刚爬上一个小沙丘，我突然被眼前出现的一幕惊呆了，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眼前不远处站着一个浑身脏得不能再脏、羽毛都快掉光了的大秃鹰，两眼闪着凶狠的光，摆出一幅随时都要扑过来的架势。

秃鹰头上光秃秃的，只长着几根杂毛，整个脑袋还是油光光的，脑袋晃悠的时候还有点闪闪发亮，头上有的地方连颅骨都露出来了，看上去真让人感到有些阴森森的。一靠近它，它就马上伸展开巨大的翅膀扑腾几下，摆出一幅气势汹汹的架势，它那怒气冲冲的样子好像是说：你再往前走的话，我就扑上去咬你！

往那秃鹰的身后看去，我不由得吓了一跳：在这个沙漠强盗身后不远，横卧着一具尸体！我一下子觉得恶心起来，急忙转过脸去打算赶快离开这里，可是刚刚走出了十几步，身子不由自主地又停了下来，这尸体如果是第23师团士兵的话，卫生队有责任把它收容回去，这也是卫生队在战场上的任务之一。再说这尸体就这么扔在这儿被秃鹰吃个精光，未免也有点儿太残忍了。良心的呼唤使我终于再次向秃鹰逼近。

那秃鹰正用锋利的尖嘴撕着尸体，见我返回来好像吃了一惊，连连后退了几步，又展开那脏乎乎的大翅膀，虎视眈眈，准备决一雌雄。大概在那秃鹰看来，我这种举动明显地是要抢它嘴边的肉，那怎么行啊。

这时候身后的那两个士兵也跟了上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不由得“呀”地尖叫起来，这一声尖叫一下子把秃鹰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瞅准这个空档我仔细看了看，原来那不是人的尸体，而是一匹死马，这才放下心来。“哎，这是一匹死马，不要紧的。”我转身想告诉那两个士兵，可是回头一看他俩早已没影了，只有那秃鹰还盯着我，站在那儿等着呢。再一看，两个士兵早已跑出老远。

“军医呀，你也真行，那种阴森森的地方你也敢站在那里看。”两个士兵感叹到。我急忙解释：“我也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可那要是士兵的尸体就不能扔在那里不管，所以我才凑过去看了看，好在不是人的尸体，是一匹死马。”听我这么一解释，两个士兵的脸上才露出一点笑意，但是笑得很不自然。三个人又沉默了下来，低着头往前走。

这个脑袋光秃秃、身上脏乎乎，看起来又笨又壮的家伙，真是名副其实的大秃鹰，记得以前在哪本书上见过，不过说真的，猛地一看这家伙还真有一种“天方夜谭”的感觉，两个翅膀全伸展开来足有3米多长，体重怎么也有30公斤左右，光那光秃秃的脑袋就比个小孩头还大，看上去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感和厌恶感。

这动物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个世上的动物，要是说它是沙漠死神的使者倒是挺合适的，别看它脏乎乎的，却有一副威风凛凛的雄姿。

这种秃鹰是不是一生下来脑袋上就没有毛儿？还是和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开始秃顶呢？要是一出生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脑袋，那不就跟一



残存的日军第23师团森田彻联队。

个小老头一样了吗?这太可笑了，我禁不住笑了起来，越笑越想笑，越笑越觉得好笑，直笑得直不起腰来，一边笑嘴里还一边大呼小叫：“有意思，有意思，太有意思啦!”

两个士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忙跑了过来，满脸是惊恐不安的表情。“那秃鹰的脑袋太滑稽，太有意思了。”我说着还是禁不住笑。

“秃鹰的脑袋有什么好笑的?军医的脑袋才好笑呢，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了?”“我们还以为军医精神失常了呢，吓了我们一大跳，真是的!”两个士兵嘟囔着，一屁股就坐在沙地上了。

我掏出脏得像擦脚布一样的手帕擦了两把汗，走到士兵的身后也一屁股坐了下来，三个人谁都不说话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疲乏无力不说，想想刚才那一幕，总觉得是一种不祥之兆。

“秃鹰，秃鹰，卫生队不是也跟秃鹰一样吗?卫生兵算不上战士，并且从卫生队的作用来看，倒是很像那脏乎乎的秃鹰，两者共同的目标都是寻找尸体，所不同的是卫生队把尸体收容回去烧掉，而秃鹰是把尸体收容到自己的肚子里，现在卫生队撤出了战场，剩下的尸体就该由秃鹰来收容了吧?”我低着头，心里这么琢磨着。

第六章 停战了



第六章　停战了

【相关背景】

诺门罕地区的战斗进行到8月底，日军前线大部分联队已失去了战斗力，整个防线岌岌可危，荻州立兵被迫放下面子向关东军求救。关东军也感到第6军已濒临绝境，有必要将第2、第4师团和所有的汽车联队增派上去，但一下子抽出4个主力师团势必造成“满洲”防备空虚，故一时犹豫不决。日本大本营发现荻州的第6军即将被歼，急得快发疯了，决定立即从中国派遣军中抽兵回援，第5、第14师团和两个野战重炮联队源源不断开赴“满洲”，中国正面战场的压力顿时减轻。12个野战高射炮大队和22个汽车中队也在日本国内集结完毕即将登船出发，并首次增派了3个电信中队加强前线联络。

关东军咬牙将第1坦克师团剩下的惟一一个坦克联队也拿了出来，并派出了第2、第4师团，决心在结冰期前的这两个月内结束战斗，并推出了一个“夜间进攻、白天固守”的新战术。所谓的“新”战术无非就是每次进攻不超过500米，然后挖掘阵地固守，即使被苏军战车挤压，也能凭层层战壕和反坦克“肉弹”步步阻击，最终靠优势兵力将苏军挤出诺门罕，完成战役计划。(实事求是地说，这虽不是什么高招，但确实是装备低劣的日军对付优势装备的苏军惟一有效的方法，一旦采用，只要不顾忌士兵的重大伤亡，还真能让步兵不足的苏军头痛。)到了这个时候，关东军也顾不上什么“北进方案”了，只想打上一仗多少挽回点“皇军”的面子就行。各师团到了前线后立刻掀起了演习夜袭和挖壕的高潮，把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挖得像鼹鼠窝一样到处是洞。

9月3日，关东军突然接到了大本营的急电，内容很明确：

立即主动结束诺门罕战事，停止一切战斗行动。植田大将和他的幕僚们顿时傻了。怎么回事?摩拳擦掌半天，还未上台戏就结束了？悄悄一打听，才知道东京罢战的原因缘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1939年8月23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两国非战协定。德国虽一直敌视苏联，但它与英法的矛盾远比与苏联的矛盾更直接、更现实，希特勒暂时还不想去招惹苏联；而苏联政府也想争取时间加强战备，作为缓兵之计，从长远战略考虑同意与德签约。德国与苏联签约事先根本没有跟日本通气。(其实希特勒强调“种族优胜论”，认为日耳曼民族天下第一，谁也不在话下，根本就没有瞧得上日本这个弹丸小国。当初《反共协定》签订后，日本一直追在德国屁股后面要求建立军事同盟，而德国则哼哼唧唧，始终不予以明确答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传来，无疑给正在与苏作战的日军当头一棒。日本政府颜面尽失，大为震惊，平沼骐一郎(当时的日本首相)为了签订日德同盟条约曾先后与德国进行了70多次磋商而未果，没想到德国却悄悄地先和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签订了和平条约，弄得日本内阁狼狈不堪。平沼内阁只好宣布总辞职。在这次战争中，日本不仅军事上一败涂地，政治上也输得精光，成了国际舞台上一个让人耻笑的跳梁小丑。

到了这个地步，关东军最高司令官植田谦吉只好承担起战争失败责任，请求辞职。东京大本营接受了他的辞呈，将其转入预备役。梅津美治郎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小松原道太郎中将身为前线指挥官，因处事不当也被撤职转入预备役。(小松原越想越窝囊，最后跑到第23师团阵亡官兵的墓地前剖腹自杀，到黄泉重组第23师团去了。)同时受处理的还有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作战部长、课长一大堆人，当然总参谋长载仁亲王是不会有错误的，天皇裕仁还是让叔叔闲院宫载仁继续当他的参谋长。

1939年9月15日，苏联、蒙古和日“满”当局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停战及交换战俘的协定，并建立了一个边境委员会专门处理哈拉哈河流域的国境线问题。在非常时期爆发的诺门罕战争中，朱可夫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出了高超的指挥才能——快速组织机械化兵团并彻底歼灭敌人的能力，以及侧翼施压、中央突破的战术思想。朱可夫回到莫斯科后，获得了“苏

联英雄”的称号（朱可夫是苏军历史上指挥战役最多、获得勋章最多的一人），斯大林热情接见了他，亲自向他祝贺，并情绪激动地安排朱可夫任苏联最大的军区——基辅军区的司令员。基辅军区紧靠苏联西部边境，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对于朱可夫来说，一个新的挑战又摆在了面前。（朱可夫于1940年提前晋升为大将。）



胜利的欢欣。苏军在诺门罕战争中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这次战役锻炼了部队，考验了干部，检验了装备，为苏德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有力支援了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军民，给不可一世的日军在士气上以沉重的打击。

朱可夫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一反当时苏军高级将领总是在斯大林面前讲好话的习惯，明确指出红军在作战指挥体系及训练中存在严重缺点，并说：“如果我们让胜利迷住了眼睛，对军队训练暴露的问题视而不见，那么我们的血就白流了。”

（一）惟一生还的军医

9月17日，我听到了停战的消息。但是没有任何感觉，消息是真是假无从得知，是谣传还是梦幻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这一天卫生兵们正驻扎在胡鲁斯台河的河畔。四周全是河柳，初秋的微风凉爽宜人，太阳暖洋洋的，真是一个好天气。

卫生兵们一听到停战的消息，脸上的表情顿时就晴朗起来，这儿一伙那儿一撮地围个圆圈席地而坐，有说有笑地议论起来。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们的笑脸了，他们的笑脸至少可以说明这么一个问题：大家是喜欢和平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感和空虚感，实在笑不起来。一个人爬上了一棵柳树，坐在树杈上眺望起远方来。

离卫生队驻扎地四五百米远的地方，日苏两军的代表十几个人站在那里交涉着什么。双方好像都赤手空拳，甚至连一辆吉普车的影子都看不到。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双方的吉普车都在停火线3公里的地方停下，谈判人员是步行走过去的。交涉



停战交涉中的两军代表。(出自《太平洋战争·1937～1945》，每日新闻社)

的场面看上去是那么庄严，但是庄严之中却能看出和平的迹象，加上天高气爽阳光明媚，更显得是一片和平的气氛。

辻政信会不会在这些人里面，朱可夫会不会也在里面？一想到这里我就没有心思再看下去了，从柳树上跳了下来。

刚刚跳下来，就见担架班长满脸是笑，一蹦一跳地跑了过来："军医，这是给你的，从军医部来的好消息。"我接过来一看，是关东军军医部发的一张奖状，大意是，贵官在诺门罕之战中，首尾一贯奋斗不息，圆满地完成了战地卫生救护任务，维护了军医部的荣誉，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特发此状以资鼓励。

除了野战医院以外，参加过历次诺门罕之战的一线军医当中，只有草平一个人完完整整地活了下来，所以才给予表彰的。可是说老实话，接到奖状我并没怎么感到高兴，也没觉得怎么难得，平平淡淡地就把奖状递给了凑热闹的卫生兵们。

与其说兴奋感倒不如说有一种虚脱感，回首自己像泡沫一样虚无的人生，看一看那地狱一般血腥的战场，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厌世感，对周围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再说这么多军医都死了，那么多士兵也都白白地死掉了，这种表扬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

与我的心情相反，卫生队的一伙人拿着奖状却高兴得不得

了，又说又笑又打又闹，就像他们自己得了奖一样。有的忙着去打水，有的忙着去找柴火，卫生队一下子忙碌了起来，把我一个人扔在一边，什么也不让干。虽然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但心里明白他们这是为我感到高兴。

忙碌了半天，松永上等兵跑了过来："军医，洗澡水烧好了，请吧。"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忙活了半天，是想用这种方式庆贺一下。奖状本身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但能洗个热水澡倒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不好意思归不好意思，他们好不容易给准备了，总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好意吧。再说已经有3个多月没洗澡了，哪有不洗之理呢。我说了声："不好意思，那我就不客气啦。"三下两下脱下衣服，一纵身就跳了进去。


露天澡堂

澡盆就是一个大汽油桶，水是从胡鲁斯台河里打来的，还有些混浊。汽油桶架在几块石头上，底下点火一烧就成了。

啊，露天澡堂，真是棒极了。钻进去就像到了极乐世界一样舒服。"谢谢啦，谢谢啦！"我嘴里一个劲地道谢，"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能不能给照张相?"说着我把自己的照相机掏出来递给了一个卫生兵。拍出来的照片就是旁边的这一张。

这架依斯特曼相机是我的宝贝。生命第一重要，相机就是第二重要了。在整个诺门罕战役中，我随时都把它带在身边，危急关头什么都可以扔，就是相机不能扔。"玉碎突击"的时候，我曾把行李什么的都给扔了，但是也没把相机给扔了。

在整个诺门罕战役中，我曾用它拍了不少照片，但现在手里却只剩下两张。一张是第二次诺门罕之战开战前在运输卡车上拍的，另一张就是这张了。激战之中及惨败时拍的照片，都作为我的替身埋葬在哈拉哈河的河畔上了，大概永远也找不到了。

在我身后站着的是松永上等兵，遗憾的是旁边两人的名字给忘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我们身后四五百米的地方，日苏两军的代表正在进行停火交涉。停火交涉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反正与我们无关了，爱怎么交涉就怎么交涉去吧。

泡了一个热水澡，好像是舒服过头了，或许是过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的缘故吧，一天下来老有一种虚脱无力、精神恍惚的感觉。

（二）收尸行动

9月22日到9月28日，在苏军的严密监视下，我们到哈拉哈河东岸进行了战死者搜索和尸体收容。一个星期收容尸体4386具，再加上苏军从哈拉哈河西岸收容的59具，共计收容尸体4445具。他们多数是被炮弹弹片击中要害而毙命的，也有被火焰喷射器烧死的。绝大多数尸体都没有收容回来，战斗进行期间，为防止腐败的尸体造成瘟疫传播，一些被就地掩埋了，还有一些被炮弹炸碎或被坦克碾烂了。

不管哪具尸体，腐烂得都相当严重，散发着奇异难闻、令人作呕的臭气。参加搜索和收容任务的士兵们，头两天被熏得连饭都吃不下，晚上回到宿舍马上就洗澡。可是怎么洗身上也还是臭，那臭味洗也洗不掉。

9月24日，在747高地发现了山县、伊势的尸体，还发现了尚未完全烧掉的第64联队的军旗，从旗手的口袋里还发现了军旗的徽章和山县的遗书。不知是时间紧迫未及烧完呢，还是因为军旗的一部分压在山县的身下才没有完全烧掉，反正总算是发现了军旗的一部分。

停战后日军在检查被击毁的蒙军装甲车



军旗的发现，使第6军和关东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士兵死了多少，而是军旗：最令他们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是军旗是否落入苏军之手。因为对他们来说，丢失军旗是关东军的奇耻大辱。更重要的是，丢了军旗也就意味着丢了自己的面子。关东军计划的“二期作战”也好，“战场清理”也好，其中的

一个潜在原因，或者说是说不出口的目的，就是寻找下落不明的军旗。

军旗只是一面旗帜，充其量是一个部队的象征，可是第6军也好，关东军也好，甚至可以说整个日本军队，都把军旗看得太重、太重，甚至比士兵的生命、比部队的一切都高贵。要是说起原因来，这还要说是日本军统教育的结果。

记得在我幼年时代，只要一有陆军的军事演习，母亲总是背着我，跟在邻居的后面一起去观看，去参加欢迎式，从不敢怠慢。当明晃晃的刺刀伴随着用黑布包着的军旗从眼前走过的时候，母亲和邻居们都一齐下跪叩拜，流着眼泪目送军旗走过。

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军旗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头往下低，这恐怕也是被那个时代熏陶的结果。那个时候军国主义的调子吹得正响，我们这些人就是在那种环境里被驯养出来的。可也是，3岁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熏陶，事过60多年仍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想抹也抹不掉了，想一想真令人可怕。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老爷子用那粗粗的声音教给我唱的一支歌，这歌大概是明治十年前后流行于日本的，歌词是：

小宫，小宫，你马前是什么？
一闪一闪，一飘一飘，



夕阳下，撤下来的日军部队在向阵地告别。

那不是征伐朝鲜的锦旗吗？
征呀征，征到底，
伐呀伐，伐到头
……

不难看出，当时军人是多么狂妄，多么傲慢。在征伐东亚的军旗下，那些幼稚而浅薄的军人们开始蠢蠢欲动，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令人恐惧的侵略潮流，到头来害了别人，更害了自己。

9月24日到10月2日，在诺门罕的4个地方修筑起了4个临时火葬场。几十辆军用卡车昼夜不停地从后方拉来木柴，用来火葬这4445具尸体。临时火葬场就修筑在诺门罕的一个大沙丘后面，说是临时火葬场，其实就是在地上挖好多长3米、宽3米、深0.6米的大坑，把木柴往坑里横一层、竖一层地垛，一直垛到1米来高，然后上面放上尸体。每一堆木柴上士兵的尸体放4具，将校一级的尸体只放2具。然后倒上汽油，以随军僧侣的念经声为信号，所有的坑一齐点火，顿时几十条烟柱直冲初冬的云霄。

熊熊大火一直烧上五六个小时，才能把尸体烧成白骨。大火一停，士兵们就跳进坑里用柳树枝作筷子，把白骨挑进一个个准备好的白木盒子里，手表和护身符等也一起放进盒子里，但是哪块白骨是谁的，手表及护身符又是谁的，那就无人知晓了。烧完了这一组以后，赶紧把坑内打扫一下，再铺上木柴、摆上尸体、倒上汽油，接着烧下一组。

轰炸机前观测罩生产线，这种现代化大工业的生产能力当时是日本望尘莫及的



9月24日，一个火葬坑里熊熊大火正烧着的时候，突然轰地一声爆炸了，负责烧尸体的一名军官和一名下士当场被炸死。经查是大火引爆了尸体身上的手雷。这样尸体又多了两具，一共是4447具了。

所有的尸体在火葬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查验，收回身上所带有的枪支和武器。可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爆炸事件。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第一线部队在最危急的时候，发给每人两颗手雷，要求一颗在最后一刻投向敌军，另一颗则留给自己“杀身成仁”。可是好多士兵手雷还没有投出去，或者手雷还没有掏出来就倒下了。尸体放上几个星期自然是要腐烂的，并且最容易腐烂的部位是肚子，肚子腐烂了以后手雷慢慢地就陷进去了，所以查验是查不到的。意外发生以后，再烧尸体的时候要求旁边都不许有人，避免误伤。

整整烧了一个星期，才把这4445具，不，4447具尸体烧完。

（三）别了，诺门罕

诺门罕停战协定之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们接到了护送伤兵回日本的命令。

草草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我就踏上载满伤兵的列车，离开了诺门罕这块充满了血腥味的土地。

诺门罕一战我是几度遇难几度逃生，并且是完完整整地活着出来了，真可谓命大。怎么也应该在中国买一个独特的纪念品什么的，作为大难不死的纪念。火车到了哈尔滨站，听说要在这里停上一段时间，我马上就跳下车，一个人到市里去物色纪念品去了。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深感钢产量不足，只好靠收集全国的废铁来支撑。图为日本小学生在捡拾废金属



但是，我的中国话说得根本就不行，想打听也打听不出个究竟来。只好在大街上找大店铺，一家接一家转悠。可是转悠了半天，始终也没有发现一个中意的纪念品。

后来转悠到了一个像百货商场一样的大店铺。心想在这里肯定能找到自己理想的纪念品，兴高采烈地就奔了进去。可是进

去一看就失望了，店铺虽然很大，但是商品的种类却很少，好多东西缺货。

就在犹豫徘徊、茫无所从之时，突然我发现斜对面不远的柜台后面，有几双眼睛一直在盯着这个方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于是我再也没有心思挑选什么纪念品了，急忙转过身来匆匆走出了那个大店铺。

离开店铺刚刚走出20来米，突然听到身后“啪”地一声枪响，听起来好像是手枪打的。一听枪响，我的脑子里“嗡”地响了一声，一看旁边有一所好像是什么行政官署的大宅院，我一个闪身就把身体靠在了墙上，掏出了枪，然后才探头向身后望去。

只见刚才那个大店铺二楼西侧的窗口附近一片混乱，叫喊声、怒吼声听得一清二楚，出了什么事了?从方向及角度来看是冲着我来的，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冲着我来呢?

我低头一看自己的身上，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出来的匆忙，我没有来得及换衣服，穿着一身军装就跑了出来。这身关东军的军装太显眼了，所以才险些送命。打枪的是不是抗联的人呢?因为他们是最恨关东军的，并且也只有他们才有条件在哈尔滨这种大城市搞暗杀。

哈尔滨的治安这么不好，反日情绪这么高涨，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原本为了纪念自己在诺门罕大难不死才跑出来买纪念品的，结果为了这个纪念品差一点把性命都丢了，想想也真后怕。再也没有心思买什么纪念品了，赶紧往回走吧。

可是，火车站在哪个方向?又该往哪里走?我全然不知，四周全是一色的中国人，看不到一个日本人，加上语言又不通，我心里一下子恐慌不安起来。想想自己轻率的举动，真可谓无智无谋的冒险，心里一个劲儿地后悔，后悔自己不该一个人出来，就是一个人出来也应该换换衣服才对。

这可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虽然我心里恐慌得要命，但是外表上却不敢露出惊恐的表情。我右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腰里，紧紧握住别在腰里的手枪，故作镇静、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

可是走了一会儿就发现，这一乱走可就更麻烦了。原本我就分辨不出东南西北，是个有名的“方向盲”，急急忙忙这一“紧急撤退”就更搞不清东南西北了。走着走着天色也黑了下来，可

还是没有找到火车站。越着急就越往小胡同里钻，越往小胡同里钻心里就越着急；越着急脚下的步子就越快，越快就可能离目的地越远。

焦躁、恐慌、不安一齐袭上心头，这种心情一点也不亚于在诺门罕战场上的体验。我急得满头大汗，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硬着头皮盲目地往前走。

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我像是在茫茫大海里一下子抓到了一棵救命稻草一样，急忙跑上前去求救。好在这个中国警察会说日语，这才总算得救了。照着警察指的路又走了一阵子，终于到了哈尔滨火车站。

一到火车站，神经一下子松弛了，与此同时身心的疲劳也全部涌了上来，眼前金星乱冒，脚下软绵绵的，浑身酸软无力，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走起路来像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

从这以后，我一个人再也不敢乱跑了。尽管哈尔滨当时有“满洲魔都”之称，可是不管她有多大魅力，反正我是再也不敢靠近她了。

等了整整两天，火车终于离开了哈尔滨，驶往大连。一到大连，同车的一些人就到市里逛去了。可是我已经吃过一次苦头，有过一次教训，所以上街购物的心情荡然无存，连想也不敢想了。尽管有人一再拖着我一起去，但我是死活不去，就一个人在大连港内的商店里转悠起来。

在这里我看中了一个唐三彩，一看价格竟要28日元。当时一个月的津贴才6.5日元，这个唐三彩是多么昂贵可想而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把它买下了。纪念品总算是有了，心里也多少踏实了一些。

之后不久，我和伤员们登上了运输船。在大海上颠簸了好几天，终于，故乡那令人怀念的一座座大山映入了眼帘，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喜悦。从船上远远看去，一座座大山，虽然很美，但是却有一种拥挤不堪的感觉。山与山之间挨得是那么紧，给人一种你挤我、我挤你，相互争地盘比高低的感觉，这大概是从广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下子回到狭窄岛国的缘故吧。

运输船在下关港靠了岸，我和伤员们终于踏上了故国的土地，终于活着回到了故乡。

码头上也显得那么拥挤不堪。人来车往如同穿梭一般，四

轮马车载着堆得像山一样的货物一点一点地往前爬行。尽管已是冬天，但那马却是一身的汗，浑身冒着热气，从鼻孔里“扑噗、扑噗”地喷着白气。马拉着车，马夫拉着马嚼子，吃力地往前走着。在满洲看惯了二轮马车，现在倒对眼前的这种四轮马车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总而言之，山也拥挤、人也拥挤、马也拥挤，看什么都觉得挤得慌。肩挨着肩，脸贴着脸，拥挤得令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诺门罕之谜

——译者眼中的诺门罕

诺门罕战争存在着许多令人费解的地方，比如当时的国境线究竟在哪儿？诺门罕到底有什么历史背景？在中国和蒙古的国境附近，为什么苏联和日本却大打出手？参战四方到底伤亡了多少人马？为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查阅了一些资料，进行了一些整理归纳。

1．“诺门罕”一名的由来

诺门罕，在英语里写成“NOMONHAN”，在日语中写成“ノモンハン”，也有的书上把诺门罕写成“诺门罕·布日德”或者“诺门罕·敖包”。诺门罕战争在日本被称为“诺门罕事件”，而在外蒙和苏联则被称为“哈拉哈河战争”。

“布日德”在蒙古语中是沙丘的意思，“敖包”是用石头堆成的一个圆锥形的石头垛子，蒙古人常常把它当作祭坛和崇拜之物，也作为路标或者境界标志来使用。从这些不同的叫法来看，不难发现这里以前既有过沙丘，也有过石垛子。

其实，“诺门罕”原本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蒙古喇嘛教的大僧侣的名字。说起这个大僧侣，还要多少提及一些喇嘛教的历史。

蒙古人对喇嘛教的信仰，最初是从元朝（1271～1368）的末期开始的，但是信仰者基本上都是蒙古族的上层阶级，喇嘛教在民间并没有得到普遍的信仰。

到了明朝（1368～1616），当时在蒙古最具有权势的封建领主们，开始积极地接受、传播喇嘛教。为什么呢？其原因还在喇嘛教的教规里。

喇嘛教的教规，是这样向人们进行宣传的：“所有贵族、高

官们现世的荣耀和地位，全是他们前世行善积德的善果，所以他们生来就具有支配权，具有显贵的地位，过着安乐的生活。”“喇嘛教的高僧们、蒙古的大领主可汗们，他们都是元朝世祖忽必烈汗和古代印度传说中的皇帝们的‘转世’，也就是说是又一次投胎到人间来的，所以他们生来就具有支配他人的权利。”喇嘛教的这种教规，对当时蒙古的各统治阶层来说，与其说是宗教，倒不如说是一种绝妙无比的“精神支配工具”。

清朝时（1616～1911），蒙古各地的“旗”（相当于县）里就出现了喇嘛教组织，这个喇嘛教组织的头把交椅就叫“呼图克图”（活佛的意思），呼图克图的下面就是“诺门罕”。并且各地的旗长札萨克的职务，大都是由呼图克图或者诺门罕来兼任的，这种情况就叫“喇嘛旗”。旗的最高长官就叫作“札萨克·喇嘛”，也就是说他们既是宗教上的领袖，又是政治、行政上的首长，并且在他们的管辖区域内，还具有独立的行政、司法、税收的权力。比如在清朝的后期，蒙古就有7个这样的“喇嘛旗”：锡罗图库伦·札萨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札牙班第达·呼图克图、那鲁班禅·呼图克图、青苏珠克图·诺门罕、察汗·诺门罕。

诺门罕僧侣的真实姓名叫“达尔汗·乔布敦”，在喇嘛教中的地位是“诺门罕”。他的祖先从明朝的皇帝那里得到了从哈拉哈河西岸到克鲁伦河一带的草原地带，所以他的先祖们世世代代就在这片草原上生活着。

到了清朝康熙三十年（1691），乔布敦的弟弟汗单突然举兵反叛清朝，乔布敦马上率领旗兵讨伐叛军，把弟弟汗单一直驱逐到了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为了表彰乔布敦的这个功绩，康熙皇帝把哈拉哈河流域的左翼前旗，也就是后来的诺门罕地区一带奖赏给了他。这一带水源充足、牧草茂盛，地势上比哈拉哈河西岸低，所以即便是冬天气温也比西岸暖和，是一个理想的天然牧场。

乔布敦对清朝有功，所以才得到了这一带最优良的土地，并且还得到了“札萨克”，也就是旗长的官衔，另外还得到一个显赫的爵位——“镇国公”。

2.内、外蒙的国境线划分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朝统治，1912

年建立了中华民国。就在这一时期，蒙古的喀尔喀族与巴尔虎族的对立逐渐表面化，喀尔喀族开始闹独立。但是这时，中华民国为了讨伐各地军阀已经是焦头烂额了，根本无暇顾及蒙古问题。

1924年，喀尔喀族终于从中国独立出去，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俗称外蒙古。而巴尔虎族则作为一个自治区，仍留在中国，俗称内蒙古。这么一来，诺门罕·敖包就自动地变成了外蒙古与中华民国的国境线了。

1919年中华民国邮政局发行的《中华民国地图》，1932年东亚同文书院发行的《最新中华民国大地图》，1919年、1926年、1934年关东州政厅发行的地图等，都把国境线划在哈拉哈河的东方。另外，到1935年为止，满洲铁路出版局发行的所有地图上，国境线也全是划在哈拉哈河东方大约20公里的地方。

但是，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操纵的傀儡“满洲国”一成立，事态就发生了突变。关东军开始主张“国境线不是诺门罕，而是哈拉哈河”。由此，1935年以后关东州政厅发行的“满洲国”的地图上，就开始把哈拉哈河改为国境，以前发行的地图一律禁止再使用。

关东军厅惟一的一个证据，是大正七年（1918年）日本军出兵西伯利亚之际，在当地缴获的一张俄军军事地图。这张地图是俄军参谋部制作的一张比例尺为1∶84000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诺门罕附近的国境线是划定在哈拉哈河的河正中的。关东军以此为基础，对地图上的国境线进行了修改，关东厅也随之进行了修改。

那么，帝政俄国为什么要把国境线划定在哈拉哈河上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还要追溯到1727年清俄之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这个条约中关于两国的国境线划定的原则为“有山以山为界，有河以河为界”，这个条约从此也就成了新的国境线划定的基准了。1734年，俄军本着这一条约基准，便把国境线划定到哈拉哈河的正中上了。

可是到了1932年，外蒙指出这个国境线的划分是错误的，要求苏联进行修改。1932～1934年，苏军根据外蒙的这个要求对哈拉哈河附近进行了重新测量，测量的结果为，国境线不是哈拉哈河，而是诺门罕·敖包，遂对以前的地图进行了修正。

但是，关东军对这个事实全然不知，当看到在诺门罕战争

中缴获的蒙古军地图时，不由得惊讶起来："咦，国境线什么时候变了？"

3.满洲里会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以自编自演的"柳条湖满铁线路爆发事件"为借口，挑起了"满洲事变"，转眼之间就占领了整个满洲，第二年就匆匆忙忙地成立了一个傀儡"满洲国"。

眼看着日本军勃勃的侵略野心和野蛮行径，蒙古开始恐慌不安，警戒心一下子高涨起来。那么，蒙古为什么会感到恐慌不安呢？蒙古有蒙古恐慌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根据就是1927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交给天皇的《上奏文》，也就是所谓的《田中上奏文》。这个上奏文尽管在日本有人指出是捏造出来的，但是在中国、苏联、蒙古却是大家深信不疑的。在这个上奏文中，使蒙古政府神经紧张的是以下一段内容：

"要想征服支那，首先必须征服满蒙。要想征服世界，首先必须征服支那……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以征服满蒙为前提，继而征服支那全土……"

这个《田中上奏文》是真是假先不去管，看一看其后的关东军、日本军的侵略足迹，不得不说跟《田中上奏文》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半点不差：1895年"征服"了台湾；1910年"征服"了朝鲜；1932年"征服"了满洲；1937年开始"征服"中国；1940年对英美宣战，企图"征服"世界。《田中上奏文》是真是假，看一看这一段历史便一目了然。

1935年1月8日，在"满"蒙国境上发生了"哈拉哈庙事件"，外蒙骑兵十几个人突然袭击了哈拉哈河东北方的"哈拉哈庙满军监视哨所"，并且掳走了"满"军哨兵，占领了哨所。这是"满"蒙国境上发生的最初的武装冲突。事件发生后，"满洲国"一方马上向蒙古一方提出抗议，并要求蒙古撤兵和进行外交交涉。为此，双方在中国的满洲里举行了解决国境纷争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满洲里会议"。

第一次会议是从1935年6月到11月，日本和苏联均没有出头露面，会议是在"满洲国"代表凌升和蒙古代表桑包之间进行的。"满洲国"主张国境线在哈拉哈河，而蒙古国则主张国境线在诺门罕·敖包，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结果会议没

有得出结论，双方只是通过了一个“在满蒙两国的国境上发生的冲突，应该以和平的手段进行解决”的谈判纲领，第一次会议就这样不了了之。可是，会谈破裂后的1936年2月，“满洲国”的代表凌升以“特务嫌疑”被关东军宪兵队逮捕、枪杀。蒙古国的代表桑包不久也被苏联逮捕，第二年被处死刑。

第二次会议是从1936年10月到12月，第三次是从1937年4月到9月……共计进行了56次之多的会谈。可是随着苏联和日本的介入和干涉，国境线到底是在哈拉哈河还是在诺门罕·敖包，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会议最终以破裂而告终。

满洲里会议决裂后，“满洲国”政府进行了一次独自的现地调查，首次否认了“哈拉哈河国境线”一说，并且把调查结果写成书面报告，分别提交给了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但是，关东军对这个报告书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儿，而是命令海拉尔的特务机关再次进行现地调查。矢野光二少佐等人受命亲自前往诺门罕方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以“哈拉哈河作为国境线比较合理”为宗旨，以报告书的形式上交给了关东军。

从以上经过来看，事情闹腾得这么大，辻政信却在自己的著作《诺门罕》中写到：“幕僚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诺门罕这个地名，拿着放大镜、眼瞪得像盘子那么大，在海拉尔南方与外蒙边境接壤处，好歹才找到了诺门罕这个地名，它大概只是一个蒙古族的放牧部落吧。”只能说他是一派胡言。

满洲里会议的进展状态，使蒙古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于是开始向苏联求援。1936年3月，蒙古和苏联之间就缔结了《苏蒙相互援助条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满”苏、“满”蒙的国境线附近，国境纷争开始多发起来。

1936年2月，奥拉奥嘎事件。日“满”军的杉本支队与外蒙军发生冲突。

1936年3月，塔廊事件。日“满”军的涩谷支队与外蒙军发生冲突。

1937年6月，干岔子事件。在黑龙江的“满”苏国境上，关东军与苏军发生冲突。

1938年7月，张鼓峰事件。“满”苏国境上日本朝鲜军第19师与苏军发生冲突。

1939年5月，诺门罕事件。

4.《满苏国境纷争处理纲要》

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在干岔子事件和张鼓峰事件后的1939年4月，把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打不还手”的方针，来了一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大改变，制定了一个《满苏国境纷争处理纲要》，并于4月25日以关东军司令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向各兵团长进行了传达。制定国境纷争处理纲要一事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并且可以说是一件好事。问题在内容上，内容不好的话，不但解决不了纷争，反而会扩大纷争。

这个《满苏国境纷争处理纲要》，问题就出在第四条上：“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性地进行国境线认定……”

首先，这个“防卫司令官”并不是指关东军司令员，而是指在国境线担任防卫任务的各个师团的师团长一级。“自主性”一词，据日本的大词典《广辞苑》的解释是“不受其他干涉、自行进行决定”。换句话说，担任防卫任务的师团长一级，就可以“自由地”“适当地”划定国境线。这话说起来简单，可是要是真做起来的话，那可真是不得了。

日本是一个岛国，与周围的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地面上的国境线，可是除了日本这样的岛国之外，世界上所有的国与国之间都存在着地面上的国境线。美国与加拿大、中国与俄罗斯、法国与西班牙、伊朗与伊拉克、印度与巴基斯坦等等，都存在着成千上万公里的国境线，要是这些国家都不通过外交途径，就让各自军队的师团长一级的防卫司令官去“自主划定国境线”的话，那么会怎么样呢？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大概每天都会发生国境纷争，一天24小时国境战火不断吧？

结果呢，这个《满苏国境纷争处理纲要》下达了才刚刚两个星期，在西部防卫地区的诺门罕，战争就爆发了。

另一方面，苏联和蒙古对这个《满苏国境纷争处理纲要》又是怎么看的呢？外蒙为什么把这场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呢？

原来在诺门罕战争之前的1938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一个对苏作战计划——“八号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是日本陆军在《昭和十四年度（1939年）帝国陆军作战计划》中，“以苏联为敌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击败远东之敌”为宗旨，先后制定

了“甲案”和“乙案”两个作战方案。

甲案是从东正面作战，从“满”苏国境的乌苏里江、阿穆尔河、大兴安岭方面，关东军以14个～26个师的兵力对苏联发起攻击。西正面以3个师为基干，设置一个第6军担当防卫任务。可是，苏联很快就获悉了这个甲案，作为防御措施，苏军在东正面修建了一个宽500公里、纵深200公里的近代化要塞，部署了12个师的兵力，并且作为后备力量又在后方准备了18个师的兵力。

这样一来，东正面的攻击就相当困难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马上就做出了判断。“东面不行的话，那么就从苏军配备比较脆弱的西正面进行攻击，这样的话成功的可能性比较高一些”，于是又制定了一个“乙案”。这个乙案的作战构想是，主攻部队从西正面的满洲里，以苏联的乌兰乌德为目标发起攻击，作为助攻，关东军的机械化部队跨越“满”蒙国境直攻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然后从乌兰巴托的东侧北上，攻击乌兰乌德苏军的背后。

可是，关东军在对这个乙案进行了周密细致的研究之后，得出一个“作战不可能”的结论，结果这个乙案也成了一个废案。主要的原因是，从满洲里到乌兰乌德既没有铁路，又没有条像样的道路；况且苏联军和蒙古军常备部队就有9个师，一旦战争打响，马上就能增强到18个师。

这个乙案苏联也获悉了，不用说蒙古也知道了，大概这个乙案作废的情报苏联也获悉了。但是，苏联和蒙古还是相信这个乙案，废案一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相信，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打算去相信它。对蒙古来说，这显然是日本赤裸裸的侵略计划，而且是明目张胆地攻击自己的首都乌兰巴托！

实际上蒙古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关东军的举动。1936年11月～12月，在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的操纵和指挥之下，发生了内蒙古军叛乱的“绥远事件”。可是事件爆发后还不到一个月，叛乱就被中国军队彻底粉碎、平息了。可是距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仅仅2个月之后的9月14日，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就指挥察哈尔兵团，再次进行“内蒙作战”，一举占领了绥远和包头。

面对关东军如此嚣张的气焰，蒙古知道关东军的战火烧到外蒙来，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并且这个《满苏国境纷争

处理纲要》，在蒙古看来恰好就是日军“八号作战计划”乙案的实施，是侵略蒙古的第一步。所以对蒙古来说，这个诺门罕战争的的确确就是一场卫国战争，是一场抵御侵略的战争。

诺门罕战争已经过去60年了，可是苏联和蒙古事到如今还是认为“八号作战计划是侵略计划，诺门罕战争就是侵略计划的第一步”，日方一个劲地解释“那只不过是一个办公桌上的作战研究方案而已”，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在这一点上，和《田中上奏文》是一个道理：事实证明了一切。

5.“七三一”部队——首次使用细菌战

1949年12月15日～30日，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市，以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为首的12名关东军干部，以“准备及使用细菌兵器之嫌疑”受到起诉。在审判中，原“七三一”部队的教育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供述如下：

“哈拉哈河事件的时候，石井部队的确使用过细菌兵器，这事儿我知道。1944年7月，我从孙吴支部调到第七三一部队任教育部长，和前任部长真田中佐进行了交接，当天真田中佐就出发回日本了。我在整理他的文件箱时，发现了诺门罕事件、也就是哈拉哈河战争时，使用过细菌兵器的文件。我记得里面有当时的照片底版、参加作战的敢死队名单，还有碇少佐的命令等。敢死队由将校2人、下士官兵约20人组成，在名单的下面还有他们用血签写的名字。”

其实，第二次诺门罕战一开始，“七三一”部队就奉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前往诺门罕了。在7月15日的小松原师团长的日记中，“石井军医大佐来访”一事就是证据。石井把参加部队分为“防疫供水队”和“敢死队”，并亲自率领这两支部队前往诺门罕。

“防疫供水队”由佐佐木少佐指挥，任务是给前线部队提供饮用水。“敢死队”由碇常重少佐指挥，是一支秘密别动队，任务是实验和使用细菌兵器。

关于细菌兵器作战，石井制定了三个方案提交给关东军司令部：

方案一，细菌炮弹作战。把炭疽菌装入炮弹里，从日军的炮兵阵地以榴散弹炮打入苏蒙军的阵地。

方案二，细菌炸弹作战。用飞机把“石井式陶器炸弹”投

到哈拉哈河西岸。一架飞机装载数十个陶器炸弹，一个陶器炸弹里大约装有5000只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

方案三，细菌投放作战。敢死队直接潜入哈拉哈河西岸，在水源地直接投放赤痢菌、霍乱菌、伤寒菌。

但是，小松原师团长等现场指挥官们对石井这个作战方案提出了疑问。首先是方案一，这种方法要是日军单方面的炮击战的话，的确是一种好方法，可问题是苏军的炮火要比日军猛烈得多，日军阵地一旦遭到苏军炮击，细菌炮弹就有可能在自己的阵地上爆炸。其次是方案二，要想空投陶器炸弹的话，飞机就必须低空飞行，可是飞得越低，被击落的危险性就越大，并且谁都无法保证坠毁的飞机不坠落到东岸上。另外，空战时日军的飞机也有可能坠落到自己军队的阵地上。最后是方案三，哈拉哈河西岸苏蒙军戒备森严，潜入是很困难的，即便是潜入成功，恐怕还没有接近水源地，敢死队自身的生存就成了问题。

经过周密的探讨，最后决定细菌兵器只有在日军战况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或者撤退的情况下使用。石井方案的方案二被放弃，另外两个方案也进行了修改：

新方案一，细菌炮弹严密保存，在战况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才向西岸发射。

新方案二，在哈拉哈河、胡鲁斯台河的上游投放细菌，使下游的苏蒙军患上传染病。

细菌炮弹攻击是否进行过，译者的手头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无法确认，但是投放细菌的作战的确进行过。参加过投放作战的原军属人员——鹤田兼敏（家住日本佐贺县唐津市新町）回忆如下：

“1939年8月的一天夜里，柴田班长带领我们往哈拉哈河里投放了液体状的肠伤寒杆菌。当时我们紧张得不得了，因为河对岸就有苏军的封锁，空中还时不时升起信号弹。大概是过于慌乱，我们的班长不小心感染上了肠伤寒。等我们回到哈尔滨后，才知道他早就死在海拉尔的陆军病院里了。

“投放细菌的那天，我们班下午从将军庙出发，在途中发现了一户农家，我们就伪装成过路的日本人，在农家休息了一会儿。那农民一家对我们还挺热情，特意包了韭菜饺子招待我们。我们临走时趁着主人没注意，在屋子里悄悄地撒了一些鼠疫菌。等我们完成任务从哈拉哈河返回时，又去看了一下那个农家，

可是那农民一家三口全都死了。”

鹤田还说：“从8月20日苏联军的总攻开始一直到停战这一段时间，敢死队曾先后三次进行了投菌行动，把伤寒菌的培养液投放到胡鲁斯台河的上游，但是只成功了一次。教育班长和卫生军曹也感染上了肠伤寒，死了。我因为参加过这次作战，论功行赏还得了一个‘勋八等’的奖。”

对“七三一”部队的罪行非常了解的中国人韩晓先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在他的著作《“七三一”部队的犯罪》中写到：“诺门罕战中，日本军患传染病者达1340人之多，这些病人使得海拉尔的病院人满为患……8月中旬，山下健次大尉带领病原菌检查班的10个人来到海拉尔，通过验便的方法对病原菌和其细菌效果进行了调查，结果查清在诺门罕战场上发生的传染病的来源，就是日军自己散布的传染病菌。石井部队中除了战死者之外，另有三四十人患上传染病而死。”

6.诺门罕战争的伤亡——日、苏、蒙、“满”军的损耗

关于各军的损耗问题，各国的统计数据大不一致，所以要想掌握一个准确的数字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尊心问题，人们往往都是把自己军队的伤亡尽量往小、少的方面计算，而对敌军的伤亡则尽可能往大、多的方面估计。

日本军：

诺门罕战争刚刚结束之时，据第6军军医部的统计：共出动人员58925人，其中战死7696人、战伤8647人、生死不明1021人，总损耗17364人，损耗率大约30%左右。可是从战争的悲惨程度来看，这个数字也太低了，是统计不全还是故意隐瞒，这一点无人知晓，反正可信度太低。

陆军当局于停战之后的10月3日，发表了一个笼统的伤亡数字：日本军战死、战伤合计18000人。这个数字可信度仍然太低，大概就是把第6军军医部的统计来了一个照抄、照搬而已。

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是1966年10月12日，这一天在靖国神社举行了“诺门罕事件战没者慰灵祭”，在第二天的新闻报纸上，发表出来的战死人数是18000人，这个数字比第6军军医部的统计整整多出了1万人，是陆军当局发表的战死、战伤人

数的总和！

五味川纯平在他的著作《诺门罕》中指出，“从事件后的军方的统计数据来看，死者人数增加了1万人。对热衷于打了败仗就又遮又盖企图掩人耳目的军政当局来说，有必要把数字过小发表，但是对靖国神社来说，却完全没有必要把数字过大发表。”

事实也正是如此，停战后的27年间，也就是从1939年10月到1966年10月，在诺门罕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尽管如此，战死者却突然增加了1万人，这是怎么回事？原因不外乎有两个：说得严厉一些叫故意隐瞒，说得宽容一些叫统计不全。

另外，战后苏联公文图书馆里的资料表明，关东军出动人员为67257人、战死18868人、战伤25900人，死伤合计44768人，损耗率大约为66%。关于出动人员的总数问题，美国作家A lvin.D.Coox在他的大作《NOMONHAN》中指出：“在诺门罕事件中，日本军投入的总兵力还应该加上坦克部队的1627人、飞行集团的3307人、独立守备队的3012人、步兵第1师的4981人、高射炮部队的3576人，所以比较合理的人员总数应该是75738人。”

另外根据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史专家Boris Slavinsky的新作《日苏战争之路》，日本一方的死亡人数至少为18300人，俘虏464人。

战后，归还回来的日军俘虏只有204人，其他人全部自愿留在了苏联。据俄罗斯战史研究所研究部长瓦尔塔诺夫的调查，到1992年时共确认日本俘虏129人，但是当问及这些人中现在是否还有人活着时，瓦尔塔诺夫说他也是一无所知。

苏联军：

诺门罕停战之后，苏联方面的统计是：出动人员57000人，战死仅300人～400人、战伤仅900人。这个数字不用说，可信度也是非常低的。

41年后的1980年，苏联发表了新的统计结果：苏军战死3281人、战伤15286人、去向不明154人、俘虏94人，共损耗18815人，损耗率大约为33%。

另据《日苏战争之路》一书指出，“这个数字还是太低，令人难以置信。根据俄罗斯军事专家最近的研究，哈拉哈河一战苏军的兵员，战死及查无下落的人数为7974人，战伤战病人数

为15925人”，合计为23899人，损耗率大约在41%左右。

停战后，归还回来的苏联俘虏有89人，另外的5个人“去向不明”。另据韩晓先生的《“七三一”部队的犯罪》介绍，苏军俘虏中有一个叫“德姆琴科”的人，被送到石井的“七三一”部队，在那里遭到杀害。

蒙古军：

根据蒙古方面的资料，蒙古军出动部队为2个骑兵师，人员2260人，其中战死165人、战伤401人，合计566人，损耗率大约为25%。这个数字是否可信？可信度到底有多少？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伪满洲军：

不可思议的是，在日本尽管有这么多关于诺门罕战争的书籍、资料，但是涉及伪满洲军伤亡、损耗的却寥寥无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关东军（1） 对苏战备·诺门罕事件》中记述道：“‘满’军，尤其是在诺门罕事件之际，与优势的苏蒙军进行了激战，在激战之中，大部分的‘满’军由于战斗力的低劣，抵挡不住苏蒙军的猛烈攻势而后退，若干的部队出现了散乱、叛乱。”但是关于“满”军的损耗，则完全没有言及。

五味川纯平著的《诺门罕》中，也只是提到“满”军的第1混成旅（石兰支队）的一个营，于8月21日夜晚，把4名日本指挥官做了血祭，250人集体逃跑、投降了苏联军这一叛乱事件，但是对于损耗问题也是只字未提。

译者李兆晖先生



提及“满”军损耗的，是美国人Alvin.D.Coox的大作《NOMONHAN》：“1942年9月，为了给满洲事变以来在满洲各地倒下的战死者祈祷冥福，在海拉尔修建起了‘忠魂碑’，忠魂碑共

10301柱，诺门罕事件的战死者就占了9673柱，其中日军9471柱，满军202柱。”

据辻政信的《诺门罕》一书记载，参加诺门罕战争的“满”军部队有：兴安师（1851人）、兴安支队（2936人）、石兰支队（1376人）、铃木支队（1176人），合计7339人。

另外，根据苏联和蒙古方面的资料统计，“满”军的损耗为2480名、损耗率为33%左右。“满”军俘虏约1800人，其中260人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向苏联军投降的”。

参考文献：

1.《中国少数民族的信仰与习俗》，覃光广等编著，第一书房1993年版。

2.《边境·近境》，村上春树著，新潮社1998年版。

3.《从西伯利亚出兵到战后50年》，北川四郎著，论创社1995年版。

4.《私评诺门罕》，扇广著，芙蓉书房1986年版。

5.《诺门罕·哈拉哈河战争》，诺门罕战争国际学术专集实行委员会编著，原书房1992年版。

6.《诺门罕·草原上的日苏战》，A lvin.D.Coox著，朝日新闻社1989年。

7.《诺门罕》,辻政信著，原书房1975年版。

8.《改变世界的战争·革命·叛乱》，三浦一郎等监修，自由国民社1984年版。

9.《“七三一”部队的犯罪》，韩晓著、山边悠喜子译，三一书房1994年版。

10.《诺门罕》，五味川纯平著，文芸春秋1975年。

11.《现代史的断面·诺门罕的惨败》，杜松正著，校仓书房1993年版。

12.《关东军（1）对苏战备·诺门罕事件》，防卫厅战史室编著，朝云出版社1969年版。

13.《日苏战之路》，Boris Slavinsky著，加藤幸广译，共同通信社1999年。

14.《草原与革命》，田中克彦著，恒文社1984年版。

15.《追溯昭和史之谜》，秦郁彦著，文芸春秋1993年。

译 后 记

几年前，我从作者的长子、天心堂病院理事长松本文六先生的手里接过了这本书，先是扎扎实实、反反复复地读了两遍，可是越读越觉得难以下笔。

一是此书虽然是一个老医生写的，但是内容却和医学没什么关系，令我这个学医出身的翻译甚是为难；二是整本书里古文与现代文掺杂，而我又是见了古文就头痛的人；三是我对这一段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翻译起来恐怕比较吃力。但是，我最终还是被松本老医生的反战情绪、反战激情所感动，决定翻译这本书。

这本书通过诺门罕这个边境战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傲慢狂妄的残暴性，批判了关东军草菅人命、涂炭生灵的残忍性，以及被逼向死亡的士兵们发自心底的愤怒和呐喊。人们往往以为日本士兵个个都是效忠“皇国”，个个都是“不成功便成仁”、充满了武士道精神的狂妄之徒，其实也不尽然，这本书就能证实这一点，这也是我决定翻译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理由。作者松本草平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战后在他给《大分合同新闻》(1980年3月15日)的投稿里，就日本的宪法有过这么一段评述：

“日本不设置军队、不往外国派兵，这是日本宪法第九条所明文规定的。这个第九条可以说是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样板。日本今天之所以能繁荣起来，可以说靠的也就是这个和平宪法、靠削减军费而发展起来的。现在有一些鹰派国会议员竟嚷着要修改这个宪法，这种改宪论是一种谬论，是无视现实的谬论。他们身先士卒与下层阶级的平民百姓一起经历过那场残忍无比的战争了吗？经历过忍饥挨饿、喝着稀粥冲向炮火硝烟的地狱世界了吗？不！他们只知道布满鲜花的讲坛，只知道利用战争发不义之财。

“日本是一个小国，在列强之中日本可以说就像一个孩子一

样。翻开地图看一看，日本简直小得可怜，并且没有资源，几乎什么都要靠进口。所以日本才需要这样的宪法，垂范于世界的宪法，这个宪法才是日本值得骄傲的贵重遗产。”

“能把一个面包分给他人一半的孩子，强过一个自命不凡的优等生。”这是松本老医生在创建天心堂病院时，刻在宣传牌子上的一句话。就像这句名言说的一样，他的确是本着“一个面包分两半”的精神来行医看病的。他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为金钱只为病人，对贫困的患者从不张口要钱，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不给也不要。二是门诊兼出诊，不分白天黑夜随叫随到。出诊骑大马，恐怕是当地老百姓脑海中对他印象最深的记忆了吧。

松本老医生于1981年7月20日因脑溢血而去世，就在去世前的头两天，他还在电闪雷鸣之中出过诊，治疗了一个骨折的老太太。松本老医生的孙子、当时还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松本莫，在作文中记述了爷爷追悼会的情景：“7月20日放暑假的第一天，爷爷死了。爷爷的追悼会上来了1970人，大人们都哭了，哭得脸都红了。爷爷就好像是户次地区的大总统一样。”

诺门罕战争结束已经66个年头了，“诺门罕村”这个村子现在还在中国境内，但是苏蒙军与日“满”军激战过的诺门罕地区——从诺门罕村到哈拉哈河一带，现在已属于外蒙古的领土了。以国境线为界，双方各后退1.5公里，形成了一条3公里宽的“非武装地带”。

1999年8月，我途经外蒙，曾亲临过诺门罕这块茫茫的旷野，要不是有历史记载的话，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就为这么一小块荒无人烟的土地，曾发生过那么大规模的战争，四方累及伤亡人马7万之多！

诺门罕战争（在日本仍称“诺门罕事件”）在日本广为人知，年纪大一些的人恐怕无人不晓，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

（1）诺门罕战争是日本“无敌皇军”建军以来的第一次大惨败。

（2）第一次败给了“日俄战争”的手下败将、老对头的苏联。

（3）第一次尝到了近代战争的苦头。

其实，诺门罕战争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那就是促使日本放弃“北上打苏”而改为“南下打美”。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结成了法西斯军事

同盟，日本开始讨论是应该“北上打苏”还是“南下打美”这一问题。陆军参谋本部推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熟柿北攻”，一个是“好机南进”。“熟柿北攻”是指等德国对苏联开战以后，苏联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日本再来个渔翁得利，对苏宣战；“好机南进”是指要抓住机会对英美开战，夺取英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所占有的资源。

讨论来讨论去，日本最后的选择是放弃“北上打苏”，决定“南下打美”。至于为什么要放弃“北上打苏”，诺门罕战争的肇事者——后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战力班长的辻政信的一席话就能解开这个谜：“苏联的军事势力，在诺门罕事件中我们已经充分地试探过了，从现状来看关东军即使是北上打苏，年内要想达到目的那是根本不可想像的。那么就不如南攻了，因为南方有取之不尽的资源。”

南方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苏联也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根本的原因不在资源问题上，放弃北上打苏，恐怕是吃尽了苏联的苦头，不敢再轻易下手而已。假如没有诺门罕战争的话，那么日本也许就会放弃“南下打美”而改为“北上打苏”，与纳粹德国从东西两方面同时夹击苏联，那样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得改写了。遗憾的是，历史是不存在“假如”这两个字眼儿的。

据说，诺门罕战争结束后，有外国记者赶到现场，对一日军将校进行了采访：

“请问，这下面有什么？有钻石？有石油？还是有煤炭？”

“什么都没有。”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地方打仗？”

“那是为了保卫(伪)满洲国国境这一日本的节义而战的。”

“节义？真是不明白，真的就为这个而打的仗？”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就为这种所谓的“节义”，赤裸裸地侵略了大半个亚洲，杀戮了几千万无辜的人民，至今许多日本右翼分子还不肯正视侵略历史，嘴上也是说为了“节义”，历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李兆晖

2005 年 1 月

日本，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国家
——编著后记

从地理上说，日本是离中国最近的邻邦之一。隔海相望、一衣带水这些词几乎成了我们今天描述日本必不可少的词汇。然而，在很多中国人心里，日本却是地球上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国家！

日本人给我们的印象太复杂、太捉摸不定。从好里讲，主动对华低息贷款的有他；援助西北植树造林、防风治沙的有他；甚至弯着腰到喜马拉雅山脚底下捡易拉罐、废电池的人群中也有他。可是，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拒不承认侵略的是他；偷偷修改教科书隐瞒历史真相的也是他；“贼喊捉贼”、诬蔑中国强大会危及亚洲安全的又是他。守着这样一个诡谲的邻居令人不能不警觉。一个当年闯到你家杀了人，抢了物，最后还放了把火的邻居，虽说今天给了些钱让你贴补家用（当然日后是要还的），但对自己往日犯下的恶行却故意混淆是非、拒不反悔，反而在你修补门窗谨防盗贼时说三道四、横加指责，怎么能让人对这样的邻居产生好感？！

我们不愿纠缠于历史，可是我们决不能忘记历史!我们要放眼未来，可是我们更要立足于现实!

看完松本草平这本沉甸甸的书稿后，我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说实话，当初我并不想接这个稿子。我的家乡是当年侵华日军肆虐的重灾区，也是抗日游击战最活跃的地方。我的父辈、祖父辈都是抗战的老兵，从小我听到了太多书本上所未记载的日军暴行，以致我对日本人素无好感。复旦大学历史系赵建民教授贴在网上的一篇文章刺激了我，使我改变了初衷。文中说：

2000年8月，在石川县的护国神社里，一座12米高的“大

东亚圣战碑”落成。这是由原日本关东军士兵中田清康发起建造的，建碑费用高达1亿日元，由“战友会”、“遗族会”等近400个团体和2300多人募捐。此碑的建立缘于1995年6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了“战后50周年不战决议”。当时，金译市组织了抗议示威游行，指责不战决议是“亡国的谢罪”，力主建一座“大东亚圣战碑”，对政府的表态进行对抗和挑战。

长期以来，在日本社会教育中缺乏对战争的反省。相反，从“战争记忆”的角度设置机构、搜集材料，进行展览的活动却层出不穷。2001年10月31日，“和平祈念事业特别基金会”展示了300多件战时实物，以表现当年日军“勇敢作战”的情景。我翻阅留言簿时，竟发现参观者一致赞赏日本军人的法西斯行为，他们写到：“真了不起！感到作为日本人很光荣！参观以后很受教育，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展示。”日本游就馆的说明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战争是不幸的事。但是为了保卫日本的独立，为了周边亚洲诸国的共荣，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不得不战。”

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记忆不仅存在于日本各地大量的“慰灵碑”，在一些游览胜地还建起了比“慰灵碑”、“忠灵碑”规模更大的建筑群。

建于日本石川县护国神社里的大东亚圣战碑。



爱知县的三根山山谷，是山青水秀的历史名胜，沿着崎岖的山道前行，会看到其间布满了上百个不同级别的“慰灵碑”。再向前，则是一个由甲级战犯、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题名的“殉国七壮士庙”。庙里还刻有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的题词。这是为当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7名甲级战犯建造的坟墓。墓前竖有一块三四米宽的牌子，记述了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生平事迹”。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就看到3位八旬老人驱车前来，他们在墓前恭敬地鞠躬、行礼、志哀，后来又有好几位青年来到墓前毕恭毕敬地立正哀悼，这不是公然为东条英机等侵略者招魂和歌功颂德吗？

作为一个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海滨城市——宫崎，号称“日本传统的发源地”。就在市区西北的高坡上有一座1940年日本最高的建筑物“八纮一宇”塔。此塔是由侵华日军在中国掠夺各地富有文物价值的珍贵石料作为“战利品”献来建成的。当时从中国抢掠的石料共计189块，分别来自长城、泰山、中山陵、明故宫、黄鹤楼等地。塔名“八纮一宇”的含义是“制霸世界”，这是一条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典型标语，也是把日本引向战争的精神支柱。可悲的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竟是从这里点燃的。如今这里已成为宫崎市一大观光胜地，每天车水马龙，游客川流不息。试问，日本想让参观者受到什么样的教育?”

读完此文后，我也不禁思考今天的日本到底怎么了。战后我们以德报怨，播下了龙种，难道收获的是跳蚤?

自从1980年日本法务大臣奥野诚亮在内阁会议上指责教科书缺乏培养爱国热情的内容后，从自民党到社会各团体都对教科书群起而攻之，日本政府更是强行规定不按要求修改的历史书今后不能出版，企图淡化甚至抹杀日本的侵略行为。如：将“侵略”一词改为“进入”；将“九一八事变”说成是日军“炸了南满铁路的一个地方”；将“三光政策”含糊地说成是“日军采取的保安措施”；而把“南京大屠杀”狡辩为“日军出于激愤而杀了一些中国军人”；等等。这样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教科书把年轻一代引入了歧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有所行动，不能任其颠倒黑白!

幸好日本广大人民群众是反对战争，愿意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在日本，竭力美化侵略战争的只是少数人，当然坚定不移批判军国主义罪行的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对侵略战争史了解肤浅。加上舆论宣传的误导，特别是右翼翻案势力的猖獗活动，日本人缺少正确的历史观。近年来，也有一些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著书来揭露和声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如著名的《东史郎日记》等。松本草平的这本回忆录也是日本国内为数不多的揭露日军侵略战争罪行的图书之一。在目前日本国内右翼猖獗的大环境下，这些老兵的忏悔是需要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冒一定风险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出版者有义务将其历史真相告诉给大家，尤其

是告诉青年一代，60年前日本曾在亚洲发动了一场怎样血腥而肮脏的战争！

泰戈尔说，蛮横和嗜武恰恰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软弱和不自信。日本人的性格中既有尚武好斗的一面，还有欺软怕硬的一面。140年前，美国海军准将佩利攻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败北后竟在美军登陆处奴颜婢膝地为其建纪念碑；二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日本人马上又媚态十足地称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为“恩人之帅”，并准备再为其建个纪念碑。你能想像这是个在此之前野蛮地侵略了大半个亚洲、凶残地杀害了2000多万名邻国平民的国家吗？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过：“日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亚洲有必要记住这一点。”我们更不该忘记的是：在近现代100多年间，中国屡遭日本侵略和欺辱。我们愿意和日本人民世代友好相处，但一厢情愿不行，友谊是相互的，更是需要实力来维护的。在手捧橄榄枝笑迎和平的同时，不要忘记身边要有根防身的棍子！

是为跋。

华野

2004年12月于千佛山下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并向所有敢于揭露侵略战争、反思军国主义罪行的日本友人致意！

为什么二战初期日苏要调集重兵在一片不毛之地发动一场秘而不宣的战争？

为什么此战被视为日本侵略国策的转折点？

为什么一向骄横的日本陆军省肯宣布“诺门罕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首次战败”？

为什么战后60多年日本对此战一直讳莫如深？

